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00 學年度

博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黃美娥教授

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
移植與再造

The creation of fiction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inheritance, transplant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fiction in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研究生：林以衡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七月

本論文之寫作曾獲：

中華發展基金會獎助研究生赴大

陸地區研究

教育部 99 年度人文領域人才培育

國際交流計畫

國科會 100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

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

文」

之獎助

謹此致謝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論題，主要探討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東／西文化的交互影響下生成；以及由東亞、西洋文學的脈絡出發，探究它對雙方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就研究時間而言，本文論述範疇集中於日治時期（1895-1945）；就研究對象而言，主要是以刊載於各份報紙上的漢文通俗小說為文本分析對象，探究其敘事組成、文體變化與內容思想。外緣資料則考察此時期流動於東亞各地與臺灣間的小說書籍為重點，析論日治臺灣圖書文化如何與東亞脈絡相接軌，兩者相輔相成，以勾勒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市場的面貌。

立基於上述議題，本論文由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對東亞小說與西洋小說進行「接受」、「移植」與「再造」等各項觀點出發，考察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生成的原由，探討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跨領域、跨文化的思考模式下，擁有匯聚各方文化的特點，並追問臺灣文人在對中國、日本或西洋翻譯小說閱讀後，如何將之透過傳抄、模擬的方法，再造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形式與內容，最後傳達給日治臺灣讀者閱讀，日治臺灣閱讀者因此能從中接受到東、西文化交錯下多層次的閱讀體驗。

在內容、章節架構安排上，本論文由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敘事手法和文體變化的討論為起點，以文本精讀的方式，分章論述小說敘事背景、敘事模式和敘事角度等問題。文體變化方面則探討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歷時性變化，以及文體分類的共時性問題。其次，論述中國、日本兩地小說書籍如何代銷和傳播進入日治時期的臺灣，此圖書傳播／接受的現象，將可作為東亞脈絡下臺灣與各地圖書往來互動的例證。最後，分別論述中國演義傳統、日本講談文化和西方翻譯小說在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承衍、紮根和譯介過程，並研析其所表現出如「桃花源」意涵、忠孝精神的宣揚、復仇觀的建立，以及與西方啟蒙精神、政治隱寓和奇幻特點的交互融合。經由上述各項議題的研究，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跨界容納多元文化，以成就己身繁盛面貌的特點，將被本論文所彰顯，而同時，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研究價值也將更被學界所肯定。

關鍵字：漢文、通俗小說、東亞、西洋、接受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the creation of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literary works were produced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elaborates on the permeation, transplantation and re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time scale, it focus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In the main material, it emphasizes on the popular fiction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pays close attention on its narrative, genre and content. Besides, I also consider the catalogue of fiction prevailed over Eastern Asia, seeing how Taiwanese culture associated with Eastern world. In this way,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book market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is thesis begins with the ideas of permeation, transplantation and reformation.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ultures. When Taiwanese literati read the fiction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Japan and Western world, we can notice that they are influenced and stimulated by this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create the new form and content as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reader liv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an experience styles combined wi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is thesis, I start with the discussion of narrative and genre. I take the close reading as the main strategy to discuss the narrative background, mode, angle and so 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re, it not only elaborates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vernacular Chinese, but also researches on the synchrony existed in genre. Secondly, it demonstrates the situation that various books from Chinese and Japan was sold and transported into colonial Taiwan. This special transport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Eastern Asia.

Finally, it illustrates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reinforcemen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novel tradition, Japanese Kōdan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fiction, such as the metaphor as the “Utopia”, the spirit of loyalty and piety, the concept of reven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 and fantasy. After this research, it manifests the truth that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possesses the great importance in history.

Keywords :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 Popular fiction , Eastern Asia , Eastern world , accept

謝辭

論文口考完的剎那，雖然心情喜悅，卻更覺責任重大，提醒自己仍要秉持著學無止盡的態度，去接受更嚴格的挑戰。畢竟拿到學位只是一個開始，拙文也還不算完美，期勉自己就算大環境充滿變數，也要持續保有解決問題的熱忱。

但，要是沒有身旁師長學友的協助與鼓勵，資質平凡的我大概也不會在自大學起始的十二年後等到這一刻。首先最要感謝的，就是自碩班時期持續溫言鼓勵我的美娥老師，回想當時和老師並不認識，只憑藉著一股傻勁向老師請益問題，沒料到老師竟然願意在百忙中與我見面，提點學生不少研究方向。之後，在修讀博士學位時，老師不但是我研究上的恩師，和雅能師丈更是在我遇到挫折時不停給予溫暖關心的親人。我是個粗心大意之人，老師卻每每包容我的過失，讓學生又慚愧又感謝。而碩士班指導老師廖振富老師，也是自碩班以來始終堅持直話直說的原則，指正我的缺失，我才能在老師的督促下，不停改正問題，雖然至今仍努力不夠，但有兩位老師的關懷與指導，讓我倍感幸運。口試委員徐志平老師是大學時的恩師，老師如同過去般指正我論文的問題，讓我不禁回想起在南部求學時的快樂時光。李進益老師在我撰寫單篇論文時，雖未謀面就已熱心地提供不少資料，以及在口試時毫不保重指出我可以努力和改進的地方，和侯雅文老師在初審乃至於正式口考時，字字句句都為學生帶來鼓舞的力量。

感謝我的母校嘉大中文及師長們，有遠見地把「臺灣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同列必修，輔以西方文學理論的講授、「莊子」與「史記」課程的合作無間，讓我覺得 30 歲以前最正確的選擇，就是大學志願由南而北的填，希望離開臺北，感受陽光與泥土的味道。感謝政大中文提供自由且融洽的學術環境，我很幸運學生生涯的最後一站能在這裡結束。也感謝政大臺文所「東亞文學專題研究」帶給我博一時的啟發。此外，也感謝清華臺文所柳書琴老師的通俗課程，讓一個碩一時感到茫然的學生找到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而臺大臺文所視我如一份子的體貼，讓我永遠感謝這麼溫馨美好的環境。此外，感謝中央研究院單德興教授在這一年給予學生的鼓勵，以及施懿琳老師、余美玲老師在為某些計畫案提供意見時為學生所樹立的風範，讓學生見識到嚴謹且認真的研究態度。當然，政大中文鄭文惠老師所帶領的「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學長姐們，謝謝各位學長姐在學弟前面成為最好的學習對象。感謝同指導老師並一起同甘共苦的學弟妹俐茹、品涵、富閔、席昕、偵宇等人，和自碩班以來，芷凡學姐、育婷學姐的細心照顧，更讓學弟銘記在心。感謝所參加過的研習營如臺大「東亞文化研究論壇」、「文與體跨領域對談」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暑期翻譯研習班」帶給我的知識成長。大學兄弟阿信、恩賜等人的打氣，以及景文在學術路上一一起合作的患難精神，更是我在求學時的助力。還有自碩班時期就屢次被我麻煩的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六樓、五樓的館員們，謝謝你們在我蒐尋資料時的協助與撰寫文章時的鼓勵。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總是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給予我最大的自由以及快樂無憂的成長過程，爸、媽，謝謝您們。

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1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目的.....	7
第三節、研究回顧與章節安排.....	11
第二章、海納百川：東、西文化匯流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與文體演變.....	21
第一節、對世界的認識：跨越全球的敘事場景.....	22
一、作家筆下的西方國家：歐洲與美洲.....	23
二、陌生與想像的冒險世界：非洲.....	25
三、對鄰近國度的描繪：東南亞.....	30
第二節、由文言到白話：臺灣通俗小說的文體變化.....	33
一、文言／白話的糾葛：臺灣文人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文體認識觀.....	33
二、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形成：由文言到白話的歷時性考察.....	41
三、文言未廢、白話當興：白話通俗小說的成熟.....	46
第三節、文本、閱讀與再書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類型與文體再造.....	49
一、承接中國：章回體、傳奇體和叢談體小說.....	50
二、移植日本：日本漢文體小說.....	52
三、學習西方：新聞體小說.....	61
第三章、跨地域的圖書流動：日治臺灣通俗圖書市場對小說書籍的代銷與接受.....	69
第一節、臺灣文人在上海的訪書活動.....	70
一、連雅堂「雅堂書局」、莊垂勝「中央書局」與蔣渭水「文化書局」.....	71
二、張純甫與「興漢書局」.....	73
三、漢文書局的主要目的：文化維護與知識啓蒙.....	81
第二節、日治臺灣書店對中國通俗小說的代銷：以「蘭記圖書部」為觀察對象.....	84
一、「蘭記」所販售的各類小說.....	85
二、「蘭記」所售之中國通俗小說的特點與管道來源.....	90
三、「代銷」之必要？印刷生成與閱讀習性.....	101

第三節、由日本到臺灣：圖書館中的日本「軍談」和通俗讀物.....	106
一、「軍談」的由來及其文學脈絡.....	107
二、「軍談」在日治臺灣的流傳.....	111
三、「軍談」外的其他通俗讀物.....	121
第四章、來自中國：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傳統的繼承.....	129
第一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敘事模式的承衍.....	129
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演義」傳統.....	129
二、「演義」敘事結構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沿續.....	132
第二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取材於中國演義的情節.....	140
一、〈金魁星〉對中國演義情節的運用.....	141
二、〈新蕩寇志〉對《蕩寇志》的再造.....	145
三、〈奇人健飛啓疆記〉對《三國演義》人物的複製.....	147
第三節、暗戀桃花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中理想世界的模仿.....	149
一、再現桃花源：〈金魁星〉的重刊意義.....	150
二、尋覓桃花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桃花源的建構.....	152
三、消逝桃花源：理想世界的沒落.....	156
第五章、源於日本：「講談」文化在臺灣的移植與紮根.....	159
第一節、「講談」：作為日本文化的重要角色.....	159
一、「講談」在日本文化的發展過程.....	159
二、著名講談師及代表作.....	166
第二節、日治時期在臺灣流傳的講談.....	170
一、活躍於臺灣社會的講談活動.....	171
二、講談師松林伯知及其講談之作.....	175
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於講談的學習與模仿.....	177
第三節、中、日文化混生下的漢文通俗小說：「忠孝」與「復仇」.....	186
一、承衍自中國通俗小說的忠孝精神.....	187
二、來自日本文化的忠孝一體觀.....	192
三、盡忠盡孝：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復仇觀.....	196
第六章、翻譯西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西方小說的譯介與模仿.....	205
第一節、日治臺灣傳統文人接受西方小說時的困境.....	206
一、「翻譯」的困難處.....	206
二、透過日文翻譯的中介模式.....	211
三、臺灣文人開始接觸西方文學.....	212
第二節、由原著到譯本：西方翻譯小說在臺灣.....	214
一、奇幻想像與冒險犯難：《格理弗遊記》和《魯賓遜漂流記》.....	218

二、俠盜與愛國故事的譯介：《羅賓漢》和《愛的故事》	220
三、童話名著的引入：《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與《安徒生童話》	224
第三節、翻譯的影響：創作範本、增廣見聞與娛樂效用.....	226
一、創作範本：敘事視角的轉換與新題材的運用.....	226
二、增廣見聞：西方議會制度的體驗.....	238
三、娛樂效用：神怪、詼諧到奇幻的跨越.....	241
第七章、結論.....	247
參考書目.....	253
附錄一：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同業掛號.....	265
附錄二：上海書業公所書底掛號.....	269
附錄三：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張純甫〈守墨樓書目〉所藏書籍及來源一覽表.....	288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中葉的今日，作為世界文學一環的臺灣文學，已無法由跨領域、跨文化的學術浪潮中被摒除，因此，臺灣文學研究自從成為一門學科後，研究者莫不致力於以新方法、新觀點進行詮釋，期待能夠得出新的研究價值，而在此之外，新史料的蒐集與開發，個人以為也是臺灣文學可以另闢新局的一個研究取徑。

臺灣身為東亞文化圈的一份子，鄰近中國，卻又位於大陸與大洋、東北亞與東南亞間的交通樞紐，於是成就臺灣再受到中國文化的直接影響外，也源源不絕地受到世界各文化的衝擊。這個情況，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更為明顯。日本統治臺灣以前，清朝已經在臺灣統治了兩百多年，臺灣由原本被清廷視為不毛之地的邊疆區域，卻在清朝國力衰退、門戶動開的時期，被建設為略具現代化規模的省份。日本殖民勢力進入臺灣後，更加速臺灣現代化的進展，大和文化、西洋文化也隨之不停地進入臺灣。但近二百年根植於臺灣的中國文化，並不因為政治的阻絕而被抹除，許多中國文化仍在臺灣被保存、延續，源源不絕地來到臺灣，甚至是與日本、西洋文化相互融合，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的東亞文化，乃至於西方文化對殖民地臺灣而言，皆非過去式，而是進行式。

因此，臺灣如何以固有的漢文化為基礎，並吸納世界各地匯聚而來的文化養分，以創造出自己的文化，將是本文以臺灣通俗小說為例，在文化流動的思考下，探究臺灣通俗小說如何移植東亞／西洋小說的形式、文化與思想精髓，並加以轉化、再造後讓自身得以與世界文化接軌，即是本研究的首要目標。

臺灣文學研究發軔之初，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是最為人所注意的題材，而後臺灣古典詩歌、散文、母語文學，以及現當代的臺灣小說、詩歌、散文的研究成果也日益豐碩。除此之外只要翻閱日治時期的報紙，即可發現自《臺灣新報》、《臺灣日報》開始，已有少數使用日文寫作的小說刊載於報紙上。到了《臺灣日日新報》結合兩報刊行，並在明治 38 年（1905）另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後，由於臺灣知識份子們擁有漢文作品的發表空間，這些報紙上的小說已不再限於日文書寫，而有漢文小說的加入。¹但這些以漢文書寫的小說，除了臺灣本地文人例如李逸濤、謝雪漁、魏清德和佩雁等人的作品外，還有一部份是經由轉載、

¹ 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2004 年），頁 242。

改寫和仿作等方式，接受日本漢文小說而來的作品²，無論這些小說來自何方，這個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都會受到東亞與西洋文化的影響。以東亞文化而言，中國通俗小說與日本漢文小說、講談文化，對於日治初期開始嚐試書寫小說的臺灣知識份子而言，是一部部適於模仿的學習範例。而西洋小說的引入，對臺灣知識份子來說，不但是迥異於傳統創作手法的新體驗，蘊含於內對新知識、新觀念的介紹，更開啓臺灣作者、讀者的新視界。

有鑑於此，如何梳理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與東亞／西洋接軌的問題，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創作手法、文化接受、翻譯改寫等諸議題將成爲本文的研究重點。以此問題出發，本文以東亞／西洋小說傳入臺灣爲例，研析二者如何成爲日治臺灣文人書寫漢文通俗小說時的學習對象。並討論東、西文化交混下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上，佔有何種重要的意義。故本文將根據下列問題，對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作出探討：

(一)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和文體演變：

文學由語言、文字堆砌而成，這是文學的基本定義，若沒有語言、文字作爲素材，作家也難以將其組織排列，成爲一篇篇供人閱讀的文學作品。世界上任一地、一國的文學皆是如此，作爲世界文學的臺灣文學自不例外。而由於臺灣文化、政治的組成複雜，在探討通俗小說具有的文化意義前，研究小說的敘事模式和文體演變就有其必要性。本論文將小說的敘事模式和文體演變列於研究一環的目的在於：唯有對小說基本特性有所認識，才能進一步發現它在敘事組成時所混雜的傳統與創新、文體的變化和分類³，並思索它在殖民統治下的時代意義，以及在東亞文學脈絡中的重要地位。

以往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大抵直接由文化意義的闡釋入手，而忽略了其作爲敘事作品的特質，實應由敘事和文體研究著手，才能爲一門學科奠定堅實的基礎。敘事和文體同爲文本中心論的研究派別，兩者同異相間，卻又可以於文本研究中相輔相成，或是分別論述，申丹說：

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敘述學和文學文體學都是 20 世紀形式主義文論這一家族的成員。它們關注文本、文學系統自身的價值或

² 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爲例〉，《中國文學研究》第 26 期（2008 年 6 月）。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73。

³ 所謂「文體」(style)，一詞涵義頗多。既可指某一時代的文風，又可指某一作家使用語言的習慣；既可指某種體裁的語言特點，又可指某一作品的語言特色。它包含文體(或語體)和風格兩方面的意思。秦秀白，《文體學概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1。

規律，將文學作品視為獨立自足、自成一體的藝術品。⁴

敘述學的目的不在於詮釋作品，而是找出敘事文學的普遍框架和特性。敘述學家注重理論模式的建立，注重探研敘事文本共有的構成成分、結構原則和運作規律，忽視創作主體的作用。與此相對照，小說文體學家旨在探討具體作品中語言特徵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因而關注作者所做的特定的語言選擇。但有的敘述學家也注意敘事作品之間的差異，尤其在與文體學的“文體”有部分重合的“話語”這一層面上，不少敘述學家不僅注重對敘事文本的共同特點進行探討，而且也注重對對具體文本的特徵進行研究。⁵

申丹之語，指出敘事學與文體學在對文本進行研析時的互補作用，對於吾人進行文本研究時提供了一個參照模式。其實，過去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中，並不是沒有研究者注意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加以補足。但問題在於，這些論述仍較集中於作家個人作品的討論，缺乏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整體敘事特性的整理與分析，因此難以顯現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整體的敘事特性和文體特點。⁶所以本文由對小說文本的細讀出發，首先，以全面性的觀察，論述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背景。此乃有感於在小說研究中，人物、角色的形構固然是為人所重視的一個環節，相對上來說，小說中的敘事場景，卻往往被忽略。近年來，學界已經開始反思這個問題，無論在詩歌或是小說的範疇，研究者已開始注意到小說場景的重要性⁷，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而言，亦可藉由敘事場景的研究，發現其與世界接軌的特點。其次，本文將探究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文體變化、文體類別等基本特徵。最後，以分類論述的方式，針對各類文體如中國演義、日本講談或西方翻譯小說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接受、模擬和再造的情況，並輔以探討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被各類文體影響後的敘事模式。

經由本文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敘事手法與文體演變的研析後，將可明瞭漢文通俗小說在由文言文發展到白話文時，文體產生的歷時性變化。以及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呈現了哪些文體類別。最後，在分章論述各外來文體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影響時，又可從中了解諸如敘事手法的承衍、敘事視角的創新等問題⁸，

⁴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

⁵ 同上註，頁8。並轉引原出處於 S.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London: Methuen, 1983, p. 4, 以及上引 G. Prince, *uNarratology*, ” p. 524 & p. 526.

⁶ 例如曾婉君，《〈三六九小報〉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文學敘事與文化視域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⁷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5期（2009年2月）。

⁸ 秦秀白指出：「作家與小說的目的雖然也是向讀者傳遞信息，把讀者引進一個建立在現實生活基礎上的虛構世界，但作家本人對讀者（受話人）的了解是甚少的，何況一本（篇）小說並不是寫給一個人看的，作家在創作時不可能對眾多的讀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此，為了使形形色色的

對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和文體全貌將有全面性的統整作用。

（二）東亞跨界交流下小說書籍的傳播／接受：

隨著全球化的議題在各研究層面中持續發酵，臺灣文學研究在迎向世界之前，更應該先由與東亞文學的接軌出發，以闡明臺灣文學在東亞網絡中的重要性。東亞文化的形成，是由諸多國家所共同融合而成。其中，中國由於在歷史長河中佔有悠久、漫長的發展歷程，連帶地使中國漢文化，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向外傳播，特別是作家利用文字堆砌成詩歌、散文或是小說後，更擴大其影響幅度。而和中國一樣，與臺灣有過實質政治關係的日本，漢文化也在日本由古代跨越到現在，甚至持續到未來，成為大和文化的一部份。

而由中國散發出來的漢文化，藉由文學作品的媒介，形成東亞諸國無法忽視的文化原素。小說作為東亞文學的一環，其對外傳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詩歌和散文的成就。⁹1895年臺灣改由日本統治後，一水之隔的臺灣與中國，雖然政治分離，但並未造成文化交流的中斷，擁有近五千年歷史的中國，雖在此時政治情勢動蕩不安，但其作為漢文化輸出國的重要性，對日本、臺灣而言，仍是必須正視的文化影響。與日治臺灣同時期、原本僅是一個小漁村的中國上海，因為開放成為通商口岸的關係，早已躍升為東亞著名的近代化都市。隨著經濟快速的發展，上海的文化事業也隨之扶搖而上，配合印刷事業的勃興，中國通俗小說的再版、重印與對外傾銷，造成日治時期臺灣的書店，開始大量地引入這些由上海各書店出版的中國通俗小說。此外，日治時期臺灣的各書店及書店經營者，在臺灣通俗小說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但，臺灣的書店為何會引入這些小說？臺灣的閱讀者為何喜歡閱讀這些小說？以及臺灣通俗小說又在書籍、書店與閱讀者的交流環結中具有何種意義？上述是本文透過史料的蒐集和分析後，所欲探討的問題。

另，中國通俗小說在東亞文學脈絡中的傳播，可以建構出由中國到日本的路徑外，是否能再度地建構出由日本到臺灣的傳播路徑？當這些小說經由日本作家的改寫、譯寫或是仿作後來到臺灣，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及文化價值，將可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形成，開拓出另一個不同於小說直接由中國到臺灣的思維模式。所以，本文將檢視日治時期各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其中錄有大量日文書籍

讀者能正確理解和評價一部(篇)作品，作家除了應該用各種方式交待清楚敘述的時間、地點、背景及有關的人物外，還必須注意敘事的人稱，恰當地選擇和變換敘述或描寫的角度 (point of view) 秦秀白，《文體學概論》，頁 242。

⁹ 例如李進益的研究已經為我們指出中國通俗小說由中國到日本的輸送方式，以及對日本作家的的小說觀、寫作觀的影響。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如軍談、通俗讀物等於圖書館中供人閱讀¹⁰，這些書籍的特點為何、將會灌輸何種觀念給臺灣讀者？此亦是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最後，這些由中國上海進入到臺灣的小說書籍，以及從日本而來的軍談、通俗讀物，它們除將見證東亞圖書業蓬勃發展的生命力，和繁盛的交流關係外，亦將共同組織起臺灣通俗小說市場的繁盛面貌，連帶提升臺灣圖書市場在東亞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

（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各地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

在跨領域研究思潮的影響下，文本（text）的開放性將被彰顯。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說：「每一個文本都是引語的鑲嵌所成，所有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納和改寫。」¹¹德國學者姚斯（Jauss Hans Robert.）也從讀者接受的角度出發，認為：

一部文學作品，即便它以嶄新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它卻可以通過預告、公開的或隱蔽的信號、熟悉的特點、或隱蔽的暗示、預先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接受。它喚醒以往的記憶，將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¹²

基於上述論點，本文將首先思考中國通俗小說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產生的影響。對於曾經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臺灣文人而言，政治上的遠離，並不能代表他們能輕易地割捨舊有文化。特別是內容精采生動的中國通俗小說，仍是這些文人念念不忘的文學作品。¹³這些中國通俗小說成為臺灣文人書寫小說時，在小說敘事模式／內容編寫上不可缺的範本。黃美娥在分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小說專欄設置時，已經注意到臺灣小說在敘事成規方面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討：

從『說苑』欄到『小說』欄的進程軌跡，正指出了臺灣小說敘事成規的確立與實踐，其實歷經萌生、形構與成熟的不同發展階段，而這充分顯露『小說』概念內涵的逐步進化事實。¹⁴

¹⁰軍談（ぐんだん），江戶時期的通俗小說，或是軍記書、軍書。日本國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國語大辭典（4）》，頁 1180。

¹¹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Toril Moi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6. p36.

¹²（德）H.R 姚斯等著、周寧、金元蒲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遼寧文學出版社，1987年9月），頁 29。

¹³ 例如，臺灣文人李逸濤撰有〈小說藝語〉和〈小說閑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4 年（1911）3 月 1 日，由此二篇文章，可見當下文人流露出對中國章回小說的喜愛和熟讀。

¹⁴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63-396。

細讀日治時期臺灣報刊上的漢文通俗小說，除了外在專欄在形式上的改變，可察覺小說敘事成規的逐步構成外，在小說敘事技巧方面，也明顯地接受中國通俗小說固有的敘事模式。例如佩雁的長篇小說〈金魁星〉，就時常出現「下文自有交代」、「俗套之言，毋須多贅」、「按住漫表」等，作者以全知敘事角度進入小說內容的敘事手法。這種書寫手法，保留長篇章回小說或是話本中傳統說書人的口吻，成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吸納日本文化、西洋現代性觀念時，不曾放棄的書寫模式。¹⁵唯有針對此書寫模式作出更細緻的探討，擴及思考小說敘事視角受到西方手法的影響，才可發現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形式、手法美學上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承衍和改變情況。而此敘事模式將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文人書寫小說時的習性，以及如何在此舊形式上，進一步對小說添加異國想像、科學理性概念時不可缺乏的研究重點。

其次，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除了日本漢文小說在體例上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造成影響外，是否還有其他文學成份，也在臺灣小說中紮根？本文將以日本文化中有著漫長發展歷史的「講談」文化為例¹⁶、以日治時期在報紙上所刊載的講談活動、文本為分析對象¹⁷，考察臺灣文人如何模仿、譯介日本講談，以及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容納講談成為己身的一部份。這將是在日本漢文小說、軍談書籍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接受議題。¹⁸透過這個文學接受現象的觀察，還可分析其寓於情節中對於「忠孝」觀念的傳達，並進一步與中國演義、日本軍談等各項被臺灣小說所接受的文體並置思考，以了解「忠孝」精神在東亞文化脈絡中的重要性，以及臺灣閱讀者如何在中國／日本的「忠孝」脈絡中自處，並在「盡忠盡孝」後所形成的「復仇觀」。

如果說中國傳統全知視角的敘事手法，是作家與讀者們彼此間最熟悉的寫作／閱讀默契，那麼，西方翻譯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事方式，則為臺灣作家、讀者

¹⁵ 此敘事模式中，雖然仍存在一個以說書人身份出現的「我」，但羅鋼仍將其歸於第三人稱的敘事型態中，但區分的依據仍應是以敘述者與小說人物是否處於同一虛構的藝術世界中。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165。

¹⁶ 講談（こうだん）是日本的傳統藝能，它起源於戰國時代的御伽衆（おとぎしゅう），主要方式是主講人坐在一高臺，手持紙扇，並配合節拍，或以談話、或以歌唱形式，為聽眾講述軍談、歷史方面的物語，以及政論意見。此一文化在江戶末期與明治時代間大盛。日本国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国語大辭典（5）》（東京：小學館，2001年5月），頁372。在臺灣，講談文化的盛行，除了作品刊登於報紙上外，還可見日本學者針對臺灣的「講古」以及日本的「講談」進行比較性的研究。塘翠迂人，〈臺灣講古私考〉（上、下），《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129、131期（昭和3年（1928）3月、5月）。

¹⁷ 由日本引入並刊載於日治臺灣報紙上的講談文學即多，最富盛名的當為松林伯知（臺灣記為「痴」）一系列的作品，例如〈二代の譽塚原左門〉、〈北白川宮殿下〉、〈山田長政之傳〉等。其中也有如〈塚原左門〉被翻譯成漢文。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原左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911）1月22日。

¹⁸ 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究》第26期（2008年6月）。

們提供一個在書寫與閱讀上的新體驗。¹⁹以日治時期翻譯進入臺灣的西洋文學名著《格理弗遊記》為例，譯者在「前言」時特別強調：「詳細且看本文，此下皆用作者自述口吻」。²⁰此說明表現當下的臺灣讀者們，對於第一人稱敘事手法的好奇與陌生。所以，在中國與日本外，臺灣文人如何譯介西方小說以融入漢文通俗小說中，並在敘事手法、增廣見聞和娛樂效用上受到何種影響？亦是本論文針對哪些西洋著作譯介為漢文通俗小說的探討後，欲論述的問題。此研究將有助於了解西洋翻譯小說進入臺灣後，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融合，並豐富其組成原素，以及帶給臺灣讀者們一個不同以往的閱讀體驗。²¹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目的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小說往往被視為「小道」，故其重要性及文化內涵，曾長時間被忽視。但小說如同詩歌、戲曲或散文一樣，皆是組成文學群體不可缺少的文類，無論西方或是東方的文學史，也逐漸重視小說的作用。是故，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為關注面向，論述範圍包含文言和白話小說兩者。以此兩種小說研究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轉變到白話的過程，並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進行文體上的分類，兼論其敘事手法上的運用。此研究方法不但是開拓過去較少為學界所注意到的研究領域，若能從中發掘受影響的文化層面，並了解其在殖民統治下的文化意義，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議題將不再是被忽略的研究範疇，且在東亞／西洋文化的衝擊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將逐步開拓出自己的獨特性。

本文將由內部文本分析，配合外部資料的蒐集與論述，以此兩項研究主線架構全文。最後，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功用、影響，和各文化在小說中滙流的現象。全文將依照由內而外的分析，先針對小說的形式問題進行論述，並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加以說明。最後，得以證明對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東亞文學脈絡中的重要地位。

一、研究方法：小說跨界行旅、文化接受與文本分析的多層面考察

日治臺灣作為各文化交流的匯聚點，東亞、西洋文學脈絡對於臺灣文人創作漢文通俗小說有何影響？本文先以內部文本的分析為主，藉由對文言／白話通

¹⁹ 按羅鋼的解釋，第一人稱敘事情境即是敘述者存在於虛構的小說世界中。第一人稱敘述者就像其它人物一樣，也是這個虛構的小說世界中的一個人物，人物的世界與敘述者的世界是完全統一。同上註，頁 163。陳平原並指出，中國傳統小說如唐傳奇，並非沒有使用過第一人稱敘述的方式，雖暫時突破全知敘事角度，但仍是少數。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7 月），頁 64。且使用「余」、「予」、「吾」等文言詞彙，也與白話的「我」在閱讀上會有差異。

²⁰ 佚名，〈小人國記〉（緒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昭和 5 年（1930）3 月 3 日。

²¹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6 月）。

俗小說的精讀，論述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文轉變為白話文的遞變過程，以作為論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歷經模仿、學習各文化小說後的最終結果。並進而說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類型，以及如何模仿、再造這些文體，以成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樣貌。而這些文學現象，自然有受到殖民政府以政治力進行操控，以及具有西方知識與東亞文化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調合的特徵。在東亞／西洋小說源源不絕地進入臺灣下，論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與東亞／西洋接軌的情況下，不但敘事手法、文體樣貌趨於多元，由於它接受了中國演義、日本講談和西洋翻譯小說等文類，造就它多采多姿和兼容並蓄的特點，進而走出一條屬於自我的道路。如此，即可論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兼具接受和再造的能力。

其次，中國小說書籍、日本軍談、通俗讀物與西洋名著如何跨界來到臺灣，並成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組成部份？此乃本文經由資料蒐集、整理和綜合思索後，所欲釐清的問題。意即，臺灣在中國通俗小說、日本軍談、通俗讀物以及西洋名著譯介的脈絡下，如何建構起小說傳播的文學網絡？透過對日治各地書店圖書目錄、圖書館館藏的探索，和對西方原著的追尋，將可得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與東亞／西洋的小說市場接軌，與在文化上疊合的結論。²²且經由此外圍研究路徑的分析，不但可證明臺灣作為文化接受者的地位，透過小說圖書在臺灣匯流的論述，可助本文深入思考東亞／西洋小說在臺灣的流通，以及異文化敘事模式在臺灣通俗小說中的發酵與承衍。

由上述欲處理問題之步驟與方法可知，本文的理論架構根源於接受理論。此理論乃是姚斯有感於傳統文學史的不足，而特別注重作品所產生的影響力所提出，他說：

藝術作品的歷史本質不僅在於它再現或表現的功能，而且在於它的影響之中。領悟到這一點，對建立一種新的文學史基礎有兩點作用。一方面，假如作品生命的產生“不是來自于作品自身的存在，而是來自于作品與人類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不斷的理解和對過去的能動的再生產就不能被局限于單個作品。相反，現在必須把作品與作品的關係放進作品和入的相互作用之中，把作品自身中含有的歷史連續性放在生產與接受的相互關係中來看。換言之，只有當作品的連續性不僅通過生產主體，而且通過消費主

²² 筆者曾於 2009 年 7、8 月接受「中華發展基金會」之補助，前往上海圖書館、上海檔案資料館、徐家匯藏書樓、上海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辭書出版社以及南京大學等地蒐集清末民初上海書肆的相關資料，發現不少值得參考的資料。另，2010 年 12 月，筆者亦蒙教育部「人文領域人才培育交流計畫」之補助，前往東京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東京立川市國文學研究所蒐集資料，查詢臺灣未能見、但在日治時期卻又有在臺灣通俗界中流傳的軍談、物語，並與臺灣大學圖書館的軍談館藏綜合整理。以上將作為本文論述東亞小說如何傳播進入臺灣時的參考資料。

體，即通過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調節時，文學藝術才能獲得具有過程性特徵的歷史。²³

本文認為，中國／日本圖書進入臺灣，對臺灣而言自是一種接受行爲。但中國演義、日本講談和西洋翻譯小說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和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摻雜了各式如章回體、日本漢文小說體和新聞體等文類，亦是接受理論所能包括的論述範疇。由於上述作品頗多，所以在選擇分析材料時必須有所取捨。首先，本文的「漢文」用法是相對於「日文」的概念而言，主要是基於在當時也有不少日文小說刊登在各報刊上，但受限於論文篇幅，這些日文小說暫不列入本文的討論範疇。其次，如何界定「通俗小說」的性質、以作為本文選材標準？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通俗」（Popular）帶有「受喜愛的」、「受歡迎的」、「討人喜歡」和「刻意迎合」的特質²⁴，所以這些被刊登在報紙上供閱讀者閱讀、具有娛樂性以及作家試圖迎合讀者興趣而書寫的小說，就成為「通俗」的一環。而本文所選擇分析的作品，大抵上都具備佛斯特（E.M.Forster）所言：「故事」、「情節」、「人物」、「奇幻」、「預言」、「圖式」與「節奏」等特點，故可視之為「小說」。²⁵若進一步閱讀其內容，這些小說還具有「程式化」的特徵。²⁶故本文將這些小說以「漢文通俗小說」稱之，之後的各章節即是以這些小說作為研究對象，闡述其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

除此之外，臺灣讀者作為通俗小說的接受者，這些小說是否能夠滿足他們的閱讀期待，進而在以東亞／西洋小說為寫作範本下，創造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姚斯說：

一部文學作品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對它的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滿足、超越、失望或反駁，這種方法明顯地提供了一個決定其審美價值的尺度。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從審美經驗與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性。根據接受美學，就盡可能縮短接受距離的範圍內，接受意識無須轉向未知經驗的視野，作品就更能接近“通俗藝術或娛樂藝術(Unterhaltungskunst)。

²³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19。

²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10月），頁355-157。

²⁵佛斯特（E.M.Forster）著、蘇希亞譯，《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臺北：商周出版，2009年1月）。

²⁶考維爾蒂（John G. Cawelti）認為：「在研究高雅藝術時，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單個藝術家的獨特成果，而對於通俗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所面對的卻是集體的產品。」又說：「因襲與創新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能，因襲提供的是眾所周知的形象與意義，它們維護的是價值的連續性，而創新呈獻給我們的則是我們先前未曾認識到的新的概念或意義。」所以「程式」即「構造文化產品的傳統體系。」成穹、王作虹譯，〈通俗文學研究中的「程式」概念〉，收於周憲、羅務恆等人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425、428、429。

通俗或娛樂藝術作品的特點是，這種接受美學不需要視野的任何變化，根據流行的趣味標準，實現人們的期待。它能夠滿足熟識的美的再生產需求，鞏固熟悉的情感，維護有希望的觀念，使不同尋常的經驗象“感知”一樣令人喜聞樂見，甚至可以提出道德問題，但只是作為一種預設的問題以一種教育方式“解決”這些問題。²⁷

對中國演義而言，臺灣閱讀者無須視野的變化而自然而然地產生共鳴。但像日本各類小說、西方翻譯小說，則是政治控制和時代演進下的流行產物，亦滿足當下閱讀者好奇的期待。而臺灣更特別的地方在於，當這些小說書籍、多元文體傳入臺灣時，負責引進的閱讀者往往又兼具小說作者的身份，並將小說模仿、再造後，才刊於報紙上為閱讀者所閱讀。所以，在接受理論的輔助運用下，本論文的研究方式，將是結合內部文本的分析與外圍資訊的研究。意即：以對小說的閱讀為基礎，才能進一步將思考範疇拓展至圖書代銷路徑的追溯、文體形式的觀察和內容分析等。解決上述問題，才能了解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將各方文化集大成，進而形成東亞小說脈絡中的風貌。再證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匯聚文化的功能後，其所具有的啟蒙與教化等各項功能，也才能在經由本文外圍和內部的交相闡述後，其價值與重要性得以彰顯。

二、研究目的

日治時代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領域仍待開展，許多問題尚待深入論述與釐清。因此本論文期待以此領域為研究範疇，除了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來源、接受路徑作出整理，以作為聯絡中國、日本乃至於西方文學的傳播網絡外，也將指出小說在敘事手法上所蘊含的承衍現象、再造手法與文體分類、融合等特點，藉由對日治臺灣文通俗小說如何形成的研究出發，擘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發展脈絡。

故本論文之寫作目的在於，一方面可藉由資料的蒐集，整理中國上海、日本各書局、圖書目錄、相關小說等過去鮮少為人所注意到的史料外，還能將其與臺灣本地的書局、圖書目錄相比較，希冀能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化事業的發展、知識的傳播建構一個參照系譜，可協助日後的研究者對日治臺灣漢文通俗文學的整體面貌進行更深入的剖析；並對通俗議題多方省思與激蕩，以上將可讓臺灣通俗文學的未來發展更為茁壯。在此研究目的為取向下，本文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為論述重點，梳理小說的類型、情節與特色。並由「接受史」的視角出發，以及多元文化的思維下，思考臺灣與東亞、西洋兩方小說交流的意義。如此將可帶動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並期許能開拓通俗小說研究的新方法與視野，在未來能夠發掘更多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值得探討的問題。而本論文綜合思考

²⁷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32。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國通俗小說、日本軍談、通俗讀物和講談文化，以及西洋小說，並輔以文化理論的研究，對於日後的研究者若欲以臺灣通俗小說為研究對象、進而思考東亞文學／文化研究的建構與發展，極具重要意義。

第三節、研究回顧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回顧

在過去，由於材料取得較為不便，雖有研究者開創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路徑，卻一直到近幾年，才有更多研究者投入研究行列。本論文探討對象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小說史料的蒐集方面，日治時期臺灣的各份報紙，成為本文主要的材料來源。只要翻開日治時期的報紙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崇聖道德報》或《三六九小報》、《風月》、《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等報紙，皆有刊載各類型的通俗小說。隨著以上幾份報紙的數位化，或是重新復刻，欲閱讀這些小說，已非難事，但要如何了解日治時期到底有哪些類型的小說存在於報紙上，仍須研究者對上述報紙具有全面性的認識，才得以了解小說在這些報紙上分佈的情形。此點並非僅靠數位資料庫的檢索即能得知。故本節先行回顧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情況，其次，輔以對中國通俗小說續衍、書業文化和日本、西洋小說的研究介紹。最後，總結上述各項研究成果，提出本文有別於前述對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進行研究的方式，期能為此研究範疇開闢一個思考方向。

(一)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研究

近年來學者對日治時期通俗小說的選編、集結成書，有助於本文對此時的通俗小說作出初步認識。例如黃美娥、黃英哲兩人所共同主編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集一、二》為日本、臺灣兩地現階段最早的文言小說選集。²⁸其後，亦有吳福助所主編的《日治臺灣小說彙編》。²⁹但以上史料集成皆為選集，並未全面地將所有小說收入於內，所以本文在小說的蒐集與閱讀方面，仍以各類報紙的原件為主。在經由對原件的逐步翻閱後，才能對日治時期通俗小說的特點、分佈情況有通盤了解。至於通俗小說作家與作品的個案整理，目前已有林翠鳳、蕭玉貞和羅景川等人對於鄭坤五小說的蒐集、整理與研究，這些資料的蒐集或論述，都已讓日治文人鄭坤五的個案研究趨於完備，編者所發現鄭坤五的小說如〈火星界探險奇聞〉、〈華胥國遊記〉等也極具探討價值。³⁰相信隨著時間推移，有更多如魏清

²⁸黃美娥、黃英哲主編，《台灣漢文通俗小說集一、二》（東京：綠蔭書房，2007年）。

²⁹吳福助主編，《日治台灣小說彙編》（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年）。

³⁰林翠鳳主編，《鄭坤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11月）。蕭玉貞，《鄭坤五小說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4月）。羅景川，《鄭坤五和鯤島逸史》（高雄：山林書局出版社，2000年）。

德、李逸濤、謝雪漁和佩雁等通俗小說作家的文學總集能夠問世。

在研究成果方面，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目前以黃美娥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例如專著《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一書中，部份篇章即對此一問題有開創性的研究³¹，其後的單篇研究論文如〈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³²，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以西洋為小說背景的漢語通俗小說為分析對象，可見當下臺灣文人如李逸濤、謝雪漁、魏清德等人，在西洋為「現代化聖地」的前提下，如何對西洋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歷史文化的認識，建構出屬於當時臺灣人對於西洋的知識想像，以及探討臺灣人面臨西方現代性時的心理癥狀。〈「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一文，則是針對臺灣通俗小說中的歷史書寫、忠孝教化功用的闡釋，藉以釐清殖民政府如何透過小說，將其國體精神寄寓於內，傳達給殖民地臺灣的作家、閱讀者理解中日文化的共通性，以及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價值。³³上述各篇雖然思考層面不同，但「小說」皆是關注重點。其〈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一文，鎖定「小說」的發現為議題，作為日治臺灣文學新知識秩序生成的觀察指標，並剖析時人文學知識秩序邊界的滑動和知識內涵變異的現象。³⁴

此外，尚有不少碩士論文，是以日治時期的臺灣報紙、小說作為研究方向，例如柯喬文的〈《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以《三六九小報》為研究範圍，論述刊載於《小報》上的各式小說。此文雖以「古典小說」的觀點分析文學題材，而非以「通俗小說」的視角論述小說，但其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研究，仍有開創性的價值。而小說主題的探討，亦是本文重要的參考資料，例如呂淳鈺的〈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及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產生〉，以通俗小說的研究觀點，分析「偵探」主題的小說，如何透過翻譯的手法引進臺灣，並在臺灣與新聞、時事結合，帶給臺灣讀者科學、啟蒙的新視野，成就一個「新大眾娛樂」。³⁵除呂氏關心偵探敘事問題外，王品涵的學位論文《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以一個全新的論述方式，由跨國的視角出發，探討犯罪小說對臺灣通俗小說所帶來的影響，一個新穎的小說類型於焉誕生

³¹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2004年）。

³²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5期（2009年2月），頁1-39。

³³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頁363-396。

³⁴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當代》第221號（2006年1月），頁42-65。

³⁵呂淳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及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產生》（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於日治臺灣通俗文學界。³⁶最後，王俐茹的論文《臺灣文人的記者初體驗及其創作實踐——以李逸濤為例的探討》，雖非專門論述小說的研究，但對於本文考察日治臺灣文人創作通俗小說的歷程時，獲益良多。³⁷以上前行研究，對於本文思考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傳統的敘事成規中「再造」小說，使其兼具文化融合的色彩，極具參考價值。

除了小說作家、小說主題或是針對報刊的研究外，並非沒有研究成果注意到對臺灣通俗小說敘事模式的討論，曾婉君的〈《三六九小報》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文學敘事與文化視域的探討〉，以「女性形象」為論述中心，但已注意到小說書寫時的形式問題。此論文指出《三六九小報》上通俗小說的程式化情節，傳達了大量重複的訊息，反映通俗創作社群的興味，而作者／敘事者的關係、作者聲音對文本故事干預程度的強弱，亦是本論文所關注的重點。雖然此論文取材僅限於《三六九小報》，且議題只限於針對女性被書寫、文化視域或女性圖像的書寫差異等問題進行探討，未能將臺灣通俗小說所受到的影響、承衍作出更入的探究，但仍能幫助本文在以日治時代臺灣通俗小說的敘事模式進行分析時，提供一個參考實例。³⁸此外，蔡佩玲的論文《「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以謝雪漁的文學作品及其人為個案分析對象，將其置於「同文」的議題中探討，以歷時性的手法，試圖解析日治時期的臺灣傳統文人，在殖民統治下以漢文書寫文學作品時，所遭遇的交流、協商。此文不但觸及對殖民統制下臺灣傳統文人處境的剖析，也藉由對謝雪漁小說、散文的形式探討，論述其「教化」、「馴化」與「同化」之意義。全文以「同文」為論述重點，讓我們對謝雪漁其人生平及其創作取向有更多的了解。³⁹至於鄭明珠的論文〈謝雪漁小說《櫻花夢》研究〉，則是以長篇小說《櫻花夢》為探討對象，由謝雪漁的生平介紹出發，論及小說《櫻花夢》的緣起，並分析小說中的文化認同、想像。論者認為，《櫻花夢》在半虛實間透過小說敘事建構異質國度，並認為小說的「夢」，其實是代表謝雪漁烏托邦神話的顯現。由於僅針對單一小說進行解析，關於謝雪漁的生平又已有許多前行研究的介紹，較難呈現謝雪漁小說創作的整體特質。⁴⁰最後，林以衡在碩士論文中，雖已注意到「武俠」類型在日治臺灣通俗文學中的出現⁴¹，其他文章亦有以個案研究對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加以梳理，但仍有不

³⁶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³⁷ 王俐茹，《臺灣文人的記者初體驗及其創作實踐——以李逸濤為例的探討》（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語言及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³⁸ 曾婉君，《〈三六九小報〉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文學敘事與文化視域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³⁹ 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⁴⁰ 鄭明珠，《謝雪漁小說《櫻花夢》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2008年）。

⁴¹ 林以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年）。

少可開拓的問題有待探究。例如，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敘事模式的探討如何擴展、深化，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融合東亞小說、西洋小說的特點而生成，將是本論文所欲進一步研析的思考面向。故雖能以這些研究成果作為本論文的參考資料，仍有待行文時對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議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擴展，才能讓本論文的論述架構與討論內容更為完備。⁴²

（二）中國通俗小說續衍、敘事與書業文化研究

當今中文學界，在小說續書以及敘事手法的研究中，高桂惠、康韻梅的論著受學界肯定。⁴³高桂惠以「續書」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討論續衍作品中的文化寓意，對於續衍之作盛行的日治時期臺灣文壇來說，高氏的觀點值得借鏡。而康韻梅從敘事成規出發，討論唐代小說的承衍問題，對於本文討論中國通俗小說敘事手法如何移植於臺灣小說的情況，其方法亦深具參考價值。大陸地區方面，學者如王平、王昕、樓含松、高日暉等人對於小說敘事手法的研究，都將對於本論文有所助益。⁴⁴而海外學者如蒲安迪、韓南等人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頗具新意，本文也多所參考，以期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敘事手法上的研究上能更為完備。⁴⁵

考察日治臺灣與中國大陸書店藉由書籍代銷的交流情況，亦是本論文一個欲處理的問題。故除了臺灣方面關於日治書店的研究如蔡盛琦、柳書琴、柯喬文等人的前行研究，對本文極有助益外。⁴⁶當本文欲更進一步檢視日治臺灣書局目錄中的小說溯源時，必須對於同時期大陸地區的書局有所認識。此部份資料，大

⁴² 這些文章諸如〈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究》第26期（2008年6月）。〈革誰的命？—日治初期台灣文人李逸濤對革命思潮的接受與想像〉。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之「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3月14日。〈「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2009年9月）。〈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2010年6月）。〈英雄、歷險、桃花源—由日治小說《奇人健飛啓疆記》的試煉之路論其敘事建構的原型模式〉，《東華人文學報》第18期，2011年1月）。〈《格理弗遊記》在臺灣：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寫、諷喻與西方想像〉，《成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1年3月）。

⁴³ 康韻梅，《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2005年3月）。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2005年9月）。

⁴⁴ 王平，《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河北：河北人民，2003年11月二刷）、王昕，《話本小說的歷史與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樓含松，《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歷史敘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7月）。

⁴⁵ （美）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美）韓南著、王秋桂等譯，《韓南中國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

⁴⁶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第8卷第2期（2002年）、〈新高堂書店：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9卷第4期（2003年）、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1930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第319期（2004年12月）、柯喬文，〈漢文知識的建置：台南州內的書局發展〉，《國立臺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第42卷1期（2008年4月）。

陸近年來出版頗豐，例如宋原放所主編、全三冊的《中國出版史料》、周振鶴所編《晚清營業書目》、李家駒所著《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謝灼華主編的《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以及戚福康的《中國古代書坊研究》等學術著作，皆以編排目錄的方式呈現。這些著作，將幫助本計畫在中國上海的復旦大學、上海圖書館、上海資料檔案館等地進行文獻資料的蒐集時，可事先了解臺灣日治時期大陸地區圖書出版事業的情況，以及出版哪些書籍。並在蒐集完成，加以分類、整理後，提供和臺灣各書局的圖書目錄一同比較。⁴⁷

（三）日本、西洋小說相關研究

在日本漢文小說方面，李進益的博士論文從日本幕府時期存留下來的「舶載書目」出發，論述中國明清小說對日本僧侶、菊池三溪等文人雅士乃至於市井百姓的影響，是一本內容詳實的論文，對本文日本小說的知識建構有極大助益。⁴⁸其後，學界以「中國域外漢文小說」為主題，舉行了兩次國際型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⁴⁹王三慶、陳慶浩等學者所主編的一系列《日本漢文小說叢刊》在臺灣發行，顯示這些文學史料不再是遙不可及。近期則有孫虎堂所著的《日本漢文小說研究》，在以王三慶、陳慶浩和李進益等人的研究為基礎下，對於日本漢文小說研究資料的回顧與整理、源流以及整體特徵等問題，都有完整且詳細地介紹，屬於對日本漢文小說全面性的研究成果。⁵⁰以上諸研究皆代表日本漢文小說以中國-日本的討論路線已大致完備。

至於有關日本講談、軍談的研究，日本學者菊池真一所主編的3卷《講談資料集成》為本文提供不少思考方向。此書論述「講談」在日本的發展過程，並介紹著名的講談師、相關講談的文學作品，讓本文對於日本講談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⁵¹在軍談方面，日本研究者多偏向於翻譯問題的探討，以及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式，對日本以中國歷史為主題所書寫的軍談、物語作出論述。⁵²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標題署名為「通俗」的讀物，在現今日本研究界中，是被歸類在「國文

⁴⁷ 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2004年10月一刷）、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4月）、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二刷）、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⁴⁸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⁴⁹ 分別結集成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1999年）、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主編：《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

⁵⁰ 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

⁵¹ 菊池真一編，《講談資料集成》（全3卷）（大阪：和泉書院，2001年3月）。

⁵² 例如和漢比較文學會編，《軍記と漢文學》（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4月）、《江戸小説と漢文學》（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5月）。

學」研究的類別，而非「大眾文學」的研究範疇。此分類上的差異，以及日本學界對於這些讀物的看法為何，亦是本計畫在對日本講談、軍談文化進行論述時，得以輔助思考的問題。這些研究中，以德田武的研究最為詳細，對本文的書寫幫助也最大。例如他的專著《日本近世小説と中国小説》，已提及日本軍談與中國通俗小説互相影響的問題，對於兩方文學如何被借用、傳抄的情況亦有詳述，協助本文對「軍談」的題材有初步認識。⁵³德田武的其他單篇文章如〈二つの『絵本漢楚軍談』と『西漢演義』〉、〈中国講史小説と通俗軍談（上）-読本前史-〉、〈通俗軍談研究（一）-『通俗台湾軍談』・『通俗元明軍談』〉等文章⁵⁴，亦對於日本軍談的發展歷史、特點有詳細的介紹與論述，幫助本文在思考日本的「軍談」如何在臺灣被接受、移植時，對「軍談」有完整先備知識的建立。其他研究者如神谷勝広、石田賢司、熊慧蘇、荒尾禎秀、黒石陽子、長尾直茂等人的研究，也值得本文借鏡。⁵⁵

本文討論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説受到東亞／西洋小説的影響，自也不能忽視西洋小説和翻譯學說方面的研究資料。關於日治臺灣翻譯小説的問題，前述黃美娥、呂淳鈺和王品涵的研究皆已觸及。本論文除適時輔以西方原著本與日治翻譯本進行比較外，現今國內外文領域的學者，其研究亦為本文重要參考資料。例如單德興與其他學者執行臺灣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的相關成果，值得研究者重視和學習。以單德興為例，他所譯注的《格理弗遊記》，不但整理出《格理弗遊記》於世界各地的各種版本、歷史淵源和販售情況外，其於翻譯此書的心路歷程與經驗分享，令人佩服。⁵⁶在翻譯理論方面，劉宓慶、吳錫德、鄧慧恩等人的研究，將可幫助本文更為深入了解「翻譯」的意義、方法與價值，並得以與日治時期的翻譯環境彼此參照，有助於本文在此研究面向的深思。⁵⁷

總結上述研究成果可知，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説的研究開展之初，大多數

⁵³ 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説と中国小説》（東京：青裳堂書店，1992年）。

⁵⁴ 德田武，〈二つの『絵本漢楚軍談』と『西漢演義』〉《和漢文學比較叢書7》（1988年6月）。〈中国講史小説と通俗軍談（上）-読本前史-〉、〈通俗軍談研究（一）-『通俗台湾軍談』・『通俗元明軍談』〉

⁵⁵ 神谷勝広，〈近松と通俗軍談—『通俗列国志後編』『通俗漢楚軍談』を軸に〉《名古屋大学国語国文学》第82卷（1998.07.11），頁31-42。石田賢司，〈『吳越軍談』の構想と趣向—紀海音独創期の浄瑠璃〉《人文論究（関西学院大学）》第54卷第3期（2004.12），頁21-36。熊慧蘇，〈『通俗五代軍談』の典拠と構成法—「通鑑に載伝へたる所を拔萃和訳す」考〉《近世文芸》第18卷（2003.07.11），頁1-14。荒尾禎秀，〈『通俗列国志吳越軍談』の漢字語について〉《東京学芸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第51卷（2000.02.29），頁197-204。黒石陽子，〈草双紙と通俗軍談物の諸相—『通俗漢楚軍談』と『通俗三国志』を中心に〉《黒本・青本の研究と用語索引》（1992.2）。長尾直茂，〈「前期通俗物」小考—『通俗三国志』『通俗漢楚軍談』をめぐって〉《上智大学国文学論集》第24卷（1991.01）。

⁵⁶ 單德興譯注，《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臺北：聯經出版，2004）。〈我來・我譯・我追憶—《格理弗遊記》背後的「遊記」〉，《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8卷第4期（2007年9月），頁75-85。

⁵⁷ 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臺北：書林出版社真正的文學理論，1999年8月）。吳錫德等編，《翻譯文學&文學翻譯》（臺北：麥田出版社）。鄧慧恩，《日治時期外來思潮譯介研究》（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年12月）。

是以小說類型研究為主要範疇；取材的報刊，除了少數幾本學位論文採用《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外，其餘仍多集中在《三六九小報》和《風月報》兩份已有複印本的報紙。上述研究取向自有其重要性和研究價值，亦對本文有所啟發，但對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來源剖析、表現手法的探究和取材來源方面等探討則略顯不足。是故，如何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後，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作出更深入的探討，才得以讓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更為精進？有鑑於此，本文思考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研究目前較為缺乏的研究議題，是小說敘事手法和小說接受兩個問題面向。長久以來，學界針對小說敘事手法較多的討論，仍是以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為主要研究方向。近年來，隨著跨界研究的興起，小說接受的問題，也逐漸被研究者所重視。⁵⁸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是否能以此兩方向進行探究，亦為本文思考的問題之一。本文欲從敘事的角論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敘事手法的傳承與體驗，對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敘事研究、續行情況的探討、日治臺灣通俗文學相關研究，或是日本講談、軍談研究情況都應有所認識，才能建立基本概念。如此，本文才得以擴及深思東亞、西洋文化與臺灣通俗小說間在敘事手法、內容交互運用的關係。

二、章節安排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為分析資料，探討其與東亞／西洋小說如何接軌並進行再造的問題。全文預計七章，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闡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目的，以及回顧前行研究，並說明本論文的章節架構。

第二章為「海納百川：東、西文化匯流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與文體演變」。本章有鑑於過去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類型研究，較重視文化意義的探討，卻忽視小說形式上的分析，故透過文本的細讀，探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特點和文體演變，即是本章重點。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不但在內容上具有多元色彩，在小說敘事背景的建構上，亦有特殊之處。因日治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臺人面對新知進入、世界觀建立的影響下，除中國、日本的敘事場景廣被運用外，亦將歐洲、美洲、非洲和東南亞各地作為敘事場景，使得閱讀者能藉由小說的閱讀，進而認識這個世界，此即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與世界接軌的第一步。接著，本章擬考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文體變化，以印證文言小說到白話小說成熟的階段，並非一蹴可及，而是經由時間的演進，才出現成熟的白話小說。最後，將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進行文體分類，並對各個文體進行敘事手法的研析，以概括出臺灣漢文通俗

⁵⁸ 小說接受的研究，例如陳俊宏，《《西遊記》主題接受史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高日暉等著，《水滸接受史》（山東：齊魯書社，2006年7月）。

小說可能有哪些體裁，與其文體特徵。同時論述作者如何對這些文體進行傳抄、學習和再造，閱讀者才得以認識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豐富且多元的面貌。

第三章將以「跨地域的圖書流動：日治臺灣通俗圖書市場對小說書籍的代銷與接受」作為研究方向，論述日治臺灣與中國上海、日本間，如何藉由小說書籍的代銷，進而產生文化交流。

本章欲探討的問題在於，日治臺灣並未與中國斷絕文化上的來往交流，由於交流管道的暢通，當下識字群體若有閱讀上的需求，除了臺灣本地所刊印的書籍外，是否還有由中國所代銷進入臺灣的書籍？這些書籍中，本文特別關注「小說」一類的書籍，並欲論述臺灣書店如何藉由這些小說與中國展開交流，而這些小說進入日治臺灣的通俗市場後，又可能會產生何種影響？

日治時期臺灣書業的繁盛，已成為近年來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⁵⁹，其中，由黃茂盛在嘉義所創辦的書局「蘭記圖書部」，由於它與《三六九小報》間的合作關係，早已成為學界所注意的一個書局⁶⁰，「蘭記」所留下的史料，在經過研究者們努力的發掘、整理和保存後，也幫助「蘭記圖書部」在臺灣文化史上，立下不朽的地位。⁶¹本論文將以這些研究成果為基礎，深入思考「蘭記圖書部」所販賣的小說書籍，源於何方？又為當時臺灣通俗界、書業界帶來何種文化意義？

在跨界研究之風盛行的今日，對於「蘭記圖書部」的研究，本論文認為，不應當僅限於臺灣。因為，同時期位於中國、比「島都」臺北更早成為現代化都市的上海，其書業文化的發展，實是欲再深入研究「蘭記」時，不可忽視的面向⁶²，由臺灣不少書局例如張純甫的「興漢書局」、連雅棠的「雅棠書局」所存留下來的〈圖書目錄〉即可發現，臺灣雖然早已擁有自己的文學，以及印刷技術，但仍然有不少書局必須由中國，特別是上海一地進口書籍，以販賣給臺灣的讀者，而身處知識份子階層的臺灣文人，也常常前往中國上海，進行蒐書、買書的活動，可見臺灣與上海間的書業交流情況，值得加以闡述。而正是因為臺灣文人於上海各書肆的淘書活動呈現於此時期，小說書籍也就在這股書籍傳播、代銷的風氣下，被「蘭記圖書部」由上海的各書肆大量地代銷進入臺灣，不少中國通俗小說的書

⁵⁹ 例如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第91卷第2期（2002年12月），頁65-92。或是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2004年），頁285-333。都提到了日治時期臺灣的書局如「瑞成」、「興漢」、「蘭記」等。

⁶⁰ 例如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以及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1930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第391期（2004年12月），頁19-55。二文對於「蘭記」與《三六九小報》的合作關係已有精采論述。

⁶¹ 自2006年開始，「文訊雜誌社」即與學術界合作，將「蘭記圖書部」所捐贈的史料予以分類、整理，並邀請研究者撰文。詳見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7年11月），

⁶² 近代上海書肆的發達，可參考宋原放所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2004年10月），其中收錄許多對於上海書肆的研究。

籍於是風行於日治臺灣的閱讀群體中。

最後，同樣是針對書籍傳播進入日治臺灣的考察，但重點置於日本圖書的特徵分析。相對於「蘭記圖書部」可由相關史料進行研析，日本「軍談」與其他通俗讀物在臺灣的被閱讀，則可透過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以及讀物特點加以論述。這些曾經在日本江戶時期流行的書籍，為何在重刊後、千里迢迢地流傳入臺灣？它們每一本書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故本章將論述來自中國和日本的通俗讀物，兩者出現在日治臺灣通俗市場中的文化現象。

第四章以中國的「演義」脈絡如何被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承衍作為論述主軸。本章欲闡述：與中國一水之隔的臺灣，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是無可迴避的現實情況。因此，臺灣文化融入了中華文化，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同樣可以觀察到中國「演義」傳統於其中的承衍。本章透過對幾部長篇小說的細讀後，分析它們的敘事結構，以及文人如何運用中國演義的人物與內容，加諸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造成兩方情節互文的現象。這些都證明中國演義傳統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繼承。除了形式方面的觀察外，透過對小說情節的解析，詮釋殖民統治下臺灣文人的心靈世界，亦是本章重點。故最後將以潛藏於中國傳統中的「桃花源」象徵作為論述重點，探究日治臺灣文人如何在殖民統治下藉由小說書寫，建構一個於虛實間飄忽不定的理想世界，以寄寓他們曖昧的政治觀點。

第五章將以日本的講談如何被引進臺灣，並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吸收、為臺灣文人模仿作為關注焦點。之後，再由日本講談內容所展現的國民精神出發，擴及論述中國演義和日本軍談，三者皆具有的忠孝觀與復仇觀。本章所欲探討的問題在於，除了日本漢文小說在日治初期引入臺灣、成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文體模仿的對象外，是否還有其他的日本文化亦進入臺灣，而為小說所接受與再造？故本章選取日本「講談」作為示例，分析它對日治臺灣通俗界所造成的影響。⁶³日本講談主要以軍武之事為講述、表演的重點，它又與中國的說書傳統、臺灣的講古習俗有異曲同工的效用。藉由梳理日本講談移植進入臺灣的情形，本文將建構一個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為終點的東亞小說傳播脈絡。此即：當日本講談的形式、題材借鏡中國通俗小說後，講談又再次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接受時，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不但具有中國演義的特點，又與日本講談互相融合。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於是成為東亞小說的匯聚終點，見證其在東亞文化圈中集大成的重要性。

第六章將探討，西洋小說被翻譯進入臺灣後，為臺灣小說所接受的現象。本章認為，西洋小說如何被翻譯進入臺灣，是在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翻譯小說時不可迴避的問題。由於臺灣接受東亞／西洋文化的衝擊，翻譯的來源也隨之多元，西方的文學名著、科學新知不但可以直接由西洋翻譯而來，更可能經由日文譯本

⁶³ 其他如「淨琉璃」、「能劇」、「歌舞伎」等，雖也大量地在日治時期傳入臺灣，但因屬於戲劇範疇，故不納入本文討論。

的間接翻譯而來。同時，應該翻譯何種文學作品進入臺灣，也是此時期的譯者必須在娛樂性、教育性，以及符合政治制度等各項條件下所要考慮的問題。對於當時的臺灣人來說，遇到「翻譯」所必須面對的難處是什麼？臺灣文人如何藉由「翻譯」建構他們與西方文學接觸的管道？在釐清此問題後，將深入探究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其譯本與原著間的關係。介紹除大量的偵探翻譯小說能為臺灣閱讀者所閱讀外，還有更多西方名著在日治時期被譯介入臺灣，並影響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題材運用與情節建構。於是，臺灣作家得以藉由翻譯小說的進入予以仿作，或力求敘事視角上的推陳出新，此即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創作手法上受到西洋翻譯小說的影響。此外，這些翻譯小說內容中所闡述的理性精神、啟蒙觀念、西方議會制度，以及奇幻想像的建構，也都帶給日治臺灣讀者一個與西洋文化接軌的特殊體驗。

第七章為結論，在於總結全文要點，並說明日後得以再為深究的方向。



第二章、海納百川：東、西文化匯流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與文體演變

展開世界地圖，吾人所居的臺灣不過是位於各大洲間的渺小之島，若不凝神留意，恐將自視線中遺落。但，任何事物若單由表面觀之，而忽略其所具有的特質，或是缺乏對其文化建構的成因抽絲剝繭般地梳理，將無法認清其看似微小的外形下，實寓含複雜且深刻的文化內涵。臺灣自從有原住民於島上活動伊始，就無法免除與外在世界的接觸。以過往傳統的大陸觀點視之，臺灣不過是位居邊緣的蔓爾小島。但若以浩瀚海洋的視角觀察，四面環海的臺灣因位於溝通東南亞、東北亞的航運要衝，將使臺灣無法自東亞文明的發展脈絡，或是西力東漸的文化交混狀態中抽離。

臺灣既然作為文化接受者，又受到各方政治力的影響，故舉凡經濟、民間信仰或社會風俗等，皆會在層層交匯後，形成臺灣自我特殊面貌，所以文學自也不能例外於此一匯聚現象，屬於文學一環的小說更將表現此文化特點。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產生將由傳播、接受、摹仿和再造等方式構成。而組成文學的基本單元文字，或是體裁，實是在此發展歷程中肩負文學如何演化的關鍵。是故，欲梳理出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發展脈絡，就應由文本閱讀出發，以了解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組成和文體演變，才是架構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發展脈絡的基本方法。由於敘事學與文體學兩者皆屬語言學的範疇，兩者有相輔相成的功效，故除第一節主要探討小說的敘事背景外，其餘二節將採夾敘夾論的方式，在研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特點時，亦會針對小說內部敘事手法進行探討。¹

因此，本章開始進行說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背景。若追溯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吾人可知日治時期對臺灣知識份子而言，是一個正式認識世界的開始，透過記者兼文人的小說創作，世界地圖被濃縮進入小說中，成為小說創作者和閱讀者認識世界的第一步，故探討小說的敘事背景，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與世界的接軌，具有重大意義。至於第二節、第三節則將分別以歷時性的線性變化闡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文到白話文的發展過程；再以共時性的觀察出發，以接受美學的視角，以及文體分類的概念，歸納出臺灣文人如何透過文本閱讀、再創作的過程，形塑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各式的小說類型。姚斯(Jauss Hans Robert.)認為：

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在閱讀過程中，永遠不停地發生著從簡單接受到批評性的理解，從被動接受到

¹申丹說：「敘述學(也稱敘事學)與小說文體學在當代西方小說批評理論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敘述學與文體學均採用語言學模式來研究文學作品，屬於生命力較強的交叉或邊緣學科。兩者不僅在基本立場上有不少共同點，而且在研究對象上也有重要重合面。」又引英國文體學家福勒(R. Fowler)的研究說：「“文體”與敘述學研究的“結構”呈互為補充的關係。」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2版)，頁1。

主動接受，從認識的審美標準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的轉換。文學的歷史性及其傳達特點預先假定了一種對話並隨之假定在作品、讀者和新作品間的過程性聯系，以便從信息與接受者、疑問與回答、問題與解決之間的相互關係出發設想新的作品。²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文體的形成，即是在這個文本－閱讀－再造－新作產生的過程中達成，此乃根基於臺灣小說創作者又兼具有閱讀者的身份，才會有文體接受、模擬和再造的反應模式出現。這其中包含對中國章回體、傳奇／叢談體的承衍、對日本漢文小說的再造，以及對新聞體小說的移植。³經由本章對小說文體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相互比較、綜合分析後，將可梳理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特徵，並輔以敘事手法分析文本，開啓本論文通篇以接受視角理解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場域發展的研究重點。

第一節、對世界的認識：跨越全球的敘事場景

自西方地理大發現以來，臺灣就開始被動地為金髮碧眼的西方人所認識，隨著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相繼來到臺灣進行局部統治或貿易；或是清領時期劉銘傳在臺灣推行學習西方的「自強運動」，這些因素都造成臺灣對於西方世界的人種、器物 and 思維有更多的接觸。但歐洲以外，臺灣人對於世界的其他地方如非洲、東南亞等世界上所存在的國家和人種又知道多少？這些問題，隨著厲行西化的日本殖民政權進入臺灣，近現代報刊的興起和記者、作家出現後，臺灣人，尤其是識字階層，才得以藉由小說或新聞的閱讀，真正落實「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格言，也表現日治時期臺灣記者兼具小說創作者的重疊性。⁴雖然在對外吸收訊息並向內傳遞時，難免會有誇大不實的渲染情況發生，以致於造成閱讀者對世界環境認知上的錯誤，但也是因為透過小說將世界各地環境、人物融於敘事手法之內，臺灣閱讀者才能藉助於這個縮小、轉介的世界，開拓自己的視域，眼中將不再僅限於中國、日本或是臺灣本地，對於臺灣閱讀者相關地理資訊和知識啓蒙絕對有莫大的幫助。由於中國與日本皆是直接統治臺灣的國家，小說以這兩個國家作為敘事背景也是理所當然的手法；而「生於斯、長於斯」的觀念，也

²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4。

³ 詳見本文之後的各章論述。此外，日本講談自也可以視為一個獨立文體，但由於其文化來源複雜，又兼具中國通俗小說的文體特徵，故在本章僅作為部份引例，其詳細特點於本論文第五章討論。

⁴ 王俐茹在其研究中，已闡述臺灣文人如何兼具記者身份的轉換過程，剖析日本與中國、臺灣三地間記者身份轉換的同異之處，並藉由刊登在報紙上文章、小說的分析，了解這些臺灣文人的創作情況。其研究已證明「記者」這一職業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確實存在、對社會有極大的影響力並具有對世界局勢或思潮的接收能力。以上皆證明他們能將所接收到的外在資訊轉化到小說之中，而非僅是皮毛式的吸收與學習。王俐茹，《臺灣文人的記者初體驗及其創作實踐——以李逸濤為例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言文化暨文學研究所，2009年6月）。

是臺灣作家在創作時最方便建構的敘事環境，所以以下將就上述之外的國家、地域和人物，如何被臺灣小說家運用於小說中傳達給閱讀者閱讀，作一析論。

一、作家筆下的西方國家：歐洲與美洲

日治時期，臺灣人已然瞭解世界之大。但，受限於現實上的經濟條件，也只有像林獻堂那樣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望族，才能擁有環遊世界的的能力，並將親眼所見的一切著述成《環球遊記》。⁵至於其他臺灣士紳，雖也不乏出國經驗，卻多侷限在距離較近的中國、日本、滿洲、朝鮮，抑或是南洋一帶，這種苦無親身體驗、目睹的現實因素，造就他們對於西方世界的憧憬，以及期盼能有機會能加以挑戰異地的動機。魏清德曾在往日本的船上保受暈船肆虐，在痛苦之餘，想要挑戰歐美諸國、體驗不同旅遊經驗的志向，協助他咬牙渡過難關：

廿紀男兒，生當有世界的思想覺悟，交通大啓，五大同鄰。區區數晝夜之航海，船暈何為？勉強登甲板、上船舷……，吸空氣、嘯海風，日日如是，精神頓覺開豁，妄謂他日歐美漫遊，提示之前，茲為準備大洋大西，兩洋橫斷，當視今日壯絕百倍也。⁶

魏清德欲往「歐美漫遊」的夢想，表現出當下文人對於歐美世界的好奇。畢竟，身於晚清的臺灣文人們，並不是對西方列強憑藉著船堅砲利，進而打開中國的門戶一無所悉，而身為殖民地文人，魏氏更是親身感受到日本因西化維新後的富強情況。所以，當臺灣文人開始創作小說後，自然就將西方的一切，諸如環境、人物等，納入小說背景的建構中。

根據黃美娥針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統計，報上以西方國家作為敘事背景的總共有 24 篇，被談及的國家則有古羅馬、法國、俄國、英國、美國、瑞典、丹麥、奧國等國家。黃氏並指出，若追溯至清代臺灣相關文獻對「西洋」或是「歐美」的描寫，則日治初期的臺灣小說較集中在「歐洲」地區。同時，還具有「中古」與「近代」時間交錯的情形。⁷而在日治初期之外，稍後也常見到對西洋國家的描述，如《臺灣日日新報》上也有不少以歐洲為背景的小說，表現出作家對歐美世界的描繪與想像，例如〈武士〉：

武士胡福利者，百餘年間，英國之勇敢人也，是時美洲未有白人蹤影，其地亦未開墾，居彼土者，皆未開化之印第安人及野獸而已，武士胡福利欲

⁵ 林淑慧，〈敘事、再現、啓蒙—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臺灣文學學報》第 13 期（2008 年 12 月），頁 65-92。

⁶ 同上註。

⁷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頁 5。

以美洲為殖民地，率多數之人往。⁸

小說的背景，借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一事改寫而成⁹，表現出作者已認知西方諸國爭先恐後地進行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後，隨之而來的則是帝國主義的興起，西歐列強開始對佔領地進行物資榨取和殖民統治。小說中並不避諱使用「殖民地」的字眼，對照當下受日本統治的臺灣而言，頗為諷刺。若此篇佚名小說的作者為臺灣傳統文人，對於本身即為被殖民者的立場而言，顯然遺忘了自己被殖民的身份，反而藉用敘事表現將殖民的行為加以讚美和合理化。因此〈武士〉一文融和了西方歷史和殖民合理化的動機，其實就是敘事者本身介於殖民／被殖民間的混雜。¹⁰可見，對於敘事場景的建構，並非僅是單純的景物借用，而往往是融入當下世界局勢的發展，一方面在小說中建構世界，另一方面又告訴讀者世界局勢呈現何種面貌，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小說〈傾國恨〉中。

大正 6 年（1917），魏清德所著的〈傾國恨〉，以英德兩國外交傾軋、軍事佈署、情報往來等作為題材，小說場景由人物所活動的德國柏林，談論到法國巴黎、義大利羅馬，再轉移到英國倫敦，並將鄰國奧地利等國家同樣敘於小說中：

柏林酒樓，奚啻以千百計，指首屈者，曰「柏林佳會」大料理店，店之樓上，分作客室數十百間。一少年姿狀甚美之紳士據席，法蘭西斯姓，魯爾毅名，現為英國大使館外交官。其旁坐一美婦，奧地利哈齊男爵夫人……。其感想又何如乎？記得貴君自巴黎轉任柏林當時，妾已一見，願傾肺腑，巴黎之風景如何？¹¹

並描述魯爾毅在柏林市區的活動：

翌日，魯爾毅上午八時睡起，即乘馬出門，馳聘柏林市中最繁華般賑區域。冀遇安娜。安娜常時慣著綠色乘馬服者，魯爾毅特別注意著綠色乘馬服者，終非安娜。¹²

小說主角英國人魯爾毅的身份是一位外交官，由於職位特殊，他在羅馬、巴黎和柏林都待過，由於主角豐富經歷和學識，不但引起異性們的注意，魏清德將此部份化為小說，也有吸引閱讀者興趣的用意，並讓臺灣閱讀者了解什麼是「外交官」：

⁸ 佚名：〈武士〉，《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大正 5 年（1916）6 月 19 日第 5739 號。

⁹ 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於西元 1493 年，

¹⁰ 林以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 7 月），頁 137。

¹¹ 潤，《傾國恨（1）》，《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6 年（1917）9 月 19 日。

¹² 潤，《傾國恨（6）》，《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6 年（1917）9 月 28 日。

安娜曰：「貴君於外交官，具有趣味乎？出自希望乎？抑隨運命使然乎？魯爾毅曰：『余思世上，惟此職業，最為愉快，出自希望。』安娜曰：『良然，研究歐羅巴歷史及現在位置，外交官之趣味，深而且長。外交官之責任，重而且大。』」¹³

閱讀者藉由作者之筆，就算沒有前往歐洲，至少也因閱讀小說，而認識了幾個歐洲的主要國家。¹⁴而部份小說甚至上溯到中古時代，不但是空間的挪用，更是時空的跨越。

大正 13 年（1924）的〈俠盜羅賓漢〉和〈小人國記〉，小說以西方國家英國的傳奇人物「羅賓漢」為敘事題材，後者則以英國作為小說主角的生活環境¹⁵，小說背景可前推至中古世紀的英國，亦讓臺灣讀者得以體會時空交錯之感：

俠盜羅賓漢，英人也，性剛毅而慷慨，有強力，善劍擊格鬥，見義勇為；貧而安者時濟之，富而驕者恒諸之；盜能如斯，誠宜名之以俠焉。¹⁶

由以上小說例子可知，臺灣小說作者和讀者，對於歐洲、美洲的認識與想像已相當多元，將其融於小說中，讓每篇小說增添異國色彩，也能吸引讀者對於小說的閱讀。

二、充斥陌生與想像的冒險世界：非洲

一向有「黑暗大陸」之稱的非洲，自歐洲地理大發現後，由於探險者將非洲蘊含無窮資源的訊息帶回歐洲，遂掀起歐洲各國經略非洲的野心，原本與世無爭的世界，突然間變成列強瓜分的殖民地，但由於先天氣候條件、地理形勢和人種等特殊特性，非洲仍然藏有無法預知的危險和祕密，不但是探險者挑戰自我的天堂，更會成為小說家筆下絕佳的敘事背景，小說〈古體聖文〉即言：

非洲稱舊大陸，十中七八為野蠻未開之地，方諸文化開明新大陸之美洲，霄壤矣。¹⁷

¹³ 潤，〈傾國恨（3）〉，《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6 年 9 月 24 日。

¹⁴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頁 9。

¹⁵ 〈小人國記〉因是翻譯小說，第一回介紹作者生平時即言：「英國『勞亭漢省』是我格里弗的生產地方。」

¹⁶ 佚名，〈俠盜羅賓漢〉，《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13 年（1924）4 月 16 日。

¹⁷ 潤，〈古體聖文（2）〉，《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大正 13 年（1924）6 月 4 日。

小說中敘說不少讓人好奇的宗教與傳說，讓人對非洲的奧密嘆為觀止。其實早在〈古體聖文〉之前，〈非洲奇教之殺人慘記〉一文¹⁸，就已表現出臺灣人對於神祕非洲的好奇，而此篇文章刊登時間與〈南荒奇遇〉相隔不到一個月，文中所述的各種神妙儀式，與〈南荒奇遇〉中對非洲土人崇拜火神和巫師傳說的比較後又極為類似，或許小說作者是先閱讀過此文後，才動筆創作〈南荒奇遇〉，因此造成在風俗儀式上的借用。¹⁹除了各種神祕色彩外，臺灣自成爲日本殖民地後，由於資訊較清領時期多元且充足，不但讓臺灣對於世界的地理環境的認識更爲完備，記者們也開始揭開非洲神祕的面紗，此點充份表現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已可見到關於「非洲」的報導，報導重點主要集中在非洲三個特徵：地理環境、人種與列強勢力的割據，這些又被小說家融於小說中，茲說明如下：

（一）地理環境：沙漠

非洲因赤道通過，加上幅員廣大、氣候乾燥，容易形成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就這樣座落於非洲，明治39年（1906）的〈沙漠旅行記〉就描寫沙漠的廣大與危險：

非洲北邊一帶，有大沙漠，名曰撒哈拉（即今之「撒哈拉」）。近有法國博士，欲究其形勢，遂往遊焉。蓋沙漠之內，亦有小島，島上有水草，旅行者每於此小憩時，被野人及暴客所劫掠，故探險家恒以是為危途今法國博士之往，騎一橐駝，同伴二人，並不攜帶他種軍械，因其性情和平，故一路竟無驚擾之者，斯亦奇矣。前者以為沙漠廣大無垠，無人知其中尚有何物也，法國博士此行，曾於一日見一片荒漠，亘三百英里之，幸其間尚有井數，足資潤，竟得渡過，既渡過，見草地甚多，又有高平原，有野獸如獅象鹿等。又尋得無數古墓，大約皆數千年前物，且在大石之上，見有繪畫作野獸形，又見磨麥之。此可見上古之時，其地必有人居，惟因天氣太旱，人不能耐，漸至變為沙漠耳。²⁰

藉由對法國探險者旅行的見聞，讓讀者得以透過報導，體驗非洲沙漠「廣大無垠」或是偶有綠洲的特徵，這些固然是臺灣一地難以見到的地景，臺灣讀者因而會有特殊感，但，潛藏於美景下的，卻是非洲形勢險惡、文明未開的現況，所以會有「野人及暴客」的搶掠，這一切，都歸因於氣候炎熱、寸草不生的沙漠環境所造成。但非洲並非就沒有歷史與文明，在荒煙蔓草間，仍孕育了悠久且古老的文化，當中的「古墓」指的應該就是金字塔，而「野獸如獅象鹿」等則是指「人面獅身像」等守墓雕像。這些介紹，都足以吸引閱讀者對非洲的好奇心。

¹⁸ 〈非洲奇教之殺人慘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明治44年（1911）9月24日。

¹⁹ 逸，〈南荒奇遇（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0月9日。

²⁰ 〈沙漠旅行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明治39年9月19日。

沙漠的恐怖，成為冒險小說中最好發揮的場所，〈古體聖文〉中的寶物「古體聖文」，就被作家魏清德安排藏在撒哈拉沙漠中，待人尋覓：

回數紀元八百五十年，有摩罕萬古體大王，虞王家奕葉珍藏之寶物受外敵侵略，乃擇地而埋藏之，竝為書以誌其所在。顧王朝滅亡後，此遺書不知其去向，莫大寶物埋藏之所在莫明。此遺書即本題「古體聖文」，或言在非洲，故非洲沙哈拉流沙之住民莫不知有其事。輓近，歐洲各國政府甚欲得此古體聖文，藉諗寶物埋藏所在，法之政府猶急欲得之。雖然，惟一秘密之探索，蓋亦憂憂乎難也哉。²¹

〈羅馬王國〉也描述非洲以沙漠聞名的地理現象：

是歲非洲雞美林國王六旬壽誕。羅馬僉舉西比阿赴賀，艤舟出地中海抵非洲北岸，由亞里絲里亞上陸，一行望雞美林進發。眼見風土氣候迥異羅馬，小沙漠到處生草樹，有游民放牧其間。越一日過一峽，忽見山明水秀，瀑布白水自絕頂飛下，望之若半空白練，冷氣颯人。山鳥啾啾、野猿攀果物，見人即走。²²

對於從小就生長在雨量充足而沒有沙漠這種地理環境的臺灣文人和閱讀者而言，沙漠的神祕感和危險性，提高了他們在創作或閱讀小說時的好奇心，沙漠因此成為探險者的冒險天堂，這些值得人們冒險和探究的險惡環境，即成為作者談到非洲時所必須描繪的地理現象。

（二）人種：對於黑人原住民的好奇

由於赤道經過非洲大陸，非洲除北方和南部外，大多為炎熱的天候，再加上先天人種膚色即呈現黑色，與白種人和黃種人差異極大，又因非洲較晚被發現，所以在當時非洲人大多保有純樸之心，或是與白種人、黃種人迥異的風俗習性，這些都會引起其他人種對他們的好奇心，此外，日治初期臺灣，對於非洲人的描寫，往往是建立在與臺灣生蕃對照的書寫下，例如〈生蕃窮狀〉²³歌頌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認為生蕃是野蠻無文，而必須以文明開化，才是全球常軌，故呼籲大家配合政府政策，支持政府設立隘線，以防備生蕃。以今日觀點視之，固然不可取，但也反應出當下殖民政府對於生蕃問題的煩惱，以及民眾普遍心態對於生蕃的畏懼。文章作者以「北美土蕃」、「非洲黑蠻」和「臺灣生蕃」相比擬，足見當時人們對於世界原住民的認識。「非洲黑蠻」一詞，更將多數非洲人的膚色特

²¹ 潤，〈古體聖文（1）〉，《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1924）6月2日。

²² 異史，〈羅馬王國（1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3年（1910）10月13日。

²³ 〈隘線近況／生蕃窮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明治40年（1907）6月27日。

點，以及質樸未開化的特性一語道出。而另一篇關於「生蕃」、「土蕃」和「黑蠻」的報導，也值得參考：

花蓮港支廳有生蕃地名「大老閣」，番族頗盛，沿山而住，素稱強悍。該地山場遼闊、獵事豐獲、稼穡亦宜。生蕃每年收穫，以贍衣食外，獲利不少，最注懷者，抖換洋鎗彈子，歷年輸入，約以千計，是以積貯利。不謂不多焉！然而蕃例增奢徇葬，故若刀銃埋滅地下者，其數匪少，該蕃俗例，情殷愛子，兒童數，。父母為購備洋槍一桿刀一枝，以壯行威，亦為他日出獵禦侮之需，不幸該兒短命而亡，該刀銃彈子，概為徇葬。大凡徇葬一事，南美土蕃、非洲黑蠻，同曲而異工耳。²⁴

文中所提「大老閣」生蕃，其實就是現今的「太魯閣族」，記者例出該族「強悍」、「增奢徇葬」的特性，並以「徇葬」一事，與南美、非洲等地的原住民相比擬，認為三地的原住民習俗「同曲而異工」，對於各地的原住民風俗介紹，雖非完全正確，但至少都表現出當下臺灣記者對於國外原住民的基本認識。

報紙文章中不停使用「非洲黑蠻」的稱呼方式來表達對非洲民眾黑色特徵的描述，將會增強臺灣民眾對非洲人膚色呈現黑色的印象，在黃種人、白種人或是以往對西洋人以「紅毛」稱呼外，臺灣人藉由報紙的傳播，開啓對另一人種的認識，雖然這個認識在當時是帶有輕視和鄙夷的色彩，卻也更增強小說家在創作小說時，因好奇心和神祕感，而特意在小說中描繪非洲人「黑人」、「土著」的情節，例如〈古體聖文〉中對黑人土著的描述：

卓爾袞急取在旁之望遠鏡窺之，卻見全黑之人種三、四十名，圍住一頭雄獅，惟是該獅子猛甚，卒裂傷黑人數名，突圍而出。該黑人等不捨，復望著那雄獅追趕而去。……

其時該處有一食人種黑人，在林中窺他，卓爾袞不知。比其近也，該黑人自林中轉出，手執木棍，欲取卓爾袞。食人種之黑人號稱蠻勇，大抵開明人種，除卻攜有優秀武器，若徒手空拳，五、六人總覺敵他不住。²⁵

〈羅馬王國〉也提及：

是時已抵雞美林國界矣。雞美林國王派吏士來接，牽巨大駱駝，換西比阿乘騎。又命一黑奴在前導引。黑奴面若漆，跳擲如猩猩，狀甚可畏。巨大駱駝一過黑奴手，則馴馴然若小兒，因共異之。²⁶

²⁴ 〈葛嗎蘭信／山後蕃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明治41年（1908）6月6日。

²⁵ 〈古體聖文（3）〉，《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1924）6月5日。

²⁶ 異史，〈羅馬王國（14）〉。

可見「黑人」已經成為言及「非洲」時的代表性象徵，若以非洲為敘事背景的小說沒有黑人的出現，也就不能夠將非洲的特殊處表現出來了。

（三）列強勢力傾軋的描述

在地理大發現後才漸為西方世界所知的非洲，由於其蘊藏豐富的資源，以及廣大的土地，成為工業革命後實力增強的歐洲各國爭相競逐的角力場所，這一場資源和土地掠奪的帝國競賽，連遠在東方的臺灣，都能感受到各國的貪婪，因而屢屢在報導文字中提及：

美國於利伯利亞之財政軍事問題，嘗請為執解決之役，歐洲各國，因之注意焉。甌利伯利亞者，黑人之不獨立國，位於非洲西海岸，人口約以一百萬計。而國內不少金礦等之富源，歐美人之事於其開發者，不可勝數，故各國所以注意於美之請也。美國爾來益傾於帝國主義，不特轍得逞志於中南二美諸國，而今又欲干涉非洲，即疑其有吞併之謀者，詎足怪哉！假令有是野心，必不能實行，今不過欲擴張其勢力範圍耳。²⁷

文中的「利伯利亞」，其實就是現今位於西非的「賴比瑞亞」(Republic of Liberia) 共和國，因為在帝國主義的魔掌伸向非洲時，西非的賴比瑞亞是美國的勢力範圍。²⁸文中描述美國除了中南美洲有野心外，亦對西非展開侵略與吞併，故記者認為美國的野心不小，足見當時臺灣人對於世界局勢的脈動多所關注。除美國外，也評論德、法兩國在北非一帶彼此爭奪控制權的情況：

非洲之摩，猶美洲之墨也，均禍亂潛伏地也。摩之住民為西霧族，為哈霧族。墨之住民，白人三分之二、土人三分之一。白人羅甸人族、土人亞美利加人族也。墨西哥之住民好亂，摩洛哥之住民亦好亂。合眾國利用此好亂人民，欲收漁者之利。德則乘此騷亂機用，欲收分割之功。本摩洛哥屬法蘭西勢力範圍下，自德帝訪問，行示威運動而後，世之見微知著者，咸謂礎潤而月暈，風雨之來，有先徵矣。當其時，法之螺屢渴世，外相主張頗強，。德殊自若曰：「若宣戰，不論何時，敢不徵以從事。」兩國危機一髮，戰雲慘澹。²⁹

以及在〈雖曰舊大陸〉中說明列強在非洲彼此割據、利益衝突的複雜程度，

²⁷ 〈利伯利亞問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明治43年（1910）8月10日。

²⁸ 1861年美國殖民會成立後，即展開對賴比瑞亞的殖民，故賴比瑞亞為美國的勢力範圍。Harry Gailey 著、蔡百銓譯，《非洲史（中）》（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頁28-29。

²⁹ 〈摩墨形勢〉，《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明治44年5月22日。

往往造成非洲烽火漫天。³⁰綜觀上述報導，紛紛提及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國，可見當時的非洲，在列強環伺之下的艱困處境。當下的非洲如此，站在第一線接收到此資訊的臺灣文人、記者們，除了報導非洲局勢給島內民眾知曉外，是否也會因此對臺灣坎坷的被統治史作一番檢討和反思，將會是未來值得吾人深思的問題。但可以發現的是，臺灣作家在這些國際事件的影響下，已藉由小說的創作，將這時空與地理背景融於小說中，小說〈南荒奇遇〉，即是以法國統治下摩洛哥作為主角「西比拉耶」的冒險背景：

法蘭西人西比拉耶，早歲富有遠征心，性好寄而輕生，尤嗜游獵，嘗從陸軍征南阿、摩洛哥近境，為其御用達。事平，居摩洛哥之□鄙數年，暇輒游獵于萬山中，人跡所不到者亦及之，且出必踽踽獨行。³¹

整篇小說，就以西比拉耶、地蘭和拉虎耳等三人的冒險展開，通篇以一個「逃」字，串連起摩洛哥一地的地穴、森林和深淵，以及拼湊起拜火教的信仰，作者再藉西比拉耶之口破除迷信：

拉虎耳曰：「君謂地蘭耶？」曰：「然。」拉虎耳復愕視其上下殆徧曰：「君即與有緣，故之白人歟？亦知酋長方捕君甚急耶？況地蘭為火神所愛，神怒難干，恐未易為力也。」西比拉耶不覺前席曰：「君勿以神道嚇人，神即酋長，余窺之審。」³²

〈南荒奇遇〉綜合上述非洲的各項特點，透過新聞的接收與撰寫，作家在將這些材料調製成小說背景或題材，臺灣讀者將能藉由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認識非洲這個新奇之地，並將非洲納入臺灣讀者的世界觀中，一幅世界地圖的輪廓，也將在讀者的腦海中慢慢浮現。

三、對鄰近國度的描繪：東南亞

臺灣處於東亞島鏈的中間地位，是東北亞與東南亞來往時的中繼站。這個重要的戰略位置，造就三〇年代後日本欲將其野心擴展到東南亞時，必須以臺灣做為南進基地，可見臺灣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與重要性。此點也同時影響到臺灣作家在創作小說時，除了以日本、中國環境為主要的敘事背景，或是將視野擴大到西洋、非洲外，自也不能忽視對東南亞的描寫，當臺灣通俗小說的背景包含上述各地後，才能被視為小說題材橫跨世界各地，以展現臺灣通俗小說豐富的包容力。

³⁰ 〈雖曰舊大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明治45年（1912）10月4日。

³¹ 〈南荒奇遇（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911）10月6日。

³² 〈南荒奇遇（5）〉，《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0月10日。

只要翻閱當時的報紙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等，即可發現報導東南亞諸國如泰國（暹羅）、緬甸、越南（安南）等國家的新聞多得不勝枚舉。由於這些國家地緣關係的便利，以及在東亞史上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都造就臺灣人對東南亞的熟悉。

在上述東南亞諸國中，最常被臺灣作家用來做為小說敘事背景的是舊稱「安南」的越南。臺灣與越南的關係，在清領時期就已開始，最有名的當屬澎湖進士蔡廷蘭與越南間的文化交流。³³而日治時期作家在以越南為小說敘事背景時，大多數以「革命」為主題，進行小說的創作。例如，明治 43 年（1910）李逸濤的〈亡國志士〉，將法國殖民者以苛法治越，而造成官逼民反的情況描述給臺灣讀者知曉：

鄰有鄉進士某，以譏刺時政，為法政府所忘。後有怨家上變事，誣進士曾與逆謀，法吏捕訊之，一時鄉民皆大憤，務黨眾與吏力爭，勢甚洶洶。黃聞之，恐事不成，株連者眾。乃馳往為陳利害，勸令解散。不謂進士怨家知之，復密報法吏，謂進士家聚謀不軌。吏使緹騎往視之，（其法如四人並坐一室。其居非同室者。巡吏則可捕問之。防不軌也）果然，遂並黃而捕之。于是鄉民益憤，立呼群少自牢中奪之歸。一面舉義旗以反。黃見眾人狀若狂，不禁頓足號慟曰：「君輩欲遽以螳螂之臂當車，真貽禍無窮者，縱不為身謀。獨不為祖宗墳墓計乎？」余不忍見祖若宗罹此慘禍。（蓋法人之治背叛者，既誅戮其五族。而其祖宗之墳墓仍□燔毀也。故稍有人心者，皆不敢率然犯之）行將老死荒野間矣。³⁴

文中對於「集會」的不自由，以及「連誅」等法律的殘忍皆有描述，以此來批評法國在越南殖民地的惡行惡狀。其後，黃氏領導的民眾革命失敗，躲藏於友人家，在友人的協助下假扮成華人，以旅行券通過邊檢，順利地逃到中國。有趣的是，作家在文末竟感嘆黃氏沒有逃到臺灣，因為：

惜乎不使彼一來臺灣。見我政府之煦煦若保赤子。惟恐我臺民不同化於日本。毫無歧視心。彼當不勝天堂地獄之感也。我臺民處此小桃源。其亦知帝德矣。故筆之以為惊心警目之一助。³⁵

同樣是身處在殖民者的統治之下，李氏對於法國殖民下的越南感到憤慨，卻對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進行歌功頌德，作為知識份子和記者，李氏並非無視日本對臺灣日趨嚴密的統治政策。如此違心之論，到底是李氏對日本殖民者的討好，

³³ 陳益源，《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8月）。

³⁴ 逸，〈亡國志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1910）1月21日。

³⁵ 同上註。

亦或是藉由小說對殖民者進行批判，其動機值得深思。

同年，李氏的〈恩怨寶鑑〉，則是描述越南人阮進士與其子阮光國欲對殖民者法國進行革命，但行動不順，父子只好逃亡遇難，先後漂流到黑人群聚的海上孤島，在島上設帳教學。後遇機會得以回國，卻又遭遇海難，而被阮進士同鄉好友黃千總所救，黃千總並協助父子二人躲避法國政府的追捕，但黃千總卻又遭到阮光國的未婚妻誤會，差點遭其刺殺，所幸在千鈞一髮之際，阮氏父子出面說明，後阮光國與其妻離開越南環遊世界，不知所終。³⁶

由以上兩篇小說可知，李氏對於殖民統治或革命等議題極感興趣，其原因乃是出自於臺灣當下的處境，以及風行於世界的革命思潮，誠如黃美娥針對〈恩怨寶鑑〉所論：

文中所描述的法國高壓統治越南的殖民方式，強化了法國的帝國主義，使其成為極權獨霸的帝國象徵；而另一方面，作者在文中雖然對於反殖民者的抗爭有所刻畫，但最終以「接受殖民者」與「反殖民者」的彼此和解來作結，如此也更確認了法國帝國主義統治的合理性。³⁷

〈恩怨寶鑑〉外，小說〈亡國志士〉則是迴避了清楚的結局，表現出作者的刻意閃躲，更加證明李氏在殖民統治下，面對「革命」議題的曖昧與模糊。³⁸

其他以越南為敘事背景的小說，還有如謝雪漁的〈虎變〉，以及魏清德的〈古體聖文〉。〈虎變〉描述中國浙江人趙嘉，最先被政府派到法國學造炮，卻因事故而遭到貶黜。後趙嘉參與中法戰爭，立有戰功，戰爭結束後滯留在越南，因為通曉法語，故任法國的通譯，卻藉職務之變索取重賄、魚肉越人，而遭致怨恨。一日，因惡事做多遭到天譴，變上天化身為虎，並警告日後必做善事以贖罪。後罰責已了，趙嘉回歸本國，此後以行善終其一生。

小說〈虎變〉充滿濃厚懲惡勸善、因果報應的教化寓意，作者謝雪漁在文末

³⁶ 逸，〈恩怨寶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明治43年9月24日-10月2日。

³⁷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頁9。

³⁸ 林以衡探究李逸濤的革命態度，指出：「李氏也沒有完全地將『中國人』的過去給忘記，所以一方面懷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對中國展開批判和憂心，一方面卻又藉著革命文字與日本殖民者展開對話，於是演變成一個矛盾的現象：李氏要『革』的『命』，是清廷的『命』、是滿人的『命』，李氏並沒有以身為『中國人』為恥，但卻對過去身為『清國子民』的身份感到厭惡，因此對於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並沒有太大的抗拒，反而藉此希望能脫離清政府的惡政和腐敗，以此觀點出發，說明李氏的種族態度是堅決地『漢人至上』，但他的國族認同態度是矛盾且複雜。」〈革誰的命？—日治初期台灣文人李逸濤對革命思潮的接受與想像〉。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之「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3月14日。

以「逸史氏」的口吻，言即：「噫！報應之速捷如影響，有權勢者。可不引以為鑒乎！」³⁹ 期盼讀者能通曉善惡果報的關係，以此做為人生的指引與鑑戒。而〈古體聖文〉則將小說主角由非洲跨回至東南亞，將主角立足於安南河內，並陳述中國革命後混亂政局，並緬懷中法越南戰爭的史事。⁴⁰ 此外還有小說〈義猴〉，是以星加坡為背景，談猴子為主人報仇伸冤，文末有作者評曰：

或曰：猿獸類也，乃能臨難自全，為主鳴冤，緝凶就法，以身殉主，是獸面而人心也。世之士大夫，有一於此，已足使黨里傳為美談。甚或史冊書為盛事，彼乃四者兼全，難能可貴，謚之曰義，不亦宜乎。

由以上幾篇小說可知，臺灣作者對於東南亞的政局、歷史和環境亦充滿興趣，特別是曾經與漢文化有密切關係的越南，更是描述小說時的重要題材，在未來若能與越南漢文學、歷史並置思考，對於東亞漢文化系統的整合將有所助益。

第二節、由文言到白話：臺灣通俗小說的文體變化

文人創作文學作品，文字的運用是基本的構成要素，詩歌如此，較詩歌更需運用大量文字的小說，使用何種文體書寫，才能兼顧作者／讀者間的受予關係，顯得更為重要。⁴¹ 臺灣基於被殖民的特點，語言文字的使用呈現複雜狀況，已是被學界所公認的事實。那麼，必須依靠大量閱讀者閱讀才能維持刊行的日治臺灣通俗小說，又如何在這個複雜的文字語境中安身立命、求新求變而立足於日治臺灣文壇？本節將以分析漢文通俗小說文體為基礎，重新評價文言／白話論戰中小說的地位、論述小說文言／白話的轉變情況，以及白話通俗說何以能在日治後期達到純熟流暢的原因。

一、文言／白話的糾葛：臺灣文人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文體認識觀

作為日治時期受到讀者歡迎的文類，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具有的通俗性與娛樂性，造就它在日治臺灣文學發展過程中不可輕忽的地位。但令人啓疑的是，小說既然被廣大讀者群所閱讀，則除了在內容上以神怪、武俠、偵探和情愛等主題

³⁹ 雪漁，〈虎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23日。

⁴⁰ 潤，〈古體聖文（2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1924）7月11日。

⁴¹ 本章所取的文體之意，策重其語言風格上的特點，故以文言／白話的發展過程為分析對象。申丹說：「狹義上的文體指文學文體，包括文學語言的藝術性特徵（即有別於普通或實用語言的特徵）、作品的語言特色或表現風格、作者的語言習慣以及特定創作流派或文學發展階段的語言風格等。」另有廣義之說：「廣義上的文體指一種語言中的各種語言變體，如：因不同的社會實踐活動而形成的新聞語體、法律語體、宗教語體、廣告語體、科技語體。」本章對文體的定義採其狹義之說。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3版2刷），頁77。

吸引閱讀者所注意外，它在文體上又展現了何種特點，以致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無論在殖民治下的每一階段，都能受到讀者的歡迎？小說文體的選用，是作者與讀者在學習新形式與改革傳統閱讀習性時所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小說由於所必須使用的語言、文字數量遠較詩歌為多，它的文體如何被認定，也較遠較詩歌來得棘手。

首先，以東亞文化圈彼此影響的角度觀之，日本和臺灣受到漢文化綿延不絕的影響，卻又在時間的推移與地域不同下，衍生出屬於自我的文化特點。但追本溯源，漢字終究是構成中國鄰近諸國文化生成的基礎原素。於是由漢字堆砌而成的漢詩、文、小說，也就這樣躍於日本、臺灣文學發展的舞臺，並以此為本，推展出風格同異相間的小說。其次，隨著西洋翻譯小說進入臺灣，西洋語彙也逐漸融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這種新穎的修辭方式和語彙用法，將會幫助臺灣文人在傳統文言的書寫中試圖求新求變，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跨語言的特徵於是更為明顯。⁴²綜合上述各點，都會對於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轉變有推波助瀾的功用。是故，在進入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探究前，值得吾人提問的是，對於日、臺漢文小說皆有影響的中國通俗小說，日治臺灣文人如何看待它們的文體組成？他們對於中國通俗小說文體的判斷與認識，是否會成為他們接受／排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因素，或是對於有實際參與小說創作的臺灣文人，在寫作上的影響？所以，當下文人對於中國通俗小說文體的看法，實與臺灣通俗小說文體的生成與變化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早在日治初期，臺灣知識份子即對小說頗有見地。黃美娥分析日治初期漢文主要的發表場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時，就已指出當下臺灣文壇對於刊印小說到底是有助於文藝振興，或是有害漢學的爭議。但，無論如何，總是將「小說」視為文藝之列，承認臺灣文壇已有由詩歌到小說發展的體類與知識系統變化。並在肯定李逸濤等人提出小說觀念之餘，亦指出李氏等人小說知識觀雖源於中國小說史，但卻已發現中國小說不若歐洲小說具有嚴肅的宣傳意義，而流於閒居無事的弊病。這是臺灣正歷經由舊學轉向新學、由詩歌轉向小說時無可迴避的過渡階段。⁴³更激烈的論辯，則至新舊文學論戰時再度展開。

自大正 13 年（1924）張我軍發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文後，以連橫為首的傳統文人即與張我軍等人就詩歌、擊鉢吟的問題展開論戰。⁴⁴整個論戰的爭

⁴²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2009 年 2 月），頁 18-19。

⁴³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當代》第 221 期（2006 年 1 月 1 日），頁 54-59。

⁴⁴ 歷來對於新舊文學論戰的研究不少，且皆已為此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議題提出精采的論點。例如施懿琳，黃美娥則打破新／舊二元對立的僵化論點，重新於傳統文人的文學觀中，找出其變革的動力。黃美娥，〈對立與協立－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1924-1942）〉，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

議點，是以批判「擊鉢吟」為起點，而後擴及到對整個傳統詩歌問題的省思。但，就算是張我軍等力主白話文學的文人，也不排斥這些小說在文體上的功用。這些兩造雙方對小說文體觀點互異的看法，造成小說一直不是論戰中的爭論焦點，其原因乃出於新／舊文人對於小說文體各取所用的認知，造成小說文體在文言與白話間的混雜。⁴⁵此矛盾可由以下諸人的小說論點得知。

以張梗為例，過去在論及張梗的小說觀時，通常都只注意到張梗抨擊臺灣不過只有《彭公案》、《施公案》等小說⁴⁶，卻忽略張梗後續文章實對於整體小說的形式和內容作了褒貶相摻的評價，他對於傳統小說的不滿，首先針對形式上的敘事模式加以批評：

小說家已存著這個「片言隻語須不謬於古人」的念頭，自然一意摹倣做死板的文章。所有古來的小說大都出於一轍，不外於：「某處、某日、某生、秉性穎悟，聰慧絕倫。……一日遊於某後花園，幸遇小姐，眉目傳情，經婢子從中撮合。……上京赴試，名標金榜，回來團圓。」《西廂記》不是嗎？《荔鏡記》不是嗎？……我們再看《聊齋異誌》（按：應為《聊齋誌異》）與學他一流的小說，那篇不是「某生、某處人，生有異稟、下筆千言、才儲八斗。一日於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為情死。」……但是從小說技術上而論，竟是不值一駁了。⁴⁷

張梗對於中國通俗小說一成不變的敘事模式感到反感，認為此法只是模擬因襲，只有「奴隸性」而沒有「獨創性」。又以此敘事傳統為例，對照臺灣小說後說：

最可惜的，現在臺灣某報上，還是天天不缺登著那些「某生某處在後花園」式的聊齋流的小說，而讀者亦不以為怪。以上所述就小說「筋徑」而言的。我們再看那小說材料出處，不是像《七俠五義》、《七子十三生》、《彭公案》、《施公案》、《粉粧樓》等飛簾走壁的夜行人，就是那些說鬼話的《封神》、《走馬春秋》、《西遊記》、《聊齋記》等。再不然就是《三門街李廣》、《楊家寡婦平南蠻十八洞》、《兒女英雄》、《孟麗君》、《薛仁貴征東征西》、《樊梨花掛帥》、《薛剛鬧花燈恢復家業》，什麼《狄青征西征南》、《狄龍狄虎招親》啦。不是「才子佳人」、「公子紅粧」便是「封王掛帥」。我們仔細看去，便知道無非是、互相挪來補去、

2004年12月），頁81-142。

⁴⁵ 翁聖峰在《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中，已注意到當時文人們對於小說文體看法不一、各取所需的態度，值得本文參考後持續深究，以為下段落小說文體的實質探討作為基礎。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年1月），頁9。

⁴⁶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臺灣民報》第2卷第17號，大正13年（1924）9月11日。

⁴⁷ 同上註。

勉強雜湊成書。究原却是同歸一轍。總而言之，除去種種演義體的歷史小說外，不外乎「妖精鬼怪」、「飛簾走壁」、「才子佳人」、「封王掛師」。⁴⁸

留學日本的張梗受到新潮流的影響，對傳統小說展開檢討是正常的。但他以現代小說的觀點去檢討傳統小說的方式，則有待商榷。因為古典小說與現代小說的創作模式和觀點畢竟迥異，將現代小說的創作觀點用來評判古典小說的價值，兩者本來就無法相容，也無怪張梗的批判火力閱讀起來感覺強烈。但，張梗對於整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發展情況真的清楚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作家如李逸濤、謝雪漁和魏清德等人，並非沒有吸收日本、西洋的小說內容和敘事手法，成為自己創作小說的範本。張梗所批判、沿襲中國通俗小說的「奴隸性」，其實只是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一部份，而並不能代表全部。張梗挑選最大宗的部份加以評論，卻忽視日治臺灣通俗小說吸納其他文化以進行學習、創新的部份，造成後人對於臺灣通俗小說的刻板印象，當然也就無法提升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地位。不過，也不能說張梗就一面倒地看不起中國通俗小說，他在文中，其實仍對口語趨近於白話、通俗易懂、人物描寫生動的中國通俗小說給予讚揚：

而我們古來作品好者甚少，就中《水滸》可推白眉，描寫草澤英雄似活龍活虎一般，疏財仗義、赴士死厄。而一反筆到朝庭（按：廷）命臣，即貪婪卑鄙、彎腰曲背殘害良民。而當時的社會狀態，思想歷歷可旨。可見描寫得頗得其旨，使我們不難忖度當日著者的含義著者表面上雖緘口不言，但我們只覺得著者在紙後冷笑著，說：「朝庭不得任賢，偏登用一個萬惡不赦、無處敢留的高俅，在朝獨攬政權，使可敬可愛的英雄—宋江以下百零八人一不得用力於國家。雖賊盜蜂起，却是亂自上生，朝廷如此不明，還望什麼國泰民安？」這就是「含意」了。他如《儒林外史》也寫得很不錯，內容雖是個個文人的日常茶話事，裡面卻是描出一大幅的文人社會的縮圖出來。⁴⁹

可見張梗對於《水滸傳》、《儒林外史》這類社會性強、帶有批判性色彩的小說是喜愛的，雖不免對於金聖嘆拗口的評點法略微批判，或引胡適之語對作者在描寫人物方面的缺點提出附和。⁵⁰但他並沒有對於《水滸傳》、《儒林外史》所運用的文體提出質疑。在張梗的觀點裡，這類小說的文體淺白易懂，閱讀者可以清楚了解小說表達的寓意，所以他對這些小說是喜愛的。若是如此，臺灣有不少小說如佩雁的〈金魁星〉、謝雪漁的〈奇人健飛啓疆記〉等，不也是因襲《水滸傳》的書寫傳統而成？⁵¹故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特別是以淺近文言文書寫的小說，也應

⁴⁸ 同上註。

⁴⁹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二）〉，《臺灣民報》第2卷第18號，大正13年（1924）9月21日。

⁵⁰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三）〉，《臺灣民報》第2卷第20號，大正13年10月11日。

⁵¹ 請參閱本論文第四章。

有存在的意義。

真正讓張梗感到不滿的，應是思想上較偏向怪力亂神類的神怪小說，對於這類小說，張梗由內容上根本否定它的存在價值，他說：

什麼猴齊天七十二變啦、孔宣的冀口會攝人啦、土行孫掣起翻天印啦、某某女仙拋起馬桶把許多的大羅天仙藏起來啦！什麼元始天尊、太上李老君，什麼一氣化三清、舍利子啦，什麼掌心雷一響，好好一位美人變做烏龜從半空中跌下來啦。種種說不盡的天花亂墜、莫名奇妙的奇珍怪談。一讀興味津津的滑稽使人捧腹笑倒，但已無重意深藏，只博得一笑作無聊的消遣。至於對於人生的貢獻、藝術的使命，毫無半點，是以從嚴正的意義而論，不得稱為藝術品。⁵²

早在張梗之前，許子文在〈破除迷信議〉中，就提出對神怪小說迷信色彩的不滿，他說：

小說之書，所述迷信者甚多。然既能識字，則文理粗通，必不為其所迷，獨有目不識丁者，閒暇之時，偏好聽小說，且好聽小說之最大迷信者，如《封神》、《西遊》……，有志者宜出一提倡，……而以我國古今事實之史蹟，編而為書，刊行於世，……普及地理歷史之概念。⁵³

可見以怪力亂神為主題的小說，內容超出現實而顯荒誕不經者，是當下欲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革的知識份子，心中最為排斥的讀物。與名著小說相較，對於神怪小說，張梗的批判顯得更為嚴厲。他認為此類小說只純有「娛樂性」，而且還是無聊的娛樂性，故根本不值得一晒。對當時的知識份子來說，具有現實意義的小說，才是符合啓蒙風氣、改正社會的有益讀物。但，對於當時絕大部份教育程度不高的庶民百姓來說，寓神怪內容的通俗小說，其中所宣揚的勸善懲惡，才是他們藉由這些讀物所得到的人生啓發。這或許是留學日本的張梗在思考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對傳統小說進行批判時所疏忽的地方。

對於小說內容的好惡，促成張梗對於當下臺灣漢文小說文體變革的關心。這個想要變革的企圖，包含小說的內容與形式。由於大多數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或是識字階層所閱讀的小說讀本，在形式與內容上都與中國通俗小說有承衍關係，所以張梗文中所檢討的對象，雖是以中國通俗小說為主，卻又想要成為針砭當時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良藥。張梗提出小說創作「含意須深藏」、「排春秋筆法」、「倡科學的態度」和「歷史與小說須分工」等觀點，其實就是對當時被認為老套的敘

⁵²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二）〉，《臺灣民報》第2卷第20號，大正13年9月21日。

⁵³ 許子文，〈破除迷信議〉，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第3卷，頁54-55。

事手法，以及小說文體的檢討。例如「含意須深藏」讚美曹雪芹《紅樓夢》和施耐庵《水滸傳》委曲婉轉的筆法，卻對小說家有「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批評，他說：

我們歷來的小說家本有個通有的大毛病：「奸臣不斬，戲臺下人不散。」
「才子佳人不配，普天下同聲一哭用這精神做天經地義。」所以奸臣一出便口誅筆伐，儘管罵得爽快，必致之以死，以稱一時之歡。才子佳人一遇，雖死別也要從棺裡硬硬把她拖起來。叫她和她戀人對配（叫做叶麼借尸還魂）如《紅樓夢》、《桃花扇》那樣的結構。使寶玉、美玉死一死一瘋。使侯朝宗、李香君盡入棲霞修道。終不依那才子佳人必配的陋習者，自古以來洋洋乎幾千萬部的小說裡到底能尋出幾本！而世之文人還不滿意，必定如月下老的口吻「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所以後來便有人狗尾續貂做了紅樓圓夢、石頭記。

又批評陳套的「春秋筆法」，而力主排卻：

古人做小說、戲曲，動不動就拿出孔老的招牌來嚇倒人。起筆還未說半句就先把自已的小說擱去比那些左傳史漢，自高身價。甚至竟摹起《春秋》筆法起來，致往往生出種種莫名奇妙的迂論。……小說是描寫赤裸裸的人生，將人生世相沒有毫厘的裝飾、拋在讀者的眼前、任讀者自己解剖分拆、任讀者自己去研究解決不得插筆者絲毫的意見提供人生問題、迫讀者解決，這就是小說家一徹的態度，又是唯一的領分。⁵⁴

「歷史與小說須分工」則說：

以小說而寫一筆長且煩的歷史賬未免殺小抹說的興味，散漫了描寫的筆錄。以歷史而被寫在小說中，因要助興味或筋徑結構種種的關係，未免失掉歷史的「正確性。」這種的例在於《東西漢演義》、《三國誌》、《隋唐演義》裡很多，不遑枚舉。⁵⁵

重回原文中爬梳張梗的真正見解後，可發現張梗並非一味地排斥中國通俗小說，而是以中國通俗小說為例，提出自己在日本時所見、所聞的小說觀後，期待臺灣的小說能以此為基礎推陳出新，才能與時代潮流相接軌。此點與日治初期李逸濤對中國通俗小說求新求變的功能性期望頗為相近，皆是希望小說有所改革。⁵⁶張

⁵⁴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三）〉，《臺灣民報》第2卷第20號，大正13年（1924）10月11日。

⁵⁵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七）〉，《臺灣民報》第2卷第23號，大正13年（1924）11月11日。

⁵⁶李逸濤：「小說之風，歐洲為盛，推為一種專門之學，法之民約鉅子盧梭，伊之建國奇傑瑪志

梗的炮火對準中國通俗小說的部份缺點進行批判，對於優秀之處亦不吝稱許，這固然是當時臺灣閱讀市場仍以中國通俗小說為大宗的證明。且由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技巧與內容層面上又與中國通俗小說有密切關係，張梗自然地也就將兩者聯接起來，而將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置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框架下檢討。表面上看起來，張梗是針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檢討為主，他卻有意地以「指桑罵槐」的方式，順道檢討當時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構成。張梗對於小說文體的看法，值得於思考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特徵時做為借鏡。

除了張梗外，此時臺灣知識份子對於小說文體的模糊概念，亦可由張我軍／鄭坤五兩人的論辯、賴明弘的文章以及吳敏敦對於「文體」的看法可觀察出。鄭坤五對於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中批評文言文的觀點多所不滿，雖然張我軍在文中仍肯定幾部小說的價值，認為它們的文體淺白，值得學習：「小說也是以白話最有留傳的價值。如《紅樓夢》、如《水滸傳》等等。」⁵⁷但鄭坤五則由漢學復興的立場出發，強調漢文的重要性以及保存價值，並以《三國誌》等小說為例，認為文言文本身就是作為臺灣當下的平易文，而無所謂要以白話文取而代之：

夫臺部文學，足下亦曾言及，謂與中國隔絕，已成兩個天地。兼之數年前，某文相首唱廢止漢文，故全臺公學校課程，絕無漢文片影。吾道之衰，莫此為甚。……惟當今吾臺文學，不啻病後衰翁、元氣未足。倘不求其本，而揣其末，妄加以劇藥，或施過度之運動，余知其無益而有損，何用急於革新哉？又足下希望通行之所謂白面文者，其實乃北京語耳。臺灣原有一種平易之文，支那全國皆通。如《三國誌》、《西遊記》、《粉粧樓》，等是也。只此足矣。倘必拘泥官音，強易我等為我們，最好為很好，是多費一番週折。舍近圖遠，直畫蛇添足耳。⁵⁸

張我軍則回應：

你所舉《三國誌》、《西遊記》乃新文學家所極稱讚的。因為《三國誌》的文字極為平易、差不多大半是白話、至於《西遊記》則完全是白話了。你既知道這二部書好、何以反對白話文？⁵⁹

尼，莫不以此知名於世，助長歐洲十八世紀之革命風潮者，即此產物為其先鋒隊也。支那則異是，大作家著一小說，皆因閒居無事……，甚矣！小說之衰也！」，〈小說閒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4年（1911）3月1日。

⁵⁷ 張我軍，〈請合力拆（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3卷第1號，大正14年（1925）1月1日。

⁵⁸ 鄭軍我（鄭坤五），〈致張我軍一郎書〉，《臺南新報》，第5版，大正14年（1925）1月29日。

⁵⁹ 張我軍，〈復鄭軍我書〉，《臺灣民報》第3卷第6號15版，大正14年2月21日。

兩人的爭論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用意在。到底誰是誰非，也未能有一個定論。值得注意的是，分別代表不同立場的兩人，都在宣揚自己立場時，以符合自己心目中「平易近人語言」的小說為代表。而這些小說，卻又都是在中國頗富盛名的通俗小說。所以，此時期無論新／舊文學家，他們對於通俗小說的文體到底是白話或是文言，心中也未有嚴格的標準。畢竟，只要是被視作「通俗」，其文體便會趨於淺顯易懂。只要淺顯易懂；是文言或是白話，就不會是爭論的重點。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受到中國、日本和西洋的影響而形成，部份小說的文體在文人閱讀中國通俗小說的經驗影響下，化約為成品刊登於報紙上，自也難以避免地呈現既文又白的特點，這個特點反而能幫助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中，繼續保有文言小說的存在，卻又讓白話小說日益純熟。

此外，吳敏敦和賴明弘的文體論，也表現出對於通俗小說文體的模稜兩可。吳敏敦先說明文字的功用，是在「代語言，發表自己之思想，使人視之，一目了然。知其意所在，故書詳明，簡潔而切忌艱澀。」吳氏深知文字的特點，並論昭和時期的臺灣使用文字的情況是：

有人主張改用白話文，欲使一般婦孺，易於了解，其意良善。但所改用，乃是中國白話文，並不是臺灣話文。淺學之人，依然難解仍須求人說明。……試看中國白話文之元祖，稱是曹雪芹。其所著《紅樓夢》一書，首創白話體，於吾臺一般勞働界及初學之人，並不歡迎。如《三國》、《七俠五義》、《說岳》、《彭公案》等小說，不是白話文反大流行。而《紅樓夢》却為文學閑暇之清遣。⁶⁰

吳敏敦如同張我軍般，特將《紅樓夢》看作是白話小說。但，被視為文言文的其他小說，吳敏敦注意到閱讀者的接受程度，認為它們反而比《紅樓夢》更易為大眾所接受，這點就與張我軍有所出入，卻反而接近鄭坤五的說法。但，吳氏很快地就跳脫文體的兩難思考，轉而強調「趣味」和「教育」因素，才是吸引讀者閱讀的主要原因：

即此可知是在人之趣味如何，若無喜好，會不把讀任如何改作淺顯之文，終屬徒勞也。或者以歐美及內地人，無論婦孺，多能讀書作字，不知他因義務教育施行，至少皆有小學卒業程度，故能如此。吾臺多是無受教育者，此正文盲症原因。⁶¹

賴明弘則以胡適《白話文學史》為例，認為：

⁶⁰ 吳敏敦，〈文體論〉《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7年（1932）3月28日。

⁶¹ 吳敏敦，〈續文體論〉《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7年4月13日。

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小說《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⁶²

賴明弘將上述所有小說皆識為白話小說的看法，顯然又與鄭坤五、張我軍和吳敏敦等人有些許差異，這些作為影響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生成的部份因素，又陷入一個到底是文言小說或是白話小說的文體不確定性中。所以翁聖峰綜合上述後認為：「可見日據時期所謂的『白話』與『文言』並不是完全不相容的。」⁶³這個相容又模糊的文體問題，將組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特點。此外，值得繼續細究吳敏敦的文體態度。活躍於殖民統治深化的昭和臺灣，吳敏敦深知文言文和白話文二者在使用上的複雜，在無法取得一個平衡的結論下，他除了分析趣味和教育是文字能否盛行的動因外，最終他放棄對兩者的使用，反而倡導使用日本國語。但，他以通俗小說為例，論其文體的構成，終究表現出臺灣文人對於通俗小說應為何種文體的不確定感。

由上述論點可知，無論是新／舊文人，抑或是大正／昭和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們對於中國通俗小說文體的認定，其實都是立於一個較為寬鬆的標準。到底要如何嚴格的區分何種為文言？何者為白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標準。此模稜兩可的文體認識論既會影響到文人在創作小說時，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文體的建構與再造，使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不停地於時代的滾輪中混雜、模仿不同的文體後壯大自己。又會幫助臺灣文人在持續地書寫、傳抄、模仿各式小說後，創造出文白互現的小說，將其呈現於臺灣讀者的眼前，臺灣讀者能夠接受到的文體形式，也會趨於多元，造就被閱讀文類混雜的樣貌。

二、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形成：由文言到白話的歷時性考察

臺灣文人以自身對中國通俗小說的閱讀經驗出發，並綜合當時臺灣閱讀市場對中國通俗小說普遍性的接受現象後，對於中國通俗小說到底是文言／白話的爭論，似乎未能有一個明確的共識。那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運用文言文／白話文以構成小說文體？在文言文從未被文人書寫小說時所排斥的情況下，白話小說如何在不向前滾動的時間輪軸中邁入成熟？這將是本段落所關注、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由文言到白話的歷時性考察。

（一）對於傳統文體的沿襲

⁶² 賴明弘，〈絕對反對建設臺灣話文 摧翻一切邪說（五）〉，《新高新報》，第 18 版，昭和 9 年 3 月 9 日。

⁶³ 翁聖峰，〈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新探〉，頁 10。

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出刊、臺灣文人開始嘗試書寫小說以來，除了敘事手法上的承衍與模仿外，對於以何種體例形構小說，也成為臺灣文人在不停書寫、刊登小說時所要面對的問題。以時間點而論，乙未割臺前後的臺灣，仍籠罩在傳統中國文學的影響下，而這時小說的主要創作者如李逸濤、謝雪漁、佩雁、霞鑑生和魏清德等，雖是跨越兩個政權交替時的歷史見證人，卻因為他們過去所受、深厚的中國文學教育經驗，而使用文言文創作小說。分析此時期的文體，的確以明顯文言文的書寫方式，構成此時期主要的文體特徵，例如〈鄭成功之海神討伐〉：

以匹夫存亡國正朔，以金廈兩島抗天下全師者，鄭成功也。鄭氏之事跡，其潤飾為神話的稗史之傳說，存者甚夥，人多知之。……梗概如左，偶譚述之。⁶⁴

或是〈顛倒鴛鴦〉，講述主角文鴛依叔而居，叔叔不將女兒許予陳生，而欲將女兒嫁給武生葉騰芳。嬸嬸放女去中表家暫避，陳氏得以與女見面幽會。但，兩人的來往卻被人發現，陳生因此被捉入官府。而本來欲娶文鴛的葉氏則因感到名譽受損而退婚，並控告文鴛的叔叔騙婚，兩家婚事因而告吹，為日後陳生與文鴛的連理之合理下合理解釋。沒想到陳生被釋放歸來後，女主角卻說不認識他，兩人結成連理後某日，才知道為鴛湖主者來撮合姻緣。其筆法也用文言文加以表述：

文鴛世家女也。少涉讐史，長益慧美。母蔡氏亦凌夷宦族之所出，頗識字。女父雖習帖括，然久困場屋，一領青矜，求之不可得，以故家道日落。……及女長，思欲擇一快婿，每苦低昂不就，無何。⁶⁵

以上都是將傳統的神怪小說、綺情小說以文言筆法表述出來。其語法具備「之」、「也」等語末詞，語句中也有「然」、「之」、「以故」等用法。⁶⁶不過，雖是文言文，但並不艱澀，接近鄭坤五所指的「平易文」。可見，臺灣作家在開始寫小說後，最先是運用他們所熟悉的文言文作為小說文體的基本構成，而要補述的是，為了便於閱讀者了解故事，這些作家所使用的是較為淺近可通的文言文，而非艱深的古文。小說作家應有體認到嘗試著以淺近文言文書寫，才能將小說的娛樂性、啟蒙性和普及性發揮的淋漓盡致。例如小說〈梅花女〉以重覆二個感嘆用詞的手法，將「梅花女」不結婚而志在國事，卻又短命而逝的一生以文言文述之：

嗟夫！好花易放，圓月必虧。梅花女愛國女焚，憂勞成疾，竟得不睡之症。醫謂勞心過度，必須靜養乃有效。

⁶⁴ 〈鄭成功之海神討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1日。

⁶⁵ 儀，《顛倒鴛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1年（1908）11月1日。

⁶⁶ 關於類似諸詞的用法，可參考左松超，《文言語法綱要》（臺北：五南出版社，2003年8月）。

嗟夫！梅花女一日愁腸轉九迴，豈能靜養乎？⁶⁷

語句皆以兩個感嘆詞「嗟夫」起始，作者使用重覆的感嘆詞為讀者與自己共同營造一股悲愴哀怨之感，藉以說明新女性之奇，以及抱有壯志的難能可貴。當然，小說也是以「梅花女」為例，鼓吹當下女性能夠效法「梅花女」的精神，培養愛國情操。

自日治時期臺灣文人開始創作漢文通俗小說後，文言體的小說一直是小說創作的大宗。直到戰爭時期的《風月報》系列出刊，白話小說的比例才逐漸追上文言小說，不過，若將《崇聖道德報》、《新高新報》和《臺南新報》上的小說數量一起納入比較，文言小說仍佔上風。但，白話小說的出現，仍可視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作家在文體改變上的努力。它的出現，也並非自日治後期才有，只是數量較少，且多為轉載、傳抄之作，缺少臺灣人自行書寫的作品，但這些轉載作品對於未來臺灣作家以白話文書寫小說，仍有作為學習範本的功用。

在臺灣文人試圖創作小說之初，以文言文為基礎的文體外，臺灣還出現日本文人所撰的歌行體小說，這類小說體例特殊，但仍是屬於文言小說的範疇。雖非由臺灣文人所書寫，但對於漢文小說的閱讀者而言，仍能透過這類小說體驗不同的閱讀感受。例如明治 39 年刊登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由日本文人井上哲次郎所撰的〈孝女白菊〉。⁶⁸此篇小說通篇採用詩歌的方式組成，可以視為日本漢文傳統影響臺灣通俗小說的特例。文末附記則為閱讀者「寰江漁史」在閱讀此篇小說後的感想，並分享上篇小說值得注意之處：

孝女白菊，艷如桃李，而淡若黃花。孝貞直迫古人、氣節幾凌男子。所謂安能辨我是雌雄也。觀其事蹟，悲壯淋漓、情緒纏綿，洵為恰到好處之一短篇小說。巽軒此詩，尤筆力勁健，朝朝可吟，阿堵傳神，曲折道達。且說部亦有成以歌體者，因採錄入本欄，讀者幸勿與尋常之淫蕩猥褻小說，同一例視也可。⁶⁹

黃美娥指出，這篇記言說明時人在品評小說時，已經注意到小說人物個性、故事情節之妙。以及一種「範式的醞釀」。且把敘事詩納入說部，視為小說的觀念，仍出自於傳統說部觀念的殘餘。⁷⁰延續此論點，本文則注意到井上哲次郎以歌行體為創作形式外，「寰江漁史」在撰述記序時，亦有刻意摹倣同為歌行體的古詩作〈木蘭詩〉的影子。不然，為何在「寰江漁史」於記中特別以「安能辨我

⁶⁷ 容均，〈梅花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7 版，明治 43 年（1910）5 月 8 日。

⁶⁸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73。

⁶⁹ 同上註。

⁷⁰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12 月），頁 314。

是雌雄」的語句來描述女主角「白菊」？而「說部亦有成歌體」者的言論，則代表日本漢文人對於小說體例的嘗試。可惜，之後並未在見到類似明確由臺灣人創作的小說，故此體例並未得到臺灣文人加以學習、模擬的青睞，亦未受到臺灣閱讀者熱烈的迴響，故難以成爲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蔚爲潮流的固定體例。但在文言小說的發展過程中，仍有其特別之處。

此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組成文字是以文言文爲主體，這和日治初期小說創作者所受的漢文教育和閱讀經驗有密切關聯。爾後，文言小說在日治大部份的時期，仍爲臺灣文人創作小說時最優先採用的書寫文體。但，隨著文學交流的愈趨頻繁、時間滾輪的日漸前進，以白話文組成的通俗小說，無論是經由傳抄、擬作而來的作品，將逐步出現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組成中，文言／白話文體交互運用後所能帶給臺灣讀者的感受，也將日益強烈。

（二）文／白夾雜的混體階段

不可諱言，以文言文書寫成的小說，主宰了日治時期大部份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這與臺灣漢文小說初登文學舞臺時，作家多爲臺灣傳統文人有關，且這些文人又大多進入報社工作，擁有漢文版面的刊登優勢。再者，另一個原因是，臺灣白話文運動的展開，一直要到大正 13 年（1924）左右才開始。職是之故，當文人開始書寫小說時，自然地會使用他們最熟悉的文體，而這個文言文體的生成，背後則是凝聚文人過去對中國通俗小說的閱讀經驗，或是對日本漢文小說的學習。綜觀明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初登場的近十年，並沒有白話文體的小說刊登，但這些文言體的通俗小說雖是「文言」，卻淺顯易懂，只要識字，應該都可以被閱讀理解。

張我軍等人提倡用白話文寫作至大正 13 年（1924）左右才開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開始有白話體小說的出現，卻不用等到大正 13 年。在明治邁入大正後不久，就開始有零星的白話體小說刊登於報紙上。但這些小說是否爲臺灣作家所創作，則有待考證。因爲這些小說大多未署名、臺灣文人此時是否具有對白話文的認知與書寫能力，也讓人存疑。但可以確信的是，縱使這些偶爾出現的白話體小說不是由臺灣文人所主筆，但它們在臺灣報紙上被刊登、被閱讀乃至於可能被學習，卻是不變的事實。所以這些零星的白話體小說，不但在眾多文言體小說中顯得更爲特殊，它們的出現，多少也都讓臺灣閱讀者（包括小說創作者和純粹閱讀者）了解，除了文言文外，還有另一種文體可以創作小說。

明治末期，小說〈孫行者〉已經呈現白話文的語法。〈孫行者〉作者爲「瘦蝶」，小說情節是續衍中國通俗小說《西遊記》的故事，小說講述原本百戰百勝、體力充沛的孫悟空竟然生病了，只好四處求醫診治，最後歷經風波，又遇庸醫，

才由周道士幫忙治好。小說中提到閱讀曹雪芹的《石頭記》，又提到欲感謝周道士而辦品瓜大會，以電報聯絡南沙理事局，並將西瓜由穆嘉飛艇運上山。〈孫行者〉充滿現代筆法的改寫，其文體既有文言的影子，卻又以白話為主：

卻說孫行者，自從保護唐僧，過了九九八十一難，取得真經之後，封為戰鬥勝佛，常駐三天門，專司收遞外來表章，倒也逍遙自在。
行者謝了童子，作別下山，重新駕雲回去經過花果山。自忖道：「老孫自離此山，足足有二千九百多年了。今日順道去看看幾個舊友罷。」⁷¹

觀察小說內容與文體運用，當時的臺灣文人應沒法運用這麼流暢的白話文書寫小說，故小說應是由中國大陸傳抄而來。但，即便如此，卻也宣告著臺灣小說作家和閱讀者，在文言文或是平易文所構成的小說外，的確會閱讀到白話體構成的小說。到了大正時期，諷刺文明為害的小說〈文明苦〉，與感嘆下人辛勞的〈婢女苦〉，標題形式一樣，文體卻呈現對立貌，表現出此時期文白混雜的文體情況。〈文明苦〉以文言體形式敘文明之累：

朱門洞啓，電火通明。廳事中賓從如雲、男女雜沓。香烟人氣，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猗歟盛哉！斯何地乎！蓋某處開跳舞會也。
時有一客，方與他客握手，作娓娓談。忽覺此客之身上，別有一種特別之氣味，且談且細辨知為硫磺氣，怪而詰之，此客忸怩良久笑曰：「實告君，余染花柳毒，迄今尚未愈。君所聞之異味，即余所用之藥劑發出者也。」⁷²

但同版面另一篇小說〈婢女苦〉，卻是以白話體方式呈現，並運用疊字與狀聲詞的交會，造成全篇小說節奏快速且有音律感：

呀、呀、呀。天明快起來！掃地、淘米、搬柴、出火、燒粥，快來抱小官官。快去取面湯來，快去取火爐來。床前幾塊尿布，，快去洗乾淨了。今天沒有太陽，再弄一個火爐來。
取竹片來，跪下來拍拍，拍，你哭再打拍，拍、拍，你還不拿出來，難道饒了你不成？⁷³

對於臺灣閱讀者而言，閱讀完第一篇文言小說後，緊接而來同版另一篇的卻是白話小說，如此強烈的對立性，臺灣閱讀者應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出文／白的差異性。由於兩篇小說作者都未署名，是否只有題目類似而作者不同無法得知，只能證明此時期文／白小說確有混用的情況。大正 3 年（1914）的小說〈奇男邸〉，亦是

⁷¹ 瘦蝶，〈孫行者〉，《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5 年（1912）4 月 16 日。

⁷² 〈文明苦〉，《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3 年（1914）2 月 3 日。

⁷³ 〈婢女苦〉，《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3 年 2 月 3 日。

在前後都為文言小說間出現的白話小說，雖然它的開頭帶有一點文言文法，但卻是以白話文體構成的小說：

他一聽那嬌而且銳的呼聲，不由止住了腳步：「只聽得伯爵夫人的聲音說道：『尼露，我是忠告你，你快不要如此的好，不然於你自己身上，很有妨礙的呢。』又聽那嬌銳之聲說道：『我不信，且請夫人把所以有妨礙於我之處說出來，那我便聽從了。』」⁷⁴

到了昭和年間，《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刊載的通俗小說，仍是持續著這種以文言為主、偶爾夾雜白話文小說的混合情形，小說〈楊淑玉〉亦呈現著文白夾雜的文體，於眾多文言小說間刊出：

曾記得父母在日，嘗謂兒娶必任兒自擇。女嫁必使女自選。還有時以手拍著我的肩道：「我女擇得如意郎攜手同來，爾時我必笑謂汝輩一對鴛鴦飛來。」豈不好嗎？

淑玉正在這樣的構思，忽聽他的嫂嫂在外面叫道：「淑玉妹妹，爾哥哥有事請爾哩。」淑玉聽□他嫂嫂的呼喚，心坎上便感覺了他們昨夜的話頭。

⁷⁵

雖說是白話小說，但其語氣用詞帶有中國北方的腔調語法，應是由中國傳抄進入臺灣的小說。此外，昭和3年（1928），〈緬甸捕象〉則是通篇用白話文書寫而成的小說，主要談緬甸捕象、馴象的方式，以及利用母象捕捉公象的計策。小說到此時期，其文體由文言文愈趨近於白話，而白話小說則愈來愈多：

捕象是緬甸國要政之一。象是緬甸地方特殊出產。一年總計起來，從象身上得到利益，約有千萬金左右，其數不可謂鉅也。⁷⁶

由於有上述這些小說的出現，無論是否為臺灣人所自行創作的小說，但它們的刊載，都讓讀者了解白話小說的存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就在不停地轉刊白話小說、並被臺灣作家和讀者不停接觸的情況下，走過文白體夾雜的時期。

三、文言未廢、白話當興：白話通俗小說的出現

如同世界各國的文學般，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變化，也是由文言文逐漸轉變至書面與口語較能配合的白話文。當然，由文言到白話的階段並非一蹴可及，過程中會歷經文／白夾雜的階段也是必然現象。由於大多數的小說並未

⁷⁴ 〈奇男郎〉，《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大正3年12月20日。

⁷⁵ 〈楊淑玉〉，《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2年（1927）6月2日。

⁷⁶ 〈緬甸捕象〉，《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1928）5月11日。

署名，其來源是否為臺灣文人所作，或是由同時期中國的報刊傳抄而來，二者原因皆有可能。但，無論它從何方進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領域中，這些小說終將被臺灣閱讀者所閱讀。結束即是另一個開始，當閱讀者閱讀過這些小說後，具有書寫意圖的閱讀者，身份再而變化作者。就在這股習作之風，以及臺灣文壇開始興起對文言／白話的論爭影響下，臺灣漢文白話通俗小說的數量開始增多，打破初期清一色為文言文為基本文體的現象。

當然，一開始的白話體小說篇幅短小，不會立即就出現如〈金魁星〉、〈奇人健飛啓疆記〉等文言長篇小說，畢竟臺灣通俗小說發軔之初，文言文已經長時間為主流文體。觀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歷時性變化，愈進入到昭和年間，小說文言的部份就愈少，相對地白話體的特徵也就明顯。例如〈少女信基督 嫁後抱獨身〉，講述少女秀珠因信奉基督教而拒絕與丈夫圓房，終致離婚一途，開頭描寫秀珠的家庭背景時，即近於白話文的文法：

當塗縣屬黃池鎮，居民汪彩章現年五十二歲。曾開布號，二十年大水時停閉，近來擺設布攤。⁷⁷

但在文中，仍偶有出現較為文言的情節：

其母比為設計，請鄰姬遊說秀珠，卒不動，致婆媳間情感破裂，焦母為後嗣計，欲出秀珠。⁷⁸

整體來說，以白話語法所描述的情節愈來愈多，有些部份文言文語感雖然存在，卻已不明顯。長久以來，《臺灣日日新報》由於發行量廣、閱讀者眾，成為刊載小說最主要的載體。但當報紙上可能傳抄自中國的小說愈來愈多時，不禁讓人好奇，當初小說創作量最多的臺灣文人如謝雪漁、魏清德、李逸濤等人為何不再書寫小說？其中，日治初期在小說創作上最活躍的文人如李逸濤、佩雁早已於大正年間過世。但亦曾經致力於小說創作的魏清德仍積極參與文壇活動直到戰後，卻已不見其小說作品的出現。謝雪漁則在日後出刊的《風月報》中有寥寥數篇小說刊登。這些文人在小說書寫上不再具有創作熱忱，反應出《臺灣日日新報》上漢文版面的逐漸縮減，對作家創作小說的質和量必定是阻力，而非努力創作的助力。這些小說創作量較多的作家如此，其他文人更會因報紙漢文空間不足、大量轉刊中國小說等因素影響下，逐漸失去自我創作的動力。所以，此時期《臺灣日日新報》上文言體的小說，已逐漸成為末流，取而代之的是源源不絕地日文通俗小說被刊登。但其他報刊如《臺南新報》、《新高新報》等報紙，仍能見到短篇文言小說的創作，成熟的白話小說若要出現，仍要等待絕佳時機的到來。

⁷⁷ 〈少女信基督 嫁後抱獨身〉，《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9年（1934）6月1日。

⁷⁸ 同上註。

昭和 5 年（1930），《三六九小報》開始出刊，由於編輯群和執筆者皆以臺南地區傳統文人爲主，故往往被視爲漢文再次復興的代表性通俗刊物。⁷⁹報上的「史遺」專欄、長短篇小說也是以文言文的方式呈現，而較少白話文書寫的文章被刊登。這是文言通俗小說在失去《臺灣日日新報》上的發表空間後，得以恢復生機的一個絕佳機會。但可惜的是《小報》只有約五年的出刊期，文言小說的創作很快又趨於寂靜。繼之而起的北臺灣通俗刊物《風月報》系列，雖也出現如〈花俠〉、〈孔子演義〉、〈鯤島逸史〉、〈花情月意〉，以及日本漢文體〈小雪姬〉、〈侯家棄兒〉等文言文小說，但文言語法已沒有過去濃厚。例如〈臺灣奇俠傳〉：

翌日，言廣聚忽想起昨夜又遭失敗，心中悶悶不樂，滿面盡帶憂愁。世雄乃慰之曰：「二哥汝不要著急，且待今夜再和大哥三人同往探之。無論如何，今夜決定拚命鬪殺，豈怕不能成功乎？」⁸⁰

虛詞與代詞的使用減少許多，唯文言氣息仍有，可見作者林朝鈞還沒能脫離慣用的文法，但卻力求向白話體的語感學習。文言小說雖然還有，但就比例而論，白話體小說如〈桃花江〉、〈花非花〉、〈天真之愛〉、〈黎明了東亞〉、〈新孟母〉所佔篇幅長、數量多。⁸¹徐坤泉、吳漫沙等受到中國鴛鴦派影響甚大的文人又爲此時的主力作家，臺灣文人運用白話文寫作的成熟度至此達到高峰。例如〈新孟母〉：

可愛的春天來了，遠山如笑風景好，泉流潺潺，溪水清，樹上的鳥語關關，彷彿似對人們私語道：「一年之計在於春」，地上的嫩草，經已深綠，空氣裡帶著一種萬花蕾苞的新氣味，雨過天晴的大地，展開了一片遼遠廣大的美景。⁸²

當然，在《風月報》系列上出現純熟的白話小說，除了文體演變的必然趨勢外，發生於此時的第三次新／舊文學論戰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與首次新／舊文學論戰不同的是，此次論戰發生之前，由於經歷了鄉土文學運動的論爭，使得臺灣知識分子對於文藝普及與文體活用的認識更爲深刻，理論性和實踐性也都變得較強。所以幫助這次的新／舊文學論戰，其結果是加速傳統文學的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謂之「新文學」的白話文學⁸³，故白話小說自然也在這個時代浪潮下興起，並有

⁷⁹ 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頁 242。

⁸⁰ 紫珊室主，〈臺灣奇俠傳〉，《南方》，第 134 期，昭和 16 年（1941）7 月 15 日，頁 25。

⁸¹ 學界關於《風月》系列，以及其上小說的研究頗豐，可參考

⁸² 阿 Q 之弟，〈新孟母〉，《風月報》，第 50 期，昭和 12 年（1937）10 月，頁 31。

⁸³ 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一九二四——一九四二）〉，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114-118。

超越文言小說的勢態。當然，也由於文藝論戰和殖民政策的關係，亦不能忽視此刻興起、學習白話文的熱潮。如果說，之前的臺灣文人是藉由閱讀經驗不停累積對白話文的認識與模仿。那麼，此時多數人開始積極學習白話文，並在《風月報》上大量刊載白話文學習的感想與方法，也將會幫助臺灣知識份子在白話文學認識觀／創作觀上趨於成熟。⁸⁴而這股對白話文學習的熱潮，除了有殖民統治上的涵意外⁸⁵，白話小說的創作，亦是學習白話文後最直接的成果。

「由文言到白話」的歷時性觀察，絕非文言文就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場域中消失，只是不同時期就會產生相應成熟的文體。不同文人習用自己善長的文體加以創作，以發揮自我的風格，是自然的文學現象。在歷經長時間的學習、模仿與轉載後，成熟的白話通俗小說終於出現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舞臺。而且這些小說不再是中國傳入的白話小說，是由臺灣作家親自執筆而成的作品，這對於臺灣通俗小說的發展會有正面的助益。

第三節、文本、閱讀與再書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類型與文體再造

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內容、敘事手法多元，見證臺灣文學的包容力，以及受到外在文化影響的特點。內容與手法如此，小說文體亦呈現此面貌。文言與白話文構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基本文體，並在文學發展中的歷程中互有消長，卻又共存相生。故歷時性的觀察，讓吾人得以識此流變，並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發展過程具有通盤的掌握。但，除了文言文與白話文的交互作用外，臺灣小說創作者／閱讀者運用外來文體對臺灣通俗小說的再造現象，亦不能忽視，誠如伊瑟所言：

文本的潛能在歷史的制約下開展，這種開展須要一些架構以便來評量文學文本吸引讀者所藉用的手段運作。因此，如果要把文本在其歷史上繁複多樣的領受方式加以概念化，勢必要分析文本起反應的結構（the text's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s）。一般所稱的讀者領受，只不過是文本在讀者身上肇始而生的產品，卻被主掌讀者看法的正律和價值所塑造。因此，讀者領受指出了偏愛與癖好，這些偏愛與癖好不但透露了讀者的習性，也透露形成他態度的社會狀況。⁸⁶

⁸⁴ 楊永彬已指出此時的《風月報》上，有不少關於學習白話文的文章。楊永彬，〈從「風月」到「南方」—析論一份戰爭時期的中文文藝雜誌〉，《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臺北：南天出版社，2001年6月）。

⁸⁵ 柳書琴，〈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1937-1945）〉，《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5月）。

⁸⁶ 伊瑟著、單德興譯，〈讀者反應批評的回顧〉，《中外文學》第19卷第12期（1991年5月），頁86。

以下將由共時性的觀察出發，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類型。⁸⁷如此能夠了解當下兼具小說作者與讀者的臺灣文人，對於所能閱讀到的、由外界傳入臺灣的文體產生沿用、模擬與再造的反應，並觀察他們在創作小說時所偏好用的文體。亦在論述時輔以敘事手法的分析，探討臺灣文人如何在閱讀不同類型的小說後，模仿、再造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樣貌。

一、承接中國：章回體、傳奇體和叢談體小說

章回體小說即是直接承衍自中國通俗小說的代表，日治時期有不少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同中國通俗小說般，以回目等體裁呈現於閱讀者眼前，此點與中國的演義傳統有密切關係。⁸⁸除了講述、改編中國歷史為內容的小說外，部份以日本人、事、物為題材的講談，也都採用章回體的形式撰寫或是轉刊。⁸⁹對於自幼即閱讀中國通俗小說的文人而言，以章回體的方式撰寫小說，是他們最為熟悉的文體類型，例如謝雪漁的〈最新小說 陣中奇緣〉，性質為翻譯小說、內容為描述西方故事、並刻意標明為「最新」，譯介過來後卻仍納入章回小說的體例中，以回目和詩句作為標題，如：「第一回 松如龍進攻東野 熊大猛協守西山」。或是佩雁的〈靈珠傳〉，標目為：「第一回 珍珠入夢」、「第二回 棘院掄才」、「第五回 老俠仗義」等。⁹⁰講談使用章回體方式書寫的則如〈塚原左門〉，作者會在題目之外下一個引子，或是在每日連載的敘事文末以詩句做為結尾。例如主題〈塚門左門〉後即有「鬪武術源內制勝，試角力川北揚名」、「遇大善捕吏竄鼠，稱山貓乞丐懇親。」⁹¹等引子⁹²，以詩句做為結尾則如：「有詩為證曰：『曾為道士詐黃金，又向權門得主心。誰識用村此男子，神機百出莫能尋。』」⁹³這種「有詩為證」的手法，實際上即源於中國宋代的話本，而後演進到章回小說中使用。⁹⁴

章回體小說出現的時間，大抵分佈在明治年間、日治初期的臺灣。由上述可知，部份小說的內容已融入西方文化，但在體裁上卻仍採用傳統文體。這與此時期改隸未久，所以小說創作者和閱讀者的寫作習性和閱讀習慣，大多仍偏重於

⁸⁷ 由於白話小說於上節中已論及，而新聞體小說又包含有白話文書寫的部份。故本節暫不論述多以男女感情為描寫主題的白話小說，而著重於在日治時期數量最多的文言小說其細部分類。

⁸⁸ 請參考本論文第四章。

⁸⁹ 請參考本論文第五章。

⁹⁰ 南瀛雪漁，〈最新小說 陣中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明治38年（1905）7月1日。佩雁，〈靈珠傳〉，《靈珠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9月12日、9月18日、10月12日。

⁹¹ 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原左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911）1月22日。

⁹² 宋人話本，時常在正文之前以一個引子做為開場，此引子有的使用詩詞，有的用故事，這種引子即被當時的說話人名為「得勝頭迴」，也就是「入話」。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1999年8月），頁753。

⁹³ 「有詩為證」這類形式亦源於宋人話本，例如〈錯斬崔寧〉、〈西山一窟鬼〉等皆有此例。同上註，頁753。

⁹⁴ 同上註，頁752-754。

中國通俗小說的文體。所以，除了章回體外，亦出現對傳奇體和叢談體的繼承。

傳奇／叢談亦為小說文體之二，兩者不盡相同。⁹⁵但共同點是形式短小、作家能透過簡單的文字，將人物行動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來。日治初期的〈女劍俠傳〉的筆法，具有唐傳奇的風格：

女術能窮極變化，納須彌山於芥子中，劍一，彈丸二，旦夕隨身，時於口中吐劍，指上出丸，取人首於十里之外。⁹⁶

這種文體近似於中國唐傳奇〈聶隱娘〉：「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⁹⁷同時期臺灣文人李逸濤，也有仿唐傳奇〈虬髯客傳〉的敘事手法。〈革命奇緣〉談鍾子翼從事革命活動，卻被朋友蘇某所陷，正在危急之時，王典史之女嬌兒與婢救子翼脫困，在等待父親的過程中，嬌兒與子翼於客店中遇到奇俠「鐵血子」：

一日蚤起，嬌兒方對鏡理妝。子翼坐于其側，與謀救父之道。驟見一客率簾入，傲不為禮，昂然據上座，目注嬌兒不已。子翼見其虬髯而猿眼、五短身材，颯爽有英氣，知非凡庸。然惡其無狀，色大變。時嬌兒已偷視之，知客必非無因至前者，猶恐子翼以小忿誤大謀，乃整衣先入，目視子翼。頤使出應。……客曰：「廣西深山中，有僕別墅，不妨俱往。」子翼入告于嬌兒，嬌兒亦以為然。會有輪船將往廣東，與鐵血子共附其船以行。既又由廣東入廣西，乘肩輿十數日。步行者日餘，始抵其地。四面皆山，中有平原方六七里，甲第連亘，不知幾千百落。……鐵血子使置酒高會、暢談哀曲，夜深始散。越日有會計持簿記而前，請主人檢查，鐵血子請子翼同閱。⁹⁸

「鐵血子」與嬌兒、子翼在客店中相會的情節，與李靖、紅鬃女初識虬髯客時類似。且文末「鐵血子」亦仗義疏財，將家產全數交由子翼從事革命活動，亦跟虬髯客將家產全數贈予李靖、成就李靖平天下之志的行為如出一轍。到了大正 12

⁹⁵ (漢)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然亦弗滅也。」，《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690。桓譚，《新論·本造篇》言：「若其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漢)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9 月)，頁 1。

⁹⁶ 佚名，〈女劍俠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4 年 2 月 23 日。許俊雅認為此一系列小說是晚清文人王韜的作品。許俊雅，〈王韜文言小說在臺灣的轉載及改寫—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2011 年 8 月)，頁 265。無論作者為何人，此時刊登在臺灣報紙上皆會對臺灣文人的創作產生影響。

⁹⁷ 〈聶隱娘〉，收於李昉編《太平廣記》，卷 194。

⁹⁸ 逸濤山人，〈革命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0 年(1970) 3 月 30 日。

年（1923）的〈杜子春〉，更是直接將唐傳奇〈杜子春〉轉刊到報上。⁹⁹

除了章回體和傳奇體外，不少小說的連載最長只達二、三天，且篇幅極小，有些甚至等同於一般的方塊文章。這種叢談體的小說多以中國人、事、物為背景，諸如〈李雅宜〉、〈拳術〉、〈俠盜軼事〉、〈白衣孃〉、〈柳生〉、〈段七娘〉、〈印月〉、〈范景深〉¹⁰⁰等小說，篇幅都極短，內容也趨於簡單。最出名的是大正 5 年（1916）由署名「秋風」的一系列〈技擊餘聞〉，介紹如「徐一清」、「宋山」、「白太官」、「白大痴」、「毛豹」、「海太子」、「殷三郎」等人的行事¹⁰¹，大正 10 年也有如「陸碧景」、「珍娘」、「張松溪」等¹⁰²，大正 11 年（1922）將大俠「甘鳳池」放入介紹。¹⁰³日治後期則有趙雲石、趙雅福父子於《三六九小報》上連載的「史遺」專欄。這些體裁短小、以講述奇人異聞為主的叢談，充斥於各時期的報紙欄位，屢見不鮮。可見叢談除有趣味性能吸引讀者持續閱讀，故能歷久不衰外，亦有補白報紙欄位的功用。

二、移植日本：日本漢文體小說

日本漢文小說在日本有悠久長遠的發展歷史¹⁰⁴，其源頭主要受到中國通俗小說的影響¹⁰⁵，卻在菊池三溪、依田學海等人的致力書寫下，亦帶有濃厚的日本風格，所以應被視為異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文類。但它和中國通俗小說一樣，對日治臺灣對漢文通俗小說造成影響。其中，與日本多數來臺儒官具有師承關係的菊池三溪¹⁰⁶，他所創作的小說如〈紀文傳〉、〈木鼠長吉〉、〈臙脂虎傳〉、〈嬌賊〉、〈本

⁹⁹ 早在大正 2 年（1913）年，〈杜子春〉就已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但未刊完。杜子春，《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2 年（1913）6 月 1 日。十年後，完整的杜子春，才又分上、下兩集，重刊於報上。杜子春，《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12 年（1923）2 月 8、9 日。

¹⁰⁰ 分別刊載於大正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由於大多形式短小卻又數量眾多，故僅以例舉之。

¹⁰¹ 以甘鳳池、白太官為例，早在大正 11 年（1922）前就屢出現於中國的《小說月報》等刊物，可見日治臺灣確有不少小說由中國報刊傳抄而來。《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5 年（1916）8 月 1 日-8 月 26 日。

¹⁰² 《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10 年（1921）5 月 3 日、5 月 18 日、5 月 30 日。

¹⁰³ 《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11 年（1922）11 月 25 日、27 日。

¹⁰⁴ 「日本漢文小說體」為筆者所自創的名詞，有必要為此類小說創一專門說法的用意在於，日治初期引介了如菊池三溪、依田學海等人的日本漢文小說進入臺灣刊載。這些小說被臺灣文人閱讀後加以學習，也依其模式創作出以日本人、事、物為背景的小說，這些小說在形式與內容上都與日本漢文小說有相似處，故可以將其視為一個體例，如此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文體類別上的區分才能更為清楚。

¹⁰⁵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¹⁰⁶ 菊池三溪（1819-1891），名純，字子顯，又稱純太郎，號晴雪樓主人、三溪居士、三漢學人，日本大阪府紀州人，求學時曾拜名儒為師，並任江戶赤阪邸學明館授讀、幕府將軍昭德公侍講及儒官，是日本漢學界創作眾多的著名學者。菊池三溪與日本領臺初期的官員皆屬「儒官」團體外，日治初期來台的儒官們，多與日本國內的漢學家有師承關係，或是朋友的情誼。例如日本開始武力進佔臺灣時，以軍醫身份隨同軍隊來到臺灣的日本文人森鷗外，中學時期學習漢文學的老師即為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依田學海。而依田學海又與菊池三溪亦師亦友。依田學海（1833-1888），幼名幸造，長名朝宗，本名為百川，其師藤森天山為之取號學海，著有《譚海》、《俠美人》等漢文

所擒龍)等,就在此時開始被臺灣文人以轉載、改寫等方式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這些小說,豐富了日治初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內容外,臺灣作家也以此為範本,進行小說創作。所以菊池三溪的小說進入到臺灣,既有文學傳播的意義,也有文學上的價值,亦可被視為殖民文化的象徵加以探討,以下將逐一析論。

(一) 引入日本漢文小說的動機：作為書寫文字的過渡橋樑

日治初期的臺灣傳統文人,不但要面對戰火對身家性命的威脅,日本殖民政府挾帶著現代化革新後的優勢進入臺灣,曾經身為中國知識份子的文人們,也要面對政治、文化的變動。對於過去深受中國傳統教育的臺灣傳統文人而言,被殖民者的身份無可避免的要面臨語言轉換的問題,雖然日治初期不少來臺儒官亦熟悉漢文的使用、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也未反對民眾對漢文學習¹⁰⁷,但考量到未來殖民勢力逐漸深化,以及與殖民官方溝通的便利,不少臺灣傳統文人開始進入殖民政府所設立的「國語傳習所」學習日文。例如「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記者謝雪漁,即為第一位進入「國語傳習所」內學習日文的前清秀才,故王松稱謝雪漁:「年少氣英,汲汲於當世之學。」¹⁰⁸同樣身為「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的李逸濤,本身亦具有日文能力。¹⁰⁹

謝雪漁、李逸濤對於日文的學習,除了基於現實職務上的需要外,不免帶有主動向殖民政府傾斜的意味,但語言的學習,並非短時間內一蹴可及。明治29年(1896),第一間「國語傳習所」設立後,全臺各地才陸續設立「國語傳習所」。¹¹⁰也就是說,謝雪漁、李逸濤對於日文的學習是從清廷割臺後才開始。李逸濤固然有翻譯日文小說〈志士傳〉,但遲至1907年才出現¹¹¹,在沒能夠完全使用日文做為書寫和交談的工具時,包括謝、李二人在內的臺灣傳統文人,仍必須依賴漢文和日本官員進行文學上的交流。因此,檢視日治初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出刊前的臺灣小說,無論是日文或是漢文小說的作者皆為日本人。¹¹²除了

作品,詳細可參考王三慶、陳慶浩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初版),頁237-238。與森鷗外的師生關係可參見平川祐弘、平岡敏夫、竹盛天雄編:《鷗外の人と周邊》(東京:新曜社,1997年5月),頁105。或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究》第26期(2008年6月),頁9。

¹⁰⁷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頁123。

¹⁰⁸ 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年),頁68。

¹⁰⁹ 根據黃美娥的考證,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頁243。

¹¹⁰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頁123。

¹¹¹ 〈志士傳〉乃是李逸濤在1907年時翻譯日本作家二楸庵主的作品,黃美娥以此例做為李氏學習日文的例證外,截至目前為止筆者的檢視,1907年前似未見到李氏其他翻譯作品。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頁280。

¹¹² 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頁242。

漢詩外，臺灣傳統文人若要藉由小說來與日人進行文化上的交流，在便於閱讀、對漢文親切的前提下，以「漢文」為書寫工具的日本漢文小說，無疑是在臺灣文人日文能力未達純熟之際最佳的小說讀物。而刊登這些日本漢文小說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除了是殖民政府為安撫臺灣漢文階層的一個手段外，其功用主要是為了臺灣總督府對臺灣人宣達政令及政策的意圖¹¹³，在這種殖民政策的控制下，臺灣傳統文人轉載日本漢文小說供漢文階層閱讀，不但為殖民者宣揚日本文化，這個轉載的舉動也是殖民政府所樂見之事。

因此，菊池三溪的日本漢文小說就在日本來臺儒官的引進下，開始被臺灣傳統文人所接受。且因為這些小說以漢文作為基本屬性，滿足了臺、日雙方在以漢詩做為文化交流時的主要工具外，亦利用日本漢文小說作為另一個彼此交流的文類。

（二）漢文通俗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的轉載與改寫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對日本漢文小說進行模仿前，首先將菊池三溪的部份小說以原封不動的方式轉載到臺灣，例如全 4 回的〈臙脂虎傳〉，前三回在內容上沒有任何更動，仍是講述波流與鬼清私通並生下一女，名曰男傳，男傳不但生性好賭，更接連與波之助、市松等人發生關係，最後聯合市松殺害久病在床的波之助，市松被捕後，男傳又以女色引誘吉藏，最後將之殺害，後男傳終於伏法。¹¹⁴〈嬌賊〉一文，則是描寫富家女雪野不幸早逝，父母將其葬在極樂寺後，一日卻有一男子自稱為雪野的仰慕者，無論如何都請求寺中和尚開棺讓他見雪野最後一面，開棺之事，為法律所不允許，男子於是利用寺中和尚不敢洩密的弱點，偷取棺中陪葬物「一為頭陀囊、二為麻衣袖、三為胎髮臍帶，斜封糊貼，上署亡女之鄉貫名姓…，瀨左夫妻把檢之，皆其所記，毫，蔑可疑。」，以此對富人進行詐財。¹¹⁵〈本所擒龍〉講得也是詐欺之事，描寫一客假稱老翁家的池中藏有幼龍，客則自願幫忙捕捉，但捕捉之時為避免被龍氣所傷，要求老翁一家人只能躲在室內，不得觀看，但捕捉到的幼龍不過是鰻魚背上畫龍文，有心者把牠拿去展示，竟能得到萬金。¹¹⁶〈丸山火災〉則是以江都一地的傳奇故事為題材，描述女子阿岐與姦六私通，殺害阿岐主人德一後劫財而逃，蒙金生相救後反恩將仇報，會同佞七奪取金生財產，導致金生含恨而死，妻兒無家可歸，後阿岐得女蜉蝣，十六歲時因偶遇一紅衣少男而相思不止，後雖得男子紅繡衣卻中邪而亡，此繡衣後化為火球造成丸山大火，蓋男子即為金生之子綠松，與母最後得以善終，為惡者如

¹¹³李承機，〈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的交錯》（臺北：播種者，2004年4月），頁203。

¹¹⁴三溪，〈臙脂虎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31日-6月2日。

¹¹⁵三溪，〈嬌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6月13日-6月14日。

¹¹⁶三溪，〈本所擒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年6月16日。

阿岐夫婦、佞生夫婦則皆不得好死。¹¹⁷以上小說皆直接由菊池三溪的小說原文轉載而來，臺灣文人得以閱讀到原汁原味、由三溪所撰的漢文小說，對於日後創作小說時敘事模式的建立有所助益。

臺灣文人藉由轉載、改寫的舉動對日本漢文小說進行接受，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吸納日本文學的第一步。在配合殖民文化進入的前提下，日本漢文小說具有開拓臺灣讀者閱讀空間的意義；但對臺灣文人而言，在大量閱讀後，純粹的轉載行為已無法滿足他們身為作家對書寫小說的渴望。例如，菊池三溪的〈紀文傳〉，內容描寫文左衛門生性豪邁、頗具計智，其事蹟有以木偶做毒餌助鄉里斬殺為害鱷魚，或是滔天巨浪時不畏險阻、以百金授人，一同出海以柑子、鮭魚特物來回經商，成為巨富後禮賢下士、善聽人言，加之本身深識遠慮，而能避火災，經營林木事業公道信義，頗受好評，財富得以不停累積，卻視金錢如糞土、遊戲人間，後因家道衰落，歸隱山林並寄情於俳句，得以善終，留奇名以及才名於世間，供人懷念。¹¹⁸但此篇小說轉載到臺灣卻經過改寫，署名「白濤」者對〈紀文傳〉加以刪減、改寫，並易名為〈紀文大盡〉¹¹⁹，小說取向大致不變，但已非原本菊池三溪的版本，其改寫情況如下表：

比較類別 \ 篇名	紀文傳	紀文大盡
題名不同	原題名不變	由原本的「紀文傳」改稱「紀文大盡」，「大盡」之稱，亦為原小說所無，但〈紀文大盡〉文中有云：「極一時之揮霍，人呼曰紀文大盡，大盡云者，即邦人以稱能積財之富豪也。」
主角姓名、生平	主角名為「文左衛門，字幼吉，紀州田浦人，或曰熊野人。」 其個性：「氣宇快闊，不修細行，智愚一視，毫不設畛畦。尤喜奇計，妙心算，而外溫藉坦率，遽而接之，如勤勗書生。」 「亨保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歿焉。」	主角為：「五十嵐文左工門，紀州田邊人，幼字文平，俗稱紀伊國屋。」 其個性：「氣宇雄闊，不拘細節，權奇自喜，極妙心計。」 除原句外亦在文末增加：「年六十六，或云，元錄六年八月八日歿，年五十四，蓋德川幕府時可屈指之人傑也。其行為愈出奇，有變幻不可端倪者。」

¹¹⁷三溪，〈丸山火災〉，《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6年7月7日-7月8日。

¹¹⁸菊池三溪：〈紀文傳〉。王三慶、陳慶浩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頁312-316。

¹¹⁹白濤，〈紀文大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5月18日-5月19日。

情節刪改	買賣藝柑子一段，原篇透過對話描寫：「文左假而修理之，三數日竣工，乃揚言曰：『有能冒風浪航海者，人與百金。』人皆哂其虛妄。有一人應之，輒予百金，僉駭曰：『文左信人，豈食言詭人者邪。』」	在投毒餌毒鱷魚、甘冒滔天巨浪買賣藝柑子或是其他情節，在用字方面不同，買賣藝柑子一段甚至整個被刪去。

對〈紀文傳〉的改寫、冒名行爲已表達出臺灣文人的創作企圖。再者，好不容易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這樣純漢文空間出現，若不多進行點創作活動，未免浪費了殖民政府的「美意」。就在這種時空刺激下，不少以日本漢文小說爲範本的臺灣小說開始出現在報紙上，證明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並非只有皮毛式的轉載和改寫。

(三)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敘事模式的模仿

臺灣文人在日本漢文小說的影響下，開始創作出一連串題材、體裁與日本漢文小說相近的作品，並刊登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例如署名「最不羈生」所作、描寫天津少士「木倉海」的〈木倉海〉¹²⁰、描寫日本奇女子伊東阿春爲父報仇的〈烈女報讐〉¹²¹、兄弟爲父復仇的小說〈兄弟復父讐〉¹²²、妖怪做亂的鬼怪小說〈蝦蟇怪〉¹²³，或是寓有報恩意義的教化神怪小說〈靈龜報恩〉等¹²⁴，這些小說和三溪氏的作品一樣，有孝子、神怪，也有恩仇等多元題材，爲何這些小說可歸類爲以日本漢文小說爲範本習作而來的呢？可由以下幾點觀之：

1. 刊登的時間相近：這些小說刊登於報上的時間，大多集中在三溪的作品被刊登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時的前後，小說作者或在刊登三溪小說時已事先閱讀因而習作，或是刊登後閱讀，進一步加以習作，兩者皆有可能。
2. 大多是以日本爲背景書寫：在文字上使用漢文，但小說所描寫的背景爲日本的奇聞佚事，這些習作的小說也是如此。例如〈烈女報讐〉：「伊東阿春，蓬萊無二之奇女子也，其父仙右衛門…，與大西助次郎善…，時元錄九年事也。」

¹²⁰ 最不羈生，〈木倉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2日。

¹²¹ 少潮，〈烈女報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5月3日。少潮者，黃美娥考證爲「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李漢如，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315。

¹²² 溪州牛郎，〈兄弟復父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1906）年6月6日。

¹²³ 雪漁，〈蝦蟇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5月11日-5月12日。

¹²⁴ 雪漁逸史，〈靈龜報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4月28日-4月29日。

¹²⁵〈兄弟復父讐〉：「我邦鎌府創造之世，有河津祐泰者，伊東祐親之子也。」
¹²⁶〈蝦蟇怪〉開頭即言：「我國永錄朝，有結城千駒者，津國人也。」¹²⁷〈靈龜報恩〉亦言：「我國天正朝，左相菅原公名英號藤邨，有別莊在京都城北，號為怡園。」¹²⁸這種一開頭先介紹小說人物，又是以日本為主要背景的小說，和菊池三溪所作的漢文小說如出一轍。因為三溪的小說，無論是〈紀文傳〉、〈嬌賊〉或是〈本所擒龍〉，一開始皆是介紹何人、何地做為小說引子，對於剛接觸到日本文學的臺灣傳統文人而言，這些日本漢文小學成為了他們寫小說的最佳範本，有別於同時期刊登在報紙上，以中國人、事、物為主要背景的传统通俗小說。

3. 文末所附論贊，多仿照三溪口吻：李進益的考察指出，菊池三溪《本朝虞初新誌》一書，實受中國小說影響頗深：

菊池三溪『本朝虞初新誌』一書之命名受張潮『虞初新志』影響是相當明顯的，而且由現藏日本京都大學的若干菊池遺稿，有些漢文小說文末書以『異史氏曰』而非如現行刊本所寫『三溪氏曰』，可知菊池原本欲仿倣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常用『異史氏曰』的評論手法，其後，或許他以為直接用原明評鶯較佳，因而改採『三溪氏曰』，這正好與張潮在『虞初新志』每篇文末所附論『張山來曰』若合符節……。¹²⁹

轉載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三溪小說，亦保留三溪的文末評論。這些小說中，三溪多以「三溪氏曰」的口吻在文末做出小說評論，所以同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木倉海〉文末有「諧史曰」、〈烈女報讐〉有「奇史曰」、謝雪漁所作如〈蝦蟇怪〉、〈靈龜報恩〉有「逸史曰」、〈日本海之幽舟〉有「禪史氏曰」、〈紀文大盡〉亦有「白濤曰」等字樣，陳伯輿所作的〈智擒兇鱔〉文末甚至直接使用三溪用過的「異史氏曰」來評論¹³⁰，可見時人於小說創作中仿效三溪的意圖，故黃美娥指出此為日臺文體的「混生實踐」。¹³¹當然，這種手法也有來自中國通俗小說《聊齋志異》直接影響臺灣文人寫作模式的可能性¹³²，但就三溪小說被引進的時間點而言，時間較為接近，且有多篇作品實際刊載於報刊上。而《聊齋》使

¹²⁵ 少潮，〈烈女報讐〉。

¹²⁶ 溪州牛郎，〈兄弟復父讐〉。

¹²⁷ 雪漁，〈蝦蟇怪〉。

¹²⁸ 雪漁逸史，〈靈龜報恩〉。

¹²⁹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頁 259。

¹³⁰ 溪州伯輿，〈智擒兇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39 年（1906）5 月 10 日。

¹³¹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頁 381。

¹³² 李逸濤在〈小說閑談〉中曾提及他閱讀《聊齋志異》的感想，其感想雖論及體裁，卻只針對「小說傳紀」而述，並未深究文末論讚的使用。故就閱讀經驗觀察，李逸濤及其同時代文人應該都有閱讀《聊齋》的經驗。不過在嘗試小說文體的建構時，類似上述文末論讚的方式，日本漢文小說的影響顯得較為直接與明顯。逸，〈小說閑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4 年（1911）3 月 1 日。

用此體例的小說則皆未被刊載在報上，只存於文人閱讀經驗中。閱讀經驗和當下閱讀於日治初期產生了疊合，此種環環相扣的影響關係，正是東亞文學脈絡下、促使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生成的「跨界知識傳播」的文化現象。¹³³以當時小說作者欲與新統治者接近的政治取向觀察，謝雪漁、陳伯輿因有延用日本漢文小說的書寫模式以示好於殖民者的用意。故此種評論筆法，受到日本漢文小說的直接影響應遠大於《聊齋誌異》的間接影響。

由以上論述可知，日治初期臺灣文壇對於菊池三溪的漢文小說，並不是僅限於單純、直接的轉載，而是在認識、閱讀後，臺灣傳統文人基於同文的便利性，進一步的將其改寫，或是以三溪的小說為範本，進行習作。於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在刊登三溪的小說外，亦有不少臺灣文人所仿作、習作的日本漢文小說出現。至於，為什麼會有此文學模仿、習作的現象出現？吾人認為，日本漢文小說在日治初期的臺灣受到青睞與成為文體學習的情況，乃肇因日本殖民初期，對在臺灣文人未能快速嫻熟日文的狀態下，以漢文書寫的日本小說最先成為臺灣文人得以體驗日本文化的媒介物。所以，知名漢學家菊池三溪、依田學海的小說或詩文被大量引入，臺灣文人再閱讀過後、動筆嚐試小說創作之際，除了敘事模式上的模仿外，也開始運用類似的文體框加於其他小說中。所以，近於「三溪曰」、「異史氏曰」、「野史氏曰」等手法，並不會只出現在以日本人、事、物為結構的日本漢文小說中，在其他沒有日本人、事、物的小說裡，亦可觀察出小說創作者予以模仿後加以再造的痕跡。

如何證明臺灣文人閱讀過日本漢文小說並產生影響呢？明治39年(1906)，小說〈烈女報讐〉的形式可被歸類於日本漢文小說。其故事內容講述伊東阿春之父仙右衛門，因助次郎欲調戲妻子，而與助次郎結仇，不慎為其所害。伊東阿春忍痛習武、隱藏於豪門中伺機復仇，最後與義僕鐵平相合作，殺仇人為父復仇。報仇後自己則落髮為尼。文末「奇史」評曰：

阿春一孱弱女子，而能雪大仇於權貴之門。緹縈奇女，隻炳宇宙。觀其往來於豪門奴婢間，十餘年不動聲色。其慎密負重、志堅鐵石、心細毫毛。雖古忠臣義士之行為，何以過是。可不謂奇偉哉！噫此其所謂神州奇女伊東阿春也。(少潮)¹³⁴

「少潮」為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記者李漢如¹³⁵，他轉刊了此篇小說，於是

¹³³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頁379。

¹³⁴ 〈烈女報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5日。

¹³⁵ 李漢如(1877 ? -1936)，原名黃海，號耐儂，筆名少潮，澎湖人，師事陳梅峰。1902年左右赴臺北，任職《臺日報》記者，1907年渡廈門任職《全閩新日報》，1936年任職天津《庸報》。生平可參考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

在文末署名記之，自己當然也閱讀過此篇小說。此後，「少潮」自己有小說〈雙喜〉問世，小說內容講述周生與妓女雙喜歷經波折後互許終身，但雙喜雖為長期接客，導致身有殘缺而無法生育，但周生不以為意，仍堅持娶之。感動周生真情相待的雙喜，不顧周生反對而作主為周娶妾以沿周家香火，最後皆大歡喜。文末李漢如又以「憐儂」的筆名，提出自己閱讀後的感想，作為論讚：

買笑千金，尋歡片刻，苟當銅山倒後，欲望佳人眷我，何殊撈月滄江，故財盡交疏，色衰愛弛。易地無二致也。而孰知江河日下之際，尚有情義兩全，如少瀾雙喜者乎？余非好談人閨閣，特事有可風，故錄之以為悍妒薄倖者戒。¹³⁶

仿照日本漢文小說於文末中進行論讚的體例，在此時成為創作者／閱讀者間最佳的交流模式。這一切起因於臺灣文人對於日本漢文小說閱讀後的再創造，而他們再創作的結果，又被更多的讀者閱讀。於是論讚評論的文字，成為創作者與閱讀者溝通的管道，以及警惕世人的警語。還有如明治 43 年（1910）的〈法國演戲〉，雖是採取戲劇的「本事」，卻是將其譯為小說後登於報上供讀者閱讀，此小說來源是取自日本漢文學家依田學海《譚海》中的作品〈佛國演戲〉：

記者曰：「此係最近作古之漢文大家依田學海翁，懷出女婿川島忠之氏所談者，本事已奇，譯文頗妙，第採以存一格云爾。」¹³⁷

記者在閱讀過後，認為此篇以「古之漢文」翻譯而來的本事極為有趣，所以將其刊登於報上。可見記者不但已經閱讀過此段文字，亦對此段文字來源於依田學海的脈絡有充份了解，足見此時日本漢學家菊池三溪和依田學海兩人，其小說、文章對日治初期臺灣文人的影響甚深。

另，小說〈白亞雲〉也用論讚筆法為妓女「白亞雲」作評述，亦有模仿日本漢文小說的影子存在。小說描述白亞雲雖然為妓女，卻從名士人陸生學習，故極有才學。想要娶亞雲的男子皆被其學折服。後有某國人亦來挑戰，某國人以研究中國古學為目的，但性好漁色，故也慕名前來挑戰，希望能得到亞雲的芳心，沒想到最後仍輸給亞雲，無緣締結良緣。而亞雲基於民族情感，亦不願意嫁給外國人。小說文末天醉評曰：

吾嘗遊粵，知有亞雲其人，然漸老矣。且聞其為尼，某庵焉。觀亞雲之拒外人，彼其胸中所有豈碌碌者比哉。雖曰：妓乎，勝今明之所留名士者多

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頁 386。

¹³⁶ 少潮，〈雙喜〉，《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39 年 5 月 20 日。

¹³⁷ 〈法國演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3 年（1910）4 月 26 日。

矣。然亞雲終憔悴以老，可憫也夫。¹³⁸

天醉此語，即是嘲諷當下沽名釣譽之人不如一妓女，胸中沒有半點真材實學，而只能庸庸碌碌於人世間。但亞雲雖然學識淵博，終究因為生為女兒身且不肯屈就於男性，故最後年華老去、遁入空門，而突留空嘆於塵世中。

類似的例子，也有被臺灣文人所翻譯的西洋小說所吸收，而成為融合西洋內容、日本漢文體和文言漢文的特殊現象。例如「少潮」所譯介的西洋小說〈稜鏡〉，小說講述奧國貴族里汗若襲父封子爵。奧王生病時，里汗若有侍女稜鏡因為喜歡里汗若，而自願前來為奧王治病，治好奧王的病後，請王許婚，配給里汗若。但里汗若不喜歡稜鏡，始終冷淡以對，甚至藉口出遊。里汗若長時間不歸，稜鏡思念過度而去世，里汗若亦在一老公爵家中為列將。一日公爵出門時，遇見稜鏡在路旁哭，於是將她帶回家。將稜鏡假為其女，並再嫁里汗若。里汗若早上始知，並帶稜鏡回家。回家後，母親要已死去的稜鏡不要出來嚇人，稜鏡復回靈柩中。老夫人及里汗若大慟。奧王得知後大怒，懲罰里汗若。雖然是西洋翻譯小說，文末仍有「蕉史氏」評：

稜鏡之志，豈直墮王成之。藉非有先人枕祕，亦胡能遂夙願耶。是兒女之私，皆君父玉成之德矣。乃以齊大非耦，冰炭不容，棄憐無定，而愛戀之心，初終弗易，至竟機賚志異物而不悔，懷薄兒之肉尚足食乎。然則稜鏡之死，果誰死耶。懲里汗若以逆旨之罪，猶報之或爽者耳，嗚呼可不戒哉。

¹³⁹

同樣以西方背景寫成的小說〈報恩羊〉也存有此種體例。〈報恩羊〉是來自瑞典的小說，內容講述講女主角「雪娘」與父「蘭士」欲前往「毛爾蘭市」。「雪娘」雖然女性，但頗有男子氣概。中途以重金救一待宰之羊。後於「愛牙村」遇狼群，就在父女與僕不敵狼群之際，羊忽起而與狼鬥，救父、女和僕人以報大恩。受到感發的父女二人因此終身致力行善。¹⁴⁰文末有「蕉史氏」評曰：

以活一羊之恩，而羊即不惜其命而反救之。于此可悟施報之理。彼世之一毛不拔者，倘遇群狼，其能免哉？善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矣。¹⁴¹

無論是〈稜鏡〉或是〈報恩羊〉，故事源頭皆來自西方，而後才被翻譯入臺灣。兩篇小說的「蕉史氏」和「蕉史氏」的評論，則非原創物，而是由當時的文人所

¹³⁸ 〈白亞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911）1月19日。

¹³⁹ 〈稜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明治39年（1906）6月12日。許俊雅另指出來源於林紓的小說。許俊雅，〈少潮、觀潮、儀、耐農、拾遺是誰？-《臺灣日日新報》作者考證〉，《台灣文學學報》第19期（2011年12月），頁9。

¹⁴⁰ 中洲生，〈報恩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0年（1907）3月22日。

¹⁴¹ 同上註。

加。「焦史氏」、「蕉史氏」是否為譯者「少潮」的自我化身不得而知。但是，當連翻譯小說都出現此種附加體例時，表現當下文人隱然習慣套用此體例，作為小說創作的一環。就文體上的意義而論，則是將日本漢文小說的文體，蘊化於文本中，讓它在此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紮根。而以文化觀點視之，則可證明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多元性與融合性。

三、學習西方：新聞體小說

在各式文體的交織過程中，新聞體小說的出現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而言，無疑是一個突破傳統的劃時代之舉。它的出現，讓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透過報刊傳遞於讀者知曉的媒介關係更為緊密，並暢通臺灣閱讀者對於外電接受的知識渠道。此類小說發展至大正時期時通常形式短小、內容寫實性強卻又寓含針砭之意。且由於數量逐漸增加，成為漢文通俗小說中的大宗。

新聞體小說為臺灣文人與讀者所體驗，最早可追溯到明治時期。黃美娥指出，新聞小說突破過去以舊小說為創作典律的思維模式，而在啓蒙的要件下，達成融合「通俗」與「新聞」的目的：

真正為小說現代性發揮助力的，反倒是諸創作實踐的「新聞小說」，夾著媒體的力量，勢力漸起，除了延續向來所看重的「通俗」特質外，又融合了「新聞」報紙所欲達到的文明啓蒙目的。¹⁴²

上述研究，著重於通俗／媒體間的作用，並強調媒體為臺灣民眾所帶來的啓蒙性，指出日治初期臺灣讀者能透過媒體所受到的啓發。不難發現，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開始刊登之始，小說作家幾乎都兼具有記者的身份，他們對於外電時事的關心，亦時常轉化為小說內容，成為寫作時的題材。故當菊池幽芳的〈日本新聞小說之未來〉被轉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時，臺灣文人更能了解何謂「新聞小說」：

日本純文士與書新聞小說者，現尚無以異。單行本小說，大抵嘗登諸新聞紙上，文士既非專門之小說家，故其潤筆之資必貴。……欲研究新聞小說者，使之洋行，抑或使讀當地名家小說，吾儕謂自今而後，新聞社不當向純文士求小說，而新聞小說專門家，不可不起以應其求。¹⁴³

基於對新聞小說的基礎性認識，黃美娥亦指出日治初期臺灣新聞小說在文體上呈現模擬西方現代小說特殊類型或敘事成規的現象，因此在實踐美學上取得現代性移植與傳播的突出貢獻，且衝擊過往文學史上新／舊、古／今、雅／俗、文言／

¹⁴²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頁 60。

¹⁴³ 菊池幽芳，〈日本新聞小說之將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明治 44 年 7 月 2 日。

白話的傳統文學與新文學斷裂區別的文學、語言二元對立模式。¹⁴⁴黃美娥的研究，即指出日治初期臺灣新聞小說的出現，對臺灣過去既有小說傳統模式的再造。但若持續觀察，當通俗小說以新聞小說的姿態不停刊出時，又會呈現何種特點？

個人發現，隨著對外界訊息接受的日益便利，臺灣明治年間後的新聞小說，大致上依由「時事新聞改造而來的小說」。筆者將之命名為「新聞體小說」。這些新聞體小說通常沒有作者署名，來源不外乎是中國或是西方諸國，但，雖然有些事件難脫怪力亂神，但一定會交代消息來自何方，企圖證明所言有所根據，而具有新聞的真實性。所以它進入臺灣報刊上的方式，可能是臺灣報社記者透過對海外各地報刊上所載各式新聞的直接轉貼，也有可能經過臺灣記者加工改寫後，將新聞再造為小說的成品。例如王品涵考察日治初期的小說〈銀塊案〉來源，證明它實是由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泰晤士報》上的新聞事件所改寫而來。¹⁴⁵〈三百磅之鑽石〉則是報導英國倫敦發生離奇鑽石失竊案。內容主要講述騙子情侶檔二人，婦人先假裝入店購買鑽石，卻以蠟丸將鑽石偷出藏於店內，店主等人懷疑婦人為小偷，卻又無法自婦人身上搜出鑽石。此舉引來婦人男友不滿，前來怒責鑽石店抹黑，才將鑽石偷走。記者先以說書式的口吻，為閱讀者介紹刊引這則小說的要旨：

倫敦某街，甚繁華，行人如梭、珍奇滿市。市中某鑽石店，有一奇事，至其街名、其店名、其人名姑不發表。特將此一□奇而趣之事，為吾閱者述及。¹⁴⁶

消息引自倫敦，證明有此事。但記者不願意告知街名、店名和人名，可見此時新聞體小說的性質，小說仍大於新聞。而「為吾閱者述及」之語，則知當時記者在轉錄消息時，已經考量到閱讀者的閱讀興趣，故對新聞的題材來源有所篩選。¹⁴⁷

昭和年間的〈考婿奇聞〉則表現臺灣記者在接收新聞消息時，得以參考多份中國報紙：

支那某埠，最近有考婿奇聞。考試之前一星期，各大報上，均刊有下列之

¹⁴⁴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頁 60。

¹⁴⁵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6月)，頁 48。

¹⁴⁶〈三百磅之鑽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3 年(1910)5月3日。

¹⁴⁷秦白秀引用 Geoffrey N. Leech 等人的說法指出：「儘管作家對讀者的具體情況了解甚少，他在創作時是可以假定讀者對象的，而且可以設想：讀者與他是對交際的背景有共同了解的。作家在創作時腦子裡總已想著一個假設的讀者對象。他不是現實生活中的真正讀者，但他能理解作家的意圖，了解作家與讀者交際時的背景。因此，有人把這種假設的讀者稱作“假冒的讀者”(the mock reader)，也有人將其稱作“暗指的讀者”(the implied reader)」。秦秀白，《文體學概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頁 242-243。轉引 Geoffrey N. Leech & Michael H. Short, *Style in Fiction*, chapter Eight.

封面廣告「招考終身伴侶，小女蕙芬，年十九，曾受中等教育，……。」

148

既稱「支那」，則代表是臺灣記者所撰述的文字。同時能見到刊於各大報上的廣告，也證明當下臺灣記者有機會閱讀到中國的各式報刊。¹⁴⁹

無論這些新聞體小說是傳抄或是臺灣記者的自我書寫，它都大致具有以下特點：

(一) 平鋪直敘的書寫方式，描述事件來源與發生經過：

新聞注重事件時間和地點的紀錄，這種書寫手法影響到新聞體小說亦具備此特點。例如〈汽車新念秧〉引蘇州火車上的騙局，交代事發地點與手法，以警惕臺灣讀者：「客有談蘇州某日火車內，發生一新騙局。足資一般行旅參考警戒。」¹⁵⁰〈畢命書〉報導女子自殺案時，地點、時間和人物都以報導式筆法清楚告知讀者：

加拿大皇后號郵輪，在香港。於本年四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半，發生一女子投海畢命事。該女何人？乃報紙屢登之新女子余美顏也。¹⁵¹

余女為開啓女子新紀元的代表人物，故屢被港警驅逐。但她最後自殺的動機卻是情關難過。為了追查她的死因，作者開始以倒敘手法，追溯余女死前所發書信，信中向女界同胞埋怨自己生在青黃不接的時代，上違父母而背夫私逃，到最後才發自己錯了，期望眾女性別步上她的腳步。〈捕盜〉則報導上海搶案，詳細地將案發時間、地點、犯人數量告知讀者：

上海某日下午一點二十分鐘，有短褐盜匪三名，侵入重慶路久夫典當傍弄內、第二百三十七號半門牌屋中，該屋為寧波人林春生所賃居。……此陰溝匠乃為之報告站立重慶路孟納拉路間之一九八〇號乃一七四三號兩華捕……。¹⁵²

搶案如何發生、警方如何尋線追查而破案，記者如同化身為偵探般，為讀者抽絲

¹⁴⁸ 〈考婿奇聞〉，《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1928）5月24日。

¹⁴⁹ 類似這種新聞體小說到底是「新聞報導」還是「小說」？可由版面認定。進入昭和時期，《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漢文版面愈來愈少，但至少能維持一到二版的篇幅。但漢文空間被壓縮的原因，新聞往往和小說刊在同一版面。唯當時新聞事件大多居於版面上欄、小說居於下欄，故可由此區分。最重要的是，這些新聞體小說的欄名都明確標示著「小說」。故知當時的記者皆把它們視為小說性質加以刊登。

¹⁵⁰ 〈汽車新念秧〉，《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2年（1927）7月4日。

¹⁵¹ 〈畢命書〉，《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5月25日。

¹⁵² 〈捕盜〉，《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1928）6月14日。

剝繭地敘寫整個過程，整個搶案彷彿發生於閱讀者眼前。〈雙失案〉則將案發當事人的生平藉貫詳細報導，並於文末提加警語：

嘉定婦人陶王氏，年三十二歲。近因丈夫棄世，並遺有二子，年齡尚幼，生活艱難。由蘇州人沈阿根（年三十三歲，住閩北中華新路安定坊五十六號，賣油豆腐為業）及其妻朱氏為媒，將陶王氏作伐，再醮與喻漢卿（湖北人，年三十二歲，住中華新路吉善里，業豬毛為室）。¹⁵³

亦有報導某地異聞、指明為何地而來的消息，如〈蜘蛛精〉：

山西通訊云：晉陽縣第四區區猛，村有郭理臣者。其妻王氏年三十四，於去年秋，忽得一病，能食能作，惟日漸黃瘦，屢治無效。¹⁵⁴

此篇小說中的婦人，實是在睡夢中被蜘蛛精化身的男子求歡，因而中邪。最後請來和尚作法，才將妖怪收伏，並救回婦人。以現代的眼光視之固不可信。但在當時卻將此「異聞」視為「新聞」加以接收，開頭標明「出西通訊云」的方式，則是一個有所根據的引用方式，以證明此事並非臺灣記者的杜撰，而是接收不同地域的異事後將其傳入。

由以上諸例可知，這些小說的真面貌其實是新聞報導，但卻在臺灣記者刻意接收刊登的情況下，它的性質又有別於當時《臺灣日日新報》上嚴肅又正經的新聞消息，並在寫實手法外，另以清楚直敘的報導性口吻，將其轉化為小說供閱讀者閱讀，或作為奇聞異事的娛樂，以及引為社會民眾借鏡的案例，造成這些小說具有新聞體的特點，而風行於當時的報刊上。

（二）接收西方諸國的外電消息與奇聞軼事：

西洋外電消息的接收，對於臺灣閱讀者有增廣見聞的效果，更可發揮報刊能知天下事的功用。以日治初期臺灣記者就有接收西方外電消息的能力加以推論，臺灣記者對於西洋外電消息的刊登，並不一定只能透過中國的報刊加以接收，亦有經過譯介並刊行於臺灣報上的可能。

小說〈愛山克命案〉講述發生在英國的離奇命案，開頭告知讀者事件發生的所在地：「最近英國愛山各地方，有一警官，名古德立，不知被何人銃殺，頭部共中四彈，兩眼均被挖去。」小說大意在敘述英國愛山克地方有警員被殺，兩眼被挖，後驗屍時蘇格蘭警場找到二粒子彈以及死巷內羅佛醫生之自動車。後有

¹⁵³ 〈雙失案〉，《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9月16日。

¹⁵⁴ 〈蜘蛛精〉，《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4年（1929）7月13日。

酒醉者勃郎被捕，在他身上搜出拳銃等物，並供出助手偷了醫生外科醫用具。後警方在利物浦追到助手開特，本案由蘇格蘭警場和槍械專家合作下宣告破案。¹⁵⁵

〈巴黎暗殺團〉則談巴黎突有數十人遭到暗殺，報導偵探亞爾米斯發現暗殺團老叟，而此老者又由青年所變裝，與警方合作尋線捉到十數人。後究暗殺團形成的原因，竟是富家弟子因為無聊所組團，並為消遣娛樂而屢屢執行殺人活動，是一篇足以引發社會輿論撻伐、與反思上流社會道德行爲的小說。¹⁵⁶〈連枝姐妹〉則為來自美國紐約的消息，報導孿生姐妹身體相連，欲分割而達自由戀愛的經過。

¹⁵⁷

此外，還有從維耶納引介的靈異新聞〈黑貓異〉，文章稱事件發生地點為一飯店：「維耶納函云：正當深夜萬籟俱寂時，維耶那第一流飯店之一室，忽怪異叫喊雷動，旋有足音沓沓走出廊下。」¹⁵⁸故事乃由一退位貴族福爾南德陛下發現黑貓開始，在迷信的態度下，認為遇到黑貓會有兇事發生，於是第二天即退房離去。又談瑞典異聞〈長睡女〉，談論一無病無痛女子加羅玲賈士台德沉睡三十二年之久的異事。¹⁵⁹〈國際巨竊團〉主角雖然是俄羅斯人，但事件發生跨越俄羅斯、土耳其和英國諸國，故事來源為倫敦的外電消息：

倫敦函云：當俄羅斯尚未革命之秋，有貴族名宜果勃羅斯者，年少翩翩，長口才，擅交際，日常出沒於婦女隊中，左週右旋，度其甜蜜之生活焉。

¹⁶⁰

小說內容談論宜果勃羅斯為首，與土耳其女子黛妮斯脫組成國際竊團，成為橫行國際的鴛鴦大盜，但刊登時並未破案，而是「現正在偵察調查中」的時事小說。

〈珍珠項圈〉則源於「慕尼黑」的新聞，引用「慕尼黑函」的講述方式，談男爵亞力山大因欺詐案在符次保法庭被告發，並有「茲錄情形如下」的新聞性條規式語法。談論亞力山大將珍珠項圈投重保後以郵寄方式寄到珠寶店，但寄到後發現裡面除死鼠外，東西已於途中移失，後延請一哲學家為己辯護，意圖證明是精神錯亂所害，無法對自己行爲負責。可惜法官不採納，最後仍被科罰金或徒刑。

¹⁶¹

由上述諸例可知，自明治年間開始，臺灣記者兼文人者，即持續地引入外電消息於臺灣報紙上刊登。但不同之處在於，日治初期的臺灣文人欲將新聞融於小說中，使其成為小說一部份的意圖較強，還可見到記者以說書式口吻進入新聞中講述，造成明治年間的新聞體小說說故事的成份較濃、文學性較多，表現出小

¹⁵⁵ 〈愛山克命案〉，《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1928）。

¹⁵⁶ 〈巴黎暗殺團〉，《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7月10日。

¹⁵⁷ 〈連枝姐妹〉，《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11月16日。

¹⁵⁸ 〈黑貓異〉，《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12月13日。

¹⁵⁹ 〈長睡女〉，《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4年（1929）6月4日。

¹⁶⁰ 〈國際巨竊團〉，《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4年9月4日。

¹⁶¹ 〈珍珠項圈〉，《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4年（1929）8月24日。

說家修飾新聞以成小說的企圖心較強。反而是大正後的文體情況，呈現著新聞仍持續被引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欄位中，但其新聞性卻漸漸強過於小說應有的文學性，故在形式上多以「某地函」的新聞化方式，取代作者主觀性較強的說書口吻；究其內容，記者似乎也沒有多花心血將新聞事件流暢地融入小說中。故臺灣閱讀者雖仍能接受到異國奇聞軼事，在文學體例上反而逐漸陷於僵化，沒有像日治初期時的活潑多變。

（三）中國新聞大量引入：

此乃中國與臺灣鄰近、語言文字又相通之故。但此類之中，又以講述上海的消息為多。例如談上海陋習的〈謾藏海盜〉，講述上海冬天有剝豬羅之風，為上海特有的怪現象。有上海邱姓女子愛好虛榮，向姨媽借寶石等物參與宴會，回程路上遭遇此劫，回來後無法賠償姨媽，而造成兩家的紛爭。故文末特云：「一般好虛榮之女子，閱此其知所反耶。」¹⁶²

〈勞工淚語〉是以白話文方式書寫、具有左翼寫實色彩的小說。小說透過新聞報導式的口吻，敘說上海低下階層勞工住和生活的慘狀，以及是否在工會領導下罷工的考慮。¹⁶³〈箱中屍〉則是以上海所發生的兇殺刑案為背景，由糞夫發現一男屍開始，由偵探據此追查，後查到是因為其妻與奸夫合作謀殺，並進而發現一日本家庭中的女傭王媽媽與車夫阿二的私情。¹⁶⁴〈滬上騙案〉則是描述有女子要以支票領錢，圖章樣式都對，卻被人盜領了。後有偵探發現原一練習生所為，發現其化整為零，私刻印章及偷支票本的詐騙手法。¹⁶⁵〈騙取牛肉汁〉則講述上海同孚路有華達藥行因為經營德國獅力牛肉汁而發跡，但出名後被人以兌紙行騙。經向南昌華英藥房查詢後，華達藥房才知道被騙。¹⁶⁶

介紹上海一地新聞的小說為多，是因為上海為較近臺灣的現代化國際都市。且上海報刊發達，臺灣記者進行轉載時較為方便。部份小說可從文末的警語，觀察到臺灣記者閱讀過此新聞後，勸告臺灣讀者引以為戒的刊載動機。例如〈求婚被打〉講述上海鄧小姐因外形美貌、追求者眾，擇偶時千挑萬選。最後，顧鄧小姐差點要選了顧先生為其伴侶，沒想到落選者吃醋，反將顧先生痛打一頓。文末臺灣作者於是提醒：「上海學風如此，怪底臺灣子弟，有留學其間者，非常警戒云。」¹⁶⁷此則新聞即經過臺灣記者閱讀吸收後，由新聞再造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並以此為臺灣民眾鑑戒的例子。

¹⁶² 〈謾藏海盜〉，《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4年3月18日。

¹⁶³ 〈勞工淚語〉，《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2年（1927）2月28日。

¹⁶⁴ 〈箱中屍〉，《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2年7月5日。

¹⁶⁵ 〈滬上騙案〉，《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2年6月25日。

¹⁶⁶ 〈騙取牛肉汁〉，《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930）2月22日。

¹⁶⁷ 〈求婚被打〉，《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1928）12月30日。

由以上可知，這些被報社記者轉載進入臺灣報紙刊登的「新聞」，其放置的位置並非是臺灣報紙上的新聞版面，而是被視為「小說」般的刊登。在這股「新聞」改造為「小說」的過程中，原來的時事新聞，仍然經過原記者書寫→文本→臺灣記者閱讀→再書寫→臺灣閱讀者閱讀的傳播／接受過程。異國所發生的新聞符碼，就這樣以報刊為媒介，在臺灣記者的接收與改寫下，並並成爲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一部份。

整體而論，類似此種新聞體的小說，隨著時間的演變，逐漸成爲臺灣報紙上的大宗，不若日本漢文體小說僅盛行於日治初期的日本。但，正因爲它的數量愈來愈多，題材又重覆於社會新聞的改編和報導，臺灣記者獨創小說的書寫功力，也就愈來愈僵化於新聞體之中，而無法開發出新的文體。這些身兼小說家身份的記者，也就流於機械式的報導與改寫，失去過去文人兼記者的小說創作家們，勇於接受、嘗試不同文體的書寫精神。再者，臺灣人已非如日治初期對新異事物有極度追求的好奇心，雖然新聞體小說仍能增廣臺灣讀者的見聞，並作爲日常處事的警惕，但在文體上卻流於八股，此乃新聞體小說過重於時事新聞的敘述，而忽略文學性的後果。當閱讀者與小說間無法再擁有增強文學感受的「陌生化」效用，失去奇異感受而覺閱讀麻痺¹⁶⁸，如此，閱讀者終將會失去吸引他們閱讀文學作品的原因。所以，新聞體小說過度地被濫登與使用，是對作者創作思考和讀者閱讀動力的打擊，並不有利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發展。

小結

本章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出發，剖析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與文體變化。首先，爲證明日治臺灣文人具備認識世界地理環境的能力，論述小說以世界各地爲敘事背景的特點。例如對歐洲／美國的景物認識、神祕非洲的地理環境和人種特色，以及較鄰近於臺灣的東南亞一地的書寫。藉由上述對小說敘事背景的介紹，可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除了以中國、日本作爲小說的敘事背景外，亦藉由作者之筆勾勒出世界輪廓，日治臺灣作者和讀者皆可由此拓展自我對世界的認識，亦可證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題材與內容的多元。

其次，本章觀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歷時性的文體變化，探究其由文言發展至白話的過程。由日治初期文人們最熟悉的文言文開始，因有不少中國白話文小

¹⁶⁸ 日治初期，臺人如李逸濤、魏清德等人在初識世界之時，對於新聞融入小說，或是小說以新聞體例方式表達，都有極高的興趣，並帶給作者和讀者在文體上全新感受。此乃因過去的文學傳統中缺乏類似的文體。但隨著時間的變化，新聞體小說終將會走向末流。因爲：「一個技法在某一部作品中具有文學性，屬於文學的成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可能會變得越來越自動化，不再能產生陌生化的效果，並最終失去其文學技法的身份……任何陌生化技法都有一定的時效期，終究會變得『機械化』，被讀者所厭倦。」朱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臺北：揚智出版社，2002年7月），頁25-26。

說不時地摻雜於報上所登載的小說中，故隨著時間的推進，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使用的漢文愈益白話，最後以白話文寫作小說的技法終於達到成熟。但，白話文的純熟，並不代表文言文就此消失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文言小說仍存在於日治臺灣小說發展的每一個歷程。但文言文與白話文的交織，卻讓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不會僅受限於單一文體的書寫。

最後，本章論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分類，以及再造的情況。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文體多元，既有傳承於中國的章回體、傳奇體和叢談體小說。又在殖民文化的傳入下，移植日本漢文小說的體例進入日治時期的臺灣，成為當時文人們仿作的範例，並轉而運用到其他小說的創作手法上，造成中、日敘事手法相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情況。而新聞體小說的出現，雖是源於臺灣文人對西方新聞事件的報導與改寫，但它的取材來源除西方世界外，亦不偏廢地接受鄰近中國的新聞事件，以作為小說的素材。可惜的是，愈到日治後期，新聞體小說的文體趨於僵化與單調，對於文人創作和讀者閱讀，將會帶來枯燥無味的缺點。

經由上述三問題面向出發，以及研讀小說文本後所發現的特點。可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敘事手法和文體運用上，已充滿跨文化融合的特點，而非僅受到單一文化的影響。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豐富與多元，已由本章得到初步的論證。

第三章、 跨界下的圖書流動：日治臺灣通俗圖書市場對小說書籍的代銷與接受

日治時期的臺灣，在日本所帶來的殖民性與現代性雙重影響下，逐漸開啓新面貌。但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臺灣的知識分子如何在現代與傳統的糾結中自處，一直是臺灣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問題。尤其臺灣在經過清朝二百多年的統治後，根深柢固的中華文化，並非日本殖民者使用武力，就可以從臺灣民眾的記憶中抹去。在近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中，臺灣除受到日本文化深刻影響外，也未與對岸中國斷絕來往。而臺灣與中國、日本在書籍銷售、流動方面的合作行爲，即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在過往的文學研究中，「書籍」的銷售與流通通常容易被忽略。但，近幾年來文學社會學已特別指出，除了作者研究或是文本分析應當被重視外，「書籍」也扮演著重要角色，開始在跨文化、跨領域的研究風氣中嶄露頭角。誠如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所言：

所有文學活動都是以作家、書籍及讀者三方面的參與為前題。總括來說，就是作者、作品及大眾藉著一套兼有藝術、商業、工技各項特質而又極其繁複的傳播操作，將一些身份明確（至少總是掛了筆名、擁有知名度）的個人，和一些通常無從得知身份的特定集群串連起來，構成一個交流圈。¹

透過這段引文可知，要建構一個完整的文學交流系統，「書籍」無疑是一個重要環節，故本章將透過史料的整理，論述到底有哪些小說書籍在日治臺灣販售、以及可能被臺灣閱讀者接受？透過對上述問題的闡述後，日治臺灣如何透過書籍的代銷與中國、日本產生聯結，其傳播脈絡將會更爲清楚。

書籍的流通與代銷，所牽涉的層面極廣，它既是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現象，又是文人對文化的記憶與追尋。在經過閱讀行爲的轉化後，它更有可能演變成影響臺灣文人在創作小說時不可缺少的素材，且由書籍代銷為例，還可發現同時代不同地域書業的發展情況。所以，埃斯卡皮亦強調「書籍」的重要性：

因而書籍本身乃是交易發售的製成品，作品也受著供需法則的牽掣。在文學諸多形式中，我們也無從否認書籍乃是出版工業所產製的一項「產品」，而它的消費型態就是閱讀。²

如何將中國、日本兩地所代銷進入臺灣的小說書籍，納入建構臺灣通俗小說市場的論述中，必須先從書籍的傳播與代銷問題中加以耙梳，才能進一步理解臺灣漢

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2004年10月16日初版），頁3。

² 同上註，頁5。

文通俗小說的生成，以及臺灣閱讀者的閱讀反應／效應。故本章先以部份文人為例，探訪他們的訪書歷程，尤其是當時最具書業市場規模的上海。建立上海書肆為臺灣文人和書局主要的供應市場後，以此為背景，並輔以於上海資料檢索後的成果，深入考察上海與臺灣兩地的小說書籍，如何經由臺灣「蘭記圖書部」的中介代銷進入臺灣。最後，由於書店對書籍的代銷行為和圖書館的普遍化，皆對於通俗小說是否普及興盛有關³，在缺少日治臺灣日文書局的圖書目錄作為參考資料的侷限下，本章最後一節將轉而剖析與中國演義性質相近的日本各類軍談、通俗讀物，是如何透過日治臺灣各大圖書館提供給臺灣讀者閱讀？本章期望透過這三個面向的探究，說明日治臺灣通俗市場中的小說書籍，是如何在跨地域代銷的特點下，呈現精采繁盛的面貌。

第一節、臺灣文人在上海的訪書活動

原本只是黃浦江邊一個小漁村的上海，卻隨著滿清被迫簽定不平等條約、並開放通商口岸後，一夕間成為東亞頗具代表性的國際化都市之一。但做為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申城，它的特色並不僅止於便利的港口、熱絡的國際貿易而已，在商業鼎盛的影響下，中產階級的大量興起，有錢、有閒、有知識的人群出現，再加上印刷術的進步⁴，也促成上海在文化程度方面的提升，書籍的流通自然成為一個大城市不可缺少的物品。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說：「書籍成為大量發行的產品，當一般人的收入增加，就會購買並閱讀更多的圖書，閱讀活動在各地盛行起來。」⁵而書籍之中，又以小說書籍的流通情況最值得吾人所關注。馮紹霖在分析清末以至於十九、二十世紀間，上海民眾的閱讀品味時說：

明清時期，中國社會已經繁衍出不少離經叛道的東西。許多通俗小說曾經戴上過誣淫誣盜的帽子。但是，到了清末的上海，誣淫誣盜的成了暢銷書……大量的通俗讀物則應該受市民階層歡迎……。19、20世紀之交，通俗讀物中出現了《茶花女遺事》之類西方色彩濃郁的東西……。而不能忘記的是，

³艾恩·瓦特（Ian Watt）論及十八世紀閱讀小說的大眾興起原因時，認為此時期閱讀大眾成長的主要關鍵，在於城市中的中間階層分子數量增多，因此，在城市中最能見到閱讀大眾的成長。由於書籍價錢較為低廉，加上流動圖書館的普遍化，小說成為文學類中最受到歡迎的一類。艾恩·瓦特（Ian Watt）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年），頁38-40。根據張圍東的研究則知，日治時期各圖書館成立後，除了定點供民眾借閱圖書外，經費充足者如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即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亦常有巡迴書庫供民眾借閱書籍的例行性活動。張圍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頁62-64。故圖書館對通俗小說的傳播與普及亦有功用，值得探究。

⁴韓琦、王揚宗指出，早在光緒年間，石印技術就在上海徐家匯一帶被傳教士所運用，取代過去的雕版或活字印刷。而後五口通商，石印技術更是在上海興盛起來，光緒年間上海的石印書局就有近90家，且一直持續到清末民初。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中國印刷史料選輯·裝釘源流和補遺》（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頁358-367。

⁵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著、李中文譯：《閱讀的歷史》（臺北：博雅書屋，2009年7月），頁280。

也是在這個時候，《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乃至《施公案》之類也在盛行，以此現象觀之，當時人的思想狀況應該呈現一種非常複雜的面貌。⁶

可見，中國通俗小說並未在全中國最現代化的上海消失，反而藉著經濟發達的上海，中國通俗小說成為書商不可不賣的熱門讀物。檢視光緒年間所遺留、上海各書店的「書底掛號」就可以發現，幾乎每一間書店，都有在賣中國通俗小說，於是，上海不但是書業聚集之處，成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前往中國訪書的必經之地，它更會成為日治臺灣與同時期中國如何藉由小說書籍的代銷而進行交流時不可忽視的考察地點。故以下將先論述日治臺灣文人於上海訪書的情況，以證明上海書肆的繁盛對臺灣文人確有強大的吸引力後，再以此為論述背景，細究上海書肆與臺灣書局透過小說代銷的交流情況。⁷

日本統治臺灣後，並未阻絕臺灣與中國兩地的文化來往。日治初期的文人如林爾嘉、李望洋、李逸濤、魏清德等人，都曾至中國遊歷或工作。臺灣人只要是遵循日本殖民政府的法規，前往中國並非難事。但前往中國，並不一定就會去到上海購書，也因此，臺灣文人有哪幾位曾在上海的書肆間流連忘返，成為臺灣與上海間書籍往來的橋樑，就值得加以追尋，張靜茹以林痴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四人為例，探討這四位臺灣文人在上海接受現代性洗禮的經過。⁸其實，除了這四位臺灣文人之外，應當還有更多的臺灣人曾經到過上海訪書，可惜史料上的缺乏，本節僅先以兼具書店負責人身份的文人為例，探討他們與上海各書局如何藉由書籍販售進行雙邊互動，這些文人如「雅堂書局」的連雅堂、「中央書局」的莊垂勝和「文化書局」的蔣渭水三人。最後，將以「興漢書局」的張純甫為例，詳析他在中國等地的訪書情況，以及其所經營的書店與上海書肆互相往來的關係。

一、連雅堂「雅堂書局」、莊垂勝「中央書局」與蔣渭水「文化書局」

(一) 連雅堂與「雅堂書局」

「雅堂書局」是連雅堂由中國回到臺北後，與友人黃潘萬集資於太平町三丁目二二七番地所成立的書局，成立動機乃是：

臺灣僻處海上，書坊極小，…即如屈子、楚詞（辭）、龍門、史記為讀書

⁶ 馮紹霆，〈從清末上海幾份書目說起〉，收錄於上海檔案館編，《檔案裡的上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頁 262-267。

⁷ 此時上海書肆繁盛，可參考本論文文末附錄一：「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同業掛號」，可知上海書肆眾多。或是附錄二：「上海書業公所書底掛號」，則知此時各書店出版、印刷書籍風氣盛行。

⁸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 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稻香，2006年9月）。

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臺，無處可買。⁹

雅堂成立書店的主要原因，乃是有感於臺灣購書的不便，那麼，既然要成立書店，要從何處引入書籍，以解決「走遍全臺，無處可買」的窘狀，就極為重要。雅堂雖對作為國際型大都市的上海褒貶參半，既認為上海「庠序之盛冠全國。」又批評上海是「文明僞爾，自外觀之，非不煥然美備，人民熙嘯，如春登臺；而社會之腐敗，道德之隕落，苟非悉心研究，則不知其底蘊也。」¹⁰但對於上海書肆的繁盛，則有深刻體認。從雅堂的〈大陸游記〉，可以看見他對上海幾間書肆的體驗：

商務印書館前與日人合辦，故其陳設井然，各省皆有分局，出版之書，多屬新籍。又有雜誌數種，亦斐然可觀。滬上書坊甚多，可為全國文學之源，而掃葉山房、國學扶輪社則多刊舊籍，以惠藝林。¹¹

當然，由於上海的書肆皆集中在鄰近的地方，雅堂所認識的上海書店，一定不僅這三間，但從雅堂對於「商務印書館」的經營狀況，以及與「掃葉山房」、「國學扶輪社」的販書性質的不同，可見其對上海書肆的熟悉。及至成立書局後，雅堂更深知臺灣的書籍來源必須以上海為主要的輸入對象：

然則，欲購書者，須向上海或他處求之，而郵匯往來，諸多費事，入關之時，又須檢閱，每多紛失，且不知書之美惡、版本之精粗，而為坊賈所欺者不少。¹²

可見「雅堂書局」的書籍，主要是由上海書肆所進口而得，而書局負責人連雅堂，在中國上海時，也體驗到當時上海書肆的繁盛景況。

（二）莊垂勝與「中央書局」

莊垂勝在臺中所負責成立的「中央書局」與蔣渭水在臺北成立的「文化書局」，都與「臺灣文化協會」關係密切，亦同時肩付著啓蒙民智的重要任務。莊垂勝的「中央書局」原本只是附屬於「中央俱樂部」下的一部份，但卻因為文協左右路線的分裂，成為純一的企業組織，販賣書籍成為主要目的：

同人等有鑑於時勢之要求，想在臺中市籌辦一俱樂部，內設簡素食堂、靜雅客室，供清潔之茶食水果等，為往來人士會談安息之所，加以普友良書、

⁹連雅堂，〈餘墨〉，《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92年3月），頁374。

¹⁰連雅堂，〈大陸游記〉，《雅堂先生餘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74年1月），頁17、25。

¹¹同上註，頁25。

¹²連雅堂，〈餘墨〉，頁374。

便利學徒的趣旨，置圖書部分售國文書籍而外，並為不通國文或慣讀中文的朋友計，便宜特為介紹中文書報，置講堂娛樂室、談話室等。¹³

吳三連等人解讀此成立宗旨後認為：

譬如書局的經營，中文書籍的輸入，好像是附帶營業，有可、無亦可的說法，其實不然，販賣中文書籍乃是主要目的之一。民國十三年(1924)春，莊垂勝在東京畢業後，先到韓國然後轉到北平考察，同年秋經由上海回臺灣，當時上海正是出版界的黃金時代，新刊書籍擠滿各間書店的店頭，他受了很大的刺激…於是他在上海做了一番書局的調查工作，並和商務印書館等幾家大書局接過頭。¹⁴

可知「中央書局」的負責人莊垂勝，除了統籌規畫俱樂部的所有事務外，也注意到上海書肆所出版的書籍，是在臺灣販售書籍時，重要的書籍來源。

(三) 蔣渭水與「文化書局」

繼莊垂勝的「中央書局」成立後兩年，蔣渭水也基於對臺灣民眾進行文化啓蒙的理想，在臺北成立了「文化書局」，張靜茹整理「文化書局」在《臺灣民報》上刊登的售書廣告，指出「文化書局」的書籍來源：

有不少購自上海，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都是當時滬上頗具影響力的書局，而《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更是上海高知名度的刊物。¹⁵

檢視蔣渭水的生平，雖受和、漢教育的雙重影響，但其一生中並未到過上海。不過，沒有機會親身流連於上海各書店的蔣渭水，在經營書局時，對於上海書業熱絡的情況也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可見此時期上海各書店在臺灣圖書事業中，佔有供貨的主要地位，從中亦反映出此時期的上海書業的盛名遠播。

二、張純甫與「興漢書局」

相較前述幾位文人，張純甫因有日記留下，更能見證此時臺灣與上海兩地書業交流的實際情況。張純甫，名津梁，字濤邨，又字純甫，號「興漢」，又號漢、筑客、寄民、老鈍、耕香散人、竹林樵客等，生於光緒十四年(1888)，卒於昭和十六年(1941)，享年五十四歲，其父親為清附貢生，不但精通經史百家，

¹³ 〈中央俱樂部將出現了·趣意書〉《臺灣民報》第85號，大正14年(1925)12月27日，頁8。

¹⁴ 吳三連、蔡培火等：《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年12月)，頁336。

¹⁵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85。

又曾任教於明志書院。¹⁶由此可知，張純甫的生平，和許多臺灣傳統文人一樣，跨越清領和日治兩個不同的統治時期，但幼時又是以中國傳統漢文教育為主。就在這些文化條件的影響下，大正初年時，張純甫開始活躍於日治時期臺灣北部的文壇，加入北臺灣的著名詩社例如「竹社」、「星社」、「瀛社」、「臺灣文社」或是「松社」等文學性社團，並與其他文人共同唱和。有時甚至以評議員、講席的身份參與社團的運作，並留下不少積極參與活動的紀錄。此外，由於他不遺餘力的推動儒學、宣揚孔教，又贏得「北臺大儒」的美名。¹⁷因此黃美娥稱讚張純甫為「於異族統治下始終薪傳漢學不輟，尤具民族意識。」¹⁸以往關於張純甫的研究重點，大多集中在他的文學成就或是思想傾向，¹⁹這些研究都肯定張純甫在臺灣文學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但若只從張純甫文學、思想方面的成就做為研究視角，似乎無法更深入地去了解，做為一個深受中國文學、儒家思想影響的文人，在接受殖民統治的同時，對於過去的文化祖國中國，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記憶？在接受殖民統治的同時，他又如何藉由前往上海購書的文化行為和商務考察，與過去的中國文化保持聯繫？從張純甫所遺留下一連串《守墨樓藏書目錄》、《守墨樓書目-叢書部》和《守墨樓書目-卷密書室之部》中²⁰，可以發現，無論是「購書」還是「藏書」的文化行為，其中都流露出張純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懷念。那麼，藉由耙梳這些記載張氏前往上海購書的史料，將能勾勒日治時期的臺灣與上海，如何藉由書籍的交流，形構出一張文化流動的脈絡。

(一)《守墨樓目錄》各卷收書情況簡介

1. 《守墨樓藏書目錄》

黃美娥已經指出，從《守墨樓藏書目錄》中，可以發現：

此稿記載先生珍藏之書目，計分群經、史鑑、小學及諸子、雜說、碑法帖等部，分門別類登錄各書籍名稱、冊數、出版者、版本、價格，可以略窺當時書籍出版之情形。²¹

在編製此份目錄時，張純甫大略將每一套叢書、每一本書按照性質加以劃分。

¹⁶ 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6。

¹⁷ 同上註，頁7。

¹⁸ 同上註，頁7。

¹⁹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武麗芳，《日據時期竹塹地區詩社研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蔡翔任，《張純甫「是左」、「非墨」思想研究-以古史辨運動為背景》（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陳琬琪，《張純甫儒學思想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3年）。

²⁰ 上述資料，以及文中所引用的《張純甫日記》相關史料，現存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皆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蒐集、整理所得來，除在此除特別說明資料來源外，為求行文方便，以下進行論述時，將視情況直接以《守墨樓書目》的通稱概括參考來源。

²¹ 黃美娥，《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頁13。

按本文統計，僅是一個「叢書部」的單元，性質屬於「經」類者約有 441 種，若再加上「群經部」的 114 種，「經」類的書籍大約有 555 種。其他例如「史鑑部」的書籍約有 97 種、「小學部」的書籍約有 49 種、「諸子部」約 53 種、「雜說部」約有 22 種、「總集類」約有 22 種，總集類約 64 種、書畫法帖約 22 種，其他未歸類書籍則大約有 340 種。所以整份《守墨樓藏書目錄》有記載的書籍，數量多達 1665 種，分類的方式，則以經、史、子、集的標準劃分。

2. 《守墨樓書目-叢書部》

此份書目的主要收藏取向，雖未言明是以何種方式進行對圖書的收藏，但黃美娥考察後指出：「此稿專載先生叢書收藏書目，內容依經、史、子、集四類登錄，記有書名及作者名稱。」²²按本文統計，子類大致包含二十五子、百子全書、續二十五子為主要的思想性書籍類別，包括儒家、道家、雜家、晏子、魯連子等，總計約有 157 種。經典集林則以「經」類書籍為主，例如春秋繁露、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微旨等，大致上可以用「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標準來規類，此類約有 39 種。小說家雜事類則包括例如《山海經》、《拾遺記》、《搜神記》等書籍，約 12 種。史類書籍自「九通」項目開始計算，包含各式史書約有 91 種、小學類書（包括小學類編和小學彙編）約有 25 種、續附 10 種、集部類的書籍，數量則約在 256 種左右。

3. 《守墨樓書目-卷密書室之部》

張純甫所屬的三份藏書目錄中，這一份書目的分類比前二部目錄更為精細，黃美娥介紹這份書目時說：

此稿專載先生卷密書室藏書之部，分由總彙、群經、歷史、諸子、總集、全集、別集、詞曲、元人雜劇全集、圖譜、方言、辭典、雜說、…小說、演義、稿本、醫數各類登錄，除記有書名、冊數、出版者、版本之外，間亦錄存各式書籍之價格，可以略見當時物價情形。²³

而值得一提的是，筆者留意到這一份書目中，記錄著張純甫收到小說例如《金瓶梅》、《花月痕》、《東周列國》、《今古奇觀》、《官場現形記》等小說約 33 種，戲曲類書如《元人雜劇全集》若干。但數量、種類最多的書籍，仍子類和集部文學類的書籍，圖譜、辭書、醫藥、方言類等用書雖然也有收錄，但數量上沒有前二份目錄來得多。

²²黃美娥，《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頁 13。

²³黃美娥，《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頁 13-14。

（二）《守墨樓書目》的編排方式

從上述三份書目中，觀察張純甫對於書籍的分類方式，可以發現主要是以中國傳統的四庫分類方式經、史、子、集來做為分類的依據。雖然有些書籍，例如同屬於「子」類的性質；或是「史」類性質的書籍沒有放在一起。但歸類的標題，仍以「子」、「二十五子」；或是以「史鑑」、「史類」等名稱加以標示，可以清楚看出書籍的類型。但是，對於部份書籍例如佛經、醫藥、圖畫法帖、小說戲曲等，張純甫並未將其納入四部的分類中，而是散見於書目中，這一直是中國古代以四部分類的最大問題：

《隨書·經籍志》以後，四分法即成了我國古典目錄分類法的主流，但是如何用它來範圍包括道、佛著作在內的全部書籍，如何將古代所無之新出書籍按其性質分別隸屬四部，仍然是有待解決的問題。²⁴

對於佛經、醫藥、圖畫法帖、小說戲曲這些書籍，張純甫沒能創造出一個更新的方式來為它們做歸類，只能單項式地將這些書籍擺放在一起，似乎可惜。但從另外的角度思考，這種「疏忽」，反而突出這些書籍在書目中，量少且不同於正統四庫之書的特殊地位。在過去，中國對四庫分類的改良方式，造成這些書籍無法顯現出它們的學術特點，例如《舊唐書》、《新唐書》即是如此：

兩《唐志》這種處理方式的優點是將道佛著作併入子部或史部，成了真正的四部，缺點是沒有耐與道佛著作以獨立的地位，因而未能鮮明反映出它們的學術特點。²⁵

由以上張純甫對於自身藏書的性質，以及分類方式觀察，張純甫仍試圖透過收藏的性質與編排方式，與這些種類繁多的書籍建立一份永不遺忘的情感，烏爾夫（Wulf.D.von Lucius）認為：

凡是收藏家圍繞者某個文學的、美學的、科學的、文化史的或其他任何主題長期收集的書籍都屬於真正的藏書。…實物的存放秩序對於藏書生活具有決定性的實用意義，並且常常能反映藏書家與書籍的感情關係。²⁶

張純甫就在各類型書籍都加以選購和收藏的前提下，運用舊有的圖書分類方式，企圖在日治時期現代性大舉入侵下的臺灣，透過沿襲中國傳統圖書的分類方式為圖書進行編目，努力維繫與過去的統治者——中國一個文化情感的交流管

²⁴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山東：齊魯書社，1998年4月），頁125。

²⁵同上註，頁128。

²⁶烏爾夫（Wulf.D.von Lucius）著、陳瑛譯，《藏書的樂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5月），頁26。

道。

(三) 購書：「維繫斯文於一線」的文化旅程

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購書」似乎是社會上不可缺少的商業／文化行爲，而「書店」所肩負的任務，除了讓愛書人得以滿足對知識的渴望外，還要同時承擔社會上文化教養的責任。張氏不但工於詩文，也是藏書家和「興漢書局」的負責人，縱使臺灣與中國間因政治、交通等因素往來不便，張純甫仍排除萬難，在一生中前往中國大陸兩次，主要就是爲了實業作計畫，並收購書籍以供販售，或作爲自我收藏，皆是張純甫前往中國大陸的目的。由書局標明爲「興漢」，亦或是他的藏書樓提名爲「守墨」觀察，這兩個詞彙其實都隱涵著作爲一個知識份子，對於固有文化的堅持，以及難以分割的文化認同。但「興漢」要能實現、「守墨」要能成功，對於日本帝國殖民下的臺灣而言，卻是相當困難，隨著書房日漸的凋零、以教授「國語」（日文）爲主的公學校、小學校紛紛設立²⁷，臺灣人要如何拓展知識來源，也變得與維護文化同樣重要。因此，張純甫利用郵寄購書，或親自前往中國大陸的書肆購買書籍等方式，達成鞏固漢學知識來源的企求。

1. 以郵寄方式購書

對於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來說，要如何與中國大陸互相來往交流？在交通仍不甚便捷的因素影響下，日治時期臺灣、中國兩方在郵務上，並未因政局的阻隔而受到影響，對於酷愛購書、藏書，或是爲自己經營的「興漢書店」進書的張純甫來說，透過與對岸書局的信件往來，或是書籍的寄送，可免除不少時間上、精神上的負擔，這些與對岸書局的來往過程，都記載在其日記中，例如，與上海商務印書館間書籍來往：

寄商務印書館□券一角，郵券二□前往購《群經音辨》一部，二冊定價□元。(昭和9年2月11日)

商務印書館寄來《群經音辨》已到。」昭和9年3月17日)

又寄商務印書館通訊，現購股一函，由□□之書籍列。(昭和9年3月27日)

商務印書館及蘇州來青閣之書到。(昭和9年4月25日)

商務印書館到書三件。(昭和9年8月4日)

由上述記載可發現，張氏本人及其所經營的「興漢書局」，與上海商務印書

²⁷可參考鄭梅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或《臺灣省通志稿·教育設施篇》。

館在書籍方面的交流可說是極為頻繁²⁸，爲了己身收藏和書局業務上的需要，張氏除向商務印書館購書並請對方寄來臺灣外，商務印書館也不忘寄送書籍通訊給張氏，這不但是書局自我的行銷手法，對張氏而言，也得以藉由閱讀書局所主動提供的通訊，進一步了解目前圖書界的最新出版訊息。埃斯卡皮指出：

書店始終是一種經營艱難的行業，負擔沉重，進貨政策稍有閃失，往往在幾個月之間便貶值蝕本。因而，不論規模如何，一般大型書店都堅持定期發寄目錄給已有購買記錄的顧客，特別還設置專櫃或分銷點，又容許可能購書的顧客當場閱讀挑選，以便拉攏客戶而保有個人化的主顧交情。²⁹

昭和 9 年（1934），上海已是大陸吸納世界新知識、新潮流的重要門戶，書店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成立，乃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其中，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規模更爲眾多書店中的佼佼者，其書籍也呈現多元特色。³⁰透過圖書通訊的寄送，張氏也可間接了解部份在臺灣無法接收到的世界脈動。

除了與上海商務書館交流頻繁外，張純甫也透過郵務的方式，與其他地區、書局有所來往，例如與蘇州的來青閣、上海的會文堂、中華書局、大展書局等各書局的往來過程，張氏皆一一登記於日記中：

蘇州來青閣寄信到。(昭和 9 年 1 月 10 日)

商務印書館及蘇州來青閣之書到。(昭和 9 年 4 月 25 日)

會文堂寄書目一冊來。(昭和 9 年 3 月 30 日)

覆藝文社一函。(昭和 9 年 4 月 2 日)

接中華書局一函，謂書籍已寄□□□。(昭和 9 年 6 月 26 日)

蘇州來青閣寄到《馬氏譯史》石印二十四冊。(昭和 9 年 8 月 8 日)

接上海大展書局□□及書目。(昭和 9 年 12 月 20 日)

由以上資料可知，張氏與中國各書局的往來，以上海一地的書局爲最多。根據文末所附，由張氏〈守墨樓書目〉整理、統計出來的資料可知，〈書目〉中可考的 85 家書店中，即有 39 間爲上海一地的書局，其次則爲北京³¹，可見日治時期的圖書事業，臺灣與上海的關係密切，也見證了此時上海文化事業的發達³²，

²⁸ 詳見附錄三：日治臺灣文人張純甫〈守墨樓書目〉所藏書籍及來源一覽表，可證明上海商務印書館所提供的書籍，在張氏的書目中蔚爲大宗，顯示商務印書館對張氏的重要性。

²⁹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頁 95。

³⁰ 關於上海商務圖書館此時的重要性，可參考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³¹ 請參閱附錄三：日治臺灣文人張純甫〈守墨樓書目〉所藏書籍及來源一覽表。

³² 關於此時期上海的各間書局，可參考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2004 年 10 月一刷）、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 4 月）。以及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

經由張純甫的例子更可說明，「上海」成爲日治時期的臺灣知識份子，欲尋求文化慰藉時，不可缺席的重要地點。

2. 親自前往中國大陸購書

對於一個愛書者來說，僅靠郵寄來滿足對書籍的渴望是不夠的，身爲一個購書者／收藏家，若時間、法規、經濟能力等各方面允許，能夠親自翻閱書籍內容再決定是否購買，絕對是一個必要的舉動。由張純甫所遺留、親筆所寫的日記中觀察，可發現張純甫在前往中國大陸時，因對「購書」的高度重視，故在短短幾天的大陸行中，「購書」情況無時無刻都出現在張氏的紀載中，茲如下述：

香取九午後到申，四時停泊浦東，六時用小火船載到海關驗畢，附大東汽車抵來旅社，住二樓二六一號房…，十一點半就寢。(昭和 11 年 9 月 15 日)

五時夢覺不覺再寐，…買《宋元史新編》。(昭和 11 年 9 月 16 日)³³

張氏初踏上中國大陸後的第二天，即迫不及待地前往上海書肆集中地購書，此後，一連幾天的日記，張氏都把他買了什麼書，或是跟哪些書店接洽作了記載：

定中華書局預約《辭海》，…買商務瓷器畫一本。(昭和 11 年 9 月 17 日)

買《文學家大辭典》二小冊。(昭和 11 年 9 月 19 日)

買《陶說畫鑑》、《蓬萊市場》，尋潭小雲買辭書。(昭和 11 年 9 月 21 日)

張純甫離開上海後，前往北京、天津，並回到南京，在遊歷著名景點時，仍不忘記在書肆中採買書籍：

先到琉璃廠，仍向中山公園吃飯，…夜在東安市場買《十三經索引》。(昭和 11 年 10 月 5 日)

午後在景山畫社買畫、故宮誌。(昭和 11 年 10 月 8 日)

之後又陸續買了《全唐詩》、《拍賣冊》、《駢字類編》、《張之洞大宣對》、《壇經》、《大乘起信論》和《神會遺錄》等書³⁴，而 10 月 25 日，張純甫則是到了上海著名的「廣益書局」買書。³⁵之後，才搭乘「長沙丸」離開上海，回到臺灣。

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稻鄉，2006 年 9 月)。

³³ 文中所引用的《張純甫日記》、《守墨樓書目》相關史料，現存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皆爲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蒐集、整理所得來，筆者不敢掠美，特此致謝。另爲求行文方便，日記出處日期直接附於引文之後，不再另行附註。

³⁴ 《張純甫日記》，昭和 11 年(1936) 10 月 16 日、10 月 21 日、10 月 22 日、10 月 24 日。

³⁵ 《張純甫日記》，昭和 11 年 10 月 25 日。

回到臺灣後，由於所經營書店須要貨源，仍與雅堂一樣，使用郵寄方式與中國北京、上海和蘇州等地書店接洽購書，又以上海的書店為最：

商務印書館及蘇州來青閣之書到。(昭和9年4月25日)

會文堂寄書目一冊來。(昭和9年3月30日)

覆藝文社一函。(昭和9年4月2日)

接中華書局一函，謂書籍已寄□□□。(昭和9年6月26日)

接上海大展書局□□及書目。(昭和9年12月20日)

無論是利用郵寄方式購書，或是自己親自前往中國大陸採購書籍，張純甫都表現出身為一個書局的經營者，或是文化維護者，對於書籍的重視。若置於殖民統治的脈絡下觀察，除了以消費活動來解釋張純甫的活動外，更可深化為對失落的文化知識所展現出來的渴望。而這股「消費」行為，包亞明等人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解釋，認為是人類因生活而出現衣、食、住、行和社會交往等等需求。這些生理上的需求是有限的，可以被滿足，但「消費」這股慾求，卻是超越具體的生活需求層面，是一種非理性的動力，存於個人心理內在，並且無窮無盡地延展，難以被滿足。³⁶

當張純甫收到由對岸寄出、漂洋來臺的書籍，或是自身徜徉於故國的書肆間時，他所購買的書籍，乃至於整個購書時的消費過程，其所代表的意義將不再僅限於知識上的閱讀和金錢上的花費，更可以解釋為是一個身為一個被殖民者，在異族統治下，只能透過對書籍的購買的慾望，試圖追求那股在心靈上，永遠無法完全滿足的文化失落感。

張純甫於上海訪書的親身經歷，除讓吾人見識一位殖民統治下的傳統文人他潛藏於內心深處對於逝去文化的失落感外，也證明當時的上海書肆是多麼的繁盛，於是成為日治臺灣各書店書籍來源的主要地點。無論書店經營者自己有沒有親身前往上海訪書的經驗，但經由本文對上述史料的梳理，證明這些書店與上海確實有所往來。而下節所欲討論的「蘭記圖書部」創辦人黃茂盛，目前史料未見親自前往上海購書經歷，但仍同上述多家書店，自上海代銷大量圖書進入臺灣³⁷，且為「蘭記圖書部」贏得日治時期臺灣最大漢文書店的美名³⁸。究竟「蘭記圖書部」書籍的來源與特色為何，下文續論之。

³⁶ 包亞明、王宏圖、朱生堅等著，《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像》（高雄：宏文館，2002年），頁142。

³⁷ 楊永智，〈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臺灣出版史（1919-1954）的軌跡〉，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7年11月），頁99-132。

³⁸ 江林信，〈漢文知識的散播者—記蘭記經營者黃茂盛〉，同上註，頁9。

三、漢文書局的主要目的：文化維護與知識啓蒙

早在明清時期，臺灣已有出版事業的存在，但規模不大，活動地區多集中於臺南一地。³⁹到了日治時期，在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所開設的漢文書店，反而超過清領時的數量和規模。爲什麼日治時期會有這麼多、以販售漢文書籍的書店出現？這些書店，除了有商業上的活動外，背後是否有更深刻的考量？不同的書店，它們創辦的目標，在殖民統治下，是否相同？對於這些問題，可以參考連雅堂在創辦「雅堂書店」時的動機。連雅堂會創辦「雅堂書局」，不僅是對於臺灣一地購書不便的抱怨，最大的遺憾，恐怕是對於臺灣一地的文風不振，有所感受：

不佞自十年來，擬集同志組織讀書會，及圖書流通處，一以鼓舞讀書之趣味，一以利便讀者之購借，而呼遍全臺，無有應者，文運之衰，寧不慨嘆？蓋今日臺灣之搢紳，但知權利，青青子衿，又求享樂。而螢窓雪案之功，遂無人肯用心矣，悲哉！⁴⁰

在連雅堂等人的想法中，書局雖成立，但書局的功用，絕不僅是爲了靠販賣書籍而賺錢，或是便於臺灣人買書時免被上海或他處的奸商剝削而已。興辦書局最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基於對文風改善的責任感，或是宣揚讀書的好處，不然，隨著漢文書房的逐漸沒落，又有什麼方式，得以在「芸芸三百七十餘萬人中」，去尋找那「二三好學之士」？⁴¹而在「雅堂書局」停業後，接收大量圖書的張純甫「興漢書局」⁴²，無論是由「興漢」，抑或是提名爲「守墨」的藏書樓，這兩個詞彙其實都隱涵著作爲一個知識份子，對於固有文化的堅持，以及難以分割的文化認同。對張純甫來說，「購書」、「售書」或是「藏書」，絕不只是商業利益的考量，隱藏於內的，是身處殖民統治下，對於漢文化的孺慕與渴望。而這個時期書肆繁盛、圖書種類多源的上海，恰好滿足了這些知識份子對知識的追求與文化追憶的追尋。以張純甫不辭辛苦地到各處蒐羅圖書並加以收藏的行爲觀察，「書籍」作爲知識的產物，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的表徵。透過張氏藏書目錄的展現，固然有部份代表「新學」的書籍，可以做爲張氏初識現代化的佐證⁴³，但涵蓋總數約三分之二的中國典籍，則成爲張純甫在殖民統治下一個最重要的一份文化收藏。人們爲何藏書？這個問題似乎難有一個標準答案，烏爾夫說：

藏書家藏書的最初出發點各不相同，有的是對文字感興趣，有的是對書籍裝幀或裝幀的某一部分感興趣，有的是對文化史感興趣，無論出於哪種原

³⁹ 可參考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臺北：臺灣學生，2007年）。

⁴⁰ 連雅堂，〈餘墨〉，頁374。

⁴¹ 連雅堂，〈餘墨〉，頁374。

⁴² 詹雅能所編，〈張純甫先生年表〉，黃美娥：《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頁229。

⁴³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297。

因藏書，所有的動機都有同樣的權利。⁴⁴

由張純甫的日記已知，張氏曾多次離開臺灣前往大陸旅遊，而旅行的重點之一，即是前往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書店前去購書。這固然是爲了所經營的「興漢書店」開拓書籍來源，但更大的目的，則是作爲張氏本身的收藏。因爲觀察日記中只購買單本或是少數幾本的情況，這樣的數量並不足以達到本人親自爲書店批貨的標準，就算是張氏的「興漢書店」欲引進某種書籍到臺灣販售，也應當是張氏回臺後，請書店以郵寄的方式將書籍大量、成套的進口較爲划算。由此推測，這應是被當作張氏個人的收藏。試想，對於日常生活中須面對日本殖民政權的張純甫來說，當他離開現實生活中的世界，進入他所累積起來的「守墨樓」藏書之處時，無疑是從一個紛擾的世界，進入一個得以自我遨遊、既「虛幻」卻又「真實」的世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其個人圖書館的收藏爲例，除了證明「收藏」是一種承繼的態度外，也剖析收藏家的心態，認爲：「收藏者不僅夢想一個遙遠的桃花源，同時還夢想一個更好的境地。」⁴⁵

是故，張純甫的「守墨樓」藏書室，成爲張氏得以暫時避開殖民統治下的「桃花源」，這固然是「遺民」意識的展現⁴⁶，但藉由一本本佔有空間、具有質量的書籍，這些性質屬於中國古代傳統典籍的文化實體，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對於故有知識和傳統的追憶。於是，張純甫愛書、藏書的嗜好，和對知識與傳統的追憶，兩者不謀而合地成就一個「記憶的氛圍環境」（milieu de memoire）。誠如王斑所言：

這種記憶環境瀰漫著一種氣息或情感氛圍。從本土環境向無鄉情色彩的現代「地域」或「空間」的轉型，意味著社會結構和人情關係的變化，對應著從傳統到現代、從鄉土到國際、從情感環境到人情淡漠空間轉化的歷史過程。⁴⁷

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臺灣傳統文人，必須面對乙未割臺的政治痛楚時，他們到底能在殖民統治下，存有多少值得再三回味的事或物？的確，日治初期日本官員透過漢詩的唱和、「揚文會」、「饗老典」的舉辦，甚至是以漢文爲主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獨立刊行，都足以讓這些臺灣傳統文人得以保留一片揮灑的天空。但被清廷所割讓、被迫接受新興殖民者統治的悲哀，卻不是所有的臺灣文人都得以在短時間遺忘的痛楚，當張純甫力圖將親購回來、郵寄過來的書籍，

⁴⁴ 烏爾夫（Wulf.D.von Lucius）著、陳瑛譯：《藏書的樂趣》，頁4。

⁴⁵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臺北：臉譜出版社，2002年），頁39-43。

⁴⁶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收於梅家玲主編，《跨領域的視野：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276。

⁴⁷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

一本本、一部部地編目並放置進入「守墨樓」時，這些書籍所代表的意義，不再僅限於單純地、對於知識的追求，而是在殖民統治的氛圍下，將張純甫從殖民統治的現實生活中解救出來的一帖「懷舊」良方：

懷舊心態，則認為傷痛並未完全痊癒，療程效果懸而未決。懷舊力圖質疑、批評脫韁野馬似的現代化進程。因此，創傷經驗在歷史與記憶的錯綜關係中，佔有一席之地。⁴⁸

乙未割臺，無疑是對臺灣人民的一大震撼，特別是對於身為知識份子的臺灣文人來說，到底應該像洪棄生、許夢青那樣「閉門不出，披髮佯狂」，還是要像北臺灣的臺灣文人一樣，與日本來臺官員維持良好的往來？從日本領臺後層出不窮的武裝抗日運動，亦或是日後的非武裝抗日運動，都證明多數的臺灣人對於日本帝國的統治，縱使已距乙未多年，仍沒有全面地接受。部分活躍的人將此意識化為實際的抗日行爲，而類似張純甫這種心靜恬淡的儒者，則選擇了一條平靜的文化追憶方式。無論張純甫等臺灣文人選擇了哪條路，歷經戰火的洗滌，都已無法將他們帶回過去安定且習以為常的生活。面對大局勢的改變，透過書籍的懷舊心態，也成爲在文學創作的抒發外，被張純甫所採納的一個治癒歷史傷痛的良藥。

「雅堂書局」和「興漢書局」的成立，「維護文化」無疑地成爲主要目標。但不管是讀書風氣能夠形成，或者「興漢」要能實現、「守墨」要能成功，日本殖民者所帶來的現代性衝擊，在維護文化的思考下，臺灣的漢文書店無法避免地也要肩負起知識啓蒙的責任。於是，「雅堂書局」或「興漢書局」所引進臺灣的書籍，也必須兼顧新知的進入。或許它們沒有像「臺灣文化協會」附屬的「文化書局」般是以啓迪民智作爲主要的任務，或是像「中央書局」成立之始，就是爲了要：「夫社會生活之向上，有賴協同互相之社交的訓練，而普及健實之新智識學問，啓發高尚的新生活興味，尤爲目下之急務。⁴⁹」但連雅堂、張純甫的傳統文人身份，卻因爲在時勢潮流的影響下，連帶使書局的經營，不能只以維護傳統文化作爲唯一的目的，同樣的，「中央書局」和「文化書局」的成立目的，也帶有維護傳統文化的使命。⁵⁰

由此可知，日治時期以販賣中文圖書爲主的書店，不但不會因書店經營者所代表的文人世代或集團不同，而在經營的理念上有所差異，反而皆以維護傳統文化和知識啓蒙兩者，成爲書局的共相，「蘭記圖書部」的整體功能，也不例外，黃茂盛成立「蘭記」後，代銷、自印一連串的漢文讀本，以對抗殖民教育，或是

⁴⁸同上註，頁9。

⁴⁹〈中央俱樂部將出現了·趣意書〉，頁8。

⁵⁰吳三連、蔡培火等，《臺灣民族運動史》，頁336-337。

引入關於士、農、工、商等實業、科學性質等書籍⁵¹，不也是有感於維繫文化和啓蒙知識，是同等重要？黃美娥於是指出，「蘭記」〈圖書目錄〉的分類方式，也呈現著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情況：

透過黃茂盛的圖書分類模式，我們可以看到時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吸收和儲存知識的辦法。其次，從傳統經史子集的圖書分類，到「女子」、「白話」、「常識」類別被標舉出來而單獨歸類，顯見現代型知識已滲入傳統知識的領域中。⁵²

同樣身處於殖民統治下的書局「蘭記圖書部」，也將過去幾間書局所兼具的雙重目標繼續承接下來。而作為銷路遍及全臺的書局，「蘭記」在此風潮下所扮演的角色，必然比其他幾間書店要來的吃重。既是如此，為何和其他書局所販售的圖書相較起來，「蘭記」所售之中國古典小說，數量和種類都遠超過其他的書局？難道「蘭記」把中國古典小說，視為知識啓蒙的一個工具嗎？但中國古典小說類的圖書，對於殖民統治下的其他書局而言，仍遠比不上四書、五經、漢文讀本或是其他知識類的書籍來得重要。可見在其他書局的眼中，「小說」仍只是「小道」，但此「小道」卻反而在「蘭記」所售的圖書中，穩佔有一席之地，「蘭記」顯然比其他書局更重視「小說」。然而，它到底是把所販售的中國古典小說，看作是帶有知識啓蒙性質的書籍加以推銷？或是在一片文化維護的聲浪中，應用它的通俗屬性，成功地達到「蘭記」傳承中國文化的理想？並在各類型的書籍中為自己發聲？以下將繼續探討「蘭記」所販售中國通俗小說的種類與來源，以此說明日治臺灣書局與上海書肆間的代銷關係。

第二節、日治臺灣書店對中國小說的代銷：以「蘭記」為主要觀察對象

「雅堂書局」的經營者連雅堂曾感嘆：「臺灣僻處海上，書坊極小，所售之書，不過四子書、千家詩及二、三舊式小說。」⁵³而翻閱「興漢書局」的創辦人張純甫在《守墨樓書目》中所收錄的中國古典小說，也只有《聊齋志異》、《今古奇觀》、《續今古奇觀》、《官場現形記》、《西洋通俗演義》、《分類宋人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燕山外史》與《鏡花緣》等九種小說⁵⁴，兩位臺灣大儒對於小說數量的不重視，或是在藏書、售書時的忽略，反應出在臺灣的中國古典小說，仍停留在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⁵⁵的階段。難道長久

⁵¹許旭輝，〈蘭記版漢文讀本與漢文化傳承〉，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167-178。或見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傳播與移植－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292-293。

⁵²黃美娥，〈從蘭記圖書目錄想像一個時代的閱讀／知識故事〉，頁 80。

⁵³連雅堂：〈餘墨〉，頁 374。

⁵⁴張純甫：《守墨樓書目》。

⁵⁵《莊子·外物篇》

以來，在中國被視為「小道」的小說，在臺灣仍被文人所邊緣化，失去在臺灣文壇上的一席之地嗎？其實，自設立於嘉義的「蘭記圖書部」出現後，它與通俗報刊《三六九小報》互相合作的行銷手法，見證三〇年代臺灣讀書市場的成熟⁵⁶，而由它所發行的《圖書目錄》則可知，通俗小說亦成爲此時書籍販售的大宗類別，故檢視「蘭記」所販售小說書籍的來源，與闡述其內容和特點，即爲本節的論述重點。

一、「蘭記圖書部」所販售的各類小說

檢視臺灣小說的發展歷史，清領時期江日昇所撰的史傳小說《臺灣外紀》是現今可見，最早與臺灣有關聯的一部小說。日本統治臺灣後，初期與臺灣文人相互往來、酬唱的文學工具，則以漢詩爲最。不過，黃美娥已指出，日本領臺後沒多久，在《臺灣新報》上已出現日本人以「鄭成功」爲題材的日文小說，而後在報紙上，小說的比重增加，愈來愈多的臺灣文人，也投入小說創作的行列。⁵⁷雖然1920年左右，由張我軍、連雅堂等人所掀起的「新舊文學論戰」，乃至於之後陸續發生的兩次文學論戰，「小說」都不是論戰的主軸，例如「新舊文學論戰」是以漢詩中的「擊鉢吟」爲焦點，後兩次論戰則著重於書寫文字的討論。難道臺灣人都不太讀小說，抑或是時下小說的地位，根本是無法被重視到足以讓大家展開論戰的文類？以首次的新舊文學論戰爲例，張梗的論點，或能作爲上述兩個問題的解釋。張梗認爲：「平心而論，臺灣哪裡有小說可言，不過是那些中國流來的施公案與彭公案罷了。」⁵⁸作爲反對傳統文學的健將，張梗對於小說認知的缺乏，恰好與做爲對立面的傳統文人連雅堂相去不遠。但前述黃美娥的研究，已經指出張梗說法所忽略的面向，意即臺灣報紙上有大量的小說供讀者閱讀，不是只有《施公案》、《彭公案》這兩本小說在臺灣流傳。本論文則於前章中補述，認爲張梗由於留學日本的關係，對於當時臺灣報紙上漢文通俗小說流行的情況並不清楚；也對當小說中文化交混的現象認知不足；但卻指出中國通俗小說的創作模式對臺灣小說影響甚深。⁵⁹之後，透過對吳敏敦、鄭坤五，甚至張我軍等人論述小說的文章中，吾人發再現他們屢屢提到《三國誌》、《西遊記》、《粉粧樓》、《說岳》、《七俠五義》等小說，且三人基本上對這些小說都不排斥，只是就語言性質加以論爭。⁶⁰以上眾人對小說理論、創作觀念的闡述，都證明中國通俗小說如何被臺

⁵⁶ 「蘭記」在臺灣圖書史上的重要性，可參閱柳書琴，〈通俗作爲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1930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第319期（2004年12月）。將其與小報互補互利的合作關係分析得極爲透徹。

⁵⁷ 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見前註，頁239、241。

⁵⁸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臺灣民報》第31號，大正13年（1924）9月11日。

⁵⁹ 可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

⁶⁰ 吳敏敦，〈文體論〉，《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7年（1932）3月28日。鄭軍我（坤五）：〈致張我軍一書〉，《臺南新報》第5版，大正14年（1925）1月29日。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3卷第1號，大正14年1月1日。

灣閱讀市場接受的現象，不容我們忽視，這也是影響日後「蘭記」代銷一連串的中國通俗小說進入臺灣的背景因素。那麼，「蘭記」所販售的小說，由於三〇年代後臺灣通俗市場的成熟，較諸於二〇年代文學論戰時所提及的小說，種類和特色應該要更多元才是。

若以大正 14 年（1925 年）所印製的〈圖書目錄〉和昭和 9 年（1934 年）的〈圖書目錄〉為例⁶¹，所售的圖書種類繁多，但仍可見不少小說錄於其中，這些小說，大致可以分爲以西方背景書寫的西方通俗小說，和以中國爲背景的漢文通俗小說。西方通俗小說則可細分爲偵探、科幻、歷史、冒險、綺情、鬼怪、知識等七類小說，小說名稱如下頁所示：

西方通俗小說（共約 241 種）
<p>偵探小說：（約 92 種）</p> <p>俠女破奸記、壁上血書、娜蘭小傳、天際落花、劇場奇案、夢遊廿一世紀、華生包探案、案中案、奪嫡奇冤、雙指印、鬼山狼俠、指環黨、曇花夢、桑伯勒包探案、一東緣、車中毒針、寒桃記、畫靈、多那文包探案、壹萬九千磅、煤孽奇談、一仇三怨、海衛偵探案、奇女格露枝小傳、碧玉串、樹穴金、血痕、社會影聲錄、奇婚記、女師飲劍記、蛇首黨、秘密軍港、紅粉織仇記、四字獄、妬婦遺毒、賊博士、當顛女、毒菌學者、玫瑰花、黑偉人、童子偵探隊、華生包探案、太陽黨、三大偵探、束頸帶、三角黨、江南燕、怪面人、怪醫生、惡虎村、脂粉罪人、秘密地圖、謀產奇案、偵探學講義、木足大盜、俠女探險記、玫瑰花、偵探指南、一粒珠、密室、美人劫、盜盜、生死美人、身外身、柳暗花明、電妻、淫毒婦、秘密女子、車中女郎、福爾摩師偵探案全集、達夫偵探案全集、暴奕頓偵探案全集、八大偵探案全集、貝克偵探案全集、海威偵探案全集、探偵世界全集、偵探小說精華全集、民國十年現形記、新遊記、五福船、大澤秘密、鐵軌上、顛博士、窗外人、留聲機上、愛河情浪、福爾摩斯偵探案、中國偵探案、金窟、浪子回頭記、離奇暗殺案、千百年眼。</p>
<p>科幻小說：（約 11 種）</p> <p>科學家庭、新飛艇、鏡中人語、火星飛艇、火星與地球之戰爭、八十萬年後之世界、說鬼、天界共和、科學罪人、人間地獄、眾醉獨醒。</p>

⁶¹ 蘭記圖書部（漢籍流通會），《圖書目錄》（嘉義：蘭記圖書部，大正 14 年 8 月），此份資料爲筆者由臺灣國家圖書館館藏蒐集而來。昭和 9 年（1934）的《圖書目錄》則由《文訊雜誌社》和中正大學中文所柯喬文博士提供，在此致謝。

歷史小說：(約 25 種)

博徒別傳、清宮二年記、遮那德自伐八事、遮那德自伐後八事、雪花圍、鐘乳鬪體、盧宮祕史、劫花小影、拿破崙忠臣傳、希臘興亡記、西班牙宮闈瑣語、驃騎父子、法宮祕史前編、法宮祕史後編、外交秘事、巴黎繁華記、斐洲煙水愁城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畧、俄羅斯宮闈秘記、重臣傾國記、復國軼聞、鐵匣頭顱、鐵匣頭顱續編、飛將軍、千古恨。

冒險小說：(約 26 種)

青梨記、海外拾遺、洪荒島獸記、雪市孤踪、墮淚碑、苦兒流浪記、域中鬼域記、黃金屋、金銀島、回頭看、降妖記、秘密室、秘密怪洞、苦海餘生錄、英孝子火山報仇錄、荒村奇遇、斷雁哀絃記、埃及金塔剖尸記、環遊月球、航海少年、化身奇談、新天方夜譚、苦海雙星、寶蓮從軍記、悽風苦雨記、新西遊記。

鬼怪小說：(約 5 種)

驅中驅、塚中人、鬼士官、西樓鬼語、鬼窟藏嬌。

綺情小說：(約 51 種)

模範町村、白頭少年、青衣記、美人磁、錯中錯、孤士影、稗苑琳琅、紅星佚史、金絲髮、朽不舟、時諧、合歡草、玉樓慘語、不測之威、金臺春夢錄、恨縷情絲、牝賊情絲記、孤露佳人續編、桃大王因果錄、後不如歸、愛兒小傳、小仙源、哈邊燕語、迦茵小傳、珊瑚美人、賣國奴、懺情記、再世為人、模範家庭續編、鐵血美人、紅顏知己、翻雲覆雨、車中女郎、寫真緣、蓮心藕縷緣、圍爐肖談、癡郎幻影、現身說法、泰西古劇、白羽記續編、金梭神女再生緣、情俠、三人影、橘英男、雙喬記、雙鴛侶、孝友鏡、菱鏡秋痕、貧士、美人心、死死生生。

由以上包含各主題的西方小說觀之，時下臺灣閱讀者所能閱讀到的小說，種類可說是相當繁盛多元，它的文體應也包含著白話文和文言文。同時，透過對這些翻譯小說的閱讀，臺灣讀者亦能大致了解西方歷史的發展、科學與奇幻的展現，甚至是對於西方戀愛問題的認識。這些小說成爲大正年間臺灣讀者認識西方的另一橋樑，對於啓蒙民眾，或是作爲小說作家創作範本，應有所助益。⁶²

西方小說外，根據前行資料統計，漢文通俗小說則以人物傳記、奇觀異聞、歷史演義、武術武俠、奇觀諧語等五類爲主，數量亦多，如下頁表格所列⁶³：

⁶² 本論文至上海圖書館調查時，偵探類的小說數量雖多，但卻未能大量的尋獲，此乃筆者所困惑之處，待日後再加以考察。由於上述小說較難於上海圖書館中查到，故無法如中國通俗小說般整理出詳細的版本介紹。但無論如何，這些小說應都包含白話文和文言文書寫的類別，亦都證明由中國傳入臺灣的小說，不僅有文言小說，還包括了白話小說與翻譯小說。

⁶³ 此五類書籍詳見林以衡整理、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270-275。

漢文小說（人物傳記、奇觀異聞、歷史演義，共約 246 種）

歷史演義：（約 84 種）

繪圖開闢演義、繪圖廿四史通俗演義、廿四史通俗演義、繪圖封神傳、繪圖東周列國誌、繪圖後列國誌、繪圖前後七國誌、繪圖走馬春秋、繪圖東西漢演義、繪圖三國誌演義、繪圖後三國演義、石印大字三國志、鉛印大字三國志、石印中字三國志、石印小字三國志、大字後列國春秋、鉛版大字封神演義、石印中字封神演義、石印小字封神演義、鉛版大字西遊記、石印中字西遊記、石印小字西遊記、繪圖東西漢演義、大字三國志、繪圖隋唐演義、繪圖唐史演義、繪圖說唐全傳、大字前後說唐、繪圖薛反唐、繪圖說唐征東、大字西洋通俗演義、大字二度梅、大字南北宋、繪圖說唐征西、繪圖三下南唐、繪圖五代殘唐、繪圖五代演義、繪圖羅通掃北、繪圖宋史演義、繪圖宋史十八朝演義、繪圖南北宋演義、繪圖飛龍傳、繪圖五虎平西南、繪圖楊家將、繪圖五才子水滸傳、小字五才子水滸傳、鉛印水滸傳索隱、鉛版大字蕩寇誌、石印大字蕩寇誌、石印中字蕩寇誌、石印小字蕩寇誌、繪圖蕩寇誌全傳、鉛印加批精忠說岳傳、繪圖說岳全傳、繪圖元史演義、繪圖明史演義、繪圖英烈傳、繪圖乾隆遊江南、繪圖七國志演義、左公平西、新漢演義、明清兩國誌、鉛版大字聊齋誌異、石印中字聊齋誌異、繪圖後五才子、鉛版大字五才子、石印中字五才子、五虎鬧南京（臺灣外誌）、五虎平海氣氛、文廣平閩十八洞、明末拾遺竹蘆馬、臨水平妖傳、大明忠義傳、繪圖情史、繪圖野叟曝言、前漢通俗演義、後漢通俗演義、兩晉通俗演義、南北史通俗演義、唐史通俗演義、五代史通俗演義、元史通俗演義、明史通俗演義。

人物傳記：（約 42 種）

四大忠臣歷史、四大奸臣歷史、岳武穆歷史、關公歷史、諸葛亮歷史、包公歷史、秦檜歷史、曹操歷史、董卓歷史、嚴嵩歷史、四大神仙全傳、李鐵拐全傳、漢鐘離全傳、呂洞濱全傳、張果老全傳、藍采和全傳、何仙姑全傳、韓湘子全傳、曹國舅全傳、周文彬趣史、吳佩孚百戰奇略、陳炯明演義、張作霖演義、黎元洪全史、李烈鈞全史、馮玉祥全史、曹錕全史、徐樹淨全史、繪圖吳三桂演義、洪秀全演義、繪圖洪秀全演義、袁世凱演義、康梁演義、繪圖前後濟公傳、繪圖包公案、繪圖大字彭公案、繪圖小字彭公案、續集彭公案、繪圖濟公全傳、石印大字施公案、石印小字施公案、繪圖施公洞庭傳、

武俠小說、功夫用書：（約 70 種）

俠女殺仇記、紅閨大俠、俠女讎仇記、奇俠精忠傳、乾隆劍俠奇觀、關東女馬賊、清代劍俠奇觀、飛行劍俠、神劍奇俠傳、三十六女俠、劍俠奇緣、南北百大俠、九十六女俠、劍俠駭聞、紅葫子、飛仙劍俠、風塵劍俠、女子劍俠、古今劍俠大全、馬永貞演義、繪圖火燒紅蓮寺、江湖好漢全傳、神怪奇俠傳、少林奇俠、武當奇俠、江湖奇俠傳、江湖廿四俠、江湖百大俠、江湖英雄、雍正劍俠奇案、武俠劍俠駭聞、飛仙劍俠大觀、五湖劍俠、荒山怪俠、華山劍俠、荒村奇俠、江湖劍俠、奇人劍俠、水陸奇俠、江湖情俠、荒江女俠、巾國春秋、紅娘子、紅粉大俠、江湖遊俠、南北女俠、山東女俠、萬里情俠、江湖女怪俠、江湖百俠、四大劍俠、黃衣女俠、七劍三奇俠、鴛鴦奇俠、英雄血、桃花劍、秘密客、姐妹俠、劍珠錄、古今義俠鑑、草莽奇人傳奇、熱血英雄、患難夫妻、英雄走國記、中華武術秘傳、少林棍法圖說、少林拳法圖說、長槍法圖說、長刀法圖說、劍法圖說。

笑話諧語：（約 35 種）

守財奴日記、瞎纏先生記、牛皮大王記、潑婦日記、頑童自述記、拍馬屁日記、大鱷女婿、懼內笑史、遊戲娛樂全書、愛樓遊戲文、古今笑林大觀、滑稽聯話、滑稽詩話、客中消遣錄、一見哈哈笑、一見就笑、不能不笑、裝起面孔不要笑、老學究現形記、笑話萬種、滑稽日記、破涕錄、笑話一萬種、卓別令趣史、唐伯虎趣史、祝枝山趣史、文徵明趣史、曲辨子趣史、守財奴趣史、荷花大少爺趣史、鄉下大姑娘趣史、怕老婆趣史、呆子婿趣史、天下百有趣、天下百稀奇。

奇觀異聞：（約 55 種）

社會萬惡三姑六婆秘史、尼姑萬惡史、道姑萬惡史、卦姑罪惡史、牙婆罪惡史、玉環外史、媒婆罪惡史、師婆罪惡史、虔婆罪惡史、穩婆罪惡史、古今第一奇觀、繪圖大小字今古奇觀、忠孝奇觀、節義奇觀、姦盜奇觀、詐騙奇觀、清代奇案大觀、繪圖今古奇聞、世界奇聞大觀、神鬼怪異奇觀、神異奇觀、鬼異奇觀、怪異奇觀、駭異奇觀、上海黑幕大觀、養媳婦慘史、藥婆罪惡史、制專婚姻史、浪子懺悔史、晚娘罪惡史、清朝宮場奇報、人類七十二變、萬國奇案大觀、古今奇案彙編、古今騙術大觀、神仙大觀、婦女世界、鬼趣奇觀、怪話、貓苑錯誤、閣世奇談、點金奇術、夢話、清代奇聞、民國百大奇案、北京四大血案、江湖異聞、集錦小說、三教九流秘術真傳、二百五、五千年皇宮秘史、黃金崇、百大妖精鬪法、中國四大妖精、太平廣記（神仙類、女仙類、道術類、方士類、異人類、異僧類、妖怪類…）。

由上述各表格可知，1930 年前後由於臺灣通俗圖書市場的逐漸興起，「蘭記」所代銷的小說種類和數量，已經打破連雅堂所言：「二、三舊式小說」，或是張梗：「不過是那些中國流來的施公案與彭公案罷了！」的說法。而在這近 556 種的小說中，足以代表中國通俗小說的演義類通俗小說，又佔了 89 種，僅次於西方通

俗小說偵探類的 93 種，可見日治時期臺灣人閱讀小說的風氣盛行。

二、「蘭記」所售之中國通俗小說的特點與管道來源

那麼，這些中國通俗小說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特點？它們和「蘭記」與上海各書肆的交流，又具有何種關聯性？以下將以上表中所羅列出的各本中國通俗小說為依據進行推源檢索，試圖求得原書的翻閱，以查詢其版本情況與大致內容。此法乃有鑑於「蘭記圖書部」雖登錄了這些小說，但卻沒有交待它的特點和管道來源，故必須將特點與管道來源加以釐清，才能證明它與上海書肆間小說書籍往來的情況。這些小說特點的介紹與管道來源的追溯，本論文將以上海圖書館、上海檔案資料館、北京中國圖書館館藏書籍為主要參考對象，輔以於上海所能蒐集到的出版社圖書目錄、和現有已出版的小說辭典的比對，將「蘭記圖書部」所登錄的小說進行檢索，以求得小說版本考證與比較、內容閱讀等……，本論文於上海完成以上各項的資料耙梳後，對於「蘭記圖書部」所販售之中國通俗小說的各項特點、管道來源將更為清楚，並能證明它與上海書肆間實有密不可分的代銷關係。

（一）小說書籍的主要來源：上海廣益書局

光緒 29 年（1903），廣益書局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成立，店東登記者為魏天生，實際創辦者則為浙江人魏炳榮⁶⁴。按宋原放的說法，廣益書局在 1926 年後，以出版通俗小說為主⁶⁵，秋翁（平襟業）也描述廣益書局在出版石印小說時，與同業競爭的情況：

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這一時期內，上海有幾家書店以一折八扣便宜價格，向讀者大量傾銷各種翻印的舊小說，以及各種古典文學的單行本，震動了整個出版界和書業市場…。

所謂一折八扣，即一本書定價一元，經一折八扣，售價僅八分。一折八扣書的發起者，先是新文化書社和啓智書局。啓智出版的種類不多，旋即停止出版。新文化書社老板見亞東書館出版新標點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售價奇昂，一般讀者望書興嘆，因而按照他們的標點，密排簡裝，以低價出售，先後出版了二百多種，以舊小說居多數，名為“標點書”，售價卻比石印舊小說低廉一兩成。這樣，原來大量出版石印舊小說的廣益書局難以競爭，生意日趨低落，不得不改排標點鉛印本，以低價供應讀者。⁶⁶

⁶⁴ 〈書業公所同業掛號〉，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編號：S313-1-76

⁶⁵ 宋原放，〈近代出版大事記〉，《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2004 年 10 月），頁 590。

⁶⁶ 秋翁（平襟業），〈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現象〉。同上註，頁 289。

從這段描述上海書業間以低價競爭的文字可知，中國通俗小說在此時期是極為有利可圖的暢銷性書籍外，以出版通俗小說為特色的廣益書局更是屢遭挑戰，爲了不使自己在販賣中國古典小說的龍頭地位不保，也必須時常推出新的行銷方式，維持自己在上海書業界的地位。

在 1926 年後，開始以販售通俗小說爲主的廣益書局，時間點恰好和「蘭記」大量代銷中國通俗小說進入到臺灣販售的時間點相同，同時，若上海各書店開始在通俗小說的販售上大打低價戰，「蘭記」進口這些書籍時，也能節省成本，並從中獲利。這些原因，造成廣益書局成爲「蘭記」進口中國通俗小說進入臺灣時最重要的供應商。下表即以廣益書局的〈圖書目錄〉，和「蘭記」的兩份〈圖書目錄〉爲依據，觀察「蘭記」與廣益書局的商業往來。⁶⁷

上海「廣益書局」與臺灣「蘭記圖書部」所售小說對照表

〈上海廣益書局圖書目錄〉所錄小說名稱	蘭記圖書部〈圖書目錄〉所錄小說名稱	上海圖書館所藏版本（以 1945 年前爲限）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版本（以 1945 年前爲限）
繪圖開關演義（頁 13）	繪圖開關演義	今本爲齊魯書社 1988 年本。	查無
繪圖二十四史通俗演義（頁 12）	繪圖廿四史通俗演義	著者新昌呂撫，光緒庚寅仲夏廣百宋齋校印，今本爲浙江出版社 1985 年本。	查無
繪圖封神傳（頁 11）	繪圖封神傳	著者許仲琳，上海文明書局、中華書局 1925 年本。	查無
繪圖前後七國志（頁 13）	繪圖前後七國志	著者胡協寅，上海廣益書局 1948 年 9 月。	上海文明書局，清光緒宣統間（1875-1911）石印本。
繪圖走馬春秋（頁 13）	繪圖走馬春秋	查無	查無

⁶⁷ 《廣益書局圖書目錄》現藏於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年不詳，但側頁有言以民國標價爲準，故爲民國時期的目錄，而非清末民初的時期，所以與「蘭記圖書部」成立的時間點較爲接近，故可以作爲對照的例子。

繪圖三國志演義 (頁 11)	繪圖三國志演義	著者金聖歎，嵩山居士。上海鴻文書局、春明書店，1937 年 7 月出版發行，封面題名前「大字足本」字樣。	鑄記書局，1919 年本。
繪圖後三國志 (頁 11)	繪圖後三國演義	查無	查無
繪圖東西漢 (頁 12)	繪圖東西漢演義	查無	石印本，出版地不詳，應為民國時期，僅 1 冊。書名據書簽題黃紙本「繡像西漢演義 繡像東漢演義」。
大字鉛印三國志 (頁 11)	大字三國志	查無	查無
繪圖隋唐演義 (頁 12)	繪圖隋唐演義	查無	查無
繪圖說唐征東傳 (頁 13)	繪圖說唐征東	查無	上海大成書局，1912-1949 本，別名《繪像征東全傳》。
	大字西洋通俗演義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年不詳。	查無
繪圖二度梅 (頁 12)	大字二度梅	今本為大達圖書局 1935 年 12 月本	查無
繪圖南北宋 (頁 12)	大字南北宋	查無	查無
繪圖說唐征西 (頁 12)	繪圖說唐征西	今本為進步書局本，出版年未知。	查無
繪圖宋太祖三下南唐 (頁 12)	繪圖三下南唐	僅有錦章書局 1949 年 3 月本。(非 1945 年前)	石印本，其餘資料皆不詳
繪圖五代殘唐 (頁 12)	繪圖五代殘唐	今本為廣益書局本，出版年	查無

		未知。	
繪圖羅通掃北 (頁 12)	繪圖羅通掃北	今本為廣益書局石印本，出版年未知。	查無
繪圖五虎平西南 (頁 13)	繪圖五虎平西南	查無	上海天寶書局，1851-1911，題為《繡像五虎平西南全傳》
繪圖楊家將 (頁 13)	繪圖楊家將	查無	查無
繪圖五才子水滸傳 (頁 13)	繪圖五才子水滸傳	今本為會文堂新記書局 1937 年本。	查無
繪圖蕩寇志 (頁 11)	繪圖蕩寇志全傳	查無	查無
繪圖說岳全傳 (頁 12)	繪圖說岳全傳	查無	上海天寶書局，1912-1949，石印本。
繪圖英烈傳 (頁 12)	繪圖英烈傳	查無	明徐渭編，石印本，1912-1949，
繪圖乾隆遊江南 (頁 12)	繪圖乾隆遊江南	查無	上海錦章圖書局，繪圖乾隆遊江南全集，又名：繪圖萬年青全集，石印本。出版時間不詳。
繪圖七國志演義 (頁 13)	繪圖七國志演義	查無	查無
繪圖左公平西 (頁 12)	左公平西	查無	上海錦章圖書局，1912-1949，題為「左文襄公征西演義」，石印本。新輯左公平西全傳。
繪圖後五才子 (頁 14)	繪圖後五才子	查無	查無
繪圖楊文廣 (頁 13)	文廣平閩十八洞	今本作者為楊瑞仁、林壽龍。為廈門鷺江出版社 1987 年本。	查無
繪圖迴龍傳 (頁 14)	繪圖飛龍傳		上海書局，石印本。清光緒 18 年 (1892) 邊。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表中所錄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同類小說，並非一定是廣益書局所出版，那是因為在當時的上海，往往一本舊小說，在有廣大讀者群的利

益吸引下，各書局莫不爭先恐後地印刷各式演義小說。但若從書名的契合程度以及年代來觀察，「蘭記」所代銷之演義小說，來源於廣益書局的可能性仍較大。況且，因為年代久遠，同樣一本小說，可能只留下非廣益書局所出版的版本，不能因此就判定廣益書局未出版過這些小說，仍應以廣益書局的〈圖書目錄〉為主要依據。因為在同業激烈競爭下，以販售中國通俗小說的廣益書局，不可能販售其他家書局所出版的小說，唯有大達圖書局的《繪圖二度梅》，仍可視為廣益書局的一支⁶⁸，另小說《大字西洋通俗演義》，「蘭記」〈圖書目錄〉中有錄，廣益書局的〈圖書目錄〉中則未錄，但上海圖書館現存版本則為廣益書局所出版；「蘭記」所錄《大字南北宋》，廣益書局則記為《繪圖南北宋》，此二書仍可算是由廣益書局而來的小說。

表格中有幾本小說的來源，值得再加以探究，如「蘭記」所錄《文廣平閩十八洞》，廣益書局的目錄中標為《繪圖楊文廣》⁶⁹，兩者為不同的小說，《文廣平閩十八洞》又名「平閩十八洞」。葉國慶在1935年時指出，此小說：「在北方雖不可見，在南方其流傳之廣，則至南洋、臺灣等地，恐為其他小說所不及。」⁷⁰因此楊瑞仁、林壽龍在1987年重編此書時表示：

《楊文廣平閩十八洞》是一部章回歷史小說，原版小說經十年浩劫，幾乎絕版，幸存的也殘缺不全，本書是根據現存殘本，參照臺灣和大陸說書藝人錄音整理而成。⁷¹

由此可知，《楊文廣平閩十八洞》這本小說原本流傳甚廣，但經過十年文革後，今已難見。就地緣關係而論，「蘭記」當時所售之《楊文廣平閩十八洞》來自上海的機率不高，比較有可能是從日治時期的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引進，且由於《楊文廣平閩十八洞》的民間性極強，風行於大陸東南各省、臺灣等地，「蘭記」銷此小說，也是看準讀者們對於這部小說的喜愛。⁷²

⁶⁸秋翁（平襟業）說：「廣益書局以大達圖書供應局的名義，大量出版標點書，達數百種之多，藉以同新文化書社競爭。」〈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現象〉，《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頁289。

⁶⁹廣益書局所售之《繪圖楊文廣》，應是由《楊家通俗演義八卷五十八則》的卷七、卷八中節選出來，孫楷第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有錄此書。或見石雷：「楊家府演義八卷五十八則（明）秦淮墨客撰」，石昌渝等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頁477。

⁷⁰葉國慶，〈平閩十八洞研究〉，《廈門大學學報》第3卷第1期（1935年），頁6-7。

⁷¹楊瑞仁、林壽龍，〈內容概要〉，《楊文廣平閩十八洞》（廈門：鷺江出版社，1987年）。

⁷²此書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中，題為「楊文廣平南全傳四卷二十二回（清）佚名撰」。衛華成並指出：「該書所述故事，與明人《楊家將演義》卷八“文廣領兵征李王”一回相似，當是據前書改頭換面，加以潤色鋪陳而成。有海左書局石印本……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但本文認為，《楊文廣平閩十八洞》與《楊文廣平南全傳》雖相似，由書即可知，並非同一本書。石昌渝等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頁477。

此外，「蘭記」所售小說《繪圖飛龍傳》⁷³，廣益書局則標為《繪圖迴龍傳》，並歸於小說類別，但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以及其他小說辭典皆未見《迴龍傳》之名。顯然兩本並不是為同一本書，《繪圖迴龍傳》也並非是《飛龍傳》之誤，因為潘建國在《鄞縣馬氏所藏彈詞及鼓詞目錄》中，發現《迴龍傳》被收於其內⁷⁴，所以，《迴龍傳》的最初性質應當是彈詞或鼓詞，而非小說。由是可知，要不是廣益書局分類錯誤，就是廣益書局請人以此題材改寫為小說，才會將《繪圖迴龍傳》置於小說類。

總結上述的交互辨證，可知「蘭記」現存 83 種中國通俗小說中，來自於廣益書局出版的就佔了 27 種，且這 83 種中國通俗小說，還有許多如《三國志》、《西遊記》、《聊齋》等，分別以大字、中字、小字等項列於目錄中，若把這些重覆的項目扣除，來自廣益書局的 26 種小說，在「蘭記」的書籍來源中，佔了多數。

（二）會文堂新記書局與《中國歷代通俗演義》

除了廣益書局為「蘭記」所售演義類小說主要供應商外，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也是「蘭記」演義小說類的來源之一。那麼，會文堂又是什麼性質的書店呢？按照〈上海書業公所同業掛號〉的記載，會文堂是由邵時生在棋盤街所創辦的書局⁷⁵，但熊融則援引對朱聯保的訪問，認為會文堂是：

創辦於一九〇三年，由沈玉林、湯壽潛等籌建，地址設在上海河南中路三二五號。出版石印線裝的詩文集和演義小說，如《吳三桂演義》等…。會文堂於民國十五年（1926）停業，當系內部改組，後來改稱會文堂新記書局，經理王秋泉。⁷⁶

可見學界對於會文堂書局的發展情況是眾說紛云。但若按照現今可見、上海圖書館所藏、會文堂新記書局所出版的書籍，版權頁皆標發行人為徐寶魯，地址則為「河南中路三二五號」，那麼，熊融的考察應是較為正確。但無論哪種說法較為可靠，會文堂的特色，也是以帶有插圖的歷史演義為主。熊融引魯迅之言，指出：「會文堂是一家書店，並且以出版插圖本歷史演義著稱。」⁷⁷而這套受到魯迅肯定的圖書，即是蔡東藩所著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⁷⁸

⁷³ 此書若非廣益所出版，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則有上海書局出版，八卷六十回，石印本。清光緒 18 年（1892）的版本。

⁷⁴ 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5 月），頁 320。

⁷⁵ 〈上海書業公所同業掛號〉，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編號：S313-1-76。

⁷⁶ 熊融，〈關於「會文堂」〉，《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頁 249-250。

⁷⁷ 同上註。

⁷⁸ 同上註。

蔡東藩，(1877-1945)，浙江蕭山人，光緒十六年(1890)曾中過秀才，1910年以候補知縣的身份分發福建，後不滿官場黑暗，稱病辭官，以寫作和教書為生，八年抗戰期間，蔡東藩和多數人一樣，顛沛流離，抗戰結束前夕過世。蔡東藩於1916-1926，費時十年所寫成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以章回體的小說手法，將中國歷史自秦始皇的前漢開始，包含後漢、西晉、南北史、五代、唐、宋、元、明、清直至至民國，共11朝2166年的歷史，加上另著的《西太后演義》和其增補改寫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蔡東藩無疑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演義作家。⁷⁹這十一部《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寫成後，以石印方式印行發售，頗受讀者好評，成為時下最暢銷的演義類讀物。在〈上海特別市民眾讀物登記表〉中，會文堂新記書局特別將《前漢通俗演義》、《後漢通俗演義》、《兩晉通俗演義》、《南北史通俗演義》、《唐史通俗演義》、《五代史通俗演義》、《宋史通俗演義》和《元史通俗演義》等八本小說列入，作為上海市民眾特別讀物之一：

上海特別市民眾讀物登記表(一)

書名	冊數	書名	冊數	出版處/價目	備註
東周列國志演義	八冊	永慶昇平	八冊	皆無紀錄	□□印行各書以四書五經為主，舊小說列為附屬品。
東西漢演義	六冊	精忠岳傳	八冊		
五才子水滸傳	八冊	濟公傳	八冊		
蕩寇志	八冊	前後七國志	四冊		
乾隆皇帝遊江南	六冊	明清兩國志	四冊		
兒女英雄傳	十冊	彭公案	八冊		
鏡花緣	六冊	施公案	十二冊		
紅樓夢	十六冊	儒林外史	六冊		
花月痕	四冊				

上海特別市民眾讀物登記表(二)

書名	冊數	出版社	售價	填報者
前漢通俗演義	四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六元	(店名)會文堂新記書局 (經理人)王秋泉 (地點)河南
後漢通俗演義	四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六元	
兩晉通俗演義	四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六元	
南北史通俗演義	四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六元	
唐史通俗演義	四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六元	

⁷⁹ 參考自楊天石為《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所撰之〈總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1月。

五代史通俗演義	二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三元	路三二五號
宋史通俗演義	四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六元	
元史通俗演義	二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三元	
<input type="checkbox"/> 中道遺錄	一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二元七角	
可 <input type="checkbox"/> 一笑	一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二元一角	
古今滑稽詩話	一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七角五分	
古今滑稽聯話	一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七角五分	
閱微草堂筆記	二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四元五分	
中國大偵探案	一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一元二角	
古今姻緣傳	一冊	會文堂新記書局	二元二角五分	

80

為何將以上小說列為「特別」？現今所存的檔案並未詳細說明，但由表一的備註可知，在印刷的優先順序上，四書、五經仍被視為重要的讀物，小說的地位雖僅被視為附屬品，並非官方所提倡、欲優先印行的書籍。但此一「備註」卻令人察覺當下因為小說過於被大眾所喜好，故被大量印刷，當局為避免世俗對書籍的價值觀和重要性本末倒置，所以才會加此「備註」作為特別強調，提醒社會大眾不要被喜好牽著走，應仍以追求正統學問為優先選項。故，雖然這些小說是上海市民最常拿來閱讀的書籍，在當局眼中卻仍然只是附屬品，儘管受到大眾的愛戴，其地位卻依然比不上四書、五經，所以《中國歷代通俗演義》盛行於當時上海的最大主因，應是其的通俗特點和娛樂功效，才能如此容易地進入上海市民的閱讀領域中，並在時代浪潮中持續於民間流傳。

蔡東藩《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受到民眾支持的情況，反應到至今無論臺灣、中國或香港，皆有《中國歷代通俗演義》的重刻本。⁸¹而書中的插畫，雖然後世評論者認為「粗糙、庸俗」，但因沿襲於清末《點石齋畫報》主要畫師吳友如的畫風，故仍可吸引不少讀者和研究者的目光。⁸²

⁸⁰ 〈上海市民眾讀物特別登記表〉，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編號：S313-1-153。

⁸¹ 大陸現今由「華夏出版社」印行的版本，背面封面甚至還以毛澤東為例，說：「毛澤東很喜歡這套書，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不久，即致電李克農，請購全套《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兩部。」此種以毛澤東做為書籍廣告的行銷手法，無形中也見證蔡東藩之作的成就。臺灣現今則有世一、竹林、商兆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等版本。

⁸² 熊融，〈關於「會文堂」〉，《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頁 250。

《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在上海暢銷，以上海作為主要書籍貨源的「蘭記」自然不會將這一套叢書缺漏。「蘭記」的〈圖書目錄〉中，就錄有蔡東藩著、會文堂新記書局所出版的演義類小說如《繪圖唐史演義》、《繪圖五代演義》、《前漢通俗演義》、《後漢通俗演義》、《兩晉通俗演義》、《南北史通俗演義》、《唐史通俗演義》、《五代史通俗演義》、《元史通俗演義》和《明史通俗演義》，這十本書名稱雖有些許不同，但其實都為蔡東藩所著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可見此套書不但在上海熱銷，也由上海跨海至臺灣，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民眾能閱讀到的讀物，其影響力極為深遠。會文堂書局與「蘭記」雙方以通俗小說作為交流管道的情況因此得到證明，成為繼廣益書局外，另一個小說書籍的來源書肆。⁸³

（三）由其他書局代銷而來的演義小說

在各種圖書目錄的比較下，可發現日治時期「蘭記」所代銷的各類演義小說，佔最多數的，即是由上海廣益書局和會文堂書局而來，那麼，若扣除這兩間書局書單有錄的小說，「蘭記」其他的演義小說，是由哪些書局代銷而來的呢？這些小說又有什麼特點？以下說明之。

「蘭記」所販售的演義類小說，數量眾多，除了廣益書局、會文堂新記書局為主要來源外，還有從其他書局代銷而進的小說，例如《繪圖東周列國志》、《繪圖說唐全傳》兩本，現存新文化書社印行的版本。⁸⁴《繪圖飛龍傳》、《新漢演義》，現存上海書局印行、《明清兩國志》則由上海鑄記書局所出版。⁸⁵但在這些能見到出版社的小說外，《繪圖東西漢演義》只見其書，而不知其版本。《繪圖情史》、《繪圖野叟曝言》雖是耳熟能詳的小說，但只見「蘭記」錄其書名，確實出版者查無⁸⁶，因此無法得知這幾本小說是由何處代銷進入臺灣？

「蘭記」有販賣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聊齋誌異》等小說，但觀其目錄卻不見《紅樓夢》、《金瓶梅》等小說，然「蘭記」中不見此二本小說，卻不代表日治時期的臺灣民眾不讀此二本小說。⁸⁷相較於耳熟能詳的演義

⁸³ 蔡東藩的著作外，「蘭記」所錄、余邵魚所著的《繪圖後列國志》，根據筆者於上海檢視其現存的版本後，認為其來源可能來自上海群學社外，也有可能來自會文堂新記書局的出版，故會文堂新記書局對「蘭記」的小說書籍來源影響頗深。以上考察根據上海圖書館館藏版本而來。

⁸⁴ 《繪圖東周列國志》（上海：新文化書社，1937年5月）。范叔寒著，《繪圖說唐全傳》（上海：新文化書社，1941年7月）。

⁸⁵ 《繪圖飛龍傳》，上海書局印行，8卷60回，1892年石印本。自由生著，《新漢演義》，上海書局印行，4冊40回。

⁸⁶ 《情史》為馮夢龍所著、24卷的明代文言小說，《野叟曝言》則為夏敬渠所著之清代小說。

⁸⁷ 從相關的小說論述、心得可知，日治時期臺灣人、日本人的小說閱讀，《紅樓夢》所佔比例仍高，幾乎每篇小說心得都會提及，「紅學」學門的建立實至名歸。而「臺灣紅學」的建構，最早可追溯自清領時期，欲進一步建立日治時期的臺灣紅學研究亦是可行的方向，唯因篇幅有限，將另文探討。有關於清朝時臺灣紅學的研究可參考吳盈靜，《清代臺灣紅學初探》（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11月）。

小說，「蘭記」的目錄中，也可見幾本鮮為人知的小說值得加以介紹，如前述融合小說與民間說唱藝術而成的《楊文廣平閩十八洞》為一例，此外如《臺灣外誌（五虎鬧南京）》、《臨水平妖傳》、《明末拾遺竹蘆馬》三本小說，值得加以介紹。

在臺灣文學史上，江日昇的《臺灣外紀》，是一本中國與臺灣皆熟知的演義小說，此書又稱之為「臺灣外志」⁸⁸，葉石濤說：

「臺灣外紀」詳述鄭芝龍以下四代的事跡，但不能視為正史。由於江日昇過份潤色史實，往往有失真之處。然而，以明鄭的傳記文獻而言，首尾一貫，頗有價值。其實「臺灣外紀」為一本歷史小說兼有報導文學之體裁，其文學精神和寫作風格，應該說為臺灣文學樹立了一個風範。⁸⁹

若是如此，那麼《臺灣外志》被「蘭記」銷售，也不是件令人意外的事，細觀「蘭記」〈圖書目錄〉中有一本《五虎鬧南京》為題名的小說，並在其後括號注明為「臺灣外誌」。此部小說敘述延平王鄭成功麾下的五位大將「翻江虎」甘輝、「飛山虎」陳魁奇、「巡夜虎」萬禮、「鑽地虎」陳豹、「穿石虎」陳典協助鄭成功北伐抗清，最後同於南京戰敗的經過。此小說內容與江日昇的《臺灣外紀》內容頗多不同，故應視為不一樣的兩本書加以論之較為合理。⁹⁰這本小說目前在臺灣可見的版本是楊永智先生存有上海中華圖書館的石印本，另有三個版本收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中：

1. 《祕本臺灣外誌》：封面題「內詳五虎鬧南京」、「上海六一書局石印」，內頁題「祕本原稿 臺灣外誌」、「上海六一山房石印」、「內詳五虎鬧南京」、「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以及「每部定價大洋五角」等字樣，出版年不詳，約為 1920 年左右。
2. 《增像全圖三王造反》：封面題「增像全圖三王造反」、「明末清初臺灣外誌五虎鬧南京」、「上海漢文書局印行。」出版年不詳，應為 1910 年左右。
3. 《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京》：封面題「最新臺灣外誌前傳」、「廈門新民書社再版」。此書續集為《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封面題「內附大破磁州城」、「廈門新民書社印行。」出版年為 1920、1929 年。

臺灣現存總共四個版本的「臺灣外誌」，後二個版本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

⁸⁸ 石昌渝指出此書有「臺灣外記」和「臺灣外志」等二名稱和各式版本。石昌渝等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頁 369。

⁸⁹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2000 年），頁 5。

⁹⁰ 在中國小說史上，有「五虎平南」、「五虎平西」、「五虎平西南」等小說，甚至在《包龍圖判百家公案》中，有「五鼠鬧東京」之回名，但這些小說都與「五虎鬧南京」無關。楊永智整理前人論述，將《臺灣外誌》與江日昇所著《臺灣外紀》之各類版本合併，計 52 種。但，《臺灣外誌（五虎鬧南京）》與江日昇《臺灣外記》兩部小說雖有關聯，小說情節卻有出入，是否分論較為合理？此問題有待日後深思。楊永智，《清領時期臺南出版史》，頁 73-87。

全書》中有錄⁹¹，但《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未提及第一個由上海六一書局印行的《祕本臺灣外誌》；以及楊永智先生所存有的上海中華圖書館的本子。由於《五虎鬧南京》（臺灣外誌）版本眾多，又因「蘭記」的〈圖書目錄〉是收 1925 年和 1934 年的小說，故到底是哪一個版本被「蘭記」引入到臺灣，受限於未能親眼見到「蘭記」當時所販賣的原書，其版本今日難以判定，或許仍以上海書肆出版的版本機率較大。總之，雖未能立即查明「蘭記」版本來源，但因此本小說版本眾多，應頗受到當時中國與臺灣兩地讀者的喜愛。

至於性質為神怪小說的《臨水平妖傳》，按歐陽健的說法，有民國年間上海普及出版社的鉛印本，封面和卷端均不題撰人。⁹²內容方面，此小說講述福建、臺灣一帶，民間信仰所崇拜的女神「臨水夫人」陳靖姑的故事，由於《臨水平妖傳》的各項資料難以蒐尋，那麼，「蘭記」所銷之《臨水平妖傳》，應是由上海普及出版社所代銷而來。臺灣現今可見的《臨水平妖傳》，則僅有和「蘭記」相同、皆為臺灣老書店的台中瑞成書店，所出版的《臨水平妖傳》，但瑞成書局的《臨水平妖傳》，是二次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後才印行的，且書中並未標明印行時所根據的原本。⁹³

最後，蘭記所售之《明末拾遺竹蘆馬》一書，雖然筆者未見，但參考施雨田的說法，可知這本小說是：

清末小說，宣統三年（1911）上海萃英書局石印本，全稱為《明季拾遺劉龍圖竹蘆馬》，不題撰人。卷首有綉像八葉，正文中有插圖三十幅。……上海萃英書局石印本藏吉林社會科學院圖書館。⁹⁴

由可以知，「蘭記」所售《明末拾遺竹蘆馬》來自於上海的萃英書局。故這三本小說，雖非來自於廣益書局，或是會文堂新記書局，依舊來自上海，可見當時單就演義小說而言，上海與臺灣間的交流就已十分密切，若將其他類的書籍併置思考，臺灣與上海間的書肆流通情況，將會更加熱絡。《文廣平閩十八洞》、《臨水平妖傳》等書，名氣雖不如《三國》、《水滸》等書響亮，但「蘭記」把它們代銷到臺灣，也與臺灣民眾多數由閩、粵兩地移居而來、風俗信仰較為接近等原因有關。由此來看，「蘭記」對於市場取向、民眾閱讀經驗的掌握，極為清楚。

⁹¹ 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445。

⁹² 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年 8 月），頁 603。

⁹³ 瑞成書局所印行的《臨水平妖傳》，書皮上印有「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標語，也有內政部的登記字號、印刷廠所在地臺中市建國路的地址，雖未明示出版年月，但以此可判定為國民政府來臺後所印行之讀物。

⁹⁴ 石昌渝等編、施雨田撰「竹蘆馬四卷三十回條」，《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頁 539。

三、「代銷」之必要？印刷生成與閱讀習性

日治時期的臺灣，不是沒有作家寫作小說，那麼，為何「蘭記」還要大費周章地、代銷這麼多種類的演義小說進來臺灣？難道日治時期的臺灣，無法自行生產或是印刷小說，以滿足民眾的閱讀需求嗎？為何在殖民統治下，臺灣民眾除了閱讀刊載在報紙、雜誌上的小說外，仍不放棄對於中國演義小說的閱讀？

小說要興盛，除了須有足夠的閱讀人口外，印刷技術成熟與否、民眾的閱讀習性，乃至於書商個人喜好，都是必須具備的因素。尤其印刷術是否成熟，更是小說是否能被廣為閱讀關鍵，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 Roger Fisher）以十五世紀末的歐洲為例說：「隨著印刷術的出現，數百名讀者（甚至多到一千名）就可以擁有某部作品的同樣印本，作品的內容於是進入了公共領域。」⁹⁵艾恩·瓦特也強調印刷術與小說的關係，密不可分。⁹⁶那麼，對照「蘭記」代銷這麼多小說進入臺灣，不禁讓我們提出疑問，是否這個時候的臺灣，沒有成熟的印刷業和印刷技術，來做為滿足小說閱讀者的後盾？

臺灣的印刷事業，早在清領時期就已開始，但受限於清廷明令禁止私人刊刻書籍，以及技術仍停留在價格昂貴的雕版印刷階段，此時臺灣的印刷事業和技術並不發達，且印刷者多為善書⁹⁷，規模比較大的印刷所，也僅有臺南的松雲軒較為出名。⁹⁸

進入日治時期，隨著報業的發展，以官方為主要資本的《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或是臺灣知識份子們所主辦的《臺灣民報》，這些頗具規模的報紙，皆有專屬業務廠房和印刷機，規模較小的漢文通俗刊物《三六九小報》、《風月》等，也可以和民間印刷廠合作以方便出刊，可見臺灣的印刷業已達到繁盛。其實，早在大正二年（1913），日本人荒井治泰、木村匡、平松雅夫等人，集資收買「臺灣印刷會社」，並在臺北成立「印刷會社」，但收買的目的卻不明確。⁹⁹此後，基隆、臺北、彰化和臺南等地，也都紛紛成立印刷局。有感於印刷進步，「臺灣文社」也在大正八年（1919），成立「臺灣文社圖書印刷局」，創設動機的〈趣意書〉中有言：

本社之文藝叢誌，原訂每月發行一次，奈因承印之臺灣新聞社，異常忙碌，

⁹⁵ 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 Roger Fisher）著、李中文譯，《閱讀的歷史》（臺北：博雅書屋，2009年7月），頁212

⁹⁶ 艾恩·瓦特，《小說的興起》，頁50。

⁹⁷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事業〉，頁69。

⁹⁸ 「松雲軒」，為臺灣府六品銜職員盧崇玉（耀昆）在臺南府開設的印刻坊。林漢章，〈臺灣第一家印書松雲軒〉，《書卷》第4期（1993年12月），頁24。

⁹⁹ 〈印刷會社設立〉有云：「將以某目的，而經營之云」，《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大正2年（1913）10月23日。

以致本叢誌亦隨之延滯，而且各處活版所，均是資力短少，鉛字機械，不完備者，竟無承印之能力，故本社鑑於時勢之文明、智識之發達，印刷業一途隨之而開發，故本社不能無印刷局之組織，他日成立，不僅可自印叢誌，且可編譯各種書籍發行，其利益之多大，不揣而知矣。¹⁰⁰

由臺灣文社欲成立自己的印刷局可知，雖然臺灣的印刷業已脫離清領時期的窘狀，技術也有進步，但具有完整印刷能力的場所仍極難尋得。僅是《臺灣文藝叢誌》的印行，就遇到不少的阻礙，那麼，對於發行量更大的小說而言，在臺灣本地的印行就更為困難。再者，臺灣由於身為殖民地，日本對臺灣的圖書出版以「臺灣出版規則」加以箝制，使得進口圖書性質受到阻礙外¹⁰¹，殖民統治下的印刷用紙，也往往被課以高稅金¹⁰²，或是受到世界局勢的影響，印刷用紙的價格也逐年升高，這些都對臺灣的印刷廠造成不小的負荷。¹⁰³所以，儘管臺灣的印刷技術已發展到可以舉辦「印刷文化展覽會」的水準¹⁰⁴，對於也擁有印刷工廠的「蘭記」而言，外在情況的複雜，影響到它在選擇印行書籍性質的考量，柯喬文指出，「蘭記」所售圖書，來源有四：

1. 是上述代售中華書籍的部份。
2. 是代售臺灣書籍。(如 1934 年的《詩鐘吉光集》)
3. 是蘭記出版、大陸印刷，再由蘭記代售。(戰前，如 1930 年的《蓮心桂影錄》)
4. 是蘭記出版、臺灣印刷，再由蘭記代售。(戰前，如 1928 年的《國語讀本》，戰後，如 1947 年的黃森峰《中華大字典》、1958 年的文心千歲檜》、九 0 年代，則有黃陳瑞珠《蘭記臺語字典》)¹⁰⁵

但「蘭記」雖然兼有書局、出版與印刷等業務，自我印行出版物時，若考量到成本情況，帶有通俗性質、非正典文學或教材讀本的小說，就會成為「蘭記」放棄自行印刷的文類。演義小說既是家喻戶曉的通俗讀物，對於書商或讀者而言，只要能夠閱讀就可以了，所以書商也不用費盡心思地想要把小說印行的多完善，「價廉」、「量多」成為販賣小說文類時，欲節省成本的優先選擇，於是，上海蓬勃的印刷事業下，使用「石印」技術大量印製的書籍，就成為「蘭記」代銷小說進入臺灣時的首選。

¹⁰⁰ 〈株式會社臺灣文社圖書印刷局創立趣意書〉，《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8 年（1919）11 月 30 日。

¹⁰¹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頁 77-78。

¹⁰² 〈印刷用紙課重稅〉，《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明治 39 年 3 月 28 日。

¹⁰³ 〈印刷料直上〉，《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大正 7 年（1918）10 月 15 日、〈印刷料金の直上〉，《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1 年（1908）3 月 27 日。

¹⁰⁴ 〈印刷文化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7 版，大正 10 年（1921）10 月 1 日。

¹⁰⁵ 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頁 67。

所謂「石印」，是以特選的細質石材制版印行書籍。由於石印本設備簡單，底石又可重複制版再印，故石印不若雕版印刷，需要大量的資金，製版也較容易，每次可印份數達數千、數萬，亦遠勝雕版印刷。¹⁰⁶而「石印」技術，早在同治年間就已傳入中國，本作宗教宣傳品用途，到了美查創辦《點石齋》後，開始印行石印書籍，而後如拜石山房、同文書局等，也都開始採用石印方法印刷書籍。¹⁰⁷連雅堂對於此種印刷術的興起，曾感到興奮，卻又感到擔憂，他說：

蓋自印術改良以來，鑄鉛寫石，邀於剗刷；名山祕籍，賴以重光。而郢書燕說，紛然雜出，改竄舊名，以愚鄉士；禍棗災梨，罪無可逭矣。¹⁰⁸

石印技術的便捷，連雅堂感受甚深，但他雖指出石印技術在保存古籍上的貢獻，卻也點出石印技術過於方便，造成書籍的粗制濫造，甚至會有仿冒的問題出現。爲了遏止石印所帶來的不良效果，光緒 22 年（1896），清廷就頒布了「清朝石印書籍章程草案」，其中對於印刷規格的問題，有明確規定：

議本埠各號，曆年所有書底，無論石印、鉛版、開明頁數、開數，送交公所登簿註明，如後來有更改，亦須告明公所查校，以杜影射，倘匿而不報，察出議罰。¹⁰⁹

爲了避免因石印的便宜，造成各書店間彼此削價惡鬥，章程中也規定：

議價目議定之後，門莊交易統歸七折，不准減少，如有客幫現辦以及各路店家零躉批發，均歸六折，其關稅水脚等費，□客自理，本埠同行往來，統歸五五折，如經濫售，察出議罰。¹¹⁰

儘管清政府三申五令地規範石印準則，希望能整頓出版界因石印而帶來的歪風，但自清末到民初，隨著上海書肆的蓬勃發展，許多書店除了販賣部、發行所外，皆附有石印局，便於書籍的生產與印刷。這樣的情形，自是因爲石印技術發達、普及所導致，此時石印局的普及情況由下表可知：

上海石印局一覽表¹¹¹

書店名	性質	書店名	性質
章福記印局	石印局	文盛印書局	石印局

¹⁰⁶ 朱一玄、張守謙等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頁97。

¹⁰⁷ 秋翁（平襟業），〈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現象〉，《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頁268。

¹⁰⁸ 連雅堂，〈大陸游記〉，《雅堂先生餘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74年1月），頁17。

¹⁰⁹ 〈清朝石印書籍章程草案〉，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編號：S313-1-119。

¹¹⁰ 同上註。

¹¹¹ 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編號：S313-1-23

久敬齋書局	石印局	鑄記書局	石印局
鴻文恒記	石印局	天寶書局	石印局
昌明書局	石印局	會文堂印刷所	石印局
文明印刷所	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刷所)	印刷所
有正書局印刷所	印刷所	國粹書局	石印局
簡青齋書局	石印局	天機書局	石印局
斐章書局	石印局	周月記書局	木板、石印印刷所
文粹書局	石印局	振華圖書局	石印局
中新書局	鉛印局	彩文書局	石印局
善新端記書局	石印局	共和新印局	石印局
天南書局	石印局	文寶公司	石印局
文華書局	石印局	國光書局	鉛印局
公興書局	鉛印局	民友社	鉛印局
博文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	崇文印局	無說明
錦章圖書局印刷所	印刷所	育文印刷所	石印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印刷所	著易堂印刷所	鉛印局
鴻寶齋印局	石印局		

由上表可見因石印便利，各書店利用此技術蜂擁競爭並擴展圖書版圖的情況，仍未根本杜絕，前述各書店有能力使用「一折八扣」的方式削價競爭，就是在於石印技術的發達。而這個問題，表現在通俗小說上，更為明顯，因為通俗小說不但深受民眾的喜愛，有大利可圖。再者，翻印古代小說，可避免版權上的爭議，且中國古代小說又幾乎是以演義類小說最為膾炙人口，上海所印行的演義小說，就在這種數量眾多、價格低廉，品質又不會太差的現況下，受到「蘭記」的青睞，這種在產銷之間尋求最大利益的經營策略，正好符合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的論點，他說：

生產製造，正是這樣一個文學活動的過程之一。進行初步生產計劃時就要先設想讀者群眾，因為只供應數百名珍本愛好者收藏的豪華版書籍，抑或價廉的通俗讀物，在生產過程中，紙張、開本、排字……，尤其印刷數量，全部會為之改觀……，這些物質特徵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印刷數量…印量太多，無可避免的退書更會造成虧損，而書籍工業最特殊的一點，便是產品一旦賣不出去，就比原料本身還不值錢。¹¹²

¹¹²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頁 81。

若以上述「蘭記」所代銷各類的演義小說為例，幾乎都以石印本的形式進入臺灣，面對臺灣已形成的通俗市場，「蘭記」不但不用肩負起若自行印刷所必須面對的風險，又可以進到便宜通俗的書籍，並從中獲利，實為最適當的經營方式。上海各書店就以這種傾銷式手法，將演義小說售給「蘭記」。對「蘭記」而言，進口這些小說進入到臺灣，或許遠比自行在臺灣印刷所要花費的成本還要低廉，且又可以在上海各間書店的小說價格戰中獲利，因此「蘭記」也就把為數眾多的演義小說代銷進入臺灣了。

印刷術固然是「蘭記」選擇由上海代銷演義小說進入臺灣的原因之一，但臺灣民眾長久以來對於演義故事的喜愛，也是造成「蘭記」會開拓此一小說市場的另一原因。例如：早在日治初期，文人如謝雪漁在報紙上撰寫長篇小說〈新蕩寇志〉¹¹³，李逸濤更在報紙上談論演義小說對他的影響：

僕自九歲入塾，十一歲稍通解說，而于經書終茫然，未幾塾師復強僕讀詩文古辭，及時文試帖，僕益苦之，竊念教初學當不如此，法必有使于此者，後自書坊購得《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兩書，讀之殊了了，不禁狂喜，所購益多，遂束四子書及六經于高閣。¹¹⁴

李氏之說，除是表達他對小說的喜愛外，也讓我們得知，求學過程大半時間位在清領時期的李逸濤，他所言及的書坊已經開始在販售中國通俗小說，而「所購益多」之語，也讓我們得知，清領時期的小說種類，絕對遠超過《隋唐演義》、《三國演義》，或是《彭公案》之類的小說。作為知識份子的臺灣文人如此，一般民眾也熟悉演義小說故事情節，就算臺灣的普羅大眾識字不多，仍可藉由流傳於民間的「歌仔冊」，來了解演義小說的內容¹¹⁵，況且，「歌仔冊」這種具有底本的傳唱文學，在民間的影響力，往往又比以文字書寫在報紙上的小說，具有更大作用。

演義小說在臺灣，就這樣日積月累地，成為臺灣民眾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並養成民眾對演義小說的閱讀習性。及至三〇年代左右，通俗市場的興起，促使臺灣民眾對閱讀小說的需求大增，「蘭記」配合引入上海大量印刷的演義小說，實是把握良機。但對臺灣民眾而言，推本溯源，這些小說畢竟是由中國文學的成份中演化而來，臺灣或許可以寫出如《西遊記》、《封神演義》般的續衍故事¹¹⁶，

¹¹³ 謝雪漁，〈新蕩寇志〉，在《臺灣日日新報》上自昭和 11 年（1936）1 月 24 日起，連載至 8 月 12 日，主要分佈在報紙上的第 8 版或第 12 版。

¹¹⁴ 逸濤山人，〈小說葛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0 年（1907）1 月 1 日。

¹¹⁵ 柯榮三整理各家學者對「歌仔冊」在內容上的分類，大致可見中國古典小說的題材，被廣泛地編入「歌仔冊」中。柯榮三，《時事題材之臺灣歌仔冊研究》（臺北：鼎文書局，2008 年 2 月），頁 31。

¹¹⁶ 〈豬八戒漫遊記〉，《臺灣日日新報》，第 28 版，大正 12 年（1923）1 月 1 日。許丙丁，〈小封神〉，收錄於呂興昌主編：《許丙丁作品集》（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 年）。

卻無法將這些中國小說，全然轉嫁為臺灣本地土生土長的作品。而是作家在閱讀過程中，不停地將其融入所寫作的小說，而識字的民眾又在對這些臺灣小說的閱讀中，繼續接受中國古典小說無形的洗禮，在此反覆交流下，「蘭記」由中國進口這些小說，成為此交流過程中的催化劑。

當然，在商業考量下，力求成本愈低、書籍銷路愈好，或是投臺灣民眾閱讀習性之所好等，固然是「蘭記」由上海進口大量小說的眾多原因，但要是書局經營者黃茂盛不喜歡閱讀小說、或是認為這些小說文類僅是「小道」的話，「蘭記」所銷售的書籍，恐怕也只有文教讀本、法帖、科學、四書五經等書籍了。可見書商的個人喜好，也影響了為何這些小說可以進入到臺灣的閱讀市場。

以維護漢文化為己身要務的「蘭記」負責人黃茂盛，在力求書店的生意因小說而蒸蒸日上時，對於這些提供臺灣民眾休閒、娛樂的通俗讀物，將把「忠」、「孝」概念寓寄於這些演義中。如果再配合著臺灣文人所書寫的小說，中國傳統教忠教孝的觀念，將透過書籍和小說兩者並進的宣揚，深植於日治臺灣小說閱讀者心中，其在教化上的重要性不可輕忽。¹¹⁷

第三節、由日本到臺灣：圖書館中的日本「軍談」和通俗讀物

日治時期的臺灣固然與上海的書肆往來密切，但既身為日本殖民地，就免不了要受到日本書籍的輸入。但與由中國傳入的通俗小說不同的點在於，日治時期在臺灣專門販售日本書籍的書店實在不多，同時，臺灣人對日本書籍的需求量，河原功也抱持著悲觀的看法：

書店數量的略嫌稀少，與臺灣的人口總數有關。1933年年底時，臺灣的總人口數為五〇六萬五〇七人，其中臺灣人（本島人）為四七五萬九一九七人，而日本人（內地人）為二五萬六三二七人。雖然日本人所佔比例逐年增加，但在當年還是仍僅約佔總人口的五%左右，所以即使這些在臺日本人的書籍購買力比日本國內高出數倍，但從人口數來看，臺灣對日本書籍的需求量仍相當有限，同時會日語的臺灣人比例還很低。¹¹⁸

河原功之言，值得讓吾人思考的是：是否因書店數量和人口數的不平均，就會造成日治臺灣在書籍文化上的貧弱，而成為日本國以外的「文化沙漠」呢？若根據上節對上海書肆與臺灣各間漢文書店書籍交流的比較與分析，則可證「書店少」而「文化影響力差」不對等的因果關係有待商榷，因為單就通俗小說而言，若是

¹¹⁷ 請參閱本論文第5章第3節。

¹¹⁸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三省堂與臺灣-戰前臺灣日本書籍流通〉，收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出版社，2004年），頁232。

當時的日治社會沒有這方面的需求，以「蘭記」為首的幾間書店，又怎會甘願不遠千里地由上海進口大量的通俗小說到臺灣販售？

但相同的思考模式，卻無法運用在日文書店的探究上。一方面是因為日治時期在臺灣日文書店的資料與圖書目錄至今未見。再者，河原功認為臺灣人會日文的比例仍低。最後，若根據其對於臺灣書店數量的統計，雖然直至 1938 年全臺灣已有 106 家，但河原功認為影響力較大的書店，也僅有台北的新高堂、文明堂、杉田堂、月光堂，新竹的犬塚、榮文堂，台中中央書局、棚邊書店、育英堂書店，嘉義的振文堂書店、蘭記，臺南的浩然堂、崇文堂書店，高雄的南里書店，彰化的金子商店，鳳山的小民書局，以上共 18 家書店。而大多書又是漢和書兼賣的書局，規模較大且販賣日文書籍較多的，也只有新高堂。雜誌販賣則以大阪屋等四間為主。¹¹⁹

史料的缺乏與書店數量的不足，難道就必須忽視日文小說對臺灣通俗市場的影響嗎？在殖民文化的衝擊下，任何由殖民母國引入的文化物，必然都會影響到被殖民者的文化構成。當我們無法由書店去探求當時日文書籍，特別是本文所重視的軍談和物語時，收藏於各大圖書館並提供給民眾借閱的書籍，就成爲一個值得耙梳的面向。

一、「軍談」的名稱由來及其文學脈絡

「軍談」(ぐんだん)，其實是由日本「講談」細分出的文類，但它大體上仍保有自己獨特的特點。¹²⁰如果說「講談」重在口說，那麼，「軍談」發展到最後，則較偏向於書面化的作品。但此說並非將「講談」與「軍談」清楚地一分爲二，因為要是沒有「講談」嘗試將歷史演義等題材融入表演中，也就不會有「軍談」的產生。然而，之後「軍談」的作品數量愈來愈多，漸漸地也就由「講談」的範疇中獨立出來，成爲一個值得本文另節探討的文類。所以「軍談」演變到最後，主要是指江戶時期的通俗小說，或是軍記書、軍書。¹²¹

在談及「軍談」的起源和沿革時，大多數的說法和「講談」相近，仍將其源頭前推至「日本書記」和「古事記」的影響。然後以日本戰國時代的尚武風氣爲始，並以「太平記讀」的出現作爲「軍談」的前身。盛行年間則約在足利將軍時的戰國末期，一直到德川時代。¹²²但爲何「軍談」在後來能夠被發揚光大、受

¹¹⁹ 同上註，頁 235-236。

¹²⁰ 關於「講談」在日治臺灣的接受問題，請參考本研究第五章。另，佐野孝認為，講談可以細分成三種文類，首先是融合「太平句讀」與「軍書講釋」的「軍談」，第二種則是「御記錄物」，第三種則爲世話物、端物。佐野孝，《講談五百年》(東京：鶴書房，昭和 18 年(1943))，頁 220。

¹²¹ 日本國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國語大辭典(4)》，頁 1180。

¹²²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3。

到日本讀者、文人的重視，並成爲日本古典文學和通俗文學中受到喜愛的讀物，則其歷史的成因，有必要再加以詳釋。

日本元和年代，幕府的政治力已趨穩定，當整個日本開始偃武修文後，原來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的武士們也已垂垂老矣。於是，這些老戰士們安享晚年的時刻，就變成這些曾經叱咤於沙場上，現在卻平靜淡泊的勇士們，開始利用回憶與口述，爲其子孫講述過去英勇紀錄的時光。這些戰場上的老前輩或爲子孫談其參與戰役的過程，或與子孫分享實戰經驗。久而久之，這些言談也經由不停地累積，而成爲「軍談」的來源，例如大久保彥左衛門的《三河物語》，即是最佳的例證。其後，山鹿素行、由井正雪等兵法學者亦從事相關著述以推廣武道教育，無形中助長「軍談」在社會上流行的風氣。¹²³

至於以「軍談家」聞名，而非以「講談師」著稱者，則首推明治初年的軍談師寶井馬琴，他是明治初年至大正時代有名的講談師，約生於嘉永5年(1853)，父親琴凌在世時，擔任地方巡業的職務，故常與父親一同遊歷地方。17歲時父親過世後，寶琴受到西尾麟慶的照顧，並改名爲西尾慶豐、調窓。明治末年到大正時期，他的作品被評定爲「天下第一品」，成爲日本著名的「軍談家」，留有「國定忠次」、「東海白浪傳」等名作。¹²⁴

由上述「軍談」發展的過程觀察，「軍談」的形式與內容似乎極爲單純，但，爲何這些「軍談」到後來，會借用中國演義小說，作爲其書寫的題材呢？由於「軍談」與日本漢文小說的全盛時期，都是在日本的江戶時代，兩者有所重疊，所以「軍談」的生成與發展，如同日本漢文小說般，可置於整體漢文學影響的脈絡下探討：

江戶時期的漢文學，整體而言是以漢儒學及漢詩文為主，然而至中期，由於幕府統治政權已趨穩定，嚴密的封建制度牢固建立、地方都市工商發達、民生富庶繁榮，因而市井小民開始追求各種享樂，町人文化（平民文化）逐漸形成，以往儒者及漢詩人對社會的影響力與新興的國學者，小說創作者兩者之間有著並駕齊驅的趨勢。再加上第八代吉宗將軍緩和封閉性的鎖國政策，並且開放長崎作爲吸收唐土文化的門戶，漢籍大量由中國船舶輸入，其中並包括數量頗多的通俗小說，不但助長了日本模仿崇拜中國的文化，而且也促進了日本小說的創作，市民嗜讀小說的風氣日增，而閱讀小說亦成爲市民消閑解悶的娛樂方式之一。¹²⁵

¹²³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3-4。

¹²⁴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137。

¹²⁵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頁19。

李進益對於江戶時期漢文學發展的詳細論述，讓吾人得以了解漢文學在江戶時代的影響力，以及中國通俗小說的傳播力和娛樂性。依此文化背景，我們也可以說，較日本漢文小說更為貼近民眾、原本形式為講唱藝術的「軍談」，也得以基於大眾娛樂的需求而大肆發展，所以它的書寫題材，將會藉由中國通俗小說的傳入而另闢蹊徑，不會僅囿於只能講述日本南北朝時的分裂歷史，或是改寫戰國時期的戰記物語，此現象也是文學交混後的必然結果。¹²⁶

以中國家喻戶曉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為例，即是受到日本軍談喜好的歷史題材。自元祿 2 年（1689）開始，日本軍談開始採用中國演義作為內容，最早的就是根據《三國演義》為底本而著成的《通俗三國志》，而之所以取借《三國演義》是因為：

三國時代爭戰的地域，是我國（日本）的好幾倍，其中猛將勇卒輩出，跟我國的戰記類頗有相似之處，加上支那一流到處使用權謀術數，或是運用縱橫無盡的敘述筆法，使其爭戰雄大壯快，……讓讀者不禁血湧肉躍，拍案三歎。此書得到非常多的好評，遍及上下，三國時代以後，軍談書陸續出現，有標榜《三國志》的續編，或追溯至上代和後代，支那軍談由此陸續發行。¹²⁷

而關於取材自中國歷史的江戶時期軍談作品，根據明治 44 年（1911）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所重刊的《通俗二十一史》目錄，計有¹²⁸：

編號	書名	成書年代	編號	書名	成書年代
(一)	三國志	元祿二年	(二)	漢楚軍談	元祿三年
(三)	唐太宗軍談	元祿四年	(四)	西漢記事	元祿十二年
(五)	東漢紀事	元祿十二年	(六)	列國志前編（武王軍談）	元祿十六年
(七)	列國志後編（吳越軍談）	元祿十六年	(八)	續三國志	元祿十六年
(九)	唐玄宗軍	寶永元年	(十)	南北朝軍	寶永元年

¹²⁶ 這當然包括中國通小說在故事性、人物性格的刻畫、情節構成、藝術手法及對人情世態描繪的真實性與思想性等各方面都較為優秀，絕非同時代日本小說可比擬，因而造成大流行的原因有關。同上註，頁 20。

¹²⁷ 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 1 卷》，（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明治 44 年（1911）7 月 25 日），頁 5。

¹²⁸ 同上註，頁 6。

	談			談前編	
(十一)	南北朝軍 談後編	寶永二年	(十二)	五代史軍 談	寶永二年
(十三)	元明軍談	寶永二年	(十四)	續後三國 志	正德二年
(十五)	十二朝軍 談	正德二年	(十六)	續後三國 志後編	享保三年
(十七)	宋史軍談	享保四年	(十八)	兩國史	享保六年
(十九)	明清軍談	享保十年	(二〇)	陽煬帝外 史	寶曆十年
(二一)	宋元軍談	寬政十年			

以上各類軍談，十分明顯是受到中國歷史演義的影響而成的讀物。李進益指出中國通俗小說在日本流傳的盛況後，又進一步地以日文漢文小說為例，說明了：

日本文人在接觸到中國通俗小說「水滸」、「三國」、「肉蒲團」、「金瓶梅」等書，就被精彩的故事內容所吸引，而且有些作家還刻意模仿中國通俗小說的寫作方式，以今日所見，在十八世紀即有多種漢文小說出現，如岡島冠山的「太平記演義」及「和漢奇談」。其後以漢文寫作之模仿作品漸多，此種風潮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後期。¹²⁹

可見無論是日本漢文小說或是「軍談」的書寫，它們除了以日本歷史為題材外，由於中國通俗小說大量的引入，也會以此為取材來源，而造成今日「軍談」與中國演義小說密不可分的創作關係，中國通俗小說向外傳播的路徑因此形成，在與日本文化相結合後，成為勾勒東亞小說發展時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

經由本段落的描述與整理，可知「軍談」在日本文化上擁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和文學特性。透過史料的鋪陳與分析，可見「軍談」除具有講述日本歷史的內容外，亦以中國演義小說為範本，借鑑其題材，將中國文化轉移成日本文化，使兩方讀物保有密切相連的影響關係，並成功將中國通俗小說傳播到日本。那麼，深受中國通俗小說影響的日本的「軍談」、漢文小說，是否也能隨著日本對於臺灣的殖民統治而進入到臺灣文學的場域中？它們有哪些流傳到同時期的臺灣，其內容又再講述什麼？

¹²⁹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頁 74。

二、日本通俗讀物在日治臺灣的流傳：以「軍談」為例

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有不少形式近於中國演義的「軍談」由日本渡海而來，進入到臺灣文學的場域中。這些「軍談」所代表的，並不僅是「佔有空間、具有質量」的有形書籍，若是將其置於東亞漢學的脈絡觀察，這些自江戶時期就開始因中國小說引入日本、而逐漸在日本漢學中大放異采的「軍談」，以及其他通俗讀物在被引入臺灣時，呈現著什麼樣的面貌？

日本殖民下的臺灣，最著名且館藏最多的圖書館，非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莫屬¹³⁰；另外，中部的臺中州立圖書館也頗為重要。若檢視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即可發現在當時，有不少軍談、物語被引入臺灣，典藏於圖書館提供借閱，以下表格便可一窺當時情況：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日本軍談：¹³¹

大正六年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				
姓名	書名	出版者	出版年	卷數
石川核(校閱)	校訂通俗楚漢軍談	有朋堂文庫第二〇編ノ內	不詳	不詳
池田東籬(補)	校訂通俗吳越軍談三〇卷	帝國文庫第二〇編ノ內	不詳	不詳
湖南文山	通俗三國志	有朋堂文庫ノ內	明治 45 年	50 卷
湖南文山	校訂通俗三國志	帝國文庫第一一、一二編	明治 45 年	75 卷 15 版
《通俗二十一史》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編，明治 44、45 年共 12 卷				
李下散人	通俗十二朝軍談	帝國文庫第一八編ノ內	不詳	不詳
清地以立	通俗列國志・	帝國文庫第二	不詳	15 卷

¹³⁰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即為現今的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此館於大正 3 年（1914 年）4 月 14 日，由日本政府敕令第 62 號公布以「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為官制，11 月，在艋舺（萬華）清水祖師廟內設立臨時事務所，籌備開館事宜。大正 4 年（1915 年）6 月，首任館長隈本繁吉（1915-1916）遷館於臺灣總督府左後方（博愛路與寶慶路口，今博愛大樓）之舊彩票局內辦公，同年 8 月 9 日正式對外開放服務。民國 34 年（1945 年）原館全燬於戰火，臺灣光復，「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形式上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

¹³¹ 以下表格所見的軍談目錄，是由筆者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中所檢索而來。圖書館為了對館藏進行登錄與整理，除了有文獻保存上的功用外，亦能方便讀者資料的檢索與書籍借閱，所以前身為總督府圖書館的臺灣分館，每一年都會對館藏編目成冊，以便於能清楚掌握每一年館藏的增減。筆者於館內翻閱歷年各本圖書目錄後，發現大正六年、七年和十年的目錄所登錄的館藏軍談、通俗讀物等最為詳細，故以這三年為本文引證的範例。而臺中州立圖書館方面，則以大正十五年目錄所登載的通俗讀物最為詳細。至於本文所見之書籍，多數已在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東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尋得。此處「通俗」之意，山下一夫說是：「中國小說日文版」的意思。山下一夫，〈濟公傳在日本〉，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神魔入世：明清小說面面觀」學術座談會，2012 年 3 月 19 日。

夢梅軒章峰、 稱好軒徽庵	後編 校訂通俗楚漢 軍談	0 編ノ内		
稱好軒徽庵	通俗西漢紀事 通俗東漢紀事	第三卷	不詳	不詳
湖南文山	通俗三國志	第四、五卷	不詳	不詳
中村昂然 毛利貞齋	通俗續三國志 通俗戰國策	第六卷	不詳	不詳
尾田玄古	通俗續後三國 志	第七卷	不詳	不詳
長崎一鶚 煙水散人	通俗南北朝軍 談 通俗隋陽帝外 史	第八卷	不詳	不詳
夢梅軒章峰 中村昂然	通俗唐太宗軍 鑑 通俗唐玄宗軍 談	第九卷	不詳	不詳
毛利貞齋	通俗五代軍談	第十卷	不詳	不詳
入江若水 源忠孚 嶺田楓江	通俗兩國志 通俗宋元軍談 鴉片戰爭	第十一卷	不詳	不詳
岡島玉成 曾根俗虎譯	通俗元明軍談 通俗明清軍談 髮賊亂志	第十二卷	不詳	不詳
鈴成校	校定通俗明清 軍談	帝國文庫第一 八編ノ内	不詳	5 卷
清地以立	校定通俗列國 志（一名通俗 武王軍談）	帝國文庫第一 八編ノ内	不詳	首卷共 25 卷

這些由日本傳入臺灣的軍談，其寫作要旨與內容為何？以下將蒐集所得來的資料，進行內容大要的簡介，藉此顯現臺人對於日本軍談小說的接受情況。

（一）早稻田大學出版部：《通俗二十一史》

由日本輸入且最富盛名、數量最多的軍談，首推早稻田大學部於明治 44 年以江戶時代的刻本為底本，進行重釋、重校和重新刊刻的《通俗二十一史》。此套書有 12 卷、包含 21 個朝代，在每卷之前，除了附有江戶時期的撰述者說明書寫章旨和動機的自序外，早稻田大學編輯部亦有新刊的前言，表述重刊動機，或介紹凡例。另外在每本小說的書前還附有講述到某一朝代時，屬於那個朝代的世系表，讓讀者得以一目了然該朝代歷任帝王的事蹟，與該朝代演變的過程，甚至

還有當代著名人物的畫像，使其活靈活現的呈現在讀者眼前。由於通俗性／歷史性和學術性兼備，這些軍談不但在日本廣受歡迎，甚至也由日本流傳到當時的臺灣，而得以被採購進入圖書館供大眾閱讀。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幾本軍談在日本雖然不乏研究者探究¹³²，但就筆者所觀察，軍談小說受到重視的程度卻比不上日本近現代文學，而且就算是這些小說被歸於國文學研究，其價值卻往往被義理、詩詞研究所遮蔽。事實上，這些由江戶時期各個日本漢文人在參考中國史書、演義後所執筆、譯寫的軍談，能夠再次地被重刊，即代表它的可閱讀性及在文學上的價值。只是，還要探問的是，在殖民統治的脈絡下，這些書籍由日本漂洋渡海進入臺灣後，我們應當賦予這些亦漢亦和、既文學又歷史的書籍何種意義？由於這套書具有多元的特點，故推測它在各書店的販售名單上應是榜上有名，唯因筆者未見相關資料能夠作為佐證，目前僅能期待來日尋得新史料後再加以深究。在此將先以日治臺灣圖書館館藏目錄和所藏原件為主要論述依據，以此闡述時下臺灣人或在臺日人，可能閱讀到哪些由日本輸入臺灣的軍談類別。

1. 李下散人《通俗十二朝軍談》

《通俗十二朝軍談》為此套書的第一卷，成書於正德 2 年（西元 1712 年），作者「李下散人」不知為何人，僅知是作者故意隱藏身份的別號，所以序言曰：「先生不願顯其姓氏，號李下散人，因以此為敘。」¹³³其成書的時間，應是晚於後兩部《通俗武王軍談》和《通俗吳越軍談》，因為撰序者中西兵在閱讀《通俗武王軍談》和《通俗吳越軍談》後意猶未盡，而特別提到：

歷史之博、通鑑之精，其談何容易也哉？往年九月，浪華書肆敦賀某來先生之門曰：「前有《武王》、《吳越》之軍談，而鏤諸梓雖備諸士之閑覽，而似述其末以闕其本，故觀者不能無遺憾也，願為我作前編演義賜之則珍重？」¹³⁴

此段話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其一，《通俗十二朝軍談》成書時間晚於後兩部《通俗武王軍談》和《吳越軍談》，但它卻被置於首卷，乃是因為它所講述的時間點起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殷商滅亡，時代早於後兩部軍談所講述的時期，故將其置於首卷。其二，中西兵在閱讀後感到意猶未盡，故特以「演義」之名，來稱呼

¹³² 日本關於軍談的研究，以德田武的論著最具代表性。其《日本近世小説と中国小説》一書，對於中國通俗小説與日本軍談的關係，已有詳細的介紹。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説と中国小説》（東京：青裳堂書店，1992 年）。其他如德田武，〈中国講史小説と通俗軍談（上）、（下）〉，《文學》第 52 卷第 11 號（1984 年 11 月）。對於中國講史小説與日本軍談的承衍互文關係，亦有詳細論述。本文受限篇幅，無法針對軍談與其參考的中國講史小説或史書作細部的對比和分析。但主要的論證重點在於，當這些軍談被傳入臺灣後，臺灣閱讀者所閱讀到的內容為何，此處特就這些書籍的內容介紹多加著墨。

¹³³ 早稻田大學部重編，李下散人，《通俗十二朝軍談》，收於《通俗二十一史》，第 1 卷，頁 1。

¹³⁴ 同上註。

這一類的文學作品，卻沒有以「軍談」稱之，而是等到成書之後，標題才題名為「軍談」。由此點觀之，「軍談」與「演義」之名，雖然在中國、日本兩方運用名稱不一樣，但兩詞實乃同源，皆為講述歷史故事的別稱。而這樣的情況，造成日治時期的臺灣，既有中國的「演義」流行於閱讀界，亦有日本的「軍談」可供大眾閱讀，兩文體在臺灣合流，為臺灣的閱讀界增添了不少樂趣與新鮮感。

2. 清地以立《通俗列國志前編（又名《武王軍談》）》、《通俗列國志後編（又名《吳越軍談》）》：

此兩本軍談皆為清地以立所著，「清地以立」為何人？其生平事蹟暫無可考，依書前〈通俗列國志序〉，可知他為寶永時代的漢學者：

清地君肖柏主翁，自幼好學，魯典墳策，探討殆盡，予與翁，締方外交者多年，情好鄭重，音問不絕。一日以所譯之《列國志》若干軸相示焉，喜讀之，不啻譯《列國》，間又會左氏之蘊奧、太史之閭樞、風神矩矱，概而得其旨也。吁！微此翁，則甕牖之徒，奚至知六朝之存亡、夫有奈之具邪？厥功不為少焉？……寶永元年季龍舍甲申初冬之日，卓如文台題洛之陀峰下。¹³⁵

那麼，作者清地以立本人又是如何看待他半譯半寫的《通俗列國志》呢？《通俗列國志前編》共二十五卷，起自殷紂王七年，終至周景王二十五年，清地以立著此書，其志甚大，以效法中國古人著述《春秋》、《左傳》時的精神，對其著述寄予厚望：

春秋之為書也，當時史語而孔夫子筆削其義以定褒貶。自非富學之士不能達其旨。故左丘明氏因經而作傳大義明矣。然其數百年間，人物臧否、國勢強弱、併吞得失，又非幼學者所能盡知也。予幸得明邵氏之傳，今因之以述其義，間又參考《左傳》、《史記》、《戰國策》等譯之四十三卷，名曰《通俗列國志》。¹³⁶

由上述可知，作者清地以立對於中國史書典籍懷有深刻景仰之心，不但以之作爲其著述參考，又隱含自己所著之書能在日本發揮如上述漢籍般同樣的功效。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這些中國典籍東傳到日本後，對江戶時期的學者發揮莫大的影響力，而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學者的漢學知識養成後，這些小說竟然又由日本傳播到臺灣。於是經過日本漢學者反芻後的漢學素養，透過軍談小說的創作表現，又進一步傳達給臺灣讀者了解。至於《通俗列國志後編》（又名《吳越軍談》），按

¹³⁵早稻田大學部重編，清地以立，《通俗列國志前編》，收於《通俗二十一史》，第1卷》，頁1。

¹³⁶同上註。

新刊的〈例言〉所述，時間由殷紂王開始至秦統一天下，內容敘述越王勾踐於會稽山臥薪嘗膽，後於吳越戰爭中雪恥。在講述吳越爭霸外，亦同時述說戰國七雄的興亡過程。附言：「支那的軍談書到此時代開始進入佳境。」此書乃根據中國《春秋列國志》為底本改寫而來，「凡例」後的年代署為：「元祿癸未季春望」，清地以立自云：

後編十八卷，為《吳越軍談》，當時周室大衰，而吳越之鬪起，韓、趙、魏之三國并立，七雄相吞，終秦始皇伐六王而歸天下一統之事矣。¹³⁷

以上，可知小說內容大致梗概，此書乃仿史書筆法，將賢臣名士之事紀錄下來：「賢臣名士之傳，不能悉記者，於後重而詳之，所謂列傳曰者是也。」又說：「於春秋之諸傳及《史記》、《戰國策》等之說有差異則註之，而備考訂。」¹³⁸可見此軍談雖是趨近於演義類的讀物，但在資料的考證方面，著者和譯者其實都花了不少工夫。而值得再加補充的是，小說前頭所附的「周末秦六國年表」，以諸侯國和朝代為單位，紀錄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亦可成為日本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值得參考的資料。

3. 夢梅軒章峰、稱好軒徽庵《通俗漢楚軍談》；夢梅軒章峰《通俗唐太宗軍鑑》：

中國歷史上「楚漢爭霸」的題材亦為日本軍談所吸收，著者夢梅軒章峰在〈通俗漢楚軍談序〉中言：

嬴氏失鹿，群雄相追，漢高之起於豐沛，寬仁而懷眾、量才而能任，項羽之殘忍，印刑不予，撥墓弑君而失信於天下，宜哉？垓下之一敗，卒為漢見併也，實知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向使項羽能從范老之諫用韓彭陳英之徒，漢高豈得開四百年之基乎？間東道逸士，就予求記漢楚興亡之事，故考諸史小說，著通俗漢楚軍談十五卷以貽之。元祿庚午仲春。¹³⁹

短短幾句，實已勾勒出整個「楚漢爭霸」時的面貌，有趣的是，作者著此書的原因，竟是因為友人對此段時期的歷史感到有趣，而趨使作者夢梅軒章峰參考相關的中國通俗小說著成此軍談。

不過，夢梅軒章峰雖計畫以十五卷述此歷史，卻在書寫於第七卷時過世，徒留未完成的遺憾。所以其弟稱好軒徽庵決定繼兄之志，將十五卷的《通俗漢楚軍談》完成：

¹³⁷清地以立，《通俗列國志後編》，收於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2卷》，頁2。

¹³⁸同上註。

¹³⁹ 夢梅軒章峰、稱好軒徽庵，《通俗漢楚軍談》，收於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2卷》，頁1。

自古諸史百家之書行於天下者，雖不知其幾千萬卷而非幼學俗流之所可得而讀焉，故近世往往多以和文而述之者矣。東道有一士，曾與予亡兄章峰為友，一日來訪之次，求記漢楚興亡之事，章峰辭而不肯，士請之益堅矣。於是不得已，而將著此書十五卷也，及成七卷成不幸而章峰罹疾卒，其後士又攜之來求予續貂尾、予素才微而且多疾病，再辭三讓而不許。嗚呼！妄言俚語，真雖不足發明玄旨，而繼亡兄之志，終其篇數，以塞士之責，元祿甲戌暮春望，京南徽菴謹跋。¹⁴⁰

至於夢梅軒章峰、稱好軒徽庵兄弟兩人的詳細生平，由於史料的缺乏，暫不可考。學者如德田武等人，也未將此二者的生平作仔細的介紹，而僅言及兩兄弟在《通俗漢楚軍談》中自行翻譯的部份，與原參照本中的俚俗之語有所差異。¹⁴¹二人的生平不可考，實為憾事。

附帶一提，夢梅軒章峰另著有《通俗唐太宗軍鑑》，以唐初李淵晉陽起兵談起，並述唐太宗如何開創「貞觀之治」，並讚其：「君臣相得，治道益著。德化之隆，有古今逾之者鮮矣。」¹⁴²作者想要以唐朝盛世來警惕當下的用意是很清楚的。

4. 稱好軒徽庵，《通俗西漢記事》、《通俗東漢紀事》：

稱好軒徽庵除了協助夢梅軒章峰完成《通俗漢楚軍談》外，自己也譯著了兩本軍談，分別是《通俗西漢記事》與《通俗東漢紀事》。此二部書以中國歷史上的西漢和東漢為主，由漢高祖劉邦滅秦創漢業談起，一直講到東漢光武帝劉秀復興漢室。早稻田編輯部在「例言」中表示，稱好軒徽庵在寫作之時，很多內容參考自中國的《兩漢紀事》，為一部接續《漢楚軍談》之作，對於日本讀者了解兩漢的興衰過程頗有助益。

5. 湖南文山《通俗三國志》：

在廿十一史軍談中，最受到日本讀者歡迎的，首推《通俗三國志》。按「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的說法，這一系列的軍談叢書中，最早成書的是《通俗三國志》。而它在藝術上的價值，也是各軍談之首。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由東漢第十一代靈帝開始一直到西晉武帝太康年間、東吳亡國、天下一統後結束。日本的《通俗三國志》軍談主要參考了中國的《三國志演義》¹⁴³、陳壽所著《三國志》¹⁴⁴，然後

¹⁴⁰ 同上註，頁1。

¹⁴¹ 德田武，〈中國講史小說と通俗軍談（上）-讀本前史-〉，頁87-88。

¹⁴² 夢梅軒章峰撰，《通俗唐太宗軍鑑》，收於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2卷，頁61。

¹⁴³ 特別注明此書是「歷史小說」。湖南文山，《通俗三國志》，收於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4卷》，頁2。

將兩者加以取捨、潤飾而成。所以特別強調：「書中的事實皆以正史判斷，大事件的成敗變化、大人物的正邪忠奸，也與正史一致。」所以是與正史相為表裡的書籍。但此說卻有疑問，因為若細究「目錄」，即可知不應是正史範圍的情節如「草船借箭」、「棒打黃蓋」等情節仍出現在書中。作者與「編輯部」之意，應是指大原則、大方向無違背正史，但為吸引讀者注意，本質上仍與《三國志演義》較為接近。

日人對於《三國志演義》的喜好，也可由對《三國志演義》的推崇看出，本書「例言」特云：

在一百二十年間，猛勇將士輩出、前後無以類比，其爭鬪地域的廣大，亦是本邦全地域的幾倍大。所以其戰爭場面雄大而壯快。《通俗三國志》其史實角色豐富、具有詩的趣味，且敘述流麗快活。…其記事雄大壯快，讀者每思及此，拍案三歎……《通俗三國志》風靡於當時讀書界。¹⁴⁵

正因如此，《通俗三國志》不但是廣受大眾歡迎的讀物，它甚至影響同表中久保天隨注譯的《新譯演義三國志》，又在數年後影響日本著名大眾作家吉川英治的《三國志》。¹⁴⁶

6. 中村昂然《通俗續三國志》、《通俗唐玄宗軍鑑》；尾田玄古《通俗續後三國志前後兩篇》；毛利貞齋《通俗戰國策》和《通俗五代軍談》：

《通俗三國志》後，繼之而起的是中村昂然所譯注的《通俗續三國志》，此書由中國西晉武皇帝即位時談起，於始孝懷皇帝永嘉二年結束。最先由中村昂然所著，而後又交由尾田玄古（即馬場信武）加以校定。¹⁴⁷中村昂然另撰有《通俗唐玄宗軍鑑》，以唐玄宗時代開元、天寶年間之事為題材，敘述唐玄宗如何中興唐室，以及他與楊貴妃和「安史之亂」的故事，作者之意在於：「採之於唐書，質之於通鑑，其餘在人口搜之於野史，玄宗仁虐、官僚忠邪、政事得失、遊觀淫佚，無不具載焉，五十年太平天子，歷乎如在目矣。」¹⁴⁸

附帶一提的是，《通俗三國志》的校定者尾田玄古，其生卒年不詳，但身份為江戶時期的京都大儒，並身兼醫師，此點由玄古在「自序」之後自署為「洛下

¹⁴⁴ 特別注明此書為「正史」。同上註。

¹⁴⁵ 同上註，頁 1-2。

¹⁴⁶ 尾崎秀樹在談論吉川英治的生平及其文學成就時，特別提及久保天隨的《新編演義三國志》對自己和吉川英治都有深遠的影響。尾崎秀樹，《吉川英治 人と文學》（東京：新有堂，昭和 55 年 7 月 15 日），頁 123-124。而久保天隨會編譯《三國演義》，又是受到湖南文山的影響。

¹⁴⁷ 中村昂然，《通俗續三國志》，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 6 卷。

¹⁴⁸ 中村昂然，《通俗唐太宗軍鑑》，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 9 卷。頁 1。

儒醫」可知。¹⁴⁹後玄古改名為馬場信武，號梅翁軒。玄古擅長易學、兵學、天文指南和五經圖解、周易等，另在「通俗二十一史」系列中，著有《通俗續後三國志前後兩編》，共 58 卷。《通俗續後三國志前後編》主要講述西晉惠帝以後的歷史事件，例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而後晉室東遷南渡，敘祖逖、王導、王敦、溫嶠、陶侃等事。玄古之子馬場信義襲父之業，亦通和漢之書，著有《源氏一統志》，並著有其他軍紀。¹⁵⁰

至於毛利貞齋，生卒年不詳，為江戶時代著名大儒，名瑚珀，字虛白，通稱香之進，毛利居於京都，以教授漢學為業，講授內容包括《四書俚諺鈔》、《莊子口義大成俚諺鈔》、《蒙求俚諺鈔》等，又講授與中國歷史有關的題材，例如《通俗戰國策》、《通俗五代軍談》，其學風篤實敦厚。《通俗戰國策》雖只是作為《通俗續三國志》的附錄附在其後，沒有依照朝代先後順序排列，為二十一史中的特例。但此書為讀者介紹策士說客的事蹟，並不拘泥以往軍談書寫的主題內容，較其他軍談也有所不同。¹⁵¹《通俗五代軍談》由唐中晚期「安史之亂」、「黃巢之亂」講起，陳述了唐亡後五代政權的興衰與更替。¹⁵²

7. 長崎一鶚，《通俗南北朝軍談前編》、煙水散人，《通俗隋煬帝外史》：

《通俗南北朝軍談前後編》是作者長崎一鶚根據中國通俗小說《梁武帝演義》撰述而來，內容講述三國以來世事的變遷，以及南北朝興衰、對抗的歷史，並以隋朝開國、覆亡和李淵建國開唐三百年基業為完結。¹⁵³自號「文坡山人」的菊丘江匡弼在「敘言」時指出：

向有南北朝軍談併北魏南梁軍談而行于世矣。都是枚舉梁武一代之事業，其譯文雖駁雜，亦是稽古之俾益耳，惜哉先罹池魚災而滅其彫梓久矣，於茲剗廁氏謀再梓于不佞，且求刊補舊梓之陋焉。短才筆削之，如加霜於雪上，拒辭勢不獲止，故略雖刪補，尚舊梓之面皮耳，其南北朝也，北魏南梁也，異號一貫之書也，合雖為一部可焉，依舊為兩部也，前篇南北朝軍談十五卷，後篇北魏南梁軍談廿三卷，都合則三十八冊也，分之而以傳之世也，覽者詳之焉。¹⁵⁴

可知撰寫《南北朝軍談》的動機，乃在彌補這段因災禍而失去的歷史，以

¹⁴⁹中村昂然，《通俗續三國志》，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 6 卷》，頁 2。

¹⁵⁰尾田玄古，《通俗續後三國志前後編》，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 7 卷》，頁 4。

¹⁵¹中村昂然，《通俗續三國志》，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 6 卷》，頁 4-5。

¹⁵²毛利貞齋，《通俗五代軍談》，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 10 卷》，頁 1-2。

¹⁵³長崎一鶚，《通俗南北朝軍談前編》，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八卷》，頁 6。

¹⁵⁴同上註，頁 1。

得「興亡政教」、「萬代經綸」的教訓。¹⁵⁵

同冊「煙水散人」所著《通俗隋煬帝外史》，則是參考正史與野史，綜合改寫而成，作者在「序言」中特別言及：

此書本於隋煬帝紀，間以當時野史牌乘、敷衍而潤飾之，則煬帝一代奢侈荒淫之態，……亡國喪身之具，下愚之至下者，則此斯為甚焉，覽者欲不自戒而可得乎？苟因以推而類之，名教之所係，風化之所資，世態之所遷、人情之所趨，思過半者，亦有在焉。箴之坐右以警，旦暮未必為不可。¹⁵⁶

由此可見，該書著述的最大目的，即欲以煬帝無道荒淫，做為警惕世人之用，跟前幾部軍談比起來，它有大部份的比例是挪用稗官野史，而未引證正史著述成為參考資料，這雖然造成它在講述史實方面的減少，不過娛樂與教化的意圖，卻未有絲毫改變。

8. 尾陽舍松下氏《通俗宋史軍談》：

成書於享保己亥年間的《宋史軍談》，作者「尾陽舍松下氏」未知何人，僅知其成書動機，乃是有感於史書中有《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所謂：「一代肇興也，必有一代之史。」因而感嘆：「而但未有宋朝開國之事蹟也。」以為：

今應于書林之需，倣于前人之術，而顯宋朝軍談，以備慰覽。尚且前集有殘唐軍談，而未鐫梓，覽者熟讀於此書，而後閱於殘唐軍談，唐宋之治亂得失，朗然得云爾。¹⁵⁷

由以上可知《通俗宋史軍談》的成書，堪稱補足了《五代軍談》或是殘唐時的歷史，具備接續的功用。

9. 入江若水《通俗兩國志》；源忠孚《通俗宋元軍談》；嶺田楓江《鴉片戰爭》：

此三本軍談皆合為第 11 卷，《通俗兩國志》的作者入江若水，生卒年不詳，又號櫟谷山人，其出身為攝津富田的酒造家，曾授業於漢學家島山芝軒的門下，並到四方遊學，以詩聞名於當時，後居於京都，與朋友互以詩文唱和。《通俗兩

¹⁵⁵ 同上註，頁 2。

¹⁵⁶ 煙水散人，小說研究者如石川渝、胡萬川、徐志平等人皆考證其人為清朝浙江嘉興人徐震。可參考石昌渝等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頁 317。這裡的《通俗隋煬帝外史序》標明為「烟水散人」所著，但亦有標訓譯者為日本人「贅世子」，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八卷》，頁 1、124。

¹⁵⁷ 尾陽舍松下氏，《通俗宋史軍談》，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

國志》中的兩國，指的是偏安於杭州的南宋，以及佔領北方的金國，全書由「靖康之難」談起，細述宋王朝如何南遷建國，描寫李綱、岳飛等人抵抗外敵的忠義事蹟，另也談及秦檜等主和派奸臣如何與岳飛等主戰派作對，進而害死岳飛等事。

158

《通俗宋元軍談》，小說時間自宋理宗開始，述及南宋末年奸臣如賈似道等當道、蒙古滅金、元又滅南宋統一中國的過程，並特別記述元世祖時如何對朝鮮、安南、暹羅等國進行征伐，最終在進攻日本時遭遇神風而大敗。本書作者源忠孚，日本尾張人，寬政年間參考中國正史而對本書進行譯寫，但其生平事蹟不詳。¹⁵⁹

又，三部書中最特別的，莫過於最後的《鴉片戰志》，內容是以清道光年間林則徐廣東禁鴉片，卻招致英國以此為藉口興起「鴉片戰爭」的始末，此後，開啓晚清中國數百年來的喪權辱國史。整套軍談至此，已不再受限於古代的演義類型，而時間已擴展到對近代歷史的描述。《鴉片戰志》的作者嶺田氏生平不詳，但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稱作者著此書時，參考不少資料如《海外新話拾遺記》，以及其他如《夷匪犯疆錄》、《侵犯事略》等著作。¹⁶⁰

10. 岡島玉成《通俗元明軍談》、《通俗明清軍談》；曾根俊虎《髮賊亂志》：

《通俗元明軍談》就是由中國演義小說《大明英烈傳》改編而來，由元末順帝好酒色、昏庸談起，天下群雄併起抗元，其中又以起兵於濠州的朱元璋最得人心，在群雄割據中脫穎而出，接連擊敗陳友諒、張士誠後，終於將元軍趕回蒙古，創建明朝。《通俗明清軍談》則講述明末天下大亂，流寇四起、清軍進逼，吳三桂等開關降清，終於導致明朝的亡國，而後忠義之士如鄭成功等號召反清復明。「序言」本指作者不詳，但應亦是岡島玉成所著。¹⁶¹

本書作者岡島玉成，為江戶時期著名漢學家，原名璞彌太郎，又稱冠山，號玉成，長崎人，時任萩侯足利侯，在京坂講述性理之學，且與大儒荻生徂徠相善。岡島本人精通中國俗語，又著有《通俗水滸傳》、《通俗元明軍談》和《通俗明清軍談》等書，李進益則認為岡島還著有《太平記演義》、《和漢奇談》等，並讚岡島有直接閱讀中國通俗小說的能力，故其模仿能力極高。¹⁶²岡島於享保 13 年正

¹⁵⁸ 入江若水，《通俗兩國志》，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十一卷》，頁 1。

¹⁵⁹ 源忠孚，《通俗宋元軍談》，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十一卷》，頁 3-6。

¹⁶⁰ 嶺田楓江，《鴉片戰爭》，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十一卷》，頁 6-7。

¹⁶¹ 岡島玉成，《通俗元明軍談》、《通俗明清軍談》，早稻田大學部編，《通俗二十一史·第十二卷》，頁 1-2。

¹⁶²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頁 74-75。

月過世，享年 55 歲。¹⁶³

《髮賊亂志》一開始，作者曾根俊虎就以此書提醒日本民眾戒慎恐懼，因為：

方今文教日新，交際月盛，苟不詳海外萬國之情勢，則有不能謀本邦之事者，往往譯歐米各國之書，而滿清之書傳于我國反夥，故有志者恐有知彼國近時之情勢也……嗚呼，清之與本邦為唇齒、為輔車，固不當以秦越視之也已。¹⁶⁴

此語提醒日本民眾當以鄰國為借鏡，避免不知世界現況或鄰近國家中國的情勢，而成為井底之蛙。關於《髮賊亂志》乃是參考《清史攬要》、《元明清史略》等書，並以清代最大的內亂「太平天國」作為全書的描述內容，述及清軍如何與英、法等外援聯合，共同剿除「太平天國」的過程。

以上即是明治 44 年間，早稻田大學部重新刊行的「通俗二十一史」，而這些江戶時期著述而成的軍談，重新被當代民眾所閱讀，且在由過去到現代的時空轉換中，這些軍談的內容，以及著述的用意，都被保存了下來。那麼，當這些軍談隨著殖民統治進入臺灣後，它在殖民語境下的文化意義究竟如何？將更值得吾人探究。

三、「軍談」外的其他通俗讀物

除了眾多軍談於日治時期輸入臺灣外，還有不少其他非軍談的通俗讀物，也被臺灣閱讀者所閱讀，如下表所示：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譯寫自中國的日本通俗讀物：¹⁶⁵

大正六年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				
姓名	書名	出版者	出版年	卷數
武笠三(校閱)	繪本西遊記	有朋堂文庫ノ 內	大正 2 年	40 卷
不詳	西遊記	續國民文庫水 滸傳第三附錄	不詳	不詳
曲亭馬琴、高 井蘭山譯	水滸傳	續國民文庫ノ 內	大正元年 2 月	90 卷

¹⁶³岡島玉成，《通俗元明軍談》、《通俗明清軍談》，頁 2-3。

¹⁶⁴曾根俊虎，《髮賊亂志》，早稻田大學部編，《通俗二十一史》，頁 1。作者曾根俊虎為米澤人，後隨同西鄉隆盛推行維新運動，期間曾任外務卿副島種臣的全權大使前往中國，並視察中國地理形勢，著作有《清國近世亂誌》、《北支那紀行》、《滿洲紀行》等書，於明治 43 年去世。

¹⁶⁵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圖書目錄。

鈴木悅	水滸傳物語	世界名著物語 第一 0 編	大正 4 年	不詳
久保天隨譯	新譯水滸全傳	新譯漢文叢書 第九、一 0 編	大正 4、5 年	2 版
久保天隨譯	新譯演義三國 志	新譯漢文叢書 第一二編	大正元年	不詳
三木愛花、田 中從吾軒譯	校訂續水滸傳	續帝國文庫第 二五編	不詳	再版
雲間子翻刻	草木春秋演義	含秀居叢書ノ 內	大正 5 年	不詳
山東京山等 譯、歌川國芳 畫	稗史水滸傳	家庭繪本文庫 ノ內	不詳	不詳
夷秋散人編	平山冷燕		不詳	8 卷 ¹⁶⁶
局外史譯	支那小說李公 子		明治 28 年	不詳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圖書目錄第 30 號				
伊藤銀月	新譯水滸傳		大正 7 年	再版

日治時期臺中州立圖書館館藏譯寫自中國的日本通俗讀物：

臺中州立圖書館圖書目錄第一號 大正十五年一月				
大町桂月	水滸傳物語	不詳	不詳	大正 14 年 3 月
柴田天馬	全譯聊齋志異 卷一	不詳	不詳	
□川玄耳	支那大盜傳	不詳	不詳	不詳
米田祐太郎	西太后、楊貴 妃外三篇	不詳	不詳	不詳
支那文獻刊行 會	支那情豔祕錄	不詳	不詳	不詳
幸田露伴、平 岡龍城	紅樓夢（上、 中、下）	不詳	不詳	不詳
幸田露伴	水滸傳（上、 中、下）	不詳	不詳	不詳
宮原平民	燕子箋	不詳	不詳	不詳
平岡龍城	標訓註譯水滸 傳	不詳	大正 4 年	前自第 1 至第 8 卷、後自第 9 至第 15 卷

¹⁶⁶ 在表格內的各本小說中，《平山冷燕》並非由日本文人譯注而入表。此本《平山冷燕》是以完全漢文的身份，與其他本小說混於書目中。關於這本小說的作者「夷秋散人」，或被疑為「天花藏主人」。詳細作者與版本介紹，可參考朱一玄等人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7 月），頁 711-712。

上述小說中以《草木春秋演義》輸入臺灣的過程較為特別。此書署名「雲間子」所著，又名《草木新本牡丹亭》，全書五卷三十二回。小說敘述漢代仁君劉奴為帝時，長安總督金石斛女金銀花，往宣州海金寺還願時，遭遇大盜天竺黃而被擄走，金石斛為救女兒，發兵剿之。天竺黃逃走後，前去番邦協助番王巴豆大黃來犯，前後三次掀起戰事，漢王於是以金石斛為帥，又迎決明子為軍師，並以金櫻子為先鋒，在戰場上射殺了天竺黃，收復失地，又破番僧妖法，最終讓番王知難而投降，於是天下恢復太平。¹⁶⁷高洪鈞認為此部小說：

是一部題材別致的長篇靈怪小說，作者用擬人化的寓言手法，按中草藥的藥性特徵及配伍關係，鋪染成“漢天子”與“番邦胡椒國主”之間的種種鬥爭故事，百草入書，成一種童話式的“歷史演義”。語言乾淨俐落，情節起伏宕跌，且涉筆成趣，意在為“草木”寫“春秋”，帶有“科普讀物”色彩。¹⁶⁸

關於《草木春秋演義》之刊本甚多，研究者指出「博古堂」版在中國社科院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山東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都有收藏。「最樂堂」版則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燕京學社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¹⁶⁹但，以上卻都忽略了在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亦藏有《草木春秋演義》。

東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草木春秋演義》，和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的皆是「最樂堂」發梓的版本，由此推測，此時由日本傳入臺灣的《草木春秋演義》，最有可能是此版本。¹⁷⁰細究此本《草木春秋演義》的印刷地與刊行地，可知其為「含秀居叢書」中的一冊，而出版者則為「支那珍籍頒布會」。在書的扉頁中，則標注其刊行日期為「大正五年春，於滿洲大連排印鉛字代謄寫以頒之。」印刷所則是：「株式會社滿洲日日新聞社印刷。」¹⁷¹所以，這本《草木春秋演義》不但在中國滿洲一地重刊後輸入日本，更以日本為中繼站，進而輸入臺灣。雖然目前僅見《草木春秋演義》一部，但「支那珍籍頒佈會」的功用為何？其在東亞文學的發展脈絡中可能具有何種角色？是否還有更多的小說如同《草木春秋演義》般，透過這種殖民文化統合的方式進入臺灣？此傳播方式又有何意義？以上都將是日後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¹⁶⁷同上註，頁 802。

¹⁶⁸同上註。

¹⁶⁹石昌渝等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頁 25。

¹⁷⁰（清）江洪撰、（清）樂山人纂修，《草木春秋演義 三十二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最樂堂刊本）。

¹⁷¹駟溪雲間子編，《草木春秋演義》（株式會社滿洲日日新聞社印刷，大正 5 年）。

另外，其他至今尚可得見的小說，還有由平岡龍城所注譯、「近世漢文學會」珍藏的《標註訓譯水滸傳》，此書亦受時人歡迎，朝比奈知泉即在小說「序言」表示對此書的喜好：

予不解時文，如《水滸》一書，纔由譯本讀之，其闖毆擊刺、拳飛劍躍，乍而水火、乍而雷霆，變幻出沒，殆無窮極，是以予童時所誦覽，夢寐且不能遺。金聖嘆稱為天下第一奇書，宜矣。¹⁷²

若非平岡龍城翻譯了《水滸傳》給日本閱讀者閱讀，大概有很多人無法一償宿願地閱讀到精采的《水滸傳》。還有像是武笠三所編譯的《水滸畫傳》，主要參考的是百回本《水滸傳》，和曲亭馬琴、高井蘭山的《水滸傳》、鳥山石燕的《水滸畫潛覽》和岡島玉成的《忠義水滸傳》。本書的特點在於插畫以北齋為一老人的浮世繪插畫為輔，武笠三並讚其：「畫圖精妙。」¹⁷³

艷情小說部份，以米田祐太郎一系列的作品最為有趣，米田氏著《支那艷情小說集》，收錄了如〈情中奇〉、〈花柳情〉、〈夢中五美緣〉、〈儒村外史〉、〈鴛鴦夢〉，以及節錄《紅樓夢》的部份情節，他還簡介各篇小說的內容；¹⁷⁴其中，《西太后 楊貴妃》以及附錄三篇〈王昭君〉、〈貂蟬〉、〈西施〉，是以清末慈禧太后和唐楊貴妃的傳紀為底本，所改寫而成的小說。對於這些中國歷代奇女子，有浪漫、唯美卻又儘量不違史實的描寫，讓讀者閱讀時充滿趣味，又能藉由小說描述的幻想，獲得情慾的釋放。¹⁷⁵ 除此之外，澁川玄耳的《支那大盜傳》，此書漢字名雖以「大盜」稱之，但內容卻是以描述中國思想派別「法家」為主，分述成員管子、商子、韓非子、李斯等，為通俗小說中較特別的題材。¹⁷⁶

介紹了通俗小說的創作之後，有關中國通俗小說的注譯方面，則以曾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的鹽谷溫著力最多。他所注譯的小說，當時也被日治時期的臺灣人所閱讀，如下表所示：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圖書目錄大正十年一月第 58 號			
鹽谷溫	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搜神記、搜神後記、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李林甫外傳、李祕傳、東城老父傳、高力士傳、梅妃傳、楊太真外傳、長恨歌傳、本事詩、劍俠傳、虬髯客	國譯漢文大成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

¹⁷²平岡龍城譯，《標註訓譯水滸傳》（近世漢文學會藏版）。

¹⁷³武笠三，《水滸畫傳》（東京：有朋堂文庫，昭和2年7月13日），頁1-2。

¹⁷⁴米田祐太郎譯，《支那艷情小說集》（東京：支那文獻刊行會）。

¹⁷⁵米田祐太郎，《西太后、楊貴妃 他三篇》（東京：支那文獻刊行會，昭和3年2月29日）。

¹⁷⁶澁川玄耳，《支那大盜傳》（東京：白永社。）

	傳、馮燕傳、紅線傳、劉無雙傳、謝小娥傳、霍小玉傳、李娃傳、會真記、章臺柳傳、楊娼傳、杜秋傳、揚州夢記、杜子春傳、南柯記、枕中記、冤債志、非烟傳、離魂記、再生記、周秦行記、神女傳、妙女傳、尸媚傳、奇鬼傳、才鬼記、續鬼志、柳毅傳、龍女傳、人虎傳、白猿傳、袁氏傳、任氏傳、獵狐記		
--	--	--	--

學有專精的鹽谷溫對於中國小說與戲曲，有極高的熱愛。他在《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一書中，特以小說與戲曲為例，指陳兩者的重要性：

昨夏東京文科大學開第一回夏季公開講演，余膺薦演述中國文學概論。雄辯會主野間君與余有舊，請以這筆記付印。余雖欣然應諾，但本不過是僅僅六回的演說，到底不足直以之問世。於是修正增補一年有半，要在主要地敘述戲曲小說底發展，欲以此補我中國文學界底缺陷。……迴顧往昔在大學的時候，侍槐南森博士底講席，受詞曲之學，及其後遊學禹域，從葉煥彬先生究元曲底底蘊。歸國後雖專致力於斯，……他年積鑽研之功，升小說戲曲之堂，兼入詩賦文章之室，博通其精，深究其奧，完成中國文學概論。¹⁷⁷

其實小說、戲曲外，對於唐傳奇，鹽谷氏更是情有獨鍾，從上列圖書目錄表可知，唐傳奇在鹽谷氏的譯寫中佔了多數，因為他認為小說到唐傳奇，已經發展到一個極盛的階段：

小說也與一般文學底發達一起至唐代而達於絢爛之域了。從前的漢晉小說不是神仙談就是宮闈底情話，而且不過是斷片的逸話奇聞，唐代底小說雖是短篇，然是關於一人一事的聯絡。加之作者多是如元稹、陳鴻、楊巨源、白行簡、段成式、韓偓等顯著的才人。其中自然也有出於假託的，但也因為是下第不遇的秀才輩，藉仙俠豔情以吐露其無聊與不平的感慨，所以事既新奇，情復悽惋，文又典麗而富於風韻，真有一唱三嘆的妙味。……然而總之不過是文人之業餘，酒後茶前的助談，卻非說大真理垂大教訓的東西。無論怎樣，既非如李杜之詩一樣，或是韓柳之文一樣，使唐代底文學置重於後世，也並非是如水滸、西廂那樣的雄篇傑

¹⁷⁷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弁會，大正8年（1919）5月），頁1。中文譯文參考孫良工翻譯版本，參見鹽谷溫著、孫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民國59年），頁1-2。

作。真的中國小說定要算是到元以後纔發生。¹⁷⁸

鹽谷溫除肯定唐傳奇的價值，對於《水滸》、《西廂》也給予讚賞。表中所列之小說，可見《水滸傳》是中、日、臺三地皆喜好的文學作品，所以《水滸傳》既有由上海被代銷入臺灣的情況，同時又有在日本被創作和注譯的《水滸傳》經由日本而輸入臺灣的現象。

這些日治時期以單行本方式刊出、被保存在圖書館中讓臺灣民眾，或是在臺日人所閱讀到的「軍談」、「通俗小說」，如同上海圖書代銷進入臺灣般，這些典藏在圖書館中的作品，應該也會成為日治時期臺灣閱讀者的讀物之一。由於缺乏借閱數據資料的佐證，我們無從得知它們被閱讀的比例到底高不高？但至少臺灣讀者是有機會去接觸它們。可以深思的是，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由宗主國日本出口書籍到臺灣應是理所當然的傳播現象。這些早在江戶時期就已經刊行的軍談或小說，在歷經明治維新的長時間後，還會被早稻田大學編輯部所重刊，代表這些軍談和小說如同中國演義般，無論是在哪個時代，都存在於閱讀市場中。日治時期的臺灣閱讀者，就這樣在閱讀這些軍談書籍和日本通俗讀物中，去認識帶有大和風格的中國歷史，並與中國演義相互交織，進而成為殖民地臺灣特殊的閱讀現象。

小結

本章由圖書跨界流動的角度出發，輔以各項史料，論述上海相關圖書對臺代銷，以及臺灣對日本小說書籍的接受情況。本章認為，書籍的傳播與接受，不但是文學社會學的一環，亦是論證日治臺灣通俗圖書市場融合各方文化的例證。在本章中首先說明，同時期的中國上海，由於書肆的繁盛與集中，吸引不少臺灣文人前往上海訪書，或是為了經營書局，於是由上海輸入不同種類的書籍進入臺灣。這個訪書和代銷的過程，證明雖然處在日治時期，臺灣與中國的交流，不但沒有斷絕，甚至頗為頻繁。因此，除了連雅堂等人外，素有「北臺大儒」美稱的張純甫，其訪書足跡也踏遍北京和上海，其中又以上海為最。由於張氏具有藏書者／書局經營者的雙重角色，他對於書籍的收藏和代銷，成為兩方書籍如何流通、文人如何藉由藏書保存、緬懷漢文化的最好例證，並由此彰顯了時下臺灣傳統文人在殖民統治下追憶過往的心靈世界。

其次，有鑑於「蘭記圖書部」在日治臺灣圖書文化上的重要性，本文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並以「蘭記」目前所遺留可見的〈圖書目錄〉為基礎，開始追溯其所代銷的小說來源。其來源亦以上海為主，但若以上海各書局所存的〈圖書目錄〉為例，可知「蘭記」所販售的小說，與上海「廣益書局」和「會文堂」有較多的代銷關係，而會「蘭記」大量代銷上海所印製的小說，這是因為上海以石印技術大量印刷小說，造成小說價格低廉，因此而得以傾銷進入臺灣，如此一

¹⁷⁸同上註，頁 352-353。

來，業者可以節省不少印製成本，在滿足臺灣讀者的閱讀取向外，又得以藉由小說書籍的販賣獲致利潤。

除此之外，本文第三節討論了日本的軍談和其他通俗讀物，其實也是日治臺灣讀者的閱讀選項之一。軍談為講談的分支，但其性質又趨近於中國演義，故日治時期進入臺灣的《通俗二十一史》，其每部軍談的內容與特點，都值得吾人重視。本文雖無法對每部軍談與其相對應的中國演義作細部的比較，但至少能證明這些軍談和其他通俗讀物在日本漢文化上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是日本民眾所喜愛的書籍。由於殖民統治的關係，這些書籍得以進入臺灣，和中國而來的小說，共同交織出臺灣漢文通俗市場繁盛的面貌。





第四章、來自中國：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傳統的繼承

在敘述了臺灣對中國上海、日本兩地通俗小說書籍的接受情形之後，以下將進入小說文本的探討，首先將由中國通俗小說對臺灣通俗小說的影響開始，闡述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敘事手法、情節內容上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模仿與再造。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其璀璨的文化與文學向外影響到鄰近各地，是影響東亞文學脈絡甚深的文學傳播過程。¹臺灣與中國一水之隔，在歷史上與中國交織著複雜的統治情結，故臺灣文學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並轉而吸納中國文學的因子成爲己身一部份，實是必然現象。中國通俗小說的進入，其小說敘事手法、情節內容和忠孝節義的啓發，連帶地也影響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書寫。是故，討論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結構、書寫題材，很難與中國通俗小說的傳統切割。²因此本章所要探討的是，中國和臺灣的相互影響關係，是怎樣透過文人閱讀經驗與書寫習性後加以連結？而中國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與情節內容，又是如何成爲臺灣小說創作手法、情節鋪陳或是政治隱喻的模仿對象？期望藉由上述問題的層層挖掘彰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豐富性。

第一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敘事模式的承衍

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演義」傳統

何謂「演義」？「演義」是否能被視爲中國通俗小說的一環？明代學者胡應麟(1551-1602)把小說分爲六類，即：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但這六類之中，卻不包括後世耳熟能詳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小說，可見在胡應麟的標準中，這些從說話演變過來的通俗作品，不在他所認爲的「小說」範疇中。³但，胡氏雖未將這些作品視爲「小說」，但刻意列爲一類後褒貶半參的結果，卻反而突出「演義」的特殊性。⁴但，較爲前期的文人郎瑛(1487-1573)則在《七修類稿》卷二十二〈小說〉條中將此類具有說話性質的「演義」納入小說的範疇中，認爲其不但爲「小說」的一部份，且具有文學上的價值。⁵由上述

¹ 相關研究可參考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7月)、王平主編，《明清小說傳播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王向遠，《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

² 李志宏指出：「任何一部文學藝術作品都不可能完全孤立於傳統之外，文學研究自然不得不考察它所可能因襲的傳統因素，其中包括文學的傳統和文化的傳統。」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8月)，頁40。

³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374。

⁴ 徐志平，〈遺民詩人杜濬功能論小說觀探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7月)，頁129-130。

⁵ 郎瑛說：「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郎瑛，《七修類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頁265。

不同人物的說法可知，「演義」可被歸於通俗小說中的一環，卻又可以被單獨視爲一類加以討論，故本節將「演義」置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整體框架下後，再加以論述其對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影響，特別是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等「演義」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續衍、融合，即是本章主要的思考方向。

那麼，「演義」的範疇爲何？李志宏針對「演義」之名，作了一番嚴謹的歷史考證。⁶他指出，有許多不少非以「演義」之名問世的書籍，其實也可以包括於「演義」的脈絡中，例如「傳」、「志」、「書」、「記」等皆可視爲「演義」的範疇進行討論：

「傳」是與歷代史實和人物傳記的記述方式有關的文體和文類，一般與「志」、「書」、「記」互為運用，都屬於正史的書寫體例。從歷史書寫的觀點來說，明清長篇章回小說題名為「傳」、「記」、「志」、「錄」者時而可見，另題名為「志傳」、「全傳」、「史傳」、「本傳」、「書傳」者亦所在多有，顯示作家有意將通俗小說置於稗官野史的思想框架之中進行命名，除了賦予作品本身以歷史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藉此提升通俗小說的文學位階。⁷

由此爲「演義」立意的研究可知，不一定要標目上名爲「演義」，才能以此名視之，而是只要小說的內容與歷史有關，作者有意於「稗官野史的思想框架之中進行命名」的作品，都可以視爲「演義」的別體。且借用歷史之名與意而作爲小說題名，也可以提升小說的價值。所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新蕩寇志〉、〈奇人健飛啓疆記〉等小說⁸，由於小說創作者都取材於歷史，並有意向歷史學習以作爲情節鋪陳或教化借鏡，所以都可以列入「演義」傳統的觀察脈絡中。還有標名「傳」者，如由日文翻譯而來的〈志士傳〉⁹，或是李逸濤〈義俠傳〉和謝雪漁〈三世英雄傳〉¹⁰，亦皆爲「演義」的範疇：

「傳」字之命意，其本質或與解經方式有關，或與史傳書寫的「傳記」體例有所聯繫。而「演義」或「通俗演義」作爲小說題名，在與「傳」相互結合或相互置換的過程中，除了在闡發義理的意涵時標榜自身與經、史書寫精神的關聯，最重要的是確切顯示出自身作爲標誌「通俗小說」的一種

⁶ 同上註，頁 49-59。

⁷ 同上註，頁 60。

⁸ 謝雪漁，〈新蕩寇志〉，在《臺灣日日新報》上自昭和 11 年（1936）1 月 24 日起，連載至 8 月 12 日，主要分佈在報紙上的第 8 版或第 12 版。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2 年（1913）6 月 14 日-12 月 31 日。

⁹ 二楸庵主著、逸濤山人譯，〈志士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0 年（1907）2 月 8 日。

¹⁰ 雪，〈三世英雄傳〉，《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元年（1912）8 月 24 日-大正 2 年 1 月 10 日。

李志宏的說法，是觀察多本小說名稱後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故單篇小說如同書籍般以「傳」命名，自也被納入「演義」的框架內。所以「演義」的確存在於日治臺灣漢文小說的發展脈絡中，值得探討它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繼承的現象。

除了題名外，也有些小說未標以上述名稱，但仍為演義的範疇。如臺灣第一部文言長篇小說〈金魁星〉，雖未以類似之名命名，但作者佩雁以「稗官野史」的角度書寫，及以「長篇章回體小說之作」的面貌出現¹²，仍可將其視為「演義」傳統在臺灣的紮根。日治昭和年間的文人洪鐵濤，除肯定〈金魁星〉的文學價值外，亦將其視為各本「演義」的集合體，故〈金魁星〉自也可以納入「演義」傳統中：

余童年受書，即喜讀諸家說部。如《列國志》、《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吾臺有《征交趾》及《金魁星》兩大說部在。……融化經書，出入史漢，煌煌大著，獲觀生平未曾有之奇，誠藝林中之佳話、讀書界之瑰寶也。富貯曹倉、珍藏鄴架，幸毋交臂失之。¹³

由洪鐵濤的閱讀經驗可知他對於中國演義的喜愛。自《征交趾》和《金魁星》出現後，他更高興臺灣擁有類似的作品，因為它們延續了中國說部傳統。其實，早在洪鐵濤之前，日治初期的臺灣文人李逸濤就在〈小說藝言〉中，談到他對於中國小說發展過程的熟悉：

小說始於魏晉，盛於隋唐…皆無異乎古文，等是史也，而作之者，不必有其德、不必在其位，所言之人之事，亦不必事有其事、人有其人，謂之小說耳，故小說又名野史。¹⁴

緊接著又言及自身閱讀中國演義的過程，以及對他的影響：

僕自九歲入塾，十一歲稍通解，而于經書終茫然，未幾塾師復強僕讀詩古文辭，及時文試帖，僕益苦之。竊念教初學當不如此，法必有便于此者。後自畫坊購得《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兩書，讀之殊了了，不禁狂喜，所購多，遂束四子書及六經于高閣，不暇兼顧。背誦時每被塾師叱責，僕不之恤也。且乘塾師不及見之際，則手把小說不忍釋，目注小說不他視，往往有會心之處，藉悟許多文法。遇塾師課題，所作常較勝于前，塾師以

¹¹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頁 60。

¹²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頁 64。

¹³ 洪鐵濤撰，〈弁言〉，《三六九小報》，第 2 版，昭和 5 年（1930）12 月 9 日。

¹⁴ 李逸濤，〈小說藝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0 年（1907）1 月 1 日。

僕不甚攻時文，怪而問之，僕以實對，塾師以為狂，同學者亦以為怪物，然據此法以讀他書，殊有迎刃而解之樂，不以為非也。¹⁵

對於中國演義小說，李氏不僅將其視為娛樂讀物，還將它融入文法的實際運用，對於李氏在寫作小說時的敘事手法有深遠的影響。

小說題名與形式、圖書代銷和臺灣文人的閱讀經驗，三者融合之下，成就「演義」傳統紮根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事實。文人創作小說與「演義」相聯結，不僅是一個文體的挪用，更是作為小說接受者，對於慣性文體的反應現象。姚斯（Jauss Hans Robert.）對這個反應現象的說法是：

一部文學作品，即使它以嶄新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它卻可以通過預告、公開的或隱蔽的信號、熟悉特點、或隱蔽的暗示，預先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接受。它喚醒以往閱讀的記憶，將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隨之開始喚起“中間與終結”的期待，於是這種期待便在閱讀過程中根據這類本文的流派和風格的特殊規則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變、重新定向，或諷刺性地獲得實現。在審美經驗的主要視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過程，絕不僅僅是一種只憑主觀印象的任意羅列，而是在感知定向過程中特殊指令的實現。感知定向可以根據其構成動機和觸發信號得以理解，也能通過本文的語言學加以描述。¹⁶

由姚斯的論點，吾人得以深思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創作時，也無法避免地受到「演義」傳統的影響。透過臺灣文人所熟悉的符號、暗示等因素，「演義」的特點將會表現在敘事結構、內容運用，甚至是政治隱喻等面向。因為，作為小說創作者的文人，同時又兼具對中國通俗小說廣泛閱讀的閱讀者身分，他們的創作，不但在有意無意間會受到閱讀經驗的影響，同時為了滿足其他純粹身為小說閱讀者的閱讀慣性，他們也在創作過程中保留這股「演義」傳統。就在創作者與閱讀者彼此對小說創作的認知默契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將可處處見到「演義」的影子。

二、「演義」敘事結構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沿續

什麼是敘事結構？浦安迪（Andrew H.Plaks）說：

簡而言之，小說家們在寫作的時候，一定要在人類經驗的最大流上套上一

¹⁵ 同上註。

¹⁶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9。

個外形 (shape)，這個“外形”就是我們所謂的最廣義的結構。¹⁷

又言：

敘事作品的結構可以藉它們的外在的“外形”而加以區別。所謂“外形”指的是任一個故事、一段話或者一個情節，無論“單元”、“大小”，都有一個開始和結尾。在開始與結尾之間，由於所表達的人生經驗和作者的講述特徵的不同，構成了一個並非任意的“外形”。¹⁸

所以「敘事結構」就是指小說的外形，或是指稱它們的組成方式¹⁹，若要了解小說的外形和組成方式，就必須先透過對小說文本的閱讀，才能了解一篇小說以單個或多個的主軸組合而成。²⁰以日治時期篇幅最長的小說〈金魁星〉為例，由於它在日治時期臺灣的說部範圍裡，佔有指導性的領航地位，故在此特以〈金魁星〉說明中國傳統敘事結構在臺灣通俗小說中的紮根情況。²¹誠如洪鐵濤在重刊時的〈序言〉中說：

吾臺有《征交趾》及《金魁星》兩大說部在……二十年前，余所熱望之《金魁星》，忽披露於報端，風行一時，家傳戶誦。余狂喜，頓忘寢食，日夕唯望其報紙之來而讀之，嗣以不完篇而遽止刊，終以不窺全豹為憾……。余窮十日之目力，始竟其編，深嘆其書，結構雄奇，而窮變化，隸事賅博，而不蔓支，行文流麗，而謝繁祗。論斷嚴謹，而中肯綮。深啓宮闈之秘，下逮隸販之微，旌忠烈而抑奸邪，奮國威以臨絕域。融化經書，出入史流，煌煌大著，獲觀生平未曾有之奇。誠藝林之佳話，讀書界之瑰寶也。富貯曹倉，珍藏鄴架，幸毋交臂失之。²²

可見〈金魁星〉在民間受歡迎的程度，以及它在書寫手法上引人入勝的效果。

¹⁷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55。

¹⁸ 同上註。

¹⁹ 陳大康說：「所謂結構基本單位，指的是存在於任意一部長篇小說中的那種結構形態，而所有長篇小說的總體結構，都是它們不同方式的組合。」陳大康，〈論長篇小說結構形態的演變〉，《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頁 64。

²⁰ 陳大康認為：「提煉出結構的基本單位後，我們的任務就轉為研究它的組合方式。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整個結構簡稱為整體，被並聯成串聯的故事定義為部件，構成敘事的細節描寫則稱作零件。這樣，結構基本單位組合方式的研究，就等價於部件如何構成整體的研究。」同上註，頁 65。而陳大康的敘事結構分析對象，正是由「說話」轉變成「演義」類的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故可以參考他提出的「並聯型」和「串聯型」研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是否對此有承衍現象。

²¹ 柯喬文已對作者佩雁的生平為白玉簪，以及〈金魁星〉的性質、「魁星」意象等作過初步探討。可參考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2年6月)和薛建蓉，〈烏托邦續衍—分析佩雁小說暨其作之〈金魁星〉敘事、策略與續衍目的〉，《第5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8.9)，頁 13-43。

²² 洪鐵濤撰，《金魁星·弁言》，《三六九小報》，第 28 號，昭和 5 年 (1930) 12 月 9 日。

細觀〈金魁星〉的構成，與中國講史小說的結構模式有極大淵源關係。王平認為中國古代小說，特別是講史小說的結構，在「時間」與「情節」上既含因果關係，彼此又互相關聯：

講史小說往往以編年體的形式展開情節，既然是編年體，各個事件在時間的序列上便都含有前後的因果關係。²³

每一個結構單元雖然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彼此之間又有著密切的關和複雜的因果關係。²⁴

依此敘事模式，可見小說〈金魁星〉，亦是由幾條結構單元組合而成：

其一，少師徐鼎去世後，其子徐楷與張介圭等五人結拜為異姓兄弟，並一同入京應考，隨後改名為張錫圭。錫圭入朝為官後，與殺父奸臣喬瑚不和，喬瑚則因女兒鸞翔以死相逼，不願嫁朱陽王感到惱怒，因此故意將自己的女兒送往和番，並陷害張錫圭與太監高恩為使臣，一同前往塞外。其後，錫圭與高恩留在番地，幫助番王擊退也先、平定內亂，此為第一個單元。

其二，講述秦虎臣與其妻蘭香、二子秦琇、秦琪之事，言虎臣斷王階奇案，黑白分明，並述蘭香師父白衣老尼前來協助查探朱陽造反，而後于謙將虎臣調任，以利未來協助楚子英對抗朱陽王，並以朱琦接虎臣位，做為朱陽王收買人心的對比。

其三，朱陽王部下張牽，與孟憲章、管師輅等人結拜為義姓兄弟，並一同落草，得魏太公幫助，納糧開礦、佔地為王，張牽屢遭奇遇，與魏三娘、失散已久的兩位表妹結為姻緣。

最後，王守仁率領秦家二兄弟征討東南亂事時，部下韋雄與同伴共同剿賊的經過，可視為第四個單元。

由於〈金魁星〉並未完全刊完，故只能歸結出以上四個單元。但這四單元各有因果關係，互相指涉，卻又保有自己獨立的發展脈絡，且各單元的情節皆與朱陽王造反一事有關，故若按此書寫脈絡，造反一事，成為四單元共同生成的「因」，而〈金魁星〉這四個單元，最終都將指向王守仁領軍與朱陽王大戰，即為〈金魁星〉的「果」。

〈金魁星〉的寫作方式，並非佩雁所獨創，此模式是中國演義特有的敘事結構，中國著名小說也多採用此一模式。陳大康分析《水滸傳》時，指出《水滸

²³ 王平，《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頁362。

²⁴ 同上註。

傳》是以「人」串聯起整篇小說：

當作者把一百零八條好漢都送上梁山後，整個故事也就結束了。如果把各人的經歷看作一條條支線，那麼全書幾百個人物和各種大小事件均視其與各支線的關係而被安排了位置。……《水滸傳》的總體結構是並聯型，但各好漢的具體經歷則又由一個個事件組成。²⁵

而另一部小說《三國演義》，則是以歷史為依歸，將各事件組合在一起：

與《水滸傳》同時的《三國演義》以歷史發展為線索，將東漢末年的分裂，魏、蜀、吳的鼎立以及三家歸晉等各大事件串聯起來，而具體描寫各事件時，則分頭敘述多方，取並聯的方式。²⁶

〈金魁星〉不是《水滸傳》、《三國演義》或是其他中國通俗小說在臺灣的續書，但若從張錫圭、秦虎臣、張牽、韋雄等個別人，以及其他次要人物如秦琇、秦琪等各員大將進行觀察，可發現他們如同《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條好漢和各個事件，被佩雁安排到適當的位置。若以明代歷史發展為線索來看，也如同《三國演義》般，各個集團互成抗衡之勢，共同指向一個足以動搖社稷的大戰，而最後終將歸於一統，明代王朝得以持續安穩。兩相對照下，〈金魁星〉在敘事結構上，無疑承衍中國講史小說的結構特徵，表現出佩雁對中國通俗小說深刻的閱讀經驗，以及他在書寫〈金魁星〉時，欲模仿《水滸傳》或《三國演義》等中國小說的書寫模式。

其他例子如謝雪漁的〈新蕩寇志〉。〈新蕩寇志〉描述主角「林明郎」欲報父仇，故針對在日本山間為惡的殺父仇人、「梟黨」的首腦「山中狼」進行捕捉，而「林明郎」的師弟「張大郎」，因與「林明郎」在政治上分屬不同的單位，再加上「林明郎」屢次阻礙「張大郎」與其妹「林淑芬」的婚事，故「張大郎」因而藉故陷害「林明郎」為「梟黨」的同夥。而後，林明郎因緣際會認識了討海為生、以恢復被北條氏放逐的後鳥羽天皇為志的「鯨黨」首腦，眾人就在到底要不要幫助北條氏抵抗元軍進犯的爭議中，將「梟黨」剿滅，而「鯨黨」則幫助日本沿海地帶的諸侯國，運用道術、武技等方式，擊退來犯的元軍。作者謝雪漁是參照日本史上「惡黨盛行」的時代背景²⁷，想像出兩個在日本歷史中找不到的盜匪團體名稱「鯨黨」和「梟黨」，作為小說情節的鋪陳主體。由於小說之名承襲中國通俗小說《蕩寇志》中對於維護皇權、剿滅盜匪的觀念，於是此篇小說成為謝

²⁵ 陳大康，〈論長篇小說結構形態的演變〉，頁 62。

²⁶ 同上註。

²⁷ 有關「惡黨盛行」的記載，可參照黑田俊雄，《日本の歴史・蒙古襲來》，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 年，頁 157-158。

雪漁藉由「蕩寇」的這個名稱指涉向日本殖民者示好的工具。²⁸

小說最先是由屬於「北六波羅探題」的「林明郎」、「南六波羅探題」的「張大郎」兩人展開情節²⁹，但兩人又各為主線，分枝為林明郎妹妹菊芬一線、綾浪與中內老人為一線、秦雄一家人為一線和田春一家人為一線。在同篇小說之中，「林明郎」為全書主角，貫穿整篇小說，但各支線卻又可以分開敘述，造成彼此可獨立閱讀，但最後卻又匯聚於元軍征日的主戰役中。這種敘事結構，如同〈金魁星〉般，係不同敘事單元組織而成的小說。

敘事組織外，視角的運用，亦是值得觀察的現象。全知敘事視角為中國演義中最常見的敘事角度，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³⁰，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臺灣，小說作家們既具備了對中國通俗小說的閱讀經驗，故將此經驗轉化於實際創作時，自也大量採用了全知敘事以作為說的視角。有關敘事視角的意義，楊義說：

作者，尤其是虛構敘事的作者，對其作品的人事、心理和命運，往往擁有全知的權利和資格。……源遠流長的歷史敘事，在總體上是採取全知視角的。因為歷史不僅要多方搜集材料，全面地實錄史實，而且要探其因果原委，來龍去脈，以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沒有全知視角，是難以全方位地表現重大歷史事件的複雜因果關係、人事關係和興衰存亡的形態的。³¹

許多臺灣通俗小說，即採用此種作者現身說法的方式，來鋪陳小說情節的進行。例如長篇小說〈金魁星〉的作者是佩雁，但佩雁除了擁有作者的身分外，他還將由正史改寫、拼貼出來的小說，依照自己的構思，將其欲表達的「忠」、「孝」概念傳達給閱讀者知道。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作者主動地出現在小說中現身說法，造就〈金魁星〉在想像與拼貼中，講述一個錯置的歷史，但它的講史特性，仍繼承中國史傳小說的敘述模式。在小說中，作者佩雁從不迴避自己的聲音出現在〈金魁星〉中，讓人無時無刻都感覺到作者的存在。小說一開始，作者為了表示所書之小說確有其事，在稍微介紹徐鼎為何人後，自己進入小說中作了一段開場：

明徐少師鼎，字禹鑄，山陰龍門人…為一代名臣，史亟稱之，無待予贊。

²⁸ 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2期（2009年9月），頁175-176。

²⁹ 「六波羅探題」是北條氏奪取幕府政權後，因為經歷了天皇為首的「承久之亂」，為避免天皇以及支持天皇的西國武士們又再度興事，所以在京都以及西國一帶設立的監視系統，而以北條氏的直系子孫出任長官，是僅次於幕府的武裝機構。見前註，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71。

³⁰ 無論是王平、陳平原或羅鋼的研究都得此結論。

³¹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227-228。

然其中有段奇文，史書闕載，欲表而出之，以補史官所未備。³²

作者先強調徐鼎之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又爲了小說的情節發展，強調作此篇小說主要是「補史官所未備」，以加深小說對閱讀者的可信度。小說一開始，作者的聲音明顯出現在內容中，而在每一回的最後，作者如同說書人般，爲了對此回作結尾，並提點下回的開始，也都以「欲之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的語句概括。甚至在內容中，作者不時地進入、打斷原應是敘述者講述的小說情節，將自己的聲音置入。³³例如第 2 回言寶鴻斷完孫寡婦的冤案，拜別石霞翁後，爲了安排寶鴻在之後情節再度登場，作者告知讀者：「下文自有交代。」³⁴而當石霞翁與寶釵結合，生下徐鼎後，爲了將小說的內容儘快轉回徐鼎的功蹟，於是以「俗套之言，毋煩多贅」之語作結。第 18 回除講秦虎臣斷案公正，又欲對閱讀者強調孝道的重要，作者以啗三娶報恩狐女之事爲例，以敘述者的身分，進入小說中總評此事爲「故能受天百祿，福延後世，孝可不重哉？」³⁵第 20 回一開頭，爲讓閱讀者了解易偉人一案，以及引出宋朝人物周三畏，在小說中，作者以「話說眾人不知周三畏，與易偉人因何有師生關係」的反詰語氣，與敘述者自問自答。³⁶第 24 回爲了將虎臣、朱琦的單元，轉換到張牽的單元，於是以「茲且慢表」之語，告知讀者暫停敘述虎臣、朱琦的後續發展。這些作者以寥寥數語，在小說中所作出的交代，不但是敘事時間的跳躍，也是作者欲解釋情節發展，刻意地進入小說中，以敘述者的身分，向讀者說明作者的動機，閱讀者可以感受到作者與敘述者皆爲同一人。這種小說作者在內容中轉變爲小說敘述者的方式，除了方便自行對情節安排作出解釋外，也有預先交代情節，以作爲吸引讀者繼續閱讀的效用。第 15 回講鸞翔投河自盡，作者除因爲沒有將鸞翔所提的絕命詩全錄出來給閱讀者，而在內容中以「俟後搜出，再爲錄後以補全壁，閱者諒之」現身致歉外，接著又岔出小說，回到現實生活中，交代書寫時自我的構思歷程：

前聞吾師月夜餘談，曾云：「鸞翔小姐，投河之後不復與徐楷會合，只貞魂不昧玉體隨波，捲浪入中原，人哀其節烈，爲之禮葬……，來往遷客騷人多憑弔而奠焉。後徐楷再娶夫人，乃鸞翹小姐，係戚氏養女，與鸞翔無涉，爾時聞言，心恒悵悵……，迨後數年，偶閱楊升庵筆記，紀載此事甚詳，乃知鸞翹即鸞翔之托也……。據云：『鸞翔』投河之後，若神默佑，頃刻尸流千里，有一麥姓漁翁曉起打魚，尸入網中……。」³⁷

³² 佩雁，〈金魁星（第 1 回）〉，《三六九小報》第 29 號，昭和 5 年（1930）12 月 13 日。

³³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此種「敘事干預」的手法，中西小說中皆有。但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繼承中國演義方面的敘事干預手法，較接近於王平所言：「史官式敘述者」的手法。這是因爲〈金魁星〉本身即是以史爲本所構成的小說，所以作者在小說中敘事干預的情況，與中國演義較爲接近。

³⁴ 佩雁，〈金魁星（第 2 回）〉，《三六九小報》第 40 號，昭和 5 年 1 月 23 日。

³⁵ 〈金魁星（第 18 回）〉，昭和 5 年 12 月 9 日。

³⁶ 〈金魁星（第 20 回）〉，昭和 5 年 12 月 29 日。

³⁷ 〈金魁星（第 14、15 回）〉，昭和 5 年（1930）10 月 6 日。

鸞翔獲救後，又因恩人漁翁酒後失手打死人，而甘願入戚耀祖府中為婢，以代漁翁之罪，入府後得戚夫人喜愛，重回小姐身分，並改名為鸞翹。此處一長串絮叨之語，全是由作者的自敘所構成，既預告鸞翔之死，恐難與徐楷成眷屬，又擔心閱讀者無法接受不團圓的結局，失望之下不願意繼續閱讀，於是又在小說中自圓其說，聲明鸞翔並未真正死去，只是改名而已，仍與徐楷有重逢之日。又在第26回講張牽娶二表妹，作者在文中盛讚老嫗的賢明：

噫！嫗可謂知人矣！雖霸蜀五年，未就高光之業，而瓦城走据，歷世五傳，項王雖敗，亦是英雄，誰得以草頭王小之哉！³⁸

此段話預告張牽將走向敗亡一途，但為了避免讀者在此否定張牽的所作所為，仍給予張牽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評價。在張牽的單元即將達到情節高潮時，作者進入小說，藉由稱讚老嫗之語，先告知讀者張牽的未來，閱讀者開始關心的，將是張牽為何敗亡的原因和情節，張牽的結果如何，作者自行在文中下定論，對於閱讀者而言，就不是這麼重要了。柏茲里（Beardsley, Monroe C）說：

文學中的說話者，不應該與作者劃等號，說話者性格、狀況，只能由作品的內在證據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實在的背景，或是公開的聲明，將自己與敘述者聯繫在一起。³⁹

〈金魁星〉中，呈現多處作者與敘述者摻雜於同一處的情節，由此可知，〈金魁星〉承衍中國史傳小說中、作者與敘述者合而為一的「全知視角」⁴⁰，並延續中國小說中常見的說書人口吻，反映中國傳統敘事模式被臺灣小說承衍的情況。其另篇小說〈書齋奇遇〉，也同時表現出作者與敘述者合而為一，對於小說情節通盤了解的敘事角度，小說一開始作者自言：「有自豫章來者，談及柴桑郡有一秀士羅星垣。」或是文末：「未知煙水湖邊，能令我一見否也？然余縱不得一觀其人，亦以香花祝之，錄以著採訪之缺。」⁴¹以李生與女鬼相戀為主題的〈簫齋奇緣〉則說：「此象由心生，妖因人作，可不慎哉。」⁴²這些小說引文值得注意的是，佩雁不但自己進入到小說中掌握情節的鋪陳，且不時地告知讀者他要利用新

³⁸ 〈金魁星（第26回）〉，昭和6年（1931）5月13日。

³⁹ Beardsley, Monroe C, "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C1958. P240*. 筆者自譯。

⁴⁰ 王平由中國的史傳文學脈絡中，認為史傳著作的敘述者，遵循的是「無徵不信」的「實錄」原則，作者與敘述者是同一，於是「史官式敘述者」，就成為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特徵：「史官式敘述者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徵便是作者與敘述者相同一，因而對於所要敘述的人或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敘述者與小說中的人物基本上沒有直接關係，也很少讓小說中的人物承擔敘述的任務。」王平所說的「史官式敘述」，也是全知敘事角度的一種。

⁴¹ 佩雁，〈書齋奇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22日。

⁴² 佩雁，〈簫齋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5月24-25日。

聞事件改寫為小說情節的手法，警示世人必須小心戒懼，以免重蹈覆轍。這些動作充份表現出作者對於小說情節、人物積極的掌控權。作者既是以記者身分去探查此事後，將其改寫，他自然對於小說的情節，或是會發生什麼事能有清楚地掌握，全知敘事角度的色彩，也就更為明顯。當然，不只是佩雁的小說，其他幾篇小說如〈奇人健飛啓疆記〉、〈新蕩寇志〉等，作者與敘述者也時常重疊在一起。

43

無論是佩雁的〈金魁星〉及其相關小說，或是謝雪漁的〈奇人健飛啓疆記〉、〈新蕩寇志〉等，這些小說的形式與內容，與中國演義敘事的差異不大，作者使用長久以來習慣的全知敘事視角講述小說，也是合理之事。但另一個值得觀察的例子是，有些由日文小說翻譯成漢文的「劍客小說」，或是以西方歷史為敘事情境的小說，也可以發現譯者／作者使用中國傳統全知敘事角度來講述小說。例如謝雪漁所翻譯的〈陣中奇緣〉⁴⁴，雪漁自稱此小說為「最新小說」，其意即在於試圖擺脫過去中國傳統通俗小說的制約，故「新」相對於「舊」，謝雪漁欲以此篇小說開創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全新發展的意圖不小。但觀其內容，〈陣中奇緣〉以法國大革命時「革命黨」與「王黨」間的戰爭為主旨，配合敵我兩方的情愛糾葛、家族恩怨，故然為臺灣讀者造就了一個新的小說視野，但若細究小說本身，謝雪漁其實難以擺脫中國傳統敘事角度的影響，所以在小說中，仍不免見到身為作者的謝雪漁，習慣地將作者與敘述者的身分合而為一、跳入到小說情節中主動為閱讀者說明事件發生的始末。例如每回開頭和結尾必定出現「話說」、「且說」、「再說」，以及「畢竟如何，次回續出」、「下文自有交代，今且不表」等說書用語。而在女主角鐵花與男主角熊大猛遭難危殆之時，為加強緊張危急的情況，作者自身又投入小說中自敘：

嗚呼！少女鐵花，將處死刑，熊大猛大尉，候軍法會議。共和軍壯士，與勒王師俠女，一時命運，皆宛如纍卵。不禁代為悲痛，欲知如何，下回分解。⁴⁵

作者對於人物未來如何發展，其實是全盤了解。由此可見，謝雪漁雖然有意以〈陣中奇緣〉特意強調它的「最新」，但小說的「新」，實僅表現在小說內容的「新」，亦即以外國歷史為題材、外國人為小說人物為重點，以達到吸引讀者閱讀「先聲奪人」的功效，但在敘事的視角和時間方面，謝雪漁仍不得不採用全知敘事的觀點，而無法立即使用迥異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敘事角度，在時間方面，也是典型地以順序式手法，講述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最後男女、敵我雙方皆大歡喜，小說

⁴³ 林以衡，〈英雄、歷險、桃花源—由日治小說《奇人健飛啓疆記》的試煉之路論其敘事建構的原型模式〉（《東華人文學報》第 18 期，2011 年 1 月）、〈「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 2 期（2009 年 9 月）。

⁴⁴ 小說最末回作者自言：「附記《陣中奇緣》譯書，原為初稿，未經校閱，篇幅之複雜、辭句之繁蕪，在所不免。」故知此篇小說為翻譯之作。

⁴⁵ 南瀛雪漁，《最新小說 陣中奇緣（第 7 回）續》，頁 75。

得以完結。

還有如魏清德所譯寫的〈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雖非魏清德原創，但魏氏在翻譯之時，難免對原著加以改寫，甚至放入自我評斷。這些作者與敘述者重疊的評判文字，透露出作者對於接下來情節發展的了解與掌握，並將翻譯此篇小說的意圖毫無保留地表示出來。例如菅谷半之丞之父半兵衛受到之丞繼母的唆弄，欲將之丞逐出家門，譯者「異史氏」補充論斷道：

異史氏嘆曰：「半兵衛家有良孝子而不知愛。揮刃欲殺卒致一門風波如是，婦人長舌維厲可畏，彼豈特以小善結汝心？」⁴⁶

小說後半部開始描述赤穗事件的始末時，譯到「性奸佞、狼貪成性」的上野介義央向眾諸侯索取賄賂的醜態時，則言：

賄賂不到之諸侯，彼則含沙射影，構思以窘辱之。是真所謂黃白世界無異今日。異史譯至此，不覺為之停筆長嘆息也。⁴⁷

透過對全知視角的掌握，造成「異史氏」對於通篇小說所欲表達意義的全般了解，譯者得以在譯介過程中，以邊讀邊譯、並不時地與閱讀者們共同分享閱讀心得的翻譯方式，表現出譯者對於赤穗精神的清楚認識，而得以進一步介紹給讀者認知。

由上述各篇小說的解析可知，臺灣小說作家在深受中國演義的影響下，書寫歷史類的小說時，往往大量採用中國演義中最常運用的全知觀點來鋪陳小說，對於臺灣通俗小說而言，此點即是延續中國演義的敘事角度，而能夠將兩地的文學傳統關係彼此聯繫。但，雖然有承接的部份在，其實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也有試圖打破傳統的企圖，故隨著時間的發展，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所運用的敘事角度也會愈來愈多元，逐漸展現出臺灣通俗小說豐富面貌。

第二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取材於中國演義的情節

身處在政權交替下的臺灣文人，工於詩、文是自幼養成的文學才能。但，他們對於中國演義的閱讀，也是形成已身小說創作重要的取材來源。

中國演義對於臺灣作家創作小說時，影響有多大？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⁴⁶ 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 (第 6 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3 年 (1910) 6 月 14 日。

⁴⁷ 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 (第 14 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3 年 7 月 8 日。

說：「每一個文本都是引語的鑲嵌所成，所有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納和改寫。」⁴⁸在對於中國演義念念不忘的文學氛圍下，有不少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都在內容中運用中國演義的情節和人物，於是乎整篇小說既有承衍特點，又有創新、再造的部份，顯得多元而豐富。

一、〈金魁星〉對中國演義情節的運用

佩雁所撰之長篇小說〈金魁星〉，不但在書寫手法和結構上承衍中國演義的敘事模式；在內容方面，也融入各類演義中的人物、情節，或是借用演義內容對讀者說教。基於文本開放性的原則，吸納和改寫中國演義的情節成為構成〈金魁星〉的重要部份。例如，張牽與眾兄弟結義、據地起事，嘯據山林，並以「忠義」為旗號，旗下有「渾天星」周青、「闖天星」曹煒、「多目星」祝昇平等十路英雄，即帶有仿效《水滸傳》108條好漢，聚於梁山泊的描述。⁴⁹第25回眾兄弟約定以天意推領袖，⁵⁰第33回講唐太宗生擒王世充等事，則具有《說唐演義》的影子。⁵¹如此不勝枚舉地引用中國小說，可見佩雁對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深刻閱讀，得以在寫作時運用於內容中。但在〈金魁星〉所運用的中國通俗小說中，以引用《說岳全傳》和《三國演義》兩部小說的人物、情節最值得深究。

《說岳全傳》是描寫南宋名將岳飛領軍對抗金兀朮，最後北伐未成、遭到奸臣秦檜召回京城，並害死於風波亭的歷史故事。全書最重要的，就是在強調岳飛的精忠報國，以及秦檜等人的殘害忠良。〈金魁星〉運用《說岳》於小說中，可加強小說強調忠／奸之分的觀點，例如，第7回徐楷與戚琨結為異姓兄弟後，戚琨以「宋公明受囚蔡京，岳少保見陷秦檜」之語，開導徐楷莫因此灰心喪志。同回結束前，岑員外並以「如岳武穆之結織張元，以暗消其英鷲之氣。」解釋為何禮遇張牽的原因。⁵²包括張牽自己，在酒醉後，也暢談「爰講兀朮三進中原，宋匡王泥馬渡江故事」⁵³以抒己志。秦虎臣一節，將小說中公正無私的周三畏引出⁵⁴，同樣是對《說岳》人物的引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第38回中，作者描述喬瑚燈下閱讀《說岳》後的態度：

喬瑚方自朝堂歸來，晉入羊姑房中，脫去朝衣，秉燭而觀說岳精忠一傳，

⁴⁸ 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Iristena Reader*, Toril moi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6. p36.

⁴⁹ 〈金魁星〉第25回，《三六九小報》，昭和7年(1932)4月13日，第171號。

⁵⁰ 〈金魁星〉第25回，《三六九小報》，昭和7年4月16日，第172號。

⁵¹ 〈金魁星〉第33回，《三六九小報》，昭和7年10月19日，第227號。

⁵² 〈金魁星〉第7回，《三六九小報》，昭和6年(1931)5月3日，第70號。

⁵³ 〈金魁星〉第25回，《三六九小報》，昭和7年4月19日，第173號。

⁵⁴ 〈金魁星〉第19回，《三六九小報》，昭和6年12月26日，第140號。周三畏是岳飛被陷害、平反時的公正廉明的官員，此處安排周三畏出現，加強秦虎臣的斷案公平。語出《說岳全傳》第60回：「勘冤獄周三畏掛冠，探圜圜張搃兵義死。」

正觀到瘋僧掃秦，鬼鬧相府。棄書起曰：「那有此理！野史家偏有此無根之說，誣惑中材，我上智也，豈受汝欺？後日必者各省督撫大員，嚴禁民間買閱此書，削焚此版以免謗毀朝貴。」⁵⁵

就角色而言，喬瑚一角，在〈金魁星〉中是奸臣的代表，而「瘋僧掃秦，鬼鬧相府」在《說岳》中的情節，則是指奸相秦檜與王氏，陷害岳飛一事被發現，報應即將到來。⁵⁶喬瑚陷害徐鼎、殘害忠良，作賊心虛，閱讀此情節，自然心生不悅，此段情節實與上下文沒有任何關聯，佩雁特別將此情節突然插入，「天外飛來一筆」所造成的突兀效果，並由喬瑚口中說出對《說岳》的不滿，不但表現出佩雁深受《說岳》的影響，也藉此刻意加強小說忠與奸的對比，並以《說岳》反諷奸者將如秦檜等人般不得善終。⁵⁷

《說岳全傳》外，《三國演義》則是被佩雁在〈金魁星〉中，運用最多的中國小說。〈金魁星〉第5回講也先領軍進犯邊境，明宣宗不聽戚耀祖之言，遭到也先包圍，大軍失陷敵陣，幸得戚耀祖手下先鋒白圭軍來救，宣宗得以安全脫困，後讚白圭：「此將當世趙常山也。」⁵⁸以《三國演義》中的趙雲，作為對白圭的比擬。第6回徐楷因遭喬瑚陷害，流落到戚耀祖駐軍處，隱姓埋名與其子戚琨結識，本不敢冒露姓名與來歷，但聞戚耀祖指責喬瑚之言後，才敢自承身分：

曾聞少師與喬相國同社同盟，久結生死之交，又聯婚姻之好，情誼親密。今少師被害，喬老當朝秉政，絕不為辨本鳴冤，一垂援手，而乃袖手緘默，恕置度外，是誠何心？邇日都下白面曹操之謠，諒不誣也，他日汝輩入都，投拜座師，斷不可奔入此老門下，慎之慎之……。徐楷見戚帥如此舉動，大是忠貞可靠，中心感激，即雙膝跪下曰：「大帥關念徐某如此，某即徐楷是也。」⁵⁹

在《三國演義》的渲染下，「白面曹操」成為「奸」的代表。耀祖之語，以曹操比擬喬瑚，不但讓徐楷放心告知身分，以曹操形象作為形容，也強化〈金魁星〉以「忠」、「奸」作為對立面的用意。同時，藉由曹操在民間所被建構的刻板形象，小說閱讀者很容易地就知道情節中反派的奸惡程度。其他像是具有智計者，或有軍師身分的小說人物，往往帶有諸葛亮的影子，例如講和親使臣錫圭助狼主

⁵⁵ 〈金魁星〉第38回，《三六九小報》，昭和8年（1933）3月6日，第268號。

⁵⁶ 語出《說岳全傳》第70回：「靈隱寺進香瘋僧遊戲，眾安橋行刺義士捐軀」、第74回：「赦罪封功御祭岳王玟，勘奸定罪正法棲霞嶺。」

⁵⁷ 由此點可知，在互文性的影響下，文本充滿直白與隱晦的特點，蒂費納·薩莫瓦約認為：「文本離不開傳統，離不開文獻，而這些是多層次的聯繫，有時隱晦、有時直白。」佩雁不言明教忠及奸者果報的意圖，卻以《說岳》的精神貫穿此理想。(法)蒂費納·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vault)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頁33。

⁵⁸ 〈金魁星〉第25回，《三六九小報》，昭和6年（1931）3月3日，第52號。

⁵⁹ 〈金魁星〉第6回，昭和6年4月13日，第64號。

擊退九耳元帥的進犯，九耳求和時稱：「臣主將震懾諸葛公神威妙計，知非敵手，已如孟獲誓不復反。」⁶⁰狼主以「既知吾軍有諸葛」回應，並稱錫圭是「諸葛一生維謹慎。」⁶¹敵我雙方皆以「諸葛」此智慧形象，來比喻張錫圭在用兵方面的神勇機智。張牽一線，講其兄弟之一的管師輅，被眾家兄弟封為「小諸葛」⁶²，或是朱陽王的軍師采薇翁以「綸巾鶴氅」的打扮出現⁶³，可見「智慧老人」的形象不但存於中國小說中，佩雁在撰寫〈金魁星〉時，在形構智者型人物時，也與這個「智慧老人」的脈絡互相連接，且又以《三國演義》的「諸葛亮」形象，最是影響深遠。⁶⁴

《三國演義》在〈金魁星〉中的運用，並不只有作為對小說人物的描寫，也作為對事件的品評，或是小說情節的模仿。第 5 回寫徐楷被捕，送到張熹處，張熹為報徐鼎大恩，以其子張介圭代替徐楷受死，作者言：「或效陳宮放曹、或效英公換子」，即以《三國演義》和《薛剛反唐》的情節，來表彰張熹夫婦的偉大。第 27 回講張牽姻緣，解籤詩得：「魏武深銷二喬於銅雀臺」，為太公解詩又得：「南國二喬」之比喻⁶⁵，意指張牽姻緣天注定，此段仿《三國》中喬國老與二喬在吳國的地位，幫助張牽偏安一隅。第 27 回中，談趙武入京謀刺天子，此乃犯上的不忠行為，故安排代表「忠義」的關公顯靈，以救皇帝之難：「突見關聖大帝赤面長髯、金冠綠袍，按劍立於臺階，怒容可掬，揮指蒼髯周爺提刀趕殺僕等。」⁶⁶其他如雲彪效關公單刀赴會⁶⁷、黃花女將杖打燕尾李星，並要其詐降於王守仁，則是仿《三國》杖打黃蓋的「苦肉計」情節而成。⁶⁸

佩雁在〈金魁星〉中，大量運用《三國演義》於內，其比例遠超過其他小說，自有其用意，首先，〈金魁星〉主要在講史，與《三國演義》的性質符合，且《三國演義》又是講史小說中的代表作，佩雁對於《三國演義》有深刻閱讀，並對羅貫中《三國演義》與陳壽《三國志》小說與歷史的差異，相當了解，第 21 回中就藉秦虎臣與肅親王的對談，表現兩者的不同：

而陳壽作誌，將略非其所長，一何謬妄至此，且又喪心病狂，市魏寇蜀，使非紫陽夫子秉特筆於《春秋》，還正統於蜀漢，吾恐帝魏之謬，沿襲至今。誰其正司敗之，誅戮奸雄於死，後以正萬古綱常，陳壽之罪，上通於

⁶⁰ 〈金魁星〉第 33 回，昭和 7 年（1932）10 月 23 日，第 228 號。

⁶¹ 〈金魁星〉第 34 回，昭和 7 年 11 月 9 日，第 233 號。

⁶² 〈金魁星〉第 25 回，昭和 7 年 4 月 23 日，第 174 號。

⁶³ 〈金魁星〉第 37 回，昭和 8 年（1933）2 月 6 日，第 259 號。。

⁶⁴ 康韻梅以唐人小說為例，指出此一「智慧老人」的原型概念。康韻梅，〈康人小說中「智慧老人」之探析〉，《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9 月），頁 136-171。

⁶⁵ 〈金魁星〉第 27 回，昭和 7 年 6 月 16 日，第 190 號。

⁶⁶ 〈金魁星〉第 37 回，昭和 8 年 2 月 3 日，第 258 號。

⁶⁷ 〈金魁星〉第 44 回，昭和 9 年（1934）8 月 16 日，第 368 號。

⁶⁸ 〈金魁星〉第 43 回，昭和 9 年 3 月 13 日，第 322 號。

天矣，虎臣拍手稱快。⁶⁹

藉由兩人對《三國志》的談話，作者表現出「尊小說、抑史書」的態度，佩雁刻意忽視史書的價值，抬高小說的地位，在於佩雁不滿陳壽尊曹魏為正統的史觀，違背〈金魁星〉中鼓吹忠君的思想。佩雁奉行《三國演義》「尊劉抑曹」的說法，於是藉由肅親王的談話，與秦虎臣的附和，將「正名討逆」、「存直道於三代」的觀念⁷⁰，傳達給〈金魁星〉的閱讀者，不但得以收小說教化之效，也暗諷日本殖民者欲在臺灣建立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其實是如同曹魏般的僭越之舉。

佩雁了解閱讀者熟悉三國，才能不停地運用三國事於小說中，於是〈金魁星〉運用三國事的寫作手法，滿足作者、讀者和小說三者間的共同需求，也讓〈金魁星〉在《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各類中國通俗小說的幫助下，不但能作為延續漢文化的表徵，同時，也在字裡行間中，藉由這些小說，加強所提倡「忠」／「奸」對立的觀點。⁷¹

由以上諸點可知，〈金魁星〉的組成，是經由各種文本的拼貼、組合所綴連而成。蒂費納·薩莫瓦約說：

只要寫作是將分離和間斷的要素轉化為連續一致的整體，寫作就是複寫（recriture）。複寫，也就是從初始材料到完成一篇文本，就是將材料整理和組織起來，連接和過渡現有的要素。所有的寫作都是拼貼加注解，引用加評論。⁷²

整篇〈金魁星〉在歷史想像的寫作主體下，卻又靠著佩雁對於中國通俗小說的了解，將這些小說作為材料融入〈金魁星〉，成為對小說情節的增補、比擬、評論和注解的來源。透過對這些中國演義大量的運用，可見佩雁試圖以中國演義的寫作策略，作為己身學養的發揮，以及投小說閱讀者所好的目的。也許在佩雁設法摹寫之餘，於其人心中，更期盼著〈金魁星〉在日治臺灣的地位，能夠如同《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著那樣永垂不朽。可喜的是，這個夢想，終於在《三六九小報》上重刊〈金魁星〉後達成，重刊人洪鐵濤認定，此小說是臺灣文壇上最重要的說部。⁷³

⁶⁹ 〈金魁星〉第 21 回，昭和 7 年（1932）2 月 3 日，第 150 號。

⁷⁰ 同上註。

⁷¹ 其他小說如《紅樓夢》、《聊齋誌異》和《三寶太監下西洋》等，也在〈金魁星〉中有引用，代表〈金魁星〉對於中國通俗小說的運用和融合，唯數量較少，故暫不討論。

⁷² 原意出自於安東尼·貢帕尼翁：《二手文本或引用工作》（*La Seconde Main ou le travail de l'citation*），Seuil 出版，頁 56。

⁷³ 另一本為《征交趾》，目前未見。洪鐵濤撰，《金魁星·弁言》，《三六九小報》，昭和 5 年（1930）12 月 9 日，第 28 號。

二、〈新蕩寇志〉對《蕩寇志》的再造

如同前述，謝雪漁的〈新蕩寇志〉，不但與俞萬春所著的《蕩寇志》在名稱上有承衍的關係⁷⁴，其實在內容上也不乏有引述演義情節的地方，例如小說主角「林明郎」對「梟黨」的痛恨之言：

梟黨乃么魔小醜，其所佔據地域不謫比叡山一隅，豈如五胡勢力之強大耶？亦不過如宋之梁山泊草寇耳。⁷⁵

事實上，《蕩寇志》即是作者俞萬春針對《水滸傳》中的梁山泊群盜，認為他們理當受到皇權制裁，因而不得善終的續書，故謝氏在此將「梟黨」比喻為梁山泊群盜，而另一派「鯨黨」對比為《蕩寇志》中，為維護皇權而努力的「猿臂寨」陳希真等人。其次，由謝雪漁藉「林明郎」所言，亦可以作為此篇小說之所以命名為「新蕩寇志」的一個有力說法。⁷⁶

而不只於上述謝雪漁對〈新蕩寇志〉與俞萬春所著《蕩寇志》的續衍關係，亦可由情節模仿、小說寫作精神的承繼兩方面加以觀察。首先，《蕩寇志》所續的原書《水滸傳》，謝雪漁也提及了部份情節。⁷⁷至於在〈新蕩寇志〉的某些情節上，則更與《蕩寇志》相近。在小說中，雪漁將「鯨黨」的領袖「中內老人」，描寫為忠於天皇，同時也擁有呼風喚雨的仙術，：

中內老人叮囑注意，遂手揮寶劍，口噴符水，又念念有詞，須臾海氣團馳，化為濃霧，中內老人舉袖一揮，黑團團霧影，籠罩長夜。⁷⁸

又說：

中內老人能知天文，觀測氣候，知某日有適度風力，利於水戰。⁷⁹

「中內老人」召喚雲霧的動作，不但可以解釋元軍攻日時，守護日本「神風」的由來，也幫助孫女「綾浪」前往找尋「林明郎」，以順利求得「林明郎」幫助攻擊元軍的掩飾體。而《蕩寇志》中，同樣也是維護皇權的忠義之士「陳希真」，也具有控制氣候的法力，例如「陳希真」和女兒「陳麗卿」為躲避高太尉和其子

⁷⁴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2期（2009.9）。

⁷⁵謝雪漁，〈新蕩寇志〉（第5回），《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1年（1936）1月29日。

⁷⁶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90，註60。

⁷⁷見前註，謝雪漁：〈新蕩寇志〉（第5回）。

⁷⁸謝雪漁，〈新蕩寇志〉（134），《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1年3月16日。

⁷⁹謝雪漁，〈新蕩寇志〉（137），《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1年（1936）3月20日。

高衙內的欺凌，在逃臨宋朝首都東京時，也做法召喚雲霧，以當作掩飾：

希真道：「且慢，你主取碗淨水來。」麗卿道：「要他何用？」希真道：「只管取來。」麗卿便舀了一碗遞與老子。希真取來，唸了幾句真言，含那水望空噴去。麗卿道：「此是何意？」希真道：「這便是都錄大法內的噴雲逼霧之訣，少刻便有大霧來也，我同你乘著大霧好走。」

只見那座大霧，密密層層把東京城護著，好一似蒸籠熱氣一般，騰騰地往天上滾捲，…。希真道：「這值甚麼，我受本師張真人傳授都錄大法，有若干作用，這是裏面逼霧的法兒，我這法兒能逼起三十里方圓的大霧。」

80

小說中穿插法術、書寫鬥法的情節，對於中國章回小說而言，雖說是常見的情節安排，但由「陳希真」與「陳麗卿」、「中內老人」與「綾浪」，兩對分別是以父／女、祖父／孫女的組合觀察⁸¹，皆是屬於直系血親的對應關係，證明〈新蕩寇志〉確帶有《蕩寇志》的若干影子。⁸²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小說中登壇作法、呼風喚雨的情節，最為各時代的小說讀者所熟知的，應當屬《三國演義》中「孔明借東風」的情節，作為中國小說史上經典之作的《三國演義》，對於後世小說的影響極為深刻，俞萬春的《蕩寇志》中，就不時地出現像是具有關公形象的「雲天彪」、有「女諸葛」稱號的「劉慧娘」等。仔細閱讀雪漁所作的〈新蕩寇志〉，也可從中發現這些借用《三國演義》以增加小說精采度的情節，小說開始時，雪漁即描寫主角「林明郎」道：

其武勇儀型，群兒競倣。且是一美貌英雄，有如《三國演義》所載：「銀呂布、錦馬超」。⁸³

第廿五回「中內老人」與孫女「綾浪」談論過去幫助天皇討伐北條氏時的經過，「綾浪」因對「林明郎」產生感情，卻對「英雄」和「奸雄」的區分感到不解，「中內老人」因此感慨道：

英雄難為，奸雄亦不易。人以支那三國時之魏武帝為奸雄，然後世創業之明君，幾人得似他？⁸⁴

⁸⁰ 俞萬春，《結水滸全傳卷之四》第74回：〈希真智鬪孫推官 麗卿痛打高衙內〉

⁸¹ 《蕩寇志》中的父／女組合關係值得我們所注意，乃因高桂惠指出，這個組合關係是一個宗法父權下的女性主體，《新蕩寇志》也繼承這個傳統下的宗法父權觀。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9月），頁113。

⁸² 值得注意的是，《蕩寇志》作為《水滸傳》的續書，在《水滸傳》中，也常有這種一人使法術以左右全局的情況，例如「入雲龍」公孫勝、高廉等角色皆是如此。

⁸³ 謝雪漁，〈新蕩寇志〉（6），《臺灣日日新報》，第12版，昭和11年（1936）1月30日。

⁸⁴ 謝雪漁，〈新蕩寇志〉（25），《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1年（1936）2月24日。

第九十一回面對蒙古和高麗不斷派遣使者前來，意欲示威的舉動，雪漁也以作者的身分進入小說中，並借用《三國演義》中，孔明南征時，對南蠻王孟獲七擒七縱的情節：

時適高麗之通牒到來，蓋蒙古使者之先驅，是為第五回者。蒙古之不憚煩勞，其意殆欲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者，如孔氏之征蠻，所謂攻心為上，七擒七縱者，何知日本國民之忠勇，因不如孟獲之愚昧也？而鎌倉幕府，冥頑不靈，酣夢不醒。⁸⁵

孔明對南蠻王孟獲七擒七縱，感動叛變的南蠻軍，使孟獲等人誠心歸順蜀國，但雪漁將這段小說情節引入，主要目的仍是在突顯「日本國民之忠勇」，以為小說後半部日本各武家奮勇抗敵作伏筆，同時，也加強小說中的反幕思想。

綜觀〈新蕩寇志〉，雖然在寫作精神上與俞萬春的《蕩寇志》有所連接，但也充滿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影子，可見作者謝雪漁對於中國章回小說的熟悉。這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在文學上的成就，所帶給後世小說家難以擺脫的書寫影響，但亦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接受中國通俗小說的證明。以《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兩本臺灣家喻戶曉的中國小說經典之作穿插於小說間，對於臺灣的閱讀階層而言，作者和讀者同時找到一個值得回味的文化情節，也得以藉由這些小說情節不時地被作者運用，共同產生一股「記憶的氛圍環境」(milieux de memoire)。⁸⁶但由於日本長久以來對於中國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崇拜和喜愛⁸⁷，殖民者日本也得以輕易地進入這個「記憶的氛圍環境」中。於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中國章回小說被謝雪漁大量借用，不但造成謝雪漁得以藉由這些小說在政治、文化上取得中國、日本和臺灣三方的文化平衡，也讓無論是認同中國、日本或是臺灣的閱讀者，在閱讀〈新蕩寇志〉時，更感親切和回味。作者在利用小說，對臺灣民眾進行日本國體精神和神風意識的宣揚時，也就更為容易。

三、〈奇人健飛啓疆記〉對《三國演義》人物的複製

謝雪漁另篇小說〈奇人健飛啓疆記〉，其中部份情節也可觀察出受到中國《三國演義》的影響。小說一開始談主角「健飛」的生平。「健飛」與明王朝國姓「朱」

⁸⁵謝雪漁，《新蕩寇志》(91)，《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1年5月30日。

⁸⁶王斑說這股「記憶的氛圍環境」(milieux de memoire)，是一種「記憶環境瀰漫著一種氣息或情感氛圍。」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

⁸⁷由於日本存在著武士階層，所以在中世紀時日本興起所謂「軍紀物語」，而《三國演義》在日本的譯本又佔多數，故日本極喜愛《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中國歷史演義，尤其是這兩本小說對於「忠」和「義」又極為重視。馬祖毅、任榮珍著，《漢籍外譯史》(武漢：湖北教育，1997年)，頁518。

的血統系譜有淵源，故作者欲由明末亂世中逐步勾勒出「健飛」在家世背景方面的不凡：

明季饑荒洊臻，盜賊四起，生靈塗炭，令後之讀史者，掩卷晞噓。是時南邊諸省，雖幸免流賊之擾，然王綱解紐，土豪惡霸，魚肉鄉愚，官威失墜。莫敢過問……。閩省泉郡安溪山間虎頭鄉，鄉不一姓，而以朱姓為多，有朱健飛者父名濟時，習舉子業，博極群書，而文星不照命，屢試不第。自思不能以科甲出身，當由偏途，因入郡為吏，專攻刑名之學，造詣甚深，其名大課，雖它刑幕亦心為之折。⁸⁸

由健飛之父濟時的生平可知，朱健飛一族，其實是落難王室的化身，如同《三國演義》中的劉備雖為漢室宗親，卻在亂世中淪落成爲織草蓆的漢子。濟時一族，在謝雪漁的筆下，先天上就被賦予一個異於庶民百姓的特殊性。而這個體內帶有朱姓王朝的正統血統，也暗喻遠在東南一地生長的健飛，在未來統率群雄，抑或是在海外踞地爲王的傳承作用以及法統性。而後健飛屢遭困厄、奇遇，多數都是依靠智者呂先生幫助他由險境中轉危爲安，例如健飛被逼迫要留在石城中、而與其海外探險之志有所衝突時，呂先生恰巧被安排出現於小說中：「健飛見呂先生鬚髮半白，身材瘦削，却極康強，兩眼奕奕有神，道氣滿面，已知爲異人。」⁸⁹而呂先生會在此時恰巧來到的原因，卻是因爲：「在露臺觀天象，見一個異氣，氣象略似紫薇星，而卻不類，光芒閃閃，直射城中，又落在此樓，故尋踪至此。」⁹⁰由健飛之語，可知呂先生的特異之處，而由呂先生之口，又得以襯托健飛之英雄特質，於是知音互見，健飛了解無呂先生不能成其志向，除了將真實背景告知呂先生外⁹¹，呂先生也開始協助健飛解決各種難題。這些難題，包括像是有賊以火攻來犯石關，呂先生以法術協助禦敵：

呂先生曰：「不先滅其火器，不能退此狂賊。」即由袖中取出小盃，命鄉勇滿貯淨水來。呂先生舉右指向盃中畫符咒，口中喃喃，向盃中吸水一口，望空噴出，曰：「雨師何在？速布雨來。」⁹²

此戰爲健飛來到石城後的首戰，能在呂先生的協助下得到勝利，意義深遠，因爲經過此役後，定遠一改對健飛的多疑之心，反而肯定健飛：「非得張君（即健飛）勇猛助戰，鄙人亦孤掌不鳴，先生與張君實於敝城有再造之恩者。」⁹³於

⁸⁸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1章 譜系），《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2年（1913）6月14日。

⁸⁹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4章 留宿），《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2年6月21日。

⁹⁰ 同上註。

⁹¹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9章 談心），《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2年6月26日。

⁹²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10章 禦賊），《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2年（1913）6月27日。

⁹³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11章 善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2年6月28日。

是健飛得以奠定在城中的地位，才能冷靜思考如何繼續海外啓疆旅程。而後健飛誤陷石洞，也是呂先生算準其有五十日之災，並在災滿後將健飛帶出與定遠等人相見，不但讓定遠對健飛誤會冰釋，更讓城內諸人開始對健飛的才華感到佩服。健飛就在呂先生的幫忙下，隱然已有共主之態。在石城內的生活安穩後，呂先生將要離去，由於他具有預知未來的神力，便留下三個錦囊給健飛，作為遇到困難時的解決妙方。神聖數字「三」的出現，加深小說的神話性色彩，也表現出深藏於人類心靈內原始文化的集體潛意識。卡西勒（Ernst Cassirer）說：「在原始文化的不同時代裡，三構成數字系列的終端，因而成了完善、絕對整體本身的一種體現。」⁹⁴而這三個錦囊就在此神聖性的暗寓下，不但是表現雪漁在寫作小說時對於《三國演義》中軍師孔明付予趙雲等各武將錦囊妙計情節的承衍，也階段性地協助健飛帶領眾人打敗巨獸、開山墾荒，創造出與世隔絕、宜於人居的桃花源。又幫助健飛離開石城，與呂先生會合，開始啓疆於海外，實現健飛最大的抱負。

觀察善使法術、白髮蒼蒼的智者呂先生形象，不難發現他具有仙人呂洞賓的隱喻，以及《三國演義》中神機妙算諸葛亮的影子。上述〈新蕩寇志〉中的「中內老人」同樣具有神機妙算的形象。⁹⁵這兩位角色，都是「智慧老人」角色，乃是文學作品中時常出現、經由人類集體潛意識所形成的原型特徵。⁹⁶與中國演義中的「軍師」角色互相呼應著。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何其多，而其運用中國演義使兩者產生互文現象的小說更是不勝枚舉。由此可知中國演義對於臺灣通俗市場影響之深，呼應本論文於第三章中介紹臺灣圖書市場與上海圖書業以中國演義相互交流的書籍代銷現象。同時，作者在創造時自然地模仿、引述中國演義的文體和內容，使得臺灣漢文通俗不但承衍中國演義傳統，更將中國演義的成份納入小說內容範疇，文學傳播與接受的意義深遠。

第三節、暗戀桃花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中理想世界的模仿

背負中國演義傳統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除了因為文人閱讀經驗、寫作習性而生成外，還有什麼寓意是文人們藏於小說中所欲表達給閱讀者知道的呢？閱讀者又為何會喜歡閱讀這些手法、風格較為傳統的小說，而非僅嚐試新文體、新內容的小說？綜觀上述幾篇小說，無論有無刊登結局，但其小說結尾似都指向一個理想世界的建構。換句話說，這些漢文通俗小說的創作者在書寫小說時，並不

⁹⁴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著、黃龍保、周振選譯，《神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168。

⁹⁵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頁192-193。

⁹⁶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圖書公司，1994），頁59。

單純地只是想要抒發文采、提供娛樂，而是想要表達些許政治想像於小說中。伊瑟（Wolfgang Iser）參考英伽登（Ingarden）和高達瑪（Hans-Georg Gadamer）的論點後認為文本空白的本身，其實就是文本召喚讀者閱讀的結構機制。文學文本不停喚起讀者對既有視域的閱讀期待，但喚起它其實是為了打破它，使讀者獲得新視域，所以對閱讀的召喚不是外在於文本，而是文本自身的結構性特徵，此即「文本的召喚結構」。⁹⁷那麼，臺灣閱讀者在期待什麼？以及補白什麼？

文學作品往往被視為作家心靈的投射，若能因此與讀者產生共鳴，則其文學價值將會永垂不朽，甚至成為之後作品的學習對象。所以小說作者如能透過創作，召喚讀者藉由閱讀小說後，進入一個他所建構的理想世界，則作者即能輕易地將自我理想透過字句灌輸於讀者的內心世界，兩者共同成就對於外在世界的逃避與不滿。在中國文學的傳統中，陶淵明所建構的「桃花源」一直是東亞文化中理想世界的代表，它不但存在於歷朝歷代的文人心中，也往往是詩、文中最吸引讀者注意的政治隱喻。詩、文之外，小說也常常有營造理想世界的意圖，例如唐人小說中不時出現「桃花源」意象⁹⁸，小說發展至後期的演義，也常寄託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建構理想世界的意圖於文本中。例如施耐庵在《水滸傳》中建立自給自足、虎嘯聚義的「梁山泊」⁹⁹；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則是有感於元末大亂、民不聊生，而希冀藉由三國故事的書寫，建立世道由亂而治的想像。¹⁰⁰是故，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既然受到中國演義敘事模式的影響；在情節上又往往取材於中國演義的內容，小說作者在書寫小說時，是否也會藉小說情節的鋪陳，而寄寓自我的政治理想？畢竟，生活在政權易代的臺灣，又要面對世界局勢的詭譎變化，臺灣文人所要面對的動蕩與不安，並非殖民者的高壓統治或懷柔政策就可以完全泯除。所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將如同中國演義般，在小說作者與讀者共同的企求下，刻畫出對「桃花源」理想世界的渴望。此點即是本節透過文本中「桃花源」意象的追尋後，試圖解釋小說作者寄託於文本中的政治隱喻。

一、再現桃花源：〈金魁星〉的重刊意義

本章前二節所論述的幾部長篇小說，它們的結局極為耐人尋味。為了營造小說結尾，作者們皆有意地為閱讀者指向一個理想世界的到來，但這個理想世界卻既虛若實，甚至因為小說半途未刊完，而僅留一個未知的結局給閱讀者自我想像。例如〈金魁星〉雖未刊完、未知結局如何，但可以預想到的將會是各路正派豪傑齊聚於玉守仁麾下，然後由玉守仁帶領諸將、與朱陽王進行大決戰後獲得大勝，於是天下太平的結局。這即是符合演義既不違背正史發展，卻又能滿足閱讀

⁹⁷ 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9年10月），頁295。

⁹⁸ 廖珮芸，〈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主題研究〉《東海中文學報》第19期（2007年7月），頁61-88。

⁹⁹ 皋于厚，《明清小說的文化審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12月），頁41。

¹⁰⁰ 同上註，頁37。

者「邪不勝正」心態的妙處。也就是這股原汁原味的書寫傳統，讓當下閱讀者感受到不同於其他小說在內容上大肆融合各種文化的單純性與趣味性。作為報紙上連載的小說，如何吸引閱讀者不停閱讀，以維持刊登版面的穩固，刺激作者必須不停地「說故事」，並編寫會讓讀者不停浮現對小說追根究底的動力，能吸引讀者在空閒時間中，找到一個點綴平凡生活的方式，這都是當時每位作家要考慮到的問題。佩雁選擇全面以傳統書寫模式、中國講史內容出發的寫作動機，不但透過說書人「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模式讓讀者每天都對〈金魁星〉的下一回充滿期待，而〈金魁星〉因其長篇特色所表現多線式的敘事結構，以及履履出現的戰爭攻伐、武鬥招式、清官斷案或是才子佳人的小說內容，讓〈金魁星〉異於其他較為固定某一主題的小說，而化身為一部綜合性口味的通俗小說，成就了它在當時小說創作中的地位。

所以〈金魁星〉忠於傳統、多線式組合成長篇小說、以及以講史為主、綜合其他題材的特點，反而成為它帶給當下閱讀者不同於其他小說以求新為宗旨、以獵奇為目標的特性，而與其他中國通俗小說互文的書寫手法，更讓閱讀者藉由對〈金魁星〉的閱讀，重新感受到那股閱讀中國演義精采且刺激的娛樂感。也是因為這些娛樂作用，〈金魁星〉在日治初期被首刊時，正是中國文化與殖民文化互相過渡的年代，所以它的刊登能夠滿足在臺灣的清朝遺民，透過小說閱讀填補他們心中對於中國歷史的回味，以及文化上的留戀。並在天馬行空的想像中獲取重溫舊夢的樂趣。最後，小說中以漢民族為中心出發的觀點，多少填補臺灣文人因清廷甲午戰敗、被割讓給異族的羞辱與悲傷，能夠重新在小說的想像中，找回屬於自身的民族自信。¹⁰¹

以通俗娛樂為表面特點的〈金魁星〉不但具有延續斯文傳統、教化讀者的功用，能夠在日治初期以及後期，都得以在殖民法制下順利刊登，也代表〈金魁星〉所強調的傳統價值，並不會與日本殖民者的觀念有所抵觸。於是〈金魁星〉得以利用這些面向，連續二次在不同的時間點，透過情節的鋪陳，建構一個召喚閱讀者的文本，以傳遞它所欲表達給閱讀者的意念。這個意念最終所指的，是建構一個理想世界的意圖：例如小說中的張牽佔蜀地為王並自給自足、錫圭和高恩在塞外協助狼主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等。如此，才是〈金魁星〉的作者佩雁在殖民統治下所欲表達出的烏托邦理想。這個理想，並不會因為歷經 20 年的時光變遷後，失去它在文化傳承，以及想像世界中的價值，〈金魁星〉的重刊意義，乃歸於此。

¹⁰¹ 例如，小說中新科狀元張錫圭和太監高恩被派為和親使，護送鸞翔前往韃靼和番，和番本對於中國王朝來說，是屈辱的事情，但小說在第 72 回中，特別解釋是韃靼聞新君登基、前來進貢，並請求賜婚，巧妙地將漢族的位階提高。而張錫圭、高恩等人到了韃靼部後，恰好韃靼有各種內亂外患，也都力靠錫圭與高恩的指揮，才得以平定。

二、尋覓桃花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桃花源的建構

其他小說如〈新蕩寇志〉和〈奇人健飛啓疆記〉，更明顯地將作者心中建構「桃花源」的意圖給表現出來。唯這個「桃花源」代表哪個國家、地域或民族，作者如謝雪漁卻也沒有明說，而是交由閱讀者去對文本進行空白的填補。如〈新蕩寇志〉中，謝雪漁不停地流露出一個美好「桃花源」的世界形象，他在小說中描寫主角「林明郎」遭到陷害逃亡後，不經意地來到「秦雄」、「虎兒」居住地，此地是：

小川前面雜樹縱橫，荒池曲折，平疇數里，阡陌東西，幾個農家，雞鳴狗吠，彼此相聞。¹⁰²

對照陶淵明的《陶花源記》，可觀察出兩者的相近：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¹⁰³

「雜樹縱橫」／「中無雜樹」、「平疇數里」／「土地平曠」、「阡陌東西」／「阡陌交通」，以及「雞鳴狗吠」／「雞犬相聞」等一組組相互配合的文學意象，表現出謝雪漁建構一個新天地的期待。這個地點，彷彿等同於《水滸傳》中的「梁山泊」和《蕩寇志》中的「猿臂寨」般，能夠成爲一個自給自足、完美無缺的「桃花源」境界。之後，當「林明郎」詢問「秦雄」和「虎兒」等來自何處時，更表達出一個「避秦禍」的避世心態：

秦雄曰：『吾法乃正法，吾祖秦系乃唐朝詩豪，天寶末，避亂□溪，…唐亡，至五季，天下大亂，六世祖，分支遙渡日本，數世相承。』

此外，小說中的人物「中內老人」與孫女「綾浪」退隱時，「中內老人」也欲找一個與世隔絕的地點，從此不問世事、專心修行：

綾浪曰：『林明郎所居之毘沙門山何如？』中內老人曰：『是處去塵界尚近，入山必深、入林必密。我思登富士絕頂，尋一靜境，結廬而居。』¹⁰⁴

¹⁰² 謝雪漁：〈新蕩寇志〉（四九），《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1年（1936）4月9日。

¹⁰³ 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8月），頁465。

¹⁰⁴ 謝雪漁：〈新蕩寇志〉（百五十），《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1年（1936）8月12日。

綜合上述，謝雪漁在小說中所顯現出來的「桃花源」意象，似乎與陶潛的避世心態相差不大，但張惠娟說：

『桃花源』為中國文學中一個恒存的花園基型。然屢經遞嬗，吾人所見者，往往僅為表面意符的類似，而意旨則饒有變遷。妄以表面相似性推斷作品本質雷同，則文類混淆的假象勢將不得避免。¹⁰⁵

所以，殖民脈絡下的「桃花源」意旨，則當更為審慎地加以檢視，齊益壽說：

〈桃花源記並詩〉是以抗議重賦酷役的侵削作為基礎，…最後取材於魏晉以來的無君思想，以創造無賦、無役、無君、無臣的一塊淨土，既以之抗議痛苦的現實，並給所有為重賦酷役所苦的人的心中，油然生起對純樸敦厚自足自樂的理想社會的企盼。¹⁰⁶

歐麗娟也認為，作為「樂園」範疇的「桃花源」，實具有「懷舊、靜止、出世、具備高度封閉性和選擇性，以及解消政治籬束之後放任無為與獨善其身的特質。」¹⁰⁷但，〈新蕩寇志〉之所以為「新」，不是為了與《蕩寇志》有所區隔，其對「尊君」的意旨，也不再是過去舊有、至高無上的中國皇權，而是一個全新、君國一體的日本精神。謝雪漁在小說中，顯然無法達到一個「無君」的理想階段，甚至在他自己的詩作〈桃花源記〉中，也只強調「桑麻遍野無租稅，雞犬同仙有宿因。」或是「世外餘空逃虎口」的「無賦」、「無役」的避世思想¹⁰⁸，避免去觸及「無君」、「無臣」的理想。可見謝雪漁有打算藉由「桃花源」的建構，將己身由殖民統治中抽離。

可是，小說中原本在有如「桃花源」境地避難的「虎兒」、「秦雄」、「中內老人」等人，不但要離開家鄉或隱居之所投身報國，有的人甚至必須捨己殉國，以成就救國大業，就算是立下功勞得以回歸的「中內老人」等人，其回歸之所，卻是代表日本精神的聖山「富士山」。於是，「桃花源」之人，也不得不與外界有所沾染，而失去原本的封閉特質，並和代表日本的意象互相疊合。這使得謝雪漁在小說中所建構的「桃花源」，雖讓謝雪漁得以在這股文化記憶中，短暫地重回古代中國理想境界的精神典範，但在他的政治認同影響下，最後仍藉由「唐亡……，天下大亂，六世祖，分支遙渡日本，數世相承。」的話語，將原本應該是「不足為外人所道也」，或是應被當作逃避殖民統治的避難所的「桃花源」境地，轉

¹⁰⁵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第15卷第3期（1986年），頁88。

¹⁰⁶ 齊益壽，〈桃花源記並詩管窺〉，《臺大中文學報》第1期（1985年），頁316。

¹⁰⁷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273。

¹⁰⁸ 謝雪漁，〈桃花源記〉。

變成爲一個與正準備在昭和年間對外侵略的「日本」，合而爲一的概念。於是乎，謝雪漁所建構出的「桃花源」，並不是躲避殖民統治的理想世界，而是希望能有像「日本」一樣、可以遠離紛亂中國的「桃花源」，才是謝雪漁心中最希冀達成的政治理想。¹⁰⁹

可是，在〈奇人健飛啓疆記〉中，謝雪漁的立場似乎有所動搖。當主角「健飛」帶領眾人建構一個「新桃源」後，「健飛」最後卻拋棄了它，轉而欲完成自己的夢想，而在琉球另建一個新王國。健飛並非對一手創建的「新桃源」毫無戀棧之意，在「新桃源」萬事俱備後，他曾想與定遠一同在此稱霸，與家人夥伴了卻餘生，於是他與定遠有志一同地爲「新桃源」的人事佈局展開思考：

定遠見陳儀調度，整然有法，戲謂陳儀曰：「我家曲逆侯鄉中宰肉，自詡天下亦如是。今觀君之措置，即小見大，治鄉如是，治國亦何嘗如是？吾為天子，當以君為相國。」健飛亦笑曰：「我亦與兄有同心。」¹¹⁰

不過，陳儀立即以忠義之道正色回絕了此提議：

陳儀慨然應曰：「自來有相才者多，有帝王之福者少。世亂如此，虜騎橫肆，明室未必可復。與其低首下氣，謂他人父，寂寞以死，何如割據一方，縱不欲帝制自為，以之遙奉明朔，亦是磊落丈夫，願二位永不忘此日之言。」¹¹¹

重用陳儀代表健飛的識人之明，能夠選賢任才，這一切都是爲了「新桃源」的未來所作的盤算，但健飛與定遠有稱王之意，卻因陳儀的一席話而打消了念頭。於是，留在「新桃源」稱王既然得不到支持和認可，健飛只好投身海外，再度接受命運的召喚。海外啓疆的過程中，健飛雖歷諸多險境和戰爭，還是能在呂先生的幫忙下，完成霸業。小說中雖未描述健飛於琉球稱王經過，但雪漁述及衍東真人修成正果時，順便交代後話：「那衍東果然清修淨果，直活至百二十歲。廣傳其教於琉球，至健飛子錫麒嗣位，勅封護國禪師，又經三十年，白日飛昇，此是後話。」¹¹²由此可知健飛具有帝王之星的實踐是在海外，而非於「新桃源」中。但

¹⁰⁹除昭和年間外，日治其他時期也可以見到臺灣文人表現其政治理想的其他例子，如謝雪漁的另篇小說〈健飛啓疆記〉，也是描述在小說主角健飛等人的帶領下，眾人所齊心協力所建構的一個與世無爭、自給自足的「桃花源」，筆者將另文分析。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2年（1913）6月14日-12月31日。而日治初期文人李逸濤的寓言性雜文〈兩教主相約東遊〉，則因不滿於滿清統治下的中國積弱不振，而藉「孔子」、「佛陀」二人之口，流露出對進步日本的敬佩之意，並欲前往日本實踐理想。逸：〈兩教主相約東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0年（1907）8月9日。

¹¹⁰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72章 定名）。

¹¹¹ 同上註。

¹¹²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87章 訴冤），《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2年（1913）10月26日。

健飛人在海外，卻仍與「新桃源」來往頻繁，表現出對「新桃源」的依靠與依戀：

呂先生曰：「王已見信矣，諸將鑑於余不清事，當有戒心，必無敢違令者。然非我心腹於其間，仍覺不足以舉大事。」健飛曰：「則則奈何？」呂先生曰：「我等同來廿餘人，可盡收在府中，編為衛軍……。竝致書於陳將軍，趕緊在新桃源造成戰艦十艘，操練水兵五百名、陸兵五百名……。前來此地，以待調遣。」¹¹³

雖然離開了「新桃源」，健飛要在海外成霸業，仍要仰賴過去所建立的「新桃源」作為後盾，才能完成志向。在原居地閩地家人去世、並被盜賊所破壞後，有妻有子、有同伴弟兄的「新桃源」無疑成為健飛有困難或需要各種支援時的首選，更是他遠赴海外後心靈上的原鄉。¹¹⁴小說未刊登完全，造成讀者對主角下落交代的不清楚，原因在於奇人健飛一直被視為有帝王之相的英雄角色，但在健飛的背後成就他成為一國之君的，卻是其永遠無法割捨的「新桃源」。雪漁在小說情節中，顯現健飛仍在他的原鄉「新桃源」或是霸業「琉球國」之間來回徬徨，健飛在卸下王位後，到底是選擇回歸亂世中女神香玉所居的桃花源，還是同自己的兒子久留於海外新天地，是在何處終其一生，成為小說最大的迷團。

〈健飛啓疆記〉最大的問題在於，它順應了歷史，但卻創造出一個傳奇性人物。內容則出現了兩個「桃花源」的意象：一個在國內，另一個則在海外。雖說向外冒險一直是健飛的願望，但在遇到回歸何處的結局時，卻成為小說主角健飛最大的迷惑。海外新天地的創建，本身就可以被視為另一個「桃花源」的代表，但海外新天地是否能像亂世中的「新桃源」這麼美好、完備，由於雪漁未將小說寫完，本文無從得知，由健飛之子於此地世襲為王的後話來看，位在海外的「琉球國」，其完備與大治，不會不如國內的「新桃源」。但小說情節中不時出現海內／海外間藕斷絲連的關係，則反映出以往總是被視為親日色彩濃厚、與日本官方親近的文人謝雪漁在認同殖民制度是好／是壞的兩難態度。如果「新桃源」及海外新天地「琉球國」的建立，是謝雪漁服膺於日本殖民者為臺灣帶來文明秩序後的心得感想。然而，自立為王、與世隔絕，或是在創建海外新天地時痛擊日本海賊的描寫¹¹⁵，卻又充滿謝雪漁對於殖民統治的不安、以及想要找到一個真正沒有苦難、符合自我意志的地方。由於健飛的形象充滿作者謝雪漁英雄想像的主觀投射，健飛的失落與行踪未卜，就反映出作者謝雪漁在殖民體制下藏於內心深處的

¹¹³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 95 章 籌策），《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2 年 11 月 26 日。

¹¹⁴ 為了讓遠在海外的健飛與「新桃源」保持聯繫，援軍必須依恃對外水道的打通才能來到琉球，「新桃源」的封閉性看似被打破，但小說中立即以呂先生之語表示，「新桃源」仍然能保持百年的與世隔絕，而不會被外人所發現。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 104 章 迎師），《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2 年 12 月 26 日。

¹¹⁵ 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第 105 章 禦冠），《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2 年（1913）12 月 27 日。

迷思與糾葛。

三、消逝桃花源：理想世界的沒落

日治初期到中期的幾部長篇小說如〈金魁星〉、〈新蕩寇志〉和〈奇人健飛啓疆記〉，無論是隱晦或是明說，都為作者和閱讀者建構一個理想世界的希望。透過小說的書寫與閱讀，文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不時地被文本觸碰、召喚，在寫作和閱讀間，作者與閱讀者屢屢藉由桃花源引起共鳴。這股對理想世界的企求，既有其歷史淵源，卻又有對現實境遇的反動。

但，以歷時性的方式觀察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發展，則可發現，當殖民統治力量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愈益穩固後，桃花源的意象，似乎也隨之慢慢消逝。自〈奇人健飛啓疆記〉之後，到〈新蕩寇志〉出現以前，桃花源的想像伴隨小說形式的短小，不再是文人刻意於文本中營造的空間意象，雖然，這個傳統並沒有斷絕。大正 12 年（1923）的〈陰隱客〉，描寫工人至陰隱客家中鑿井，卻意外發現名曰「梯仙國」的世外桃源。而此國是登上仙界前的預備國度：「我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我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參觀完後，由仙國之人引領回人世，回到世上後才發現人間已歷經三、四世。¹¹⁶

同年，小說〈遇仙〉雖名為「遇仙」，但主角「陳海石」在視察民間疾苦時，無意間進入的山洞，實際上卻是遇到一個「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的理想國度：

渡溪至山麓，荒苔茂草、殊無人跡。瞥見蓬蒿深處，有山洞，大可盈抱。近睨之，聞內有人聲，心大異……。伏身而入，洞口狹隘，只容一人。初入甚暗，十餘步外，忽見天光。再入之，豁然平陽，樹木景物，與世無殊。

¹¹⁷

在仙境中與世無爭的生活，讓主角有再回來的念頭，所以：

叟自言淮滄劉氏，小字朝海。避難至此，久不與人世通矣。陳曰：「此地殊不暄囂，歸告父母，移家入山，結廬為隣，何如？」叟但笑不言。¹¹⁸

可惜當陳氏欲由人間返回仙境時，與陶潛筆下的漁翁般，再也找不到出世之路：

諸生聞之，皆來謁。越日，偕往探之。則黃葉滿徑，白雲迷山。不復識故

¹¹⁶ 〈陰隱客〉，《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12 年（1923）1 月 6 日。

¹¹⁷ 〈遇仙〉，《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12 年（1923）3 月 16 日。

¹¹⁸ 同上註。

道矣！嗟嘆而回。¹¹⁹

「桃花源」的封閉性終究被維持著不被凡夫俗子所破壞，而能維持著美好，無疑是投射出作者和閱讀者對於理想的堅持，和不願意讓夢想輕易被打破的企求。其他小說例如〈盜窩〉和〈老把頭〉，也都些許透露出在亂世中建立安居樂業封閉系統的渴望。¹²⁰

綜觀這幾篇介於〈奇人健飛啓疆記〉和〈新蕩寇志〉間具有桃花源想像的小說，形式雖然短小，但作者仍勉強地爲自己和閱讀者勾勒一個理想世界的幻影。這些小說嚴格來說，其文體都不能算是演義，而只能算是叢錄體的小說。但內容與寓意的建構，並非僅能藉由固定的體例才能表達。所以這些小說在這段時期，仍努力地與桃花源進行聯繫，成爲在新聞體小說氾濫的時期，較能夠與政治寓意相應和的小說。不過，它們終究是這個時期極少數的篇章。當文人們已經遠離日治初期政權交替地惶恐不安，而逐漸接受大正時間平穩的政治局勢時，這股心態就反應在他們不再苦心創作具有桃花源意象的小說，或是不再傳抄中國報紙上含有桃花源意義的小說給臺灣閱讀者閱讀。反倒是進入昭和時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興起，當國家主義再次被喚醒時，文人對於政治的關心才又回溫，潛藏於〈新蕩寇志〉中的桃花源想像，才又再次地被喚醒。

「桃花源」這股小說創作者錯綜複雜的心靈狀態，或隱或顯地被寓託於文本中，等待閱讀者去解讀、去填補空白，甚至閱讀者自己去安排一個自我滿意的結局，進而反映出作者和閱讀者對於「桃花源」的暗戀心理。值得注意的是，當小說作者在創作時，他們可能預想到什麼樣的閱讀者會來閱讀這些小說，但卻又無法全權掌握閱讀者的心態：

作家與小說的目的雖然也是向讀者傳遞信息，把讀者引進進一個建立在現實生活基礎上的虛構世界，但作家本人對讀者(受話人)的了解是甚少的，何況一本(篇)小說並不是寫給一個人看的，作家在創作時不可能對眾多的讀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¹²¹

所以在實際讀者之外，伊瑟認爲「隱含讀者」(the “implied reader”)的作用¹²²，就是意味文本潛在一切閱讀的可能性，它回答的是文本的各種閱讀如

¹¹⁹ 同上註。

¹²⁰ 〈盜窩〉，《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2年6月19日。〈老把頭〉，《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3年(1928)6月28日。

¹²¹ 秦秀白，《文體學概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頁242。

¹²² 伊瑟(Wolfgang Iser)著、單德興譯，〈讀者反應批評的回顧〉《中外文學》第19卷第12期(1991年5月)，頁87。

何成爲可能的問題¹²³；以及：「一個被寫入文本中而且每位讀者只能選擇性地、片面地、有條件地扮演角色。」¹²⁴所以類似謝雪漁般欲建構「桃花源」世界的作者，他們努力地勾勒出「桃花源」的輪廓。至於閱讀者要如何解讀、是否與作者心照不宣，或是作者已經捉住同爲舊時臺灣傳統文人的閱讀者心態，而期盼閱讀者藉由對小說的閱讀，填補作者（或是讀者）心中那股共同對桃花源理想失落與空白……，以上種種即是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值得吾人再三解讀的特點。

小結

臺灣鄰近中國大陸，又曾受清廷的統治，受到漢文化深刻的影響是必然現象。本章以中國演義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承衍爲觀察對象，以文本實例論證臺灣通俗小說如何接受中國通俗小說的各項特點，並轉化爲自我在形式與內容上的組成因子。首先，由敘事手法分析，可發現日治臺灣漢文通俗長篇小說有不少都具有中國演義的敘事結構，此即對演義敘事手法的繼承。這些小說，雖不以「演義」爲名，卻有「演義」之實，在日治初期大量的出現，顯示作者以其閱讀經驗創作小說外，同時也滿足當時距中華文化未遠的閱讀者在閱讀上的期待。其次，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中國演義的情節互文現象，更證明兩者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些被運用於小說情節中的中國演義，都是閱讀者耳熟能詳的內容，當它們被化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後，臺灣閱讀者不但閱讀到新創作，同時也重溫了昔時閱讀記憶。兩者相互作用，中國演義的一切將更深植於臺灣閱讀者的心中。

最後，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繼承了演義中作者渴望建構理想世界的政治隱喻，此點若置於殖民脈絡下觀察，不少創臺灣作者也意圖透過小說創作勾勒出「桃花源」，無疑是藉由小說書寫，成就作者和閱讀者心靈上的出世精神。但部份小說對建構「桃花源」世界的猶豫不決，似乎也在訴說著身爲被殖民者的苦悶。「桃花源」的想像由中國文學、演義直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不同時代、不同地點以及不同的統治者，其發展中卻始終沒有斷絕，反而播種於臺灣通俗小說中。那是因爲，它代表不同時期作者和閱讀者對於政治局勢的冷熱與否，故在日治初期時「桃花源」作爲一個躲避殖民統治的方法，卻又在日治後期變成一個讚揚以日本爲首、開創理想世界的一個政治口號，其意義重要且深遠。

¹²³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9年10月），頁295。

¹²⁴伊瑟著、單德興譯，〈讀者反應批評的回顧〉，頁87。

第五章、源於日本：「講談」文化在臺灣的移植與紮根

對 1895 年因清廷「甲午戰爭」失敗、政權被迫易幟的臺灣而言，日本殖民勢力的進入，為臺灣的各方面發展，開啓一個嶄新的時代。誠然，日治初期的臺灣，殖民政府對內要面對臺灣民眾層出不窮地起義抗日、因戰爭百廢待舉的公共建設。對外，日本本國還要面對來自於國際間的強敵彼此競爭，最終爆發決定誰為亞洲霸主的「日俄戰爭」。不過，在認真、勤勉與具有野心的民族性格驅使下，對臺灣內部以武力和懷柔雙管齊下的統治政策，終讓臺灣的社會治安步上安定。對外，歷經浴血奮戰後嘗得勝果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益加鼓舞日本民族的自信心，更將日本成功地推向「亞洲第一」。在政治、外交與戰爭種種外在因素影響下，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愈益深化且穩固，大量的日本文化，無論是傳統文化或是當代思潮，也將於日本儒官、文人來到臺灣任官或遊玩的時刻，或是透過日籍／臺籍記者的訪談與刊登，逐漸融入於臺灣文化，成為臺灣文化在中國文化之外，另一個文化多元的特徵。

綜觀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化界，日本傳統劇曲如能樂、歌舞伎、人形淨琉璃、狂言和和歌等，都可見到在臺灣流行或演出的消息，既然這些原是屬於大和文化的表演形式都能隨著殖民勢力的發展而進入到臺灣，同樣也是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講談」與「軍談」，也將一起進入臺灣。屬於說唱藝術的「講談」化約為文字，或是與中國史傳小說性質相似的「軍談」書籍進一步成為臺灣通俗小說的一部份後，臺灣通俗小說在內容、形式方面將更為豐富。而風格上表現出的濃厚東洋味，除了顯示臺灣通俗小說在殖民文化影響下所生成的特殊性外，亦可見到臺灣通俗小說如何不停地吸取外來文化，形成與同時代的中國風格、內容迥異的文學作品。

第一節、「講談」：作為日本文化的重要角色

在討論日本文化中的「講談」對臺灣通俗小說的發展有何影響前，有必要先了解，為何日本會興起「講談」？「講談」為何能夠成為日本文化的代表物之一，並進一步向外傳播到殖民地臺灣？透過本章的追本溯源，將能釐清「講談」如何透過東亞文化脈絡的傳播，不但成為日本文化中重要的原素，更隨著殖民統治傳入臺灣，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化所吸收，融合為臺灣通俗小說的一部份。

一、「講談」在日本文化的發展過程

(一) 作為日本傳統藝術的「講談」文化

「講談」(こうだん)，它起源於戰國時代的御伽衆(おとぎしゅう)，顧名

思義，即是以「口說」為主的表演藝術，綜合各部日本辭書的解釋。「講談」是以話術作為中心的日本傳統藝能，主要是綜合落語和舌耕（ぜっこう）的技術，並由一人的寄席（よせ）講演的型態進行演出。明治以後，使用「講談」之語的表演型態增多，大致的過程是講談師放一張稱作「釈台」（しゃくだい）的小機置於身前，講談師手持張扇（はりせん）、拍子木（梆子）等作為講談時的輔助工具，以邊說、邊唱有時輔以邊演的方式，將內容傳達給觀眾了解，以供娛樂。¹關根默庵說：

所謂「講談」，是近世以來興起的稱呼方式，本來是講釋軍談、物語等記錄類的講義釋讀，大概開始於慶長年間，赤松法印等人在德川家康公前講述《鴻平盛衰記》、《太平記》等書，接著又續講各諸侯的軍書為濫觴。此後，世人稱講談師的發跡，實際上是以「太平記讀」以降後開始。²

佐野孝在《講談五百年》中，則闡述「講談」之語，他指出：

什麼是「講談？」「講」與正史意義相通。「談」，則是稱之為正史的平易之語。「真講談」則是作為我皇國精神的正傳，作為宣揚日本神的藝術。「講談」是日本獨自擁有的，……這種單純的藝術形式讓許多聽眾感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找不到，這正是日本精神產生之源。³

佐野孝對於「講談」的說法，忽視講談可能源於中國「說書」文化的關聯性。不過透過他對「講談」的解釋可知，作為說唱藝術的「講談」對於日本文化及民族精神的養成，實有重要的影響。至於自何時開始可稱之為「講談」？佐野孝的論點，與關根默庵相同，他說：「作為近代藝術的講談，自『太平記讀』出來後開始。」⁴而在之前，「講談」的始祖則可追溯至《古事記》。有關於肇國物語、神國精神等，物語部的人則可做為講談的始祖。⁵但他補充說明，即學界對於「講談」何時開始的論點，並不是沒有人將時間向前推得更早：

以往，關於「講談」的起源，是以於鳥羽天皇的御宇京都進行講釋的吉岡一法眼憲海作為始祖的說法，憲海，是伊豫吉岡人，就學於阿倍長泰門下的博學宏辭。經由左大臣賴長推舉後擔任「法眼」一職，專門在宮廷中講述史書……，此說法是明治十五年在警視廳的講談業者所提出關於講談由來的根據。⁶

¹ 日本国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国語大辭典(5)》(東京：小學館，2001年5月)，頁372。

² 關根默庵，《講談落語今昔話》(東京：雄山閣，大正13年(1924))，頁1。

³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東京：鶴書房，昭和18年(1943))，頁2。

⁴ 同上註，頁3。

⁵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3。

⁶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7。

無論關根默庵或是佐野孝，他們對於日本文化上「講談」的開始，都是以「太平記讀」作為起點，而自「太平記讀」出來後，約在江戶時期的元祿 13 年（西元 1701 年），開始有以軍書記錄作為主題的講談出現，此時也興起了以特定場所為講談地點的講談所，佐野孝根據貞享四年出版的《野良立役舞臺大鏡》指出，淨王留璃作者近松左衛門是當時著名的講釋師，在「堺」就有自己的劇場。但江戶時期的講釋場，則以名和清左衛門開始，淺草見付的「太平記講釋場」則是江戶講釋場的濫觴，然後，以「太平記講釋場」為基礎，江戶時期開始出現眾多的講席，無論是娛樂性或藝術性，「講談」都為江戶時期的日本文化留下炫麗的一頁。⁷

江戶幕府時期，自赤松法師為德川家康講演戰記物語後，講談主題大體上趨近宣傳德川家平定天下的功蹟，此時最常講釋的主題，諸如「三河後風土記」、「味方原軍記」、或是關於「東照神君」的事蹟，皆是與德川幕府有關的史傳材料，並藉此作為社會教化、武士道鼓吹和庶民教化的示例，但也有少數的講談師講釋的主題是以批判幕府為主，因而遭到殺身之禍，例如馬場文耕即是因此遭到幕府處以死刑。以後的講談師，講談主題多偏向國民精神大義的貫徹、武士道以及義理人情方面的內容，延續「太平記讀」以降的忠義孝行、義理人情和武士道精神。⁸

元祿以後，自文政時期到天保時代，是江戶文化最為燦爛且成熟的時期，「講談」也隨之由初期重於教化功用，變得演藝化。此時的「講談」技術亦趨於巧妙，成為民眾們娛樂和知識上的引導，講談師雖有藝人化的傾向，但也讓「講談」成為高座藝術，透過不停地磨練與修改，日本的口語藝術在此時達到極盛，佐野孝描述此時期講談師的技法：

舌一枚、搖扇一張，數萬軍勢的叫嚷突擊的情景髣髴出現在眼前……，無論是數十人登場的場景，或是一個人一生的描述，或名君、或俠妓、或豪傑，亦或是俠盜，甚至是幽魂，都讓聽者感到慄然。⁹

可見此時期的「講談」技巧，無論是生動度或是講談師的藝法，都已較江戶初期來得完備，可以說是在江戶時期奠定了它在日本文化上的地位。

到了明治時期，「講談」延續江戶末期的良好發展，但此時期政府有意地培養講談師，加上明治維新之故，不少講談的主題，不僅有娛樂性的藝術化效用，還加上日本歷史、國家精神作為講談內容，講談師也以發揚國家精神作為自我的

⁷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15。

⁸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9。

⁹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75。

使命。佐野孝認為，此時的「講談」可以說是在藝術性與道德教化性兩者間渾然融合，當「道義與技藝」渾然成爲一體，則可代表「講談」作爲日本獨特的口話藝術已完成。

就講談席而言，明治初期的講談席幾乎是延續幕末即已營業的寄席，像是東兩國五郎兵衛席、西兩國的福本、淺草見付的太平記場、以及淺草三社前、辨天山、奧山的金車、神田的小柳和上野廣小路的本牧、日本橋的四日市、京橋際的都川、清竹，中橋的松川和石崎等，都可以做爲大場席的代表。其他的小席，則有夜講的形式存在，例如明治 10 年（1877）左右大小的席四十五軒，講談師約有 480 人、頭取格約 10 人，貞山、燕尾、如燕、燕林、麟慶、南龍等即是。整個明治時期講談席的風氣，可視爲是江戶時期的延長，較爲例外的是講談師松林伯圓以「西南戰爭」爲主題的新作，講談師以著洋服上場爲觀眾講釋較爲特殊。之後，陸續有在「寄席」方面以西化的形式加以改良，例如位在日本橋蠣殼町的「友樂館」，即是充滿洋風的寄席。明治 24 年（1891），講談達到頂峰，此時期的講談席僅在東京市內數量就高達 80 軒、講談師 800 人，聽眾則往往坐無虛席，有名的劇目則如「淺草劇場」有「市原野」、「夜討曾我」和「水滸傳」等。本鄉座在明治 25 年則有末廣鐵腸作的「雪中梅」。¹⁰

到了大正、昭和年間，「講談」呈現「沒落期」。¹¹而沒落的原因，竟然是明治 30 年代左右的「日露戰爭」所造成的。進入大正時期後，東京市內的講談席只存 30 餘軒，接著連年轉業、廢業，數字不停地減少，後又因爲地震等天災影響，東京市內的寄席竟幾不復見。

但也由於「講談」的急速沒落，讓有識之士開始重視它的存在。再者，受到震災傷害的災民，也急需可以撫慰心靈的娛樂。只需要簡單道具如扇子一把、張扇一枚的「講談」，就這樣成爲最適合提倡的消遣活動。有心者開始在災區各地設立臨時演藝場，邀請如伯山、貞山和伯鶴等講談師前來表演，「講談」反而因爲震災的關係，見到復興的曙光，這是其他表演形式如映畫、浪花節等所比不上的。¹²而真正讓「講談」有起死回生機會的，則是「講談獎勵會」的成立。

「講談獎勵會」希望讓「講談」最原初的始命復活，意即透過國民道義的鼓吹，對於當時源源不絕進入日本的英、美思想和赤色思想感到恐慌，而欲重新提倡「講談」文化，作爲對抗外來文化的武器，以維持健全的國民思想……，簡而言之，「講談獎勵會」的成立，就是希望能再度喚起並涵養國民的日本精神。基於上述理由，大正 10 年（1921）以上野精養軒爲所在地，邀請新聞記者、政治家、實業家和教育家等，與講談師們一起出席開會討論，著名講談師如松林伯

¹⁰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169-174。

¹¹佐野孝指出：「大正、昭和年間是講談的沒落期。」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180。

¹²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180-181。

知、寶井馬琴、錦城齋典山等曾擔任發起人，強調為防止思想惡化，而必須有所作為，「講談獎勵會」因此成立，翌年 11 年 12 月即召開第一回大會，「國民講談運動」也就這樣如火如荼地展開，但到了大東亞戰爭時，「講談」又再次趨於沒落。¹³

大體而言，「講談」與中國的「說書」，或是臺灣民間的「講古」，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娛樂性皆濃厚。大正年間，「講談落語研究會」是為推廣「講談」、「落語」的說唱活動而組織的機關，「研究會」成員即不停地宣揚「講談」、「落語」在通俗教育中的重要性，例如床次竹二郎肯定「講談」、「落語」對於推行通俗教育的益處，可以有風教上的利益。¹⁴田所美治則言：

近年來，通俗教育得以振興，主要是伴隨著通俗演講會開始在各地成立，此教育的日益發達，是一件可喜之事。……最為俚耳說話，是最為容易以微言雅諺深入聽眾的情緒，引發老弱男女齊聲歡笑娛樂，並自其中得到知識。

「講談」、「落語」實為我國獨特的妙技，自古以來廣在民間流傳，或傳頌忠勇義烈的事跡，或資以常識的修養發達，對於國民的一般教化效果甚大。今日雖以採用歐美諸國的長處而實施，但另一方面利用我國固有的特技仍是最為適切。¹⁵

但無論是「講談」或是「落語」，在臺灣等地，亦有類似的說唱形式出現，例如日治臺灣文人魏清德就在〈島人士趣味一斑 戲劇及勸善講古〉一文中，提到臺灣類似「講談」、「落語」時，就以臺灣民間傳統的「說書」將這些不同風俗、地點產生的說唱藝術形式加以比擬，並述其講唱方式，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若夫講古則純乎大眾娛樂機關，聽一回投以一錢，且聽下回分解時，則又再投一錢，講古講小說，語雖不經，然皆寓勸善懲惡之教訓，其荒誕則《封神傳》、《封劍春秋》、《征交趾》、《西遊記》等；歷史則《列國》、《三國》、《反唐》、《說岳》等。武俠則《水滸傳》、《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等；美文則《西廂記》、《桃花扇》、《紅樓夢》等；偵探則《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講古師即日本之講談師，須口舌伶俐、無贅詞、無複句，聲音明晰。聽之者大抵為目不多識字之人，恒多耗煙茶費，亦有狡而吝者俟講畢收錢時，則稍稍引去。俟其再講復來，或遠生而假寐。講古師雖明知其故，亦不復誅求之，要之淺易之音樂及戲劇，勸善講古，皆適合於大

¹³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180-193。

¹⁴「講談落語研究會」編，《趣味の講談落語》（東京：富文館，大正 15 年（1926）5 月 10 日）。

¹⁵ 同上註。

眾趣味，故不惜為之介紹。¹⁶

針對臺、日兩地講唱形式的比較，且更為清楚描述的人則是署名為「塘翠迂人」的作者，他在〈臺灣講古私考：落語と臺灣人の考察〉一文中，由民眾娛樂的研究角度出發，指出臺、日兩方的民眾，皆對於此種名稱不同，但內容、形式大同小異的說唱藝術感到喜愛：

世上稱為民眾娛樂的表演藝術其種類非常的多樣，像稱為『お芝居』的特別為婦女所喜愛。其中演劇、或最近特別進步發達活動寫真，讓年輕人血液奔張興奮的映畫、用折扇敲桌軍談及其他說讀故事的講談，像那赤穂義士傳、表看板的浪花節等種種數都數不完，民眾的面前將種種話題以有趣、好笑，加上身手表演引人發笑或聆聽，結尾並作很巧妙的完結，這種落語為民眾的真正娛樂之一，與落語講談、浪花節同樣為現代受歡迎並有人以此為業的人，即稱之為落語家，又俗稱為話家。在日本內地作為演藝的場所有一般稱為「寄席」(よせ)的定席，收取入場費，一晚數人以上進出，作登場表演，讓聽眾即客人意猶未盡、使其嘻笑，雖時有盛衰，但是相當興盛，自古以來精於話術者人材輩出，到後世仍然留其名者大有人在。¹⁷

並直言「講談」與「落語」雖沒有演劇、映畫直接入眼的效果，卻仍能打動人的情感，甚至幫助殖民者了解臺灣民俗文化：

民眾娛樂當中影響人的興趣、思想的以演劇電影為最大，講談、落語類也可能帶來很大的影響，不用引內地之例，光去探考在臺灣的內地人就可以明白，這個事實也適用於臺灣人，從娛樂中所受的影響不論好壞都很大。特別是在臺灣，有一般稱內地人的我等大和民族，另一方面有稱臺灣人為支那民族，皆對於特殊風習的影響很大，故對民眾娛樂中演藝的考察顯得非常重要，相信也是理解一個民族的方法。¹⁸

又說：

支那與臺灣屬同一民族，其沒有講談落語的區別，向群眾說話引起他的興趣，一種作為民眾娛樂演藝的話術其歷史相當久遠，逐漸發達而來，支那人稱為一種「咄」。《齊東俗談》中記載：「韻會曰說咄相謂也，以口出聲」，此「相謂」為互相之意，彼此在人群集中的地方說說，以口出聲，說些無

¹⁶ 塘翠迂人，〈臺灣講古私考：落語と臺灣人の考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129-132 期（昭和 3 年 3 月 1 日-6 月 1 日），頁。原文為日文，除筆者自譯外，另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資料中心六樓館員潘淑慧小姐協助與校正，在此致謝。

¹⁷ ¹⁷ 塘翠迂人，〈臺灣講古私考：落語と臺灣人の考察（上）〉，頁 94。

¹⁸ 同上註，頁 95。

關緊要的話互相打趣開始，此為莊子所謂『端者端崖』，端崖者，端也，無法道盡者，以會意之，不用掛心、無關緊要的東西。日本的是なし取自莊子的端崖，在支那這種無關緊要的話彼此間流傳，到後世成為娛樂演藝的東西，但支那人的音樂為壓住吵雜，往往震耳欲聾般的鑼鼓掀天，人愈集中愈加吵鬧，雖沒有日本、西洋的興盛發達，但帶有滑稽味讓人歡喜發笑的身表演，特別合支那人的胃口，其身手引人發笑的說話。「咄」，其內容為表演者身手的笑果讓人感到興趣，聽者引以為樂。因此不像演劇、電影一般只在劇場表演，大都於酒宴當時或人來來往往的一角，以簡單足以讓聽眾坐下的場所，說給這些集中的人群聽，類似日本的「辻講釋」，而說話的內容很多與歷史相關，像《三國誌》、《西遊記》，或有名的小說類。表演者並非很有學問的人，只是遵循以往，盲目地表演而已，而聽眾對其說話的內容卻不在意，只要表演者的身手令人發笑或令人感到興趣即可，若干的謬誤顯得很愚蠢、隨便亂說也不會引起不平。有趣掛帥可以窺見出支那人的特質，而表演者以一位藝人，身分低賤，作為職業，賣藝人般既無學問也沒有品位，大抵相當於我日本的大道藝人(街頭表演藝人)，在支那的這類演藝，在目前也不那麼盛行，正逐漸衰退中，此正是理解支那人的一項考察，也是民俗研究的標的物。¹⁹

不難發現，以上藉由研究講古、說書以了解民俗研究的言論，其背後都充滿殖民者優越的地位，以及對於支那、臺灣民族性充滿好奇的心態，這與日本殖民臺灣後，伊能嘉矩、金關丈夫等日本研究者致力於臺灣原住民文化、民俗研究的舉動類似，動機都在於了解大和文化與異文化間的異同。臺灣與中國的文化關係固然緊密，卻又發展出獨特的一面，無怪乎引起日本研究者的注意，而在臺灣進行臺灣、中國與日本三者民間藝術的比較性研究，臺灣於是成為兩方文化的交匯點以及比較的基礎，故緊接著談及日本「落語」、「講談」與臺灣「講古」之間的異同：

臺灣的講古也就是落語，但與我日本內地所稱的落語不同，縱令「講古先」或「講古先生」其話術者的話術的表現方法，話題的內容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說臺灣的講古先話術方法，即話術的身手表現，使身手裝的有趣博取嘻笑的的表情法，我落語家屬於此，其他的話術者其態度反而類似我日本的講談師。至於其話題的內容，則為我日本「落語」與「講談」混合的一種話，很多都是古代的故事，戰爭故事(軍談)尤占多數，恰與西洋的珍聞逸話，英語的 AnAnecdote，德語的 Die Anekdote(前述德語 sagte 在此訂正為 Die Anekdote，落語德語為 saguteSpriecherer 訂正為 DerAnekdotener zähler，校稿粗陋特向著者與讀者致歉。)屬於臺灣落

¹⁹ 同上註，頁 100。

語的講古，主要以珍聞逸話的古代故事。²⁰

以上三段話，分別指出「講談」與「落語」的發展歷史、娛樂效用，以及與臺灣的「講古」存有大同小異的特點。無論是日本或臺灣的說唱技術，它在教化、娛樂或是理解民族文化上的效用都極強，題材方面或許略有差異，但大多數仍是以戰爭故事作為吸引觀眾的最大賣點。由於臺灣民間本身就有「講古」的存在，當日本殖民文化進入後，「講談」和「落語」得以快速地被臺灣社會所接受，由此可知，為何當時的臺灣報紙上，會轉刊大量的講談作品了。

二、著名講談師及代表作

「講談」做為日本文化中重要的說唱藝術，數百年來培養出不少優秀的講談師，這些講談師的表演不但受到日本民眾的歡迎，在探討日治時期於臺灣流傳的講談作品前，也必須對於活躍於日本講談師的生平、風格及代表作有所了解，並與在臺講談作品加以對照，才能釐清「講談」在日本與臺灣兩地間流傳的關係。

（一）江戶時期著名的講談師

江戶時代為講談發軔之始，此時的講談師大抵為幕府所重用，專門為將軍講授歷代的戰記與物語，此部份在上段落已有介紹。但仍有不少講談師於民間表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例如以「太平句讀」聞名的清左衛門，雖然生平不詳，只知道他是京都人，但卻因有訴訟案件而被迫滯留於江戶，時間長達三、四年之久。清左衛門的講談點在淺草見付御門，非常受到民眾的歡迎，聽者常常將道路擠塞的水洩不通，甚至稱清左衛門為「江戸の名物」（江戸的名產），和他同時期的有名講談師還有赤松青龍軒。佐野孝的研究推論，赤松清龍軒應該是播州三木鄉土赤松祐輔的藝名，但有一說法是他其實和清左衛門是兄弟，不過，赤松青龍軒之後下落不明，清左衛門的卒年也不清楚，可能於享保2年8月左右過世。有趣的是，佐野孝指出清左衛門晚年的講談主題，內容幾乎是在嘲罵德川氏，並喜歡講述《太閤記》的內容，兼論大阪戰事的經過，並時常以「狐狸」稱呼德川家康。²¹由歷史的演進觀之，雖已步入江戶時期，仍有不少民間文人同情豐臣氏的處境，並緬懷太閤遺風，認為德川氏並非以正道取得天下，表現出不同於在幕府中專門為將軍歌功頌德的講談風格。

論及講談師藉由「講談」對幕府進行批判，則以馬場文耕為代表。在馬場文耕以前，是講談與庶民大眾最為接近的時刻，講談的俚俗性、下流、情色等特點吸引不少庶民前來聽講，而講談內容則僅以軍記軍談、騷動物、高僧傳等為主

²⁰塘翠迂人，〈臺灣講古私考：落語と臺灣人の考察（中）〉，頁79。

²¹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12。

要範疇，難有新題材出現。但自馬場文耕步入講談界後，他向世界汲取新題材，於是有《新場的九郎兵衛》、《麴町の東伊》，以及俠客物語如《遊女勝山》、《松葉屋瀨川》、《佐野次郎左衛門》等，佐野孝說：「自從馬場文耕開始，講談的世界豁然開朗。」²²可惜不久，馬場文耕也因為在講談過程中批評時政，被幕府逮捕後處死。²³

馬場文耕的弟子森川馬谷繼承了師父的遺志，將講談更為發揚光大，鞏固了江戶講談的地盤。馬谷主要活躍於寶曆、寬政初年，馬谷的時代，確立寄席的形式以及講談定席的出來，並附設床几、手習師匠、水茶屋等設施，讓講席場的設備更加完善。馬谷在講談時的讀物，則依初、中、後分為三段，分別以軍書、家騷動和世話加以區別。在場座席並分設前座、中座讀、後座讀等順位。馬谷本人講談時，若是夜間則左手提燈、右手的扇子加以打拍子，客人方面則輔以菸草、茶水招待，以增加講談時的樂趣。²⁴

東流齋馬琴的「寶井派」可以說是森川馬谷的直系派別，馬琴本名吉田常吉，出自神田的版本屋二代目馬谷的門下，會改取名為「馬琴」，出自於對文學家瀧澤馬琴的喜愛。²⁵東流齋馬琴以有時卑俗、有時富含趣味的風格受到大眾歡迎，但也加強了藝術上的巧化。當時的評論，將東邊的大關東流齋馬琴與西邊的大關梅林舍南鶯，視為引領藝風的代表。由於受到民眾的歡迎，馬琴門下的弟子多達六十三人，琴凌、琴莊、琴寶、和琴鶴皆為一時之選。²⁶馬琴之後，伊東燕普將講談視為「道義」的鼓吹媒介，多講述名君良將、忠臣烈婦的傳紀，以發揚「道義」為使命，和講談師的「藝人化」呈現不同的風貌。其實，當時江戶的民眾也都各有所好，有為較趨近於藝人化的講席喝采，也有讚同燕普一派，將講談視為教化的工具。或是如此，燕普除為將軍家齊講述《味方原軍記》，以敘述家康過去的行動外，燕普在 80 歲過世前，自己也閱讀過不少小說如《太平記と曾我物語》、《川中島軍記》、《源平盛衰記》和《三國志》。²⁷其他像是義士貞山派的錦城齋典山和邑井派貞山、田邊派的田邊南窓對於《義士傳》的熟讀，都各具特色。²⁸

除了上述各流派外，在馬場文耕後及其弟子森川馬谷出現前，則有京都的原永揚、大阪的赤松龍、享保的神田伯龍等講談師成為講談界的重要人物，例如屬於神田派的伯龍子，擅常講演與大名、旗本有關的兵學、軍記，《武家名數》、

²²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20。

²³馬場文耕之死，起因於美濃八幡城主金森賴錦家不當收取賄賂而發生的「金森騷動」，馬場文耕藉此批評幕政，而主張恢復皇權，故遭幕府處以極刑。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23。

²⁴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33。

²⁵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37。

²⁶同上註。

²⁷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48。

²⁸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50-57。

《太閤記大全》等則多為其參考的材料。另，佐野孝根據《南部藩勤王思想史》的紀載，指出約在明和年間，還有講談師如江戶的隨秀軒、仙臺的柏應、江戶的燕三志、深井志道軒、成田如川等，其中有名者如深井志道軒，名榮山，號無一堂，於淺草寺內講釋以「滑稽」為主的戲言。這些講談師多講「軍談」為主題的內容，並鼓吹勤王思想，雖沒有清左衛門和馬場文耕有明顯的反幕思想，但政治立場較相近。²⁹

由上述各家講談流派和講談師的特點可知，「講談」雖為上至幕府、下至民間皆喜愛的消遣娛樂，但它主要的演出場地與對象，仍是面對民間大眾。由於講談師們各有不同的意識型態與偏好、技法，無形中為講談增加不少藝術性和娛樂性。講談師又往往利用講談的時機，藉以發揮自己對時政的不滿，或是對幕府的喜好和厭惡，如此，講談師很容易就可以號召群眾或操控民心，自然地會招致幕府的注意，進而會有講談師因此惹上殺身之禍。但隨著「講談」的體制愈益完備，「講談」逐漸由俚俗化趨向雅化，並從民間技藝轉為國家文化的代表。

（二）明治時期著名的講談師

「講談」發展到明治時期，最著名的講談師首推松林伯圓。天保2年(1832)，伯圓出生於常陸下館，父親為石川伯耆守的家臣，所以伯圓實為武士之子。但為何武士之子會走上寄席藝人之路呢？佐野孝並未找到相關的資料，但可以知道的是，伯圓在16歲時成為伊東潮花的弟子，再加上幼時好武藝及沉迷於草雙紙的閱讀，或為了養家需要，經過在伊東潮花門下長時間的刻苦學習後，伯圓成了一名講談師。由於出身於武士之家，先天環境的影響下，伯圓很輕易地就讀到武家書籍，奠定他日後在講談界的基礎。伯圓的時代，恰好歷經安政、萬延、文久等時期，剛好這些時期都出現了影響日本甚鉅的大事如「黑船事件」、「安政大獄」和「櫻田御門之變」。整個江戶的氣氛瀰漫著不安的氣息，由於人心不安，需要尋求演藝娛樂的慰藉，寄席場往往呈現滿員的情況，此時可以稱作是世話物語的全盛時期，講談師也開始朝向純然藝人作轉變。

明治改元後，伯圓38歲，新政府開始實行新政，東京市充滿著興盛的活力，到處都擠滿了人。在文明開化的世界中，江戶的講釋場亦是繁盛，對講談界而言，可以說自江戶時代以來進入一個充滿活力的黃金時期，之前天保年間的改革在此時收到效果，除松林伯圓躬逢其盛外，其他如三代目貞山、桃川如燕、神田伯山、放牛舍桃林、伊東燕尾、邑井貞吉、柴田南玉、小金井蘆洲、寶井琴凌等，各講談派別都呈現興盛狀態。而對正積極推動新政的維新政府來說，透過講談師的培育，對於新政推行將會有正面的助益，松林伯圓就在此時屢次成為政府的座上賓，協助政府向國民宣傳美德，如明治6年7月，松林伯圓和其他4、5位講談師就

²⁹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59-71。

在淺草寺內，以菊池容齋等前賢事跡為主開講。³⁰此後伯圓屢有新作問世，明治7年於「河原崎座」有「河內山宗俊」上演，外題「天保六花撰」，當時的新聞紙並以「演史家松林伯圓」的封號稱之。隨後幾年，陸續又有「近世史略」、「佐賀傳法錄」、「清國戰話」和「鼠小僧次郎吉」等創作出現，其中又以「鼠小僧次郎吉」最爲人所注目。³¹由於松林伯圓的努力，講談進入到一個發展高峰，伯圓與團十郎、菊五郎等人的合作，讓講談的風氣更爲興盛。故佐野孝稱其爲「講釋界的第一人。」晚年，他隱居於鶴見總持寺之傍並度過餘生，於明治36年過世，享年75歲，其門下優秀弟子約二十餘人，例如伯知、伯鶴等皆是³²，其中又以伯知的講談作品對臺灣小說影響最大。

伯圓之後，桃川如燕的「百貓傳」，融合怪譚與笑話於作品中，受到觀眾廣大的迴響，他與伯圓一樣，也同樣有在明治天皇前講演的殊榮。另可與兩人齊名的三代目貞山，則是以「講談」鼓吹「武士道」、發揚日本精神作爲他的使命，故「義士傳」成爲他最拿手的劇目，其弟子有貞鏡、貞花、貞宗、貞朝等人。放牛舍桃林一門，源於東流齋馬琴，此派重視講談師應要有正確的禮儀、要有令人信任的師表和人格。桃林的創作今殘留「葛飾五人男」、「白藤源太」、「延命院」、「まとひの譽」、「東豪俠客傳」、「仙石騷動」、「大久保今助傳」等，收有桃葉、桃玉、桃季、桃庭等33位弟子。其他講談流派則有南龍、大南麟、蘆州，以及伊東派的燕尾和陵潮，代表作有〈天保水滸傳〉、〈天明力士傳〉等。³³

整體而言，明治時期的各流派其歷史淵源都可上溯至江戶時期，到此時發揚光大，固然是文藝演變的自然過程，卻也是因政治維新、開化後，思想漸趨自由所導致。雖然仍可見政府的意識型態在背後加以掌控，例如將其視爲維新政策的宣傳工具，或是招集講談師到天皇面前表演。但與德川幕府時期動輒以極刑迫害講談師的言行，已經算是較自由了。值得注意的是，「講談」並未因爲日本努力的西化而被視作落伍的藝術行爲加以丟棄，其在民間或朝廷受歡迎的程度，不但鼓舞講談師推陳出新，也讓它自己能在日本文化史上繼續延續下去。

（三）大正、昭和時期著名的講談師

大正初期，是「講談」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此時的講談師，還是以明治時期以降的眾人爲主，例如松鯉、伯知、典山、馬琴、貞山、伯山、如燕、文車、貞水、貞吉、南龍等，但這些人一過世或退休，「講談」就掩藏不住頹勢。³⁴

³⁰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88。

³¹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87-89。

³²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101。

³³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126-133。

³⁴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183。

但，並非就因此沒有傳承的人物產生，一龍齋貞山身為講談組合的負責人，以熟悉「義士傳」著名，他擅長於對調子的掌握，並以簡潔的口調讓「講談」真正落實口技的特點還有像是大島伯鶴，以善講「三家三勇士」、「笹野名鎗傳」聞名。神田伯山過世後，門下三弟子伯龍、ろ山、山陽三人為現代講談師的佼佼者，例如明治 23 年出生於淺草的伯龍，可稱得上是當代第一名手，他擅長講「小猿七之助」、「鼠小僧」、「四谷怪談」等篇名。³⁵

要言之，大正、昭和時期的「講談」雖沒落，但在其發展最強盛的明治年間，正好是臺灣正面臨著大量日本文化隨著殖民政治強迫引入的時間點。此後，「講談」也嘗試著在臺灣紮根，並質變成為臺灣通俗小說的一部份。

第二節、日治時期在臺灣流傳的講談

為何日治時期在臺灣流傳的講談，值得吾人所重視，或是將其列入日治時期臺灣通俗小說的發脈絡中加以思考？如果以文化跨界流動的觀點思之，則東亞鄰近諸國的影響將是環環相扣，況且，臺灣又處於殖民統治下，自不能忽視日本文化對臺灣的影響，所以塘翠迂人指出「講談」不應該由臺灣文化的探討中抹去：

在各種多樣民眾娛樂的演藝中，演劇、電影直接訴諸眼睛，講談落語則單從耳朵進入，無論那一種那種動搖人心，左右感情的微妙動作具有一種魅力，不論藉由眼睛或耳朵其給人的影響結果，社會風俗教化上所反映出來的回響所及非常的大，其事例自古至今存在著很多，其事實明白無庸置疑，故也是影響最大的演劇電影講談落語加上勸善懲惡的一面，往昔演劇也利用此一方法讓世人接受，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人類思想的變化，如今雖無法完全如往，以前利用其便的演劇，讓與其關係密切的講談落語也同樣地在世上進行運作，今日演劇也具有同樣的傾向，唯獨不列為講談落語與其淵源稍遠的浪花節、義士銘銘傳在看板上存在而已，此等直接進入人耳目民眾娛樂中的演藝，其反映力及迴響力，其結果產生的強大力量，到如今更必須要加以認識，其善用方法、因考察所得到的結果加以活用，需要賦與深大的注意。³⁶

日本的講談，進入臺灣文化的場域後，如何融入臺灣通俗小說的組成中？經由對各類報刊的檢視，將可了解這些「講談小說化」的作品，在臺灣通俗小說中的樣貌與特點。

³⁵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202。

³⁶塘翠迂人，〈臺灣講古私考：落語と臺灣人の考察〉，頁 97。

一、活躍於臺灣社會的講談活動

日本文化伴隨著殖民勢力的進入臺灣，開始在臺灣紮根。講談文化亦隨之進入，不但在各大報刊上刊登講談作品，許多講談師也來到臺灣進行表演。進入戰爭期後，講談甚至成為勞軍的娛樂，於是講談師也到軍隊中進行表演。在這些講談傳播入臺灣的方式中，又以刊登於報紙上連載，供民眾閱讀的書面形式為多。

對不會日文的臺灣人而言，語言上的隔閡成為認識日本講談的阻礙。但不懂語言，並不能否定它曾經在臺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日治時期在臺灣發行業最大、發行期最久的《臺灣日日新報》，上面就刊載了不勝枚舉的講談作品。這些講談之作極易辨認，往往在題名之下，就會標明「某某某講」，若有附插圖者，則會另加有繪者的姓名。例如浪迺舍千鳥的〈裾野の夜討〉³⁷、桃川燕林的〈俳諧三名入〉，介紹三位著名的俳諧家芭蕉庵桃青、寶井其角、關津富。³⁸ 尚流齋英山的長篇講談如〈中條武勇傳〉、〈加賀騷動〉、〈飯田八郎譽の仇討〉。³⁹ 早川貞水的〈講談皇國の花〉、〈貞烈美談〉、〈中江藤樹雪〉、〈天保水滸傳〉等。⁴⁰ 一龍齋貞山的〈早野勘平〉、〈柳生重兵衛〉、〈出世の壽老人〉、〈淺野三勇士〉、〈倉橋傳助〉、〈軍事偵探鐘崎三郎〉、〈堀部安兵衛〉。⁴¹ 桃川燕雀的〈天下無敵怪檔猿飛〉、⁴² 小金井蘆州的〈柳生旅日記〉⁴³，大島伯鶴的〈羽子板娘〉、〈鹿兒島奇

³⁷ 浪迺舍千鳥，〈裾野の夜討〉，《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明治37年（1904）2月28日-3月10日。

³⁸ 桃川燕林，〈俳諧三名入〉，《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明治44年（1911）2月23日-3月15日。

³⁹ 尚流齋英山，〈中條武勇傳〉，《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2年（1913）2月16日-大正6年（1917）6月18日。尚流齋英山講演、近藤紫雲插畫，〈加賀騷動〉，《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9年（1920）6月2日-大正9年9月13日。尚流齋英山講演，林水音插畫，〈飯田八郎譽の仇討〉，《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1年（1922）2月24日-大正11年7月8日。

⁴⁰ 早川貞水，〈講談皇國の花〉，《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大正3年（1914）6月19日。〈貞烈美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大正3年11月27日。〈中江藤樹雪〉，《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大正3年12月2日。〈天保水滸傳〉，《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大正3年12月21日-大正4年5月13日。

⁴¹ 一龍齋貞山，〈早野堪平〉，《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0年（1907）4月24日-4月30日。一龍齋貞山講演、今村次郎速記，〈柳生重兵衛〉，第5版，大正2年3月2日-8月2日。一龍齋貞山講演、野田久夫畫，〈出世の壽老人〉，第15版，昭和6年（1931）1月1日。〈淺野三勇士〉，第6版，昭和8年（1933）1月13日-1月17日。〈倉橋傳助〉，第4版，昭和12年（1937）6月18日。〈軍事偵探鐘崎三郎〉，第4版，昭和12年9月1日。矢島健三畫，〈堀部安兵衛〉，第7版，昭和14年（1939）7月25日-昭和15年（1940）3月7日。一龍齋貞山為貞山派的代表人物，他名稱的由來，是參考自伊達政宗的法號「貞山院殿」而來，他於於獨眼龍伊達政宗非常崇拜，故以「貞山」自號，安政2年9月病歿，享年57歲。

⁴² 桃川燕雀講演、長谷川小信插畫，〈天下無敵怪檔猿飛〉，第8版，大正10年（1921）9月13日-大正11年2月23日。

⁴³ 小金井蘆州演、若槻六郎繪，〈柳生旅日記〉，《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昭和13年（1938）10月11日-昭和14年（1939）5月5日。

聞 快男子)。⁴⁴後藤方泉〈日本最初の空戦〉、〈滿州事變硬骨 漢金澤中尉〉。⁴⁵邑井貞吉〈社頭の杉 養老の瀧〉、〈宮本武藏後日の仇討〉、〈義士三村治郎右衛門〉、〈甲斐勇吉〉、〈細川の茶碗屋敷〉、〈楠公と泣男佐兵衛〉、〈乃木大將の逸事〉、〈孝子背割正宗〉、〈義商天野屋利兵衛〉、〈孝子の犯罪〉。⁴⁶以及寶井馬琴的〈天保水滸傳 勢力富五郎〉、長谷川伸作〈國定忠次〉⁴⁷，和海音寺潮五郎的〈江戸桃花陣〉。⁴⁸以上所述，有不少作品是轉載日本講談大師的作品刊登在報上，而除了名家作品外，還有更多講談師其作品被轉載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此外，如嵯峨一野、松浦冠山等人，雖未見有作品刊載，卻時常在臺灣各地如新竹、嘉義、臺南、宜蘭和屏東等地舉行講談會，內容包含政治、通俗文學。田中眠龍則以軍事講談為主，在臺北、臺南等俱樂部、小學校進行表演。

書面化的講談是《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作品的大宗，這些講談不但議題多元，多數的連載時期動輒數百回，讓閱讀者可以不停地閱讀下去，有如看連續劇一般。雖然失去現場觀看說唱表演時的臨場感，卻藉由文字閱讀和插圖輔助，營造出閱讀所具有的想像空間。

講談的普及，並不僅限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為綜合類的報紙，故在藝文版面中，講談得以和其他文學作品並存。除《臺灣日日新報》外，還有許多不限於文學性質的刊物，上面亦載有不少講談，可見講談的受歡迎與普遍性。以下將這些刊物上的講談作大略整理，更能對講談在臺灣的發展情況有全盤地性掌握：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上的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	------	------

⁴⁴ 大島伯鶴，〈羽子板娘〉，《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7年（1932）12月19日-22日。大島伯鶴，口演、今村恒美畫，〈鹿兒島奇聞 快男子〉，《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13年3月20日-昭和15年11月16日。

⁴⁵ 後藤方泉，〈日本最初の空戦〉，《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12年6月5日。〈滿州事變硬骨 漢金澤中尉〉，《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12年7月22日。

⁴⁶ 邑井貞吉，〈社頭の杉 養老の瀧〉，《臺灣日日新報》，第21版，大正3年1月1日、〈宮本武藏後日の仇討〉，第3版，大正14年10月10日、〈義士三村治郎右衛門〉，第4版，昭和7年9月10日、〈甲斐勇吉〉，第4版，昭和7年9月10日-9月15日、〈細川の茶碗屋敷〉，第6版，昭和7年9月11日、〈楠公と泣男佐兵衛〉，第6版，昭和7年9月12日、〈乃木大將の逸事〉，第4版，昭和7年9月13日、〈孝子背割正宗〉，第4版，昭和7年9月14日、〈義商天野屋利兵衛〉，第4版，昭和7年9月15日、〈孝子の犯罪〉，第4版，昭和7年11月15日。

⁴⁷ 身為明治年間著名講談師的寶井馬琴，喜歡描述俠客如笹川繁藏、勢力富五郎和飯岡の助五郎等人的事蹟，故有〈天保水滸傳 勢力富五郎〉的作品。而〈國定忠次〉亦是寶琴所喜愛講演題材，不過臺灣僅有引入長谷川伸之作。長谷川伸作、岩田專太郎畫，〈國定忠次〉，《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2年（1923）6月29日-大正13年4月25日。寶井馬琴，〈天保水滸傳 勢力富五郎〉，《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大正11年7月9日-12月22日。

⁴⁸ 海音寺潮五郎作、富永謙太郎畫，〈江戸桃花陣〉，《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13年（1938）4月22日-7月30日。

浪六	飛脚半兵衛 (一)	昭和7年(1932)03/17日
----	--------------	------------------

《新臺灣》上の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無	軍國講談 カイゼル物語	大正3年 (1914) 12/05	猫遊軒伯知 演	講談大蛇の お玉	大正6年 01/10
井村元 一	新講談 出 世の仇討	大正5年 (1916) 11/10	松林白鶴	講談川中島	大正6年 03/10
村井貞 二	新講談 出 世の仇討 (承前)	大正5年 12/10			

《臺灣地方行政》上の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繁井同心	醜男の發心	昭和11年(1936)05/15

《臺灣鐵道》上の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邑井貞吉	三方目出鯛	大正4年(1915)03/01
邑井貞吉	寛政力士雷電	大正4年10/01
邑井貞吉	たつがしら	大正5年01/01
邑井貞吉	紙衣奥州	大正5年03/01
邑井貞吉	正直新助	大正6年(1917)02/01-11/01
邑井貞吉	土屋家疊紋	大正6年12/01
邑井貞吉	柔道 澁川流祖 傳	昭和2年(1927)01/01-10/01

《まこと》上の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哇花散史	二百兩之行衛	昭和9年(1934)03/01-08/01
	山中鹿之助の 忠節	昭和12年(1937)02/20

《臺灣愛國婦人》上の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渡邊政德	新作愛國婦人	大正 4 年 01/01-12/01 第 74-85 期

《專賣通信》上的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昇龍齋典三	名槍日本號の由來	昭和 12 年 09/15

由以上可知，講談作品並非僅存在於《臺灣日日報》上，而是充斥於日治時期臺灣的各刊物中。講談其實就和小說一樣，不但存在於雜誌、報紙上而使當時閱讀者能夠隨意翻閱、消磨時間，它更反映出當下有不少人對它感到興趣，要是沒有講談所能夠被讀者所接受的市場，講談之作又如何能出現在各大報刊中？值得觀察的是，有很多的刊物，其性質並非文學性刊物，例如《臺灣遞信協會雜誌》、《臺灣地方行政》和《專賣通信》等，都是屬於非文學類的雜誌，但這些雜誌，除了刊登它們主要的專業報導外，還能容許講談的刊登，既表現出講談受到民眾的歡迎，也在專業報導外，留有娛樂空間，作為閱讀者調劑消遣之用。講談在臺灣的傳播力，以及受喜愛的程度，表現出日本文化在臺灣被接受的情況。

講談大量地刊登於各類型報章雜誌中，確立它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化中的影響力。但得以持續追問的是，這些講談的閱讀者，是以哪類型的讀者居多？由於講談本身是口語藝術的一種，卻又可以被化約成文字在報刊上連載，供閱讀者藉由書面形式加以閱讀。無論是口語表演或是書面傳播，講談終究是日本文化的代表物，自然是以日語或日文為主要工具在臺灣傳播。既是以日文為主要的媒介符號，不懂日文的臺灣閱讀者，就會被排除在接受的範圍內。而它由日本傳遞到臺灣刊載的一個主因，則是為了滿足在臺日本人娛樂上的需求，這點由松林伯知〈山田長政傳〉的揭載預告中得以證明：

家庭以外的娛樂漸興盛，「芝居」滿足了這份需求。在本島居住的內地人讀者諸君對於我社企畫連載有益且有趣味的講談筆記多所支持，故此回特由東京圖書社引進松林伯知講演的〈山田長政傳筆記〉，已於近日由入港的便船送達，將儘快於明日的報紙上開始連載。⁴⁹

宣傳文案中，只強調「在本島居住的內地人讀者」，而非「本島人、內地人讀者諸君」，很明顯地未將臺灣人的閱讀需求納入考慮，僅是注意到來臺日本人的閱讀需求。此宣傳的刊載時間為明治年間，日本領臺未久，大多數的臺灣人尚未學會日語，造成圖書企畫在宣傳時，省略臺灣人的閱讀市場，仍然以日本人做為主要的讀者群。

⁴⁹ 〈講談 山田長政傳揭載預告〉，《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36 年（1903）8 月 29 日。

但並不是說臺灣人就對講談全無認知，且站在殖民政府的立場，為達統治成效，臺灣人若能跟著一起接受講談才是好事，所以前述《臺灣日日新報》上才會有豐富的講談作品，以及不少講談活動的宣傳。而臺灣人注意到講談的存在並開始嘗試接受，除了可由前述魏清德的文章中見到外，還在於臺灣「講古」與日本「講談」的相似性。由於臺灣社會的講古之風十分盛行，只要臺灣人對於兩者能有所聯結和比較，也能由此入門，對「講談」進行認識。隨著時間日久，若再補足語言上的不足，經過潛移默化的薰陶，臺灣閱讀者自然能夠加入講談作品的閱讀行列：

講談師，即臺灣所稱為講古先生者也。嘗記臺灣某講談師，善於講演，年中假某寺廟後殿一隅，講《七俠五義》、《西遊記》、《彭公案》等。嘗怪聽眾環集，而收入恒少，蓋因後方聽眾，忖摩將至且聽下回分解時，即稍稍避去，即而復集。其講談師極喜戲謔，一日講至《水滸傳》李逵之際，中間忽問一般聽眾，以黑旋風李逵與講古先生孰猛？眾呆然不知所答，某云：「講古先，實猛於李逵。」眾益不解，請問其故，有問先生益精通拳棒耶？某笑云：「黑旋風黑凜凜，執雙斧近人，人方怕他走去。今講古先生手無斧斤，未至且聽下回分解時，人便生怕望風走去，豈非講古先生猛於李逵耶！」⁵⁰

本文雖是在諷刺當下聽眾的貪小便宜，卻也反映出講古之風在臺灣社會間的盛行，講談實為庶民性極強的講唱藝術。且由文中觀之，錄者在言即「講古」時，並沒有忽視或不知它與「講談」的類似關係，通篇中「講古」與「講談」甚至時常混用，未作嚴格的區分。在以「講古」為基礎下，臺灣閱讀者對於「講談」並不陌生。在創作方面，也將會藉由翻譯、仿作的方式，書寫出類似「講談」的文學作品，「講談」就這樣逐漸地融入臺灣文化中，成為臺灣通俗小說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二、講談師松林伯知及其講談之作

對臺灣通俗小說有直接影響的講談，首推松林伯知的講談之作⁵¹。松林伯知被引介進入臺灣的講談，數量雖少於邑井貞吉，但他被刊載的時間較早，數量亦多、篇幅也長，對臺灣文人接受講談的洗禮有重大影響。《臺灣日日新報》上，有兩篇作品誤將伯知的漢字名「知」以「痴」代替。松林伯知本人並沒有來到臺灣，他在講談方面的盛名與傑作卻被帶入臺灣，供在臺日人或是通曉日文的臺灣

⁵⁰ 〈講談師猛於李逵〉，《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4年（1925）4月13日。

⁵¹ 松林伯知，本名柘植正一郎，安政3年（1856）4月生，昭和7年（1932）3月6日過世。伯知出生於江戶日本橋森御座一帶，在大正12年遇震災搬離，家裡本以經商為業，並經營鴨蛋生意。伯知以《貓遊軒茶話》為其著名代表作。菊池真一，《講談資料集成（二）》（大阪：和泉書院，2002年3月2日），頁69、325。

知識分子娛樂之用，其講談作品的篇名及大略內容，即下表所述：

松林伯知（痴）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講談作品

演者	講談名稱	起迄時間	內容大要
松林伯知	山田長政之傳 (全 50 回)	明治 36 年 08/30-11/06	宣揚日本鎖國時期，第一位赤手空拳遠渡海外探險的日本國民山田長政，由其家族開始介紹，並細數長政探險事蹟。
松林伯知	德川榮華物語	明治 40 年(1907)/10/12	作品未刊於報上，但由報紙上所刊登的書訊可知，日治時期以單行本方面在臺灣販售，內容講述幕府將軍德川綱吉的故事。
松林伯知	講談關ヶ原軍記(全 110 講)	明治 42 年(1909) 12/03-43/05/11	以豐臣秀吉過世後，東西兩軍對戰，以決定天下大勢的關原之戰為主題，講述石田三成、德川家康等人的謀略與戰事。
松林伯痴 (知)	二代の譽塚原左門(全 131 席)	明治 43 年(1910) 11/05-01-23	講述塚原卜傳的曾孫塚原左門的事蹟。全文以闡述忠孝為主要重點，並綜合槍術、劍道、柔術等十八般武藝於小說中，精采緊湊無冷場。
松林伯痴 講、雲林 生譯	塚原左門	明治 44 年(1911) 01/22-05/27	刊登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為翻譯上篇而來，但內容略有不同。
松林伯知	北白河宮殿下 (北白川宮殿下) 下(全 132 講) <small>52</small>	明治 44 年 04/03-45/01/24	配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祭典，由日本引入臺灣報紙上刊登，強調親王的作長過程，並宣

⁵² 前 14 回篇名為「北白河宮殿下」，15 回開始恢復為「北白川宮殿下」。

			揚親王以金枝玉葉的身分前來臺灣，故與臺灣有特殊關係。
松林伯知	俠藝妓（全 79 回）	大正元年（1912） 08/16-11/16	原件不清楚，略視內容為描述江戶時期的藝妓，其俠義事蹟為主。
松林伯知	名槍傳（全 94 回）	大正 2 年（1913） 11/17-03/01	德川幕府三代將軍家光時代，出了一位以高田流槍術聞名的笹野權三郎義胤，以此為主，講述眾武士以槍比試的武打情節。
松林伯知	血櫻長女郎（俠客血櫻長五郎）（全 141 席） ⁵³	大正 5 年（1916）09/10-6 年 02/15	講述江戶時期的俠客血櫻長五郎的發迹過程，由太田町太田屋銀兵衛開始談起。並敘述長五郎如何習得高深武術後報仇，卻以 35 歲英年早逝。
松林伯知	紀伊國をお	大正 10 年（1921）01/01	以東京娛樂界為題材的作品。

由上表可知，伯知講演的題材多元，包涵了歷史、軍事、傳說和武俠等方面，其中尤以描述武士的「忠」及「武」為特點。此外，對於探險、歷險的敘事情節也多有著墨。例如描寫塚原左門、血櫻長五郎、名槍傳笹野權三郎或是〈俠藝妓〉的內容時，故事發展皆緊湊相扣、引人入勝，可想而知若是講談師現場表演，將會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與喜愛。雖然講談師本人未親到臺灣，沒有現場的演出，但透過文字的刊載，得以讓在臺日人或懂日語的臺灣人了解此時在日本講談盛行的情況。

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於講談的學習與模仿

透過前述，可以瞭解大量講談在臺灣報刊上被刊載，以及許多講談活動在臺灣舉辦。以講談如此風行的程度來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娛樂活動和文藝創作，不可能沒有受到講談的影響。就文化影響而論，中國政權在臺灣統治日久，臺灣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自是最深。日本統治臺灣以後，中國文化在臺灣社會中並未消失，而是在其上又加入日本文化的成份，臺灣文化因此多元而豐富，小說自也

⁵³ 前 13 回題名為「血櫻長女郎」，14 回開始恢復為「俠客血櫻長五郎」。

不例外。隨著殖民政權的進入，大批日本文人和日本小說被帶入臺灣，對臺灣文人而言，無疑是一個全新的認識與體驗。

臺灣通俗小說將日本漢文小說視為學習的對象加以模仿，其過程有跡可尋。例如日本江戶時期著名漢學家菊池三溪、依田學海的小說、詩文，不但在日治初期時被轉載到臺灣報紙上刊登，連帶造成同時期臺灣人嘗試書寫的小說，亦帶有相近的風格。⁵⁴但除了漢文小說外，來自日本的講談在書面化後，也影響到臺灣文人所創作的小說，其學習方式可分為譯寫、仿作，以及與中國通俗小說的混寫。

(一) 譯寫：

作為日本文化代表的講談，題材多元而豐富，透過講談師的說唱技巧與表演能力，得以讓觀眾如痴如醉、沉醉在愉悅的視聽享受中。講談轉化成文字後，漸與小說合流，而講談的題材，往往成為小說的內容。此合流現象亦出現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大正年間臺灣販售的娛樂刊物《講談と小説》⁵⁵，將講談與小說合集出刊供閱讀者閱讀，證明兩者存在彼此互通影響的關係。

在日本社會、文化中家喻戶曉的「赤穂四十七人眾」，最能做為同一題材為不同文學形式所表現的代表。自日本元祿 15 年（1702），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執政時，發生赤穂藩武士們為主人報仇並死節的事件後，為日本社會所瞻仰的「赤穂四十七人眾」，即開始出現一連串歌功頌德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涵蓋了紀念文、漢詩、川柳、和歌、俳句、狂歌、狂文、講談、芝居等層面⁵⁶，足見其在日本文學中的影響力。之後，更開始被改編成為橫跨古今的戲劇、小說⁵⁷，成為日本娛樂界歷久不衰的題材。同時，配合義士祭典的舉行、周邊紀念產品的開發，在文創的巧思下，赤穂精神在通俗文化中愈益地被發揚光大，成為日本經典性與通俗性兼備的文化象徵。⁵⁸

「赤穂四十七人眾」的聞名，讓它成為講談中不可忽略的題材。日治時期

⁵⁴ 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究》第 26 期（2008 年 6 月）。日本漢文小說與講談也時常以相同題材互通，例如曾刊登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菊池三溪的小說「義倫長吉」，其源頭可追溯自明治年間的講談「鼠小僧次吉郎」。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94。

⁵⁵ 《講談と小説（8 月號）》，收錄神田伯龍、神田伯山的講談，以及《血潮》、《龍口の法難》等小說。

⁵⁶ 平尾須美雄，《赤穂義士讀本》，頁 290-345。

⁵⁷ 林以衡，〈典範、通俗與皇國教化—以「赤穂四十七人眾」為例論日治臺灣對「武士道」思想的接受〉，收於《第 8 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會議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11 年 9 月），頁 77-106。

⁵⁸ 例如因「赤穂義士」應孕而生的周邊商品如仙貝、公仔、燈籠、服飾等。每年 12 月 14 日左右，在赤穂藩的所在地兵庫縣，或是東京泉岳寺一帶，都會有義士祭典的舉辦，現今這些祭典，又常常是地方商會輪流贊助舉行，可見其與日本生活的緊密結合。

的臺灣，加藤武雄即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講談の文藝價值〉一文⁵⁹，文中除力倡講談的藝術性與娛樂性，足以作為影響大眾文化的代表外，特別題及「忠臣藏」在感動人心方面的作用。昭和 14 年，則有講談師一龍齋貞山以義士中的堀部安兵衛為主角所談論的講談〈堀部安兵衛〉，最重要的目的，則是喚起民眾的愛國意志。⁶⁰這一切都證明「赤穂四十七人眾」在講談中的地位。當然，這股熱潮也擴及至小說，早在明治年間，就已有異史氏翻譯稻岡奴之助的〈赤穂義士-菅谷半之丞〉以日、漢文形式分別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供臺灣民眾閱讀。⁶¹

〈赤穂義士-菅谷半之丞〉的內容，主要在講述主角「菅谷半之丞」本為江戶城英俊公子，但因拒絕繼母的挑逗，反遭到父親的誤會，差點被迫切腹。獲救後，又因父親為繼母所毒死而報仇，最後投至赤穂城主門下，並與其他四十六義士一同在對吉良上野介的報仇中犧牲。

漢文版「菅谷半之丞」是以日文版的「菅谷半之丞」為底本翻譯而來的小說。但由小說回數不同，可知回數較少的漢文版「菅谷半之丞」，並沒有將全本「菅谷半之丞」譯出，中間經過譯者的刪節，也有譯者自行增述的部份。例如日文版以和歌作為開場的「前言」，漢文版就沒有譯出，而是直接描述主角菅谷半之丞登場。在原文中，作者對於半之丞的服飾打扮有仔細的描寫，在譯文中卻僅提及他是著名的美男子。原文中過於冗雜的情節描述，例如須藤數馬與半兵衛對奕的情節，⁶²半之丞與瀨尾於城外溝相遇時的描寫，譯本就刪去很多細情上的描述，而僅提到兩人於城溝外巧遇。不過譯本與原著的故事情節相類似，都是以半之丞力拒繼母勾引，差點被迫切腹為開端。⁶³至於增加的部份，例如半之丞為繼母陷害、被迫欲自殺謝罪的情節，稻岡奴之助並未在文中提及參考何項資料，但譯者「異史氏」卻在譯本中補充說明此情節類似晉獻公受驪姬所欺、將太子申生賜死的歷史情節。此舉得以幫助在當時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臺灣文人，以其所熟悉的歷史事件為輔，快速了解菅谷半之丞事件發生的始末。

日、漢文譯本最值得注意的相異處，在於日文本對於半之丞、父半兵衛及繼母絹子的三角戀情，作了大篇幅且細膩的刻畫，當中並有半之丞遭父親毒打的情節，這點在漢文版中省去。而日文版在小說情節中，不時地強調「武士道」的

⁵⁹ 加藤武雄，〈講談の文藝價值〉，《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昭和 3 年（1928）10 月 4 日。

⁶⁰ 一龍齋貞山講、矢島健三繪，〈堀部安兵衛〉（全 185 回），《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昭和 14 年（1939）7 月 25 日-昭和 15 年 3 月 7 日。

⁶¹ 稻岡奴之助，明治年間著名小說家日。〈赤穂義士-菅谷半之丞〉（全 95 回），《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3 年（1910）5 月 11 日-9 月 1 日。異史譯，〈赤穂義士-菅谷半之丞〉（全 24 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7 版，明治 43 年 5 月 29 日-8 月 11 日。

⁶² 稻岡奴之助，〈赤穂義士-菅谷半之丞〉（6），《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3 年（1910）3 月 16 日。

⁶³ 異史譯，〈赤穂義士-菅谷半之丞（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3 年 5 月 29 日。

重要性，不若漢文版在小說末尾，才由「異史氏」統一詮釋小說主要精神。例如日文版在內容中即強調自神武天皇以來，日本歷史上繼母與繼子的情愛關係、以及日本重視「仁義忠孝」，此四字亦是半之丞自幼年即深植於腦中的觀念。作為一名武士，稻岡奴之助在文中就以此說明武士所必須尊從的精神信仰。⁶⁴而漢文版則將這部份刪去，是令人較意外的部份，但並不表視譯者不重視日本「武士道」的觀念。由文末可知，譯者翻譯此篇小說的目的，就是要將日本武士道信仰傳入到臺灣。至於為何不按照原本夾述夾譯，此即譯者個人的翻譯習慣與策略，或許是考量到臺灣閱讀者欠缺日本史觀的基礎。若在文中摻雜介紹，閱讀者無法立刻培養和建立一個完整的日本文化觀，故將其放到最後才作總論。而漢文版較日文版增加的部份，除「異史氏」的說明外，有不少情節出現的漢詩，並無出現在日文版中，應是譯者自行創作並加於小說內容中。此點表現譯者將中國通俗小說「有詩為證」、「以詩述情節」的敘事特點融於其中，經過翻譯的漢文版〈菅谷半之丞〉因此略異於日文原本。

論述完日、漢文版的幾項差異後，由於譯者刪改的情況明顯，本文不持續對日文和漢文的「菅谷半之丞」作逐字逐句的細譯。此外，〈菅谷半之丞〉刊登的時間點，是在日本統治臺灣未久的時期，譯者「異史氏」的日文能力在日治初期到底達到什麼程度，也會影響翻譯此篇小說時是否具有完整性。且翻譯的方式有多種，譯者可以對全篇小說有大概的了解後，依其意作出詮釋，亦是一種翻譯的方式。⁶⁵值得注意的部份是，由於經過翻譯，漢文版的「菅谷半之丞」有時會添加部份譯者的主觀看法，這是日文版所缺乏的部份，也使得漢文版「菅谷半之丞」明顯帶有自己的特色。例如菅谷半之丞之父親半兵衛，受到之丞繼母的唆弄，欲將之丞逐出家門，譯者「異史氏」補充論斷道：

異史氏嘆曰：「半兵衛家有良孝子而不知愛。揮刃欲殺卒致一門風波如是，婦人長舌維厲可畏，彼豈特以小善結汝心？」⁶⁶

小說後半部開始描述赤穗事件的始末時，譯到「性奸佞、狼貪成性」的上野介義央向眾諸侯索取賄賂的醜態時，則言：

賄賂不到之諸侯，彼則含沙射影，構思以窘辱之。是真所謂黃白世界無異今日。異史譯至此，不覺為之停筆長嘆息也。⁶⁷

⁶⁴ 稻岡奴之助，〈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10)，《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5月22日。

⁶⁵ 童元方解釋當代翻譯論者列夫維爾（Andre Lefevere）的譯詩理論，指出其中一點「重闡釋」，即是譯者可以不拘任何限制，以自己的解釋為主。童元方，《選擇與創造：文學翻譯論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6。

⁶⁶ 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第6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1910）6月14日。

⁶⁷ 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第14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7月8日。

此篇小說的刊載與譯介，正值日治初中、日文化交替的轉變時刻，臺灣知識分子們還處在一個認識日本文化的階段，所以譯者使用傳統中國說書式的手法對小說進行譯寫，也是合理之事。但有趣的是，對於譯者而言，可能也是第一次閱讀到「赤穗義士」的行徑，所以，「異史氏」的譯介，就變得是譯者邊讀邊譯、並不時地與閱讀者們共同分享閱讀心得的翻譯過程，表現出譯者對於赤穗精神的好奇。

但，最能代表直接由講談譯介而來的作品，則非講談諸作廣在臺灣報紙上被刊登的松林伯知莫屬。松林伯知在明治 43 年被轉刊到《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講談〈二代の譽塚原左門（全 131 席）〉，隔年即被署名為「雲林生」的魏清德翻譯後，以〈塚原左門〉之名，刊登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雖然在翻譯過程中，難免對內容有修改、添加的舉動，但內容大致來說相去不遠。⁶⁸〈塚原左門〉講述主角「塚原左門」與反派人物川北大學在熊田兵馬的提議下比武，川北輸了後羞慚記恨，左門之父源內知其勝怕左門遭到川北大學的報復，於是要左門出去周遊避禍，在旅行的過程中，塚原左門陸續結識了藤島兵衛、佐藤五郎左衛門、片田喜十郎、加賀美平三郎和大善和尚等好友，眾人就在塚原左門的帶領下，雖屢遭奸人陷害，卻往往化險為夷。之後，在紀州侯的主持正義下，塚原左門一行人所受到的冤屈得以洗清，反派人物如川北大學等人也伏法。受到重要的塚原左門則擔任武術教師外，仍保有江湖上的義氣，帶領眾旗本為好友彌一報仇，最後彌一大仇得報，塚原左門之名亦流傳於世間。

對於日治初期的知識分子而言，政權改隸後所遭遇到語言轉換的困擾，是必然的陣痛過程。文人既無法在短時間內擁有對日文的閱讀能力，對於知識上的吸收，以及閱讀文學創作的樂趣自然會有影響。雖然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創作空間，但在小說創作者僅限於報社幾名記者的情況下，如何產生更多有趣的文學作品供讀者閱讀，並進一步提升報紙的購買率和閱報率，甚至透過小說為閱讀者介紹新政權的文化、思想，滿足臺灣閱讀者對新政權的好奇心，或是作為記者們向殖民政府示好的工具，這些錯綜複雜的條件，都構成文人以講談為藍本，將其譯為漢文作品供人閱讀的動機。當然，也因為有這些譯作的刊登，日治時期臺灣的小說創作者，才能以這些講談為範本，在閱讀的過程中，仿作出一篇篇類似的小說，擴充日治時期臺灣通俗小說的邊界。

（二）仿作：講談式的臺灣通俗小說

透過對講談在報紙上的連載、譯介和講談會的舉辦，或是日本漢文小說的

⁶⁸松林伯痴，〈二代の譽塚原左門（全 131 席）〉，《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明治 43 年 11 月 5 日-1 月 23 日。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原左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4 年（1911）1 月 22 日-5 月 27 日。

引入，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在創作小說時，不再只是沿襲中國通俗小說的敘事手法或內容，而是將日本文化的原素加入，成為書寫小說時另一個重要的寫作材料。魏清德以「雲」的筆名所述、刊載於明治年間的〈寶藏院名鎗〉和大正年間的〈塚原卜傳〉可作為臺灣文人以講談為範本仿作的代表。⁶⁹

「寶藏院」是位於日本奈良的寺院，其位置大概在今奈良博物館的附近。「寶藏院」在日本武術史上以鎗術聞名，作者魏清德在撰寫通篇小說時，即以寺中僧侶榮壽擅使鎗為主題，學習日本講談的手法，描述榮壽和其徒弟的歷險過程，以寶藏院名鎗，如何在日本眾多流派中自成一家，受後世景仰。小說敘述榮壽出家為僧，但不喜唸經打坐，性喜習武，成為寺中特異之人。某日，平日大量資助東大寺香火錢的商人池田勘兵衛，請求榮壽為其誦經解厄，沒料到榮壽誦經當晚，池田一家遭到「無念流指南派」的劍師丸山真龍軒等人的洗劫，勘兵衛其弟治兵衛和弟媳，由於認出真龍軒等人，因而慘遭滅口，臨終前治兵衛托孤，請求榮壽收其養子重瞳子為徒。榮壽為重瞳子的生父被繼父和母親聯手謀害，進一步欲加害於他，因而被迫流浪的故事所感動，故答應治兵衛的請求，不但收養重瞳子、傳授武藝，還與他一同遊天下，伺機追捕真龍軒等報仇。在旅程中，師徒兩人遇到不少經歷，諸如為少女阿定收服白癩妖，因而發明便於使用的山形鎗。後遇高島彥郎假扮天神以解逼婚之危等。後師徒三人為追捕真龍軒等人，於途中開始與不同的武功高手進行比試，並在幕府號召舉行的武術大會上發現真龍軒的踪跡。最後，重瞳子就在榮壽及好友的協助下，將真龍軒殺死，為養父母報了仇。

同樣為魏清德所書寫的另一篇小說〈塚原卜傳〉，由於「塚原卜傳」曾在〈寶藏院名鎗〉中與榮壽交過手，又為「塚原左門」的祖先，故這三篇小說實可以視為一系列以日本武術為主題的作品。身為「真影流」的塚原卜傳，其師承上泉伊勢守藤原秀綱門下，小說以出羽國羽黑住人尸那圓海前來踢館挑戰為引子，由於藤原秀綱恰好重病不起，門下四大弟子與圓海比武卻又遭致敗戰，圓海因此耀武揚威。惹惱了回鄉探父病歸來後的塚原卜傳，塚原卜傳前去圓海處比試，連敗圓海門下數名高手，因而引起圓海門的圍攻，不慎中計被擒。幸而塚原卜傳在路程中所救之白猿前來報恩，卜傳脫困後暫藏於寺中，卻又巧遇為賊人所追的女子，告知賊人大蛇虎熊等劫其花轎，前往劫掠女子婆家大江滿之助等人。卜傳動了俠義心腸故前往搭救，以力服人，為大江家解圍。隨後卜傳遇其同門師弟丸目藏人，假稱丸目的徒弟土家久一郎，與眾高手進行比試，皆獲勝利。後在旅行途中無意間遇到強人，救了戶澤公手下武士，於是在戶澤公手下傳授武技。後因父兄之仇離開戶澤公處，被仇人佐竹彈正左衛門所害而遇牢獄之災，幸得救而與左衛門等人大戰，試圖為父兄洗刷冤屈。並流浪到上杉謙信處與其手下比試得到勝利，伺機報仇。最後，終在熊吉等友人協助下為父兄報仇，事成後退出江湖而隱居以終。

⁶⁹雲，〈寶藏院名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911）5月30日-10月2日。
〈塚原卜傳〉，《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大正元年（1912）1月17日-2月14日。

以上兩篇長篇小說，都是以日本武術作為題材的作品。其風格和手法，與松林伯知所講的〈塚原左門〉極為相似。但，為何此兩篇小說可以判定並非由松林伯知的講談翻譯而來，而應該是魏清德模仿日本講談的作品呢？首先，就時間點而言，兩篇小說都刊登於〈塚原左門〉之後，故有可能是仿效〈塚原左門〉的創作。其次，要是如〈塚原左門〉般為魏清德翻譯，應該會在小說題名之下，加上「松林伯痴講 雲林生譯」的字樣，且此二篇小說，並未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找到日文版的刊登，而是直接以漢文出現。但這個現象也可能是魏氏疏忽，或是在沒有日文原版的對照下，刻意地未將原著者的姓名標上，以作為自己的獨創之作。若是如此，則能證明魏清德對講談作出大量的翻譯，仍可被視為日本文化傳播進入臺灣的一個重要媒介。是否為魏清德模仿講談的創作，則須由作者的創作風格，以及內容上加以論斷。

由魏清德翻譯松林伯知的講談，以及翻譯〈赤穂義士-菅谷半之丞〉的創作歷程可知，在眾多臺灣作家中較早具備日文能力的魏清德，能夠接受到的文化影響，也早於其他臺灣文人。身為一位作家，在翻譯、閱讀過松林氏的作品後，產生以此為範本的仿作動機是合理的。且兩篇小說如同日本講談一樣，以歷史事件和人物作為內容，頗能符合魏清德喜以歷史為材書寫小說的寫作特點。⁷⁰此外，魏氏之作，亦遵循講談口氣，從而逐步擘畫出小說情節，足見魏氏對於講談的理解極深：

我國劍術之盛，世界鮮有其比，然絕群超倫者，猶推東北人民。蓋東北之人以藝勝，西南之人以氣勝，惟氣勝，故不肯留心於細微之事，其藝遂不能達於精奧。然戰爭，氣也，氣盛者勝，故西南之兵恆強，個人之技擊則敗矣。今日之欲紹介者，為天正年間劍術名人塚原卜傳，卜傳亦東北人也，專千古獨得之劍擊。略次其傳，演為小說，茶前酒後之清談忽見電光石火之快舉，未必非今世尚武之一助也。⁷¹

又言：

塚原卜傳，幼名小太郎勝吉，常州塚原城主塚原土佐守之次男也。十七歲時，入上泉伊勢守門學武。伊勢守姓藤原，名秀綱，真影流之流祖也，武藝之精，既為遠近之所崇拜，門徒萬人，甲於宇內。門徒之中秀出者，為九目藏人、磯端伴造、柳生又左衛門、神宮寺伊豆，此四人稱四天王；又

⁷⁰ 例如雲，〈羅馬王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明治43年（1910）8月13日-12月27日。

⁷¹ 雲，〈塚原卜傳（1）〉，大正元年（1912）1月17日。

其上，為小太郎勝吉，即此小說中所欲演之塚原卜傳也。⁷²

〈寶藏院名鎗〉亦言：

抑日本國尚武之國也，迄今世道開明，尚武之風不變。島人惟知武德會擊劍之盛況，而不知母國人古昔使用武具，劍以外有使用鎗鎌、雙刀、棍棒，如賤岳七槍之大戰，猶轟轟然見於史乘，傳諸口碑。吾人既述塚原左門累世之劍術，今更述寶藏院覺善坊之名鎗，亦尚武獎勵之一道也。⁷³

由以上小說的開頭可知，無論魏氏是作為譯者或是作者，他對於講談的形式已經瞭然於胸，故在小說啓始之時，他便主動提及「演為小說」、「即此小說中所欲演之塚原卜傳也」之語，此點自是講談對臺灣作家產生影響的直接證據。而在述〈寶藏院名鎗〉時，他以「日本國」和「本島人」作為對立，並口稱「母國」，則表露出無論他是譯者或是作者，敘寫小說的主要目標，實是為了促進臺灣人對於日本文化的認識，而利用講談手法作為宣傳工具。講談就這樣以小說的形式，出現在日治時期的臺灣，供作家和閱讀者閱讀與學習，終而成為組成臺灣通俗小說的一環。

（三）混寫：與中國通俗小說的合流

前已述及，日本講談、臺灣講古與中國的說書三者間，存在著互相影響的關係。它們不但表演的形式相近，取材或是發展，也都與小說密不可分。對臺灣文人而言，日本文化的引入畢竟是一個新的接觸，累積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影響，不但已紮根在臺灣文化中已久，在他們的啓蒙過程中，也是最直接的文化教材，這一點並不會因為日本文化的進入而有所倒退，反而能將其融合，表現在小說中的即是充滿中國味和日本風的混寫特色。

臺灣文人對於日本講談的吸收，雖著重於譯介和仿作，但並非只能在小說中展現對日本文化的體驗。在書寫的過程中，文人反而往往融入自我的意見、閱讀經驗，以及中國傳統敘事模式的技巧，表現出文化交融的特點外，也讓講談與中國通俗小說或是說書文化更為合流，大大地充實臺灣通俗小說的文化內涵。首先就形式而論，雖是模仿和翻譯日本講談，但基本的結構上並未脫離說書的口吻，無論是〈塚原左門〉、〈寶藏院名鎗〉或是〈塚原卜傳〉，皆是採用回目的方式表達。這自然是說唱藝術中最明顯的特點，化為書面後，亦是章回小說的基本架構。在表述小說內容的過程中，譯者或著者，則大量地採用「且說」、「待下回分解」、例如〈塚原左門〉：

⁷² 同上註。

⁷³ 雲，〈寶藏院名鎗（1）〉，明治44年（1911）5月30日。

話頭一轉，且說加賀美村之子平三郎自遇塚原左門而後，即改革其心面，將所有徒弟一切讓與猩猩正吉。猩猩正吉，猩猩所生之兒也，家中老母一人，正吉孝行備至。正吉為越前屋杜氏醬油家雇人，有力而勉勵，嗜酒，不肯多飲，所餘購甘旨奉親。

〈塚原卜傳〉亦時常出現說話者的用語：

自是閒話。且說龜井新十郎飽啖一頓，腹既不飢，又釋近江典膳滿腹疑慮，著典膳仍舊教誨生徒，自持行李，匆匆尋塚原卜傳去。藝高之人，亦必欲會藝高之士，第未知此後龜井新十郎得再與塚原卜傳相見否。⁷⁴

在內容方面，講談大量引述中國小說的情節。例如魏清德所譯的講談〈塚原左門〉，開頭即引中國歷本通俗小說為例，將小說中的英雄人物拿來與「塚原左門」等主角互相比擬：

塚原左門清則，我日本之劍客也。寰球之大，何地無勇士？何地無劍客？越處女之驚走猿公，至今尚武之士尚能言之。若夫《三國演義》關雲長之青龍刀、張翼德之丈八蛇矛，《隋唐演義》李元霸之金鎚，《水滸傳》魯智深之禪杖、武松之戒刀，皆絕世之勇，絕代之藝也。塚原左門清則之劍術，亦我日本之關雲長、張翼德、李元霸、魯智深、武松其流也。⁷⁵

〈塚原卜傳〉中，塚原卜傳乘船遇盜時，透過主角之口，著者也傳達出受到《水滸傳》影響的層面：

舟行入深山，絕壁惡溪，樹木蒼鬱。禿頭僧自懷中取黑螺，大可容升，迎風吹之，則船中諸客皆暈倒，昏不知人事，如魚之中魚藤汁者。而前面溪灣一轉瞬間四竹筏飛至，筏上各坐數人，衣白衣，望順風船而進。塚原卜傳大驚曰：「殆哉！是水滸傳中之水滸寨也，彼僧人其魯知深乎？」語未畢，賊人各仗劍登舟，刀□然若雪，爭搜船客衣篋。⁷⁶

〈寶藏院名鎗〉中，重瞳子之繼母與姘夫合殺父親的一段，亦有與《水滸傳》中、西門慶與潘金蓮合力毒害武大郎的情節互文現象：

先是，重瞳子之父喜兵衛既患肺病，凡事不能如其後妻意，後妻美吉因而

⁷⁴雲，〈塚原卜傳（9）〉，《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5年（1912）1月16日。

⁷⁵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原左門（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911）1月22日。此段文字為譯者自言，與原文對照中並無此語，故可歸於譯者本身的閱讀經驗與心得。

⁷⁶雲，〈塚原卜傳（10）〉，《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5年（1912）1月17日。

與鄰人丈五郎通。一夕，喜兵衛口渴，急呼茶，而美吉不在，扶杖到隔舍窺之，重門掩隔之內，孤燈黯淡之下，美吉與丈五郎調笑。喜兵衛至是心頭無明火忽發，登時氣絕在地。重瞳子由炊事場出，呼曰：「阿爺倒地！阿爺倒地！」丈五郎急奪門而出，美吉徐徐扶歸床上。喜兵衛忽醒，怒目疾視美吉，良久不言，忽睹重瞳之子在傍，不覺嗚咽涕下。是時，美吉忽外出，良久始入，捧藥進曰：「適纔由名醫乞好藥，望夫君開懷一飲，速就靈快，我夫婦百年可歡愛也。」喜兵衛閉目不飲，美吉提其耳，強使之飲。翌日，喜兵衛身亡。美吉既毒殺故夫，益與田村丈五郎圖不義之樂。附近鄰右有知喜兵衛之冤者，以為事非干己，莫肯強為出頭，惟有擬議而已；丈五郎亦自斂退。⁷⁷

這些引用、承襲自中國通俗小說的情節，實可以表現臺灣、中國與日本三地間文化融合的特點。如果這幾篇仍是按照日本講談翻譯而來的譯作，則代表日本講談在內容和形式上的確無法自中國通俗小說的影響中抽身，符合本文在本章第一節中對講談發展的概述，亦可見中國通俗小說在日本文化中的融合，而被引入自臺灣刊登，也反映中國通俗小說藉由日本講談進入臺灣時，另闢一條傳播的路徑。反之，若這幾篇小說是魏清德對講談的仿作，則他所呈現於臺灣閱讀者前的，就不僅日本講談的文化成份，而是在書寫的時，亦摻雜中國說書口吻，以及本身對中國通俗小說的閱讀經驗與感想，才在有意或無意間，將中國通俗小說的各項特點，混入自己的創作之中。

敘事作品內容與形式上的多元化，證明臺灣通俗小說兼容並蓄的包容力，以及中國通俗小說對日本和臺灣兩地的影響力。甚至由此梳理出中國通俗小說對臺灣的傳播路徑，可以是如同本文第三章所論直接的傳入，也可以是經由日本的間接傳入。無論是哪種方式，它的終點都是歸於臺灣、並被臺灣通俗小說統合、吸收，臺灣通俗小說在題材、形式和內容上因此豐富外，也將以此形構出自己多元接受的能力。

第三節、中、日文化混生下漢文通俗小說的思想：「忠孝」與「復仇」

經由上述各章節對日治臺灣小說圖書的代銷、演義傳統在臺灣的承衍，以及日本講談文化在臺灣的被接受。可見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東亞文學的跨界脈絡中，實具有集大成的地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生成，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在吸納鄰近諸國的文學精萃後，將其匯聚成自我組成的因子，並透過文人之筆的創作與渲染，才能以多元豐富的面貌，呈現於當下臺灣閱讀者的眼前。

⁷⁷ 雲，〈寶藏院名鎗（5）、（6）〉，《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911）6月9日、16日。

無論是小說書籍也好，或是中國演義以及日本講談，當它們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抑或是政治力運作下的文化傳遞進入臺灣，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敘事手法或文體上將呈現多元面貌。同時，也幫助臺灣文人對它們進行模仿、譯寫，讓這些小說文體在保有基本特徵下，被再造成臺灣文人自我的創作。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化包容力，由此可知。但，除了形式上的模仿、外在特徵的改造和創新外，這些小說內容中所寓含的精神，是否也能隨著小說體裁的進入，一起在臺灣漢文小說中發酵？以下將以上述各類小說書籍、小說體裁為例，論述其中廣被作者宣揚、並作為小說主題的「忠孝」和「復仇」觀，以此證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多方文體的接受與融匯下，亦混雜東亞諸國間不可忽視的文化精髓。

一、承衍自中國通俗小說的忠孝精神

中國通俗小說在臺灣受到閱讀者的歡迎，導致「蘭記」由上海代銷大量的小說進入臺灣，以及透過臺灣文人的書寫，演義傳統亦被承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這兩點皆證明中國通俗小說具有的通俗性，和影響日治臺灣文人創作小說時的敘寫手法與情節上的互文關係。但，中國通俗小說在日治臺灣的紮根，除了形式上可觀察出的特點和影響外，它所欲傳達給日治臺灣閱讀者的忠孝精神，更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首先就演義書籍的代銷而論，對於勤於研讀漢籍的「蘭記」創辦人黃茂盛而言⁷⁸，將中國演義、小說引入到臺灣，真的只有如江林信所言：「通俗作品成為重要的娛樂商品，黃茂盛於是在最為普遍的啓蒙讀物之外，另外找出具有高銷售量可能的圖書類型。」⁷⁹而在娛樂功用、商業利益的考量外，中國通俗小說難道沒有其他作用嗎？作為日治時期的出版人，如同其他漢文書局一樣，「蘭記」在代銷書籍時，首先要面對的，是殖民政府對書籍的檢查：

於創業略有成就後，除應士、農、工、商、醫藥各界學業參考所需外，更著重引介供幼小初學使用之初級漢學讀本教材……，但計畫卻一開始便已觸礁，因時日本政府採皇民化政策，為貫徹皇民教育，嚴禁中國文化入侵。

80

⁷⁸黃茂盛，嘉義人，為創辦「蘭記圖書部」的主要負責人，根據柯喬文的考證，黃茂盛生於明治34年（1901）6月20日，卒於民國67年（1978）11月3日，日治時期的「蘭記圖書部」位於嘉義市榮町二丁目七〇番地，九〇年代中期遷至今興中街一帶。見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64。黃茂盛的好學不倦，可參考黃陳瑞珠著、陳崑堂整理：〈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故事〉，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7年11月），頁3。

⁷⁹江林信，〈漢文知識的傳播者-記蘭記經營者黃茂盛〉，同上註，頁17。

⁸⁰陳瑞珠著、陳崑堂整理：〈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故事〉，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5。

政府檢閱制度干擾的問題，早於「蘭記」的雅堂書局在進口圖書時，也屢次遇到。因此，如何找尋一個既能延續漢文化、又能規避檢查制度的讀物，甚至建構一個符合臺灣一地的知識規準，成為「蘭記」所欲先解決的問題。黃美娥由「蘭記」總體的圖書分類觀察，已指出它是一種「知識論」的建構：

「蘭記」圖書目錄上所展示的圖書分類，也就別具建構時人知識論的時代性意義，這樣的分類觀點，是一種連結於當時臺灣社會、歷史和文化管道所生產出來的一種知識論。⁸¹

那麼，「蘭記」所售的演義書籍，到底要如何跨出僅是「娛樂商品」的迷思，或與「蘭記」在當下所營造出來的整體知識論相融合？黃茂盛在日治時期、以經營圖書事業，所要面對的難處，即是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所言：「出版的難處，便是如何將個人所起的作用導入群體生活中，又如何能在個人與群體間的聯繫上各盡其職能。」⁸²對漢文化仍保有景仰之情的黃茂盛來說，如何躲避過日本殖民政府對於進口出版物的檢查，又能達到文化傳遞的目的，實為實踐己身抱負的重點？觀察「蘭記圖書部」的演變，就可以從中發現到，黃茂盛在引介中國演義小說進入臺灣前，已對小說寄予厚望。

創立於大正 15 年（1926）的「蘭記圖書部」，前身是傳統文人們感慨：「一般人士沉溺在美雨歐風，競巧驅新，流毒社會」⁸³，而欲「網羅古今，有益稗史及諸善書聊以警世，怡養性情」的「小說讀書會」。⁸⁴後因為得到文人們的廣大迴響：「蒙島內諸公極力聲援，各界歡迎」⁸⁵，才擴大規模，變為「漢籍流通會」，將推廣閱讀活動的範疇，擴大到整個漢籍，而非僅只限於小說，希望能藉由此會「挽既倒之狂瀾，維持世道」。⁸⁶此後，才又改組成為「蘭記圖書部」。⁸⁷可見，早在「蘭記」創辦前，「小說」的平淺易懂、普及通俗，是推廣漢文化不可缺的基礎讀物，並受到黃茂盛等人的注意。「小說讀書會」的宗旨，透露小說的兩項功用，藉由中國古典小說，可以力抗西風對社會的影響；又可以「警世」、「怡情養性」。可見，當下之人對於「小說」的認識，不是只有作為閒暇時期的消遣、遊戲，而是把小說視為如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般的「小說功能論」。⁸⁷

⁸¹黃美娥，〈從蘭記圖書目錄想像一個時代閱讀／知識故事〉，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頁 75。

⁸²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 年 10 月），頁 79。

⁸³參考來源：〈漢籍流通會會章〉，蘭記圖書部（漢籍流通會）：《圖書目錄》（嘉義：蘭記，大正 14 年（1925）8 月）。

⁸⁴同上註。

⁸⁵〈漢籍流通會會章〉。

⁸⁶〈漢籍流通會會章〉。

⁸⁷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在各類小說中，演義不但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讀物，同時，也是日本殖民者所喜愛的文類。自江戶時期，大量的中國章回小說被引進日本後，在日本蔚為風潮。⁸⁸一直到昭和年間，各類演義之名，仍被日本學者、作家所重視。⁸⁹既然日本也喜歡閱讀演義，那麼這些演義，既可順利通過殖民官員的審查，也不會像漢文讀本之類、帶有明顯教育性質的書籍，被法令所禁止。

演義是中華文化既有的遺產，藉由演義的內容，可傳達不少漢文化的精髓。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或《說岳全傳》的教忠、教孝，《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五虎平西南》的剿平異族，或是《開闢演義》、《廿四史通俗演義》和《隋唐演義》等，對於中國歷史的講述；以及《臨水平妖傳》所傳達對於婦女生育的安全、衛生的宣導。⁹⁰都透過作家生動的描寫和渲染，往往會比漢文讀本上的諄諄教誨來得更有效用。同時，教忠、教孝與日本國體精神有重疊之處，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將在此取得平衡點。

若由「演義」之意觀察，「演義」可解釋為，以較詼諧、誇張的方式，在輕鬆氣氛下，對正史的敷衍，甚至是神怪情節的渲染，本就包含極重大的思想教育意義。⁹¹故「演義」的功用，可視為挑戰官方所形構出的正統歷史，讓閱讀者可於殖民高壓統治中，求得些許想像空間，並符合巴赫汀（BAKHTIN, Mikhail M）以狂歡、喧鬧的嘉年華會，挑戰權力中心的烏托邦理想。⁹²對於被殖民地的臺灣閱讀者而言，黃茂盛成功地發現他們在精神食糧上的空虛，在不牴觸殖民法令下，藉由演義的引入，得以提振這股逐日失落的文化需求。誠如埃斯卡皮所說：「書籍另外的特點，則是不能只光考慮潛在讀者群眾的人數，還要注意這些讀者的素質、他們的實用需求、尤其他們的心理狀況。」⁹³所以，黃茂盛願意代銷這麼多種的中國演義小說進入臺灣，並非完全只著眼在商業利益，或是娛樂作用。潛伏於演義背後的，仍是對於中國文化的追憶、忠孝精神的讚揚，並期待在這種追憶的過程中，將個人所欲表達的意念，藉由演義「寓教於樂」的功能，傳達給臺灣的閱讀者們，構成「認同具體性」（die Identitätskonkretheit）。⁹⁴所以，「蘭記」

年），頁 886。

⁸⁸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⁸⁹例如日本作家吉川英治撰寫《三國志》即是一例。

⁹⁰歐陽健認為《臨水平妖傳》：「對於人類來說，這些看似普通的“法”“術”，關係到後代的順利繁衍，對於作為女性的自己來說，更是一種神祕不可少的自我防衛手段。臨水平妖的故事，正是古代人民重視婦幼保健的意識的曲折反映，也是神怪小說的新鮮主題。」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年 8 月），頁 615。

⁹¹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5。

⁹²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266。

⁹³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頁 81。

⁹⁴所謂「認同具體性」（die Identitätskonkretheit），意指：「它涉及儲存的知識及對一個大我群體的集體認同的根本意義。」演義中所保存的固有文化觀，以及教化的寓意，既形構成此一知識體系，形成時下閱讀者們的集體認同。（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編，《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2 刷），頁 13。

所代銷的演義書籍，絕對不會只有娛樂功能，而更具備宣揚中國忠孝節義於日治臺灣民眾的用意。

由中國上海代銷進入臺灣的演義書籍，會帶給日治臺灣閱讀者精神上的薰陶；部份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於繼承了演義傳統，自也受到忠孝精神的影響，成為小說作者創作時不變的故事主軸。例如〈金魁星〉強調忠／奸、善／惡的對立，以及企圖在不違史實下，於結局撥亂反正的安排，足可以作為教化人心的工具。因為忠／奸、善／惡之辯始終是佩雁寫作〈金魁星〉時的主旨精髓，馬幼垣也說：

小說家知道這種功能，於是常常來點說教，也在某種程度上，熱衷於創作這種小說。在這教育主調的驅使下，優秀的作家自然樂意創造出優美的、娛樂與教化兼顧的作品。⁹⁵

此對立面除了透過小說人物形象表現出來外，佩雁也運用《說岳全傳》、《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演義》等通俗小說與〈金魁星〉情節互文的手法，不停地訓示讀者，應當遵守教忠教孝、忠君愛國、大義凜然等傳統觀念。這些傳統觀念，成為〈金魁星〉作者佩雁、重刊者洪鐵濤和《三六九小報》編輯群、日治臺灣閱讀者各方面，在書寫／閱讀的過程中，得以透過各文本間不停互文的作用，以加深彼此對這些基本道理的記憶。⁹⁶所以〈金魁星〉實是企圖融合、傳遞各小說所表現的共同教化精神。這個精神在日治初期、距中國統治未久的文人群中，是在為熟悉不過的道理。但到了《三六九小報》重刊〈金魁星〉時，透過小說傳達這些道理，則是讓與傳統文化較脫節的讀者們，得以知悉中國傳統忠與義的原則。反過來說，對於這些道理已經瞭然於胸、此時仍活躍於文壇的老一輩文人而言，則是再次喚醒深藏於他們心中，對於中國忠孝觀念的懷念。

除了演義寓忠孝精神於內容中外，部份叢錄體的小說也不忘透過短篇內容，宣揚此傳統精神。大正7年（1918）的小說〈斷指生〉，同樣以中國歷史為題材，宣揚「為國盡忠」的觀念。小說講述清末太平軍變亂時，有名士侯度善書畫，但個性忠義高傲，恥與太平軍為伍。洪秀全極盛之時，仰慕其才，親自渡江求字畫，侯度亦不肯給。於是，氣惱的洪秀全斬了侯度右手拇指，侯度反以傷口血書判賊二字，表現出土人為國盡忠的基本觀念。後來侯度改以左手書畫，仍被時人評為上等之作，此乃時人佩服其節操之故。⁹⁷〈梁成〉則是談明羅店蔣巷人梁成見清兵入關、國家將亡，於是自行與志同道合的夥伴號召義軍，協助史可法等抗敵。

⁹⁵馬幼垣著、賴瑞和譯，〈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中國小說史集稿》（臺北：時報出版社，1980年），頁116。

⁹⁶蒂費納·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vault）說：「文學的寫就伴隨著對它自己現今和以往的回憶。它摸索並表達這些記憶，通過一系列的覆數、追憶和重寫將它們記載在文本中，這種工作造就了互文。」（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頁35。

⁹⁷〈斷指生〉，《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7年（1918）5月10日。此篇小說原題為〈侯度〉，出處為寶鎮輯，《國朝書畫家筆錄》（臺北：明文書局印行，出版年不詳）。

無奈寡不敵眾，史可法殉國後，義軍亦勢不可為。梁成本身受到父親為王事而死的影響，所以願與父同樣為國捐軀，此即藉由盡「忠」而成「孝」的表現：「我父沒於王事，我亦應死於王事。」⁹⁸最後，梁成遭到夥伴陸義的出賣，在赴死的過程中，與陸義同歸於盡。小說不時描述梁成的忠義感人，於是夥伴受其感召、紛紛為國捐軀：「故羅店破時，唐景曜唐培以罵賊死、朱霞以溺死、徐佐明徐忠以戰死，無一降成棟者，此足見羅店人之忠義也。」⁹⁹

〈徐錦〉則描寫徐錦孝母的行爲，說他：

事親孝，母病危，倉皇無醫藥資，乃以刀刺脇。脇開，肝葉流出，割少許，煎湯奉母。母病漸愈，不能納糜粥，婦翟氏輟其七月兒乳以乳姑，竟獲療。

¹⁰⁰

〈少梅〉亦描寫少梅事母至孝：

王家有女，字少梅，孝女也。……少梅事母極誠，涼席暖衾，黃香不能專美於前也。某日與姐往舅家，舅饗以果餌，食其半而橐藏之，舅問何故，對曰：「將歸以奉母也。吾自有生以來，衣食均吾母是給，其可獨食不一思阿母哺兒時耶！」¹⁰¹

此外，還有〈文孝子〉講述文大光精於拳術，並孝順父親。流賊為亂時，文大光為照顧老父放棄逃走。不久賊平，文大光之妻李氏與子女走散，弟弟大榮則被人陷害關入牢中。父親屢等不到大榮回家而杖責大光，大光無法忍受，才告知父親弟弟失蹤一事。後眾人感其孝行，故多資助父子二人，並遇俠客救助，印證為孝者有好報。¹⁰²〈孝女〉則敘錢女不願意嫁人，而願終生侍奉父母。父病則：「奉侍湯藥、衣不解帶。病劇，泥首禱天，誓以身代，割肉煮湯飲父，亦罔效。」所以：

孝行乃風紀所粹，值此風範掃地時，家庭間能事親無間言，已不多觀，苦女之孝，而不表而出之，則鼓鐘于宮，未聞於外，豈重節義厚風俗之道耶！而一二妄人，且謂錢氏女之禱天、之割肉、之殉直，愚孝耳！嗚呼，古人以為孝者，而今人以為愚，宜乎晚近之罕觀孝子也。¹⁰³

對於孝行是否為「愚孝」的討論、舊傳統與新知識的辨證，已可見於小說中。雖

⁹⁸ 〈梁成〉，《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7年7月20日。

⁹⁹ 同上註。

¹⁰⁰ 〈徐錦〉，《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1年（1922）1月20日。

¹⁰¹ 〈少梅〉，《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2年（1923）6月23日。

¹⁰² 〈文孝子〉，《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2年10月2日。

¹⁰³ 〈孝女〉，《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2年（1923）10月19日。

然作者已經意識到有些孝行並不可取，但仍認為孝心值得肯定和表揚，才能為此品德低落的世道樹立楷模。可見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並非完全都是以學習西方新觀念、新器物為主。在不少小說中，傳統儒家忠孝節義的精神仍寓於內容，透過作家之筆有意地傳遞給日治臺灣讀者知曉。由此觀之，通俗小說將不再只是娛樂作用，而是在具有以忠孝觀念教化民眾的寓義下，在現代與傳統間努力地找尋平衡點。

二、來自日本的忠孝一體

同樣隸屬於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忠孝」觀念亦是其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大和民族為人處事的原則。日本忠孝觀的來源與建構，如同中國般，受到儒家思想極大的影響。¹⁰⁴由於中國演義的教忠教孝亦可溯源於儒教思想，所以當中國通俗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講談和軍談產生影響時，忠孝思想也一併被融入這些小說中。其後，隨著殖民力在臺灣的深化，透過上述小說傳播至臺灣，日本式的忠孝觀念也被帶入臺灣。於是，來自中國的傳統談「忠孝」，由日本移植進入臺灣的大和文化也談「忠孝」，兩者同異互見，但都會藉由匯聚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後，逐步影響到日治臺灣小說閱讀者的心靈層面。

日本元祿年間，正是漢學崛起的年代。此時中國文學在日本大興，由於有這些漢學家的努力，在四書、五經等經典之作外，中國演義也就這樣進入日本軍談的世界中。¹⁰⁵由於參照的底本多為中國通俗小說，所以軍談作者在撰寫或編譯這些小說時，忠孝觀念的宣揚就成為他們寫作的目的之一。《通俗二十一史》在說明重刻整部書的動機時即言：

見其文旨，所以明治亂興敗之因，以作為士大夫的鑑戒，並供士大夫閱讀。此乃當時通漢文者的目的。故其書以述治亂顛末人物的正邪、明忠烈正義的鼓吹為要旨。¹⁰⁶

這段文字包含兩個教化目的，其一是「以史為鏡」的歷史借鑑，其二則是教導閱讀者要區分正邪，以「忠」、「義」作為處事的行為準則。夢梅軒章峰則於《通俗漢楚軍談·序》中說：

¹⁰⁴ 可參考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¹⁰⁵ 《通俗二十一史》首卷《通俗十二朝軍談》的「例言」說：「支那的二十一史其及演義書，元代以後與後世俗語相混。元祿年間前後的漢學者故能便於閱讀。當時漢學者對於支那軍談的著述，其骨子裡雖是正史，但卻採用了支那演義的角色。雖是如此，這些軍談書大體和正史一致，有助於歷史智識的普及，故學界推薦閱讀此書，對學界而言仍是幸福之事。」此語證明日本軍談和中國演義的混合性。李下散人，《通俗十二朝軍談》，收於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1卷》，頁8。

¹⁰⁶ 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卷2》「緒言」，頁7。

嬴氏失鹿，群雄相迫。漢高之起於豐沛，寬仁而懷眾，量才而能任。項羽之殘忍，印刑不予，撥墓弑君，而失信於天下，宜哉垓下之一敗，卒為漢見併也。實知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向使項羽能從范老之諫，用韓彭陳英之徒，漢高豈得開四百之基乎？¹⁰⁷

《續後三國志》：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鑑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也。¹⁰⁸

用歷史的教訓訓勉後世，以期世人不要在如項羽般剛愎自用、失信於人；了解君臣的為政等善惡得失，如何在得天下與失天下間取得平衡，即是期待後人能由對歷史的學習中，了解任人處事的重要性。稱好軒徽庵則在《通俗兩漢紀事》中言「孝悌忠信」的重要性：

夫人有孝弟忠信也，猶身之有四肢，無四肢則非人，無孝弟忠信則與蟲蛇何異哉？蓋自三皇五帝而下，人道之淑慝，載在於青史，是皆脩身之規矩，正心之模範也。先人既憂幼學之難解，論漢楚三國之人物，作訓解鉅梓以行于世有年於斯矣，予惜其間有所缺，而暇日錄兩漢四百餘年之事跡，名之曰「兩漢紀事」，庶觀之者，勸善懲惡而為脩身正心之一助，則幸莫大焉。¹⁰⁹

很明顯地，作者欲將儒家《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觀念，引入歷史小說的描述中，自是希望能藉由小說為媒介，將儒家的思想以通俗卻又不失莊重的態度，傳達給閱讀者知曉。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國志》則言：

夫史所以載道，垂鑑於後世也。故君臣之善惡、政事之得失、邦家之治亂、人才之可否，無不一而錄焉。凡讀史者，讀至其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讀至其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而不忘勸懲、警懼之心，則脩身之要，豈外焉哉！……。¹¹⁰

《通俗續三國志》也說：

及觀漢後主沒，為司馬氏所併，而諸忠良之後，杳滅無聞，誠為千載之遺

¹⁰⁷ 夢梅軒章峰、稱好軒徽庵，《通俗漢楚軍談》，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2卷》，頁1。

¹⁰⁸ 尾田玄古，《續後三國志》，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7卷》，頁1。

¹⁰⁹ 稱好軒徽庵，《通俗兩漢紀事》，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3卷》，頁1。

¹¹⁰ 湖南文山，《通俗三國志》，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4卷》，頁1。

恨……，今是書之編，無過欲洩憤一時取快，千載以顯後關趙諸位忠良也。

111

對於「忠」、「孝」的強調，不但是儒家長久以來的中心思想，同時，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所信服的準則。日本國體精神的形成，就這樣藉由東亞小說的流動為媒介，寓儒教思想於其中，不但傳播到日本境內，也散播到殖民地臺灣。到了《通俗兩國志》時，為了表彰忠義，更直接以表揚岳飛的「岳鄂武穆王精忠傳敘」作為前書的序言，但此序並非作者入江若水所撰，而是將李春芳所寫的文章拿來作為序言，但通篇不停地強調「天地正氣」、「忠義」等觀點，亦是以此激勵人心。

112

由以上可知，中國演義雖然經過日本軍談的轉化與譯介，但其基本價值沒有被刪去，反被日本漢文學作家所強調與重視，造成這些軍談具備娛樂上的功能外，最重要的部份，即是推擴、著述軍談等文學讀物，還可以「寓教於樂」。無論中國、日本或是臺灣，當通俗小說蔚為風氣時，其背景或多或少都有此教化的因素存在。對於軍談大盛的日本江戶時代而言，又恰好是中國儒教在日本蓬勃發展之時，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日本漢學家在表面上是模仿中國通俗小說進行軍談的創作，實際上卻是藉由小說推廣儒家思想，達到義理教化的終極目的。

由於「軍談」屬於「講談」的一部份，而進入日治臺灣的「講談」之作，又多以歷史傳說作為內容，即如同中國的說書和臺灣的講古，都兼具娛樂和教化的功用。所以前述〈塚原左門〉、〈寶藏院名鎗〉、〈塚原卜傳〉或〈菅谷半之丞〉，每篇都脫離不了參照歷史以作為寫作題材的模式。同為講談類別的軍談，更是善於運用中國歷史，將其轉化為供日本閱讀者的大眾讀物。所以部份「講談」如同「軍談」和中國的演義¹¹³，亦透過內容的鋪陳，將忠孝觀念寄寓其中。例如〈塚原卜傳〉中的塚原卜傳向師門告假、回到家鄉照顧生病的父親：

卜傳天資絕頂、聞一知十。十八歲時，劍道之精，直凌駕厥師而上。一日與師傅上泉伊勢守閒談，塚原城之家人齋書至，披而視之，父病甚篤。卜傳驚而乞歸，望鄉關之迢遞，歎阿父之機綦危。父子天性，而卜傳又係至孝，此時卜傳直恨不能如長房之縮地也。然而卜傳歸矣，上泉伊勢守之武術館，忽有事焉。¹¹⁴

作為一名劍客，除了武藝高強外，修身品德亦是為人的重要準則。小說一開始，就描寫塚原卜傳事親至孝的事跡，即是告知讀者應以塚原卜傳為榜樣。但塚原卜傳並非只有事父至孝，當師門有難受辱，如何維護師門的榮譽，又遠比侍奉父親

¹¹¹ 尾田玄古，《通俗續後三國志》，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6卷》，頁1。

¹¹² 入江若水，《通俗兩國志》，早稻田大學部重編，《通俗二十一史》，第7卷》，頁1-5。

¹¹³ 佐野孝認為「支那的演義小說，與日本的『講談』同性質。」《講談五百年》（東京：鶴書房，昭和18年（1943）），頁263。

¹¹⁴ 雲，〈塚原卜傳（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5年（1912）1月7日。

來得重要。塚原回鄉探父後，師門上原伊勢守遭到圓海等人的挑戰而落敗，消息傳到人在家鄉的卜傳耳中，他所表現出的即是「忠大於孝」的為人觀念：

圓海竟是以誇揚於眾，入常州塚原卜傳之耳。時卜傳父病已癒，大驚曰：「卜傳聞主辱臣死，弟子之於師，亦復是也。誓手刃尸那丸圓海，為我真影流劍術吐氣。」乃辭父兄出塚原城，編笠帶劍，望羽黑山而進。¹¹⁵

在塚原卜傳的觀念中，師父並不只是「如父」的等級，而是「事父如事君」，所以他的身分並非僅是徒弟，而是以身為家臣般，有維護主公門下的聲譽。張崑將說：

出於德川時代強烈的封建階級意識，所以「武士」階級本身即懷有強烈的「階級意識之責任感。」且這個「責任感」往往是出生之後即被定位下來，即是連帶著累世的「君恩」而出來的責任。¹¹⁶

塚原卜傳的內心中即擁有這個責任感，所以在師門危難之時，他對師父如何事君般挺身而出，為師門的榮譽而戰。還有如〈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主角「菅谷半之丞」遭到繼母冤枉後無法辯白，只能事父如事君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阿母不幸遺兒為繼母戀，兒不從。繼母唆父誣兒獸行，怒撻欲死。嗚呼！欲辯（按：辯）則傷父心辱繼母，且阿父亦未必肯信。如不欲辯，則將誣趙璧為燕石、訾隋珠為魚目乎？畜生背倫無父無母之言，父詈兒，兒甚不堪。阿母有知，必能明證。吾將隨阿母於地下，無面父復見阿父。乞地下神祇，庇阿父繼母改心，生肖子光嗣續。嗚呼哀哉，言罷噓噓涕泣，淚如泉湧，暈絕頃刻復起再拜天地四方，謝父母生身大德，徐徐將上衣脫下，拔刀欲刺。¹¹⁷

異史氏嘆曰：「半兵衛家有良孝子而不知愛。揮刃欲殺卒致一門風波如是，婦人長舌維厲可畏，彼豈特以小善結汝心？」¹¹⁸

經由上述講談中所描寫的忠孝情節，可知主角雖然對父親亦有盡「孝」，但他們對於維護主公名譽、生死的「忠」更為重視。對於主君，不但是如事父般的「孝」，更是有由「孝」擴大衍生出的「忠」。這個「忠孝一體」的傳統精神，是綜合中國「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的觀念，和源於日本「萬事一系」的神道傳統，張崑將指出：

¹¹⁵ 雲，〈塚原卜傳（2）〉，《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5年1月8日。

¹¹⁶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頁248。

¹¹⁷ 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5），《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1910）6月3日。

¹¹⁸ 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6），《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1910）6月14日。

中國士大夫常言：「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或者如《孝經》所說：「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這種思維是論「忠」前提必須照顧到「孝」所以是「忠」、「孝」二元性結構，而非一元性，理由無他，因為二者皆就現象具體的道德意義而言，故「孝」一般在中國士大夫觀念中，是「至德」也是「要道」，是現象倫理中最根本的道德，「孝」往往優先「忠」而被考量，因而「忠孝」不可能一體。但如果論忠孝時，把「忠」、「孝」看成超越現象經驗的道德原理，並且結合宗教崇拜時，則「忠孝一體」乃成為可能。……神道實可作為「忠孝」道德的公分母進而論其「一體性。」事實上幕末的後期水戶學正是利用這種特質。¹¹⁹

所以，中國通俗小說和日本講談雖然都談「忠孝」，表面上看起來並無二致，但若就文化淵源而論，在同源中卻有差別。¹²⁰但，日治臺灣的閱讀者們，可以清楚分辨中國和日本間對於忠孝觀的差異嗎？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魏清德將要譯寫完〈菅谷半之丞〉時，特別強調小說中的忠孝觀念，就是將日本文化中的忠孝觀，和固有中國傳統的忠孝觀視為同樣的精神概念，並認為應該在臺灣社會中大力提倡：

異史氏曰：「日本國以忠訓世，而支那以孝示天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孝而不忠者也。讀赤穗四十七義士復仇之快舉，益知我國忠義之所由來，然而未嘗有一不孝者，如菅谷半之丞，亦大孝之人也。我臺灣隸版圖未久，忠字之觀念未生，孝字之印象已沒，牛鬼蛇神，汨沉道德，不可概乎？」¹²¹

無論是中國通俗小說或是日本講談、軍談，它們都是組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一份子，所以能夠被日治時期的臺灣閱讀者所閱讀。在閱讀過程中，原本在中國和日本間同異互見的「忠孝」觀念，將會在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加以疊合，臺灣閱讀者亦會在閱讀過程中接受洗禮。這個現象，將會讓殖民政府在民眾思想、意識上的操控更為有利，讓臺灣閱讀者不自覺地成為甘願為皇國效忠盡孝的皇民。

三、盡忠盡孝：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復仇觀

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融匯了中國以及日本的忠孝觀，使得「忠孝」精神成為中國通俗小說、講談與軍談三方面共同重視的教化宗旨，並對日治臺灣閱讀者

¹¹⁹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257。

¹²⁰復仇觀由中國到日本的演變脈絡，李隆獻已有精采的析論。李隆獻，〈日本復仇觀管窺—以古典文學為重心〉，《成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9年4月）。

¹²¹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2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8月11日。

的心靈層面產生影響。這些都說明小說傳播的影響力，以及作為外來文化的接受者，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絕非只有敘事手法和文觀方面的學習，而是表皮與神髓兼具的受容現象。但，要宣揚「忠孝」觀念容易，如何教導民眾「盡忠盡孝」、達成最後一步的使命，亦是閱讀日治臺灣漢文小說時不可忽視的重點。所以，「復仇」的行為，就成為小說主角欲「盡忠」且「盡孝」時最常採用的手段。

什麼是「復仇」？「復仇」的觀念在中國形成的很早¹²²，但它又是來自原始社會的習俗。李隆獻認為它還混雜著儒家思想而形成：

人類的復仇行為即使有生物性的來源，然而在復仇觀社會化的過程中，龐大的儒家傳統以其一貫的方式，亦即將原始社會的種種習俗規範化、禮儀化、經典化；因此原本血親復仇的模式——或者以氏族成員為對象；或以造成對方相同的痛苦為目的，如孟子所說的：「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或專以施害者為對象——這些模式便逐漸為儒家經典詮釋所收編，先是藉由經學的地位將其學術化，再經由深習儒家思想的循吏法外施恩的實踐，因此在民間社會形成一股堅實的復仇思想與風尚。當然，自戰國以降的任俠之風，也是漢代復仇風氣不可忽視的來源，然而東漢以降的中國復仇傳統，幾幾乎便是儒家典籍所描述的型態，由此亦可見證儒家倫理觀念／思想傳統，對中國社會無所不在的影響力。¹²³

可見在中國，「復仇」的生成，不僅是有生物性上的天生本能，儒家思想更有將其定名化的輔助作用。而延續至戰國的任俠之風，不但是復仇風氣的來源之一，也成為日後武俠小說不可少的行為模式之一。¹²⁴

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也以武俠類出現「復仇」情節為最。例如〈兒女英雄〉的「沈月英」，因父親殿柱悔婚，而將其改嫁給金戶部的兒子。沈月英得知後大怒，不告而別。父親只好以婢代嫁，卻被發現，而遭到金戶頭的挾怨報復。在押送過程中，已淪為山賊的沈月英無意間救了父親，將父親接到山寨定居後，決心向金戶部復仇：

然思及金戶部之讐，常耿耿于心不能忘。一日語言有事他出，攜其慣用之拳銃及匕首，潛自下山。抵雁門界，夜出者數日，于金戶部之門庭，查之甚悉。一夜越牆而入，先抵金戶部榻前，以匕首力刺其喉，應手而斃。復

¹²² 例如《詩經·大雅·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孟子·離婁下》也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¹²³ 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以《春秋》三傳為重心〉，《臺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05年6月），頁99-150。

¹²⁴ 陳平原指出俠客有「平不平」、「快意恩仇」的特點，所以：「『報恩仇』正因其個人性與盲目性，很早就成了小說中俠客行俠的主要動力。」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12月），頁169。

至其子不頑臥處，亦刺殺之，始復越牆去。¹²⁵

沈月英的復仇，大有「斬草須除根」的用意。刺殺金戶部，是對父親被陷害的不滿。而殺其子，則是對於這門婚姻強烈反抗後的結果。但細究此事因果，沈家悔婚、騙婚在先，於情於理，復仇動機並不合於法理。〈劍花傳〉中的男主角「尚武」則是急於為父復仇而失手：

東粵尚武，幼善劍術，以任俠聞。父習舉子業，頗不喜之。無何父與同邑某勢豪，因睚眦之怨，被要諸途而擊之，卒至病死，訟諸官不得直。尚武急于報父之仇，旬日之間，往刺者再，終莫得其便而返。¹²⁶

其後「尚武」被仇人懸賞追殺，在旅行過程中遇到俠女「劍花」，在「劍花」幫助下才得以成功復仇。當然，還有〈俠中孝〉中的「李阿鳳」，雖一度以為父親是被生蕃所害，但細究前因後果後，終於找到真正的仇人而為父復仇。¹²⁷〈健兒殲仇記〉的復仇情節則較特別。小說講述法國學生兄弟「盧布」和弟弟「福林兒」父親早逝，只留下母親與二子相依維命。哥哥「盧布」安份守己，弟弟「福林兒」卻游手好閒，因與富商「沙多」爭名妓「花拿」，而遭到「沙多」及其黨羽「惡魔」的殺害。兄「盧布」知道後，從科仁嘉島（今科西嘉島）回到巴黎與「沙多」決鬥，為弟報仇：「此時盧布滿腔仇恨，正如奔雷掣電、迸溢橫飛。恨不一劍即畢仇人之奇。」¹²⁸小說異於其他報仇模式的地方，在於主角非為父親報仇，而是兄為弟復仇。

當然，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何其多，論復仇者也不是只有李逸濤。大正年間的小說〈王孝子〉，談主角「王恩榮」的父親「永泰」和祖母，都因為父親被官差「奇強」所害而身亡。悲慟的母親在臨死前，留下官府不公平判決後、所施捨的慰問金十金給王生，要王生以此為戒替家人復仇。王生本立刻展開復仇行動，卻為舅舅所阻，因為其舅認為王孝子要先有子嗣傳宗接代，才能復仇。王孝子將仇人殺死後主動投官，奇家的訟師與王孝子等人展開激辯，判案官員亦在「為父盡孝」與「殺人償命」間感到困擾：

博徵諸故吏及父老，咸曰：「永泰死實奇強斃之，且孝子伺之十餘年，今日得復其仇，天也。」官遂具牒上之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兇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激復仇也。孝子父死三年，尚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猶即也。觀其視死如。飴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存埋葬

¹²⁵ 逸濤山人，〈兒女英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0年（1907）1月12日。

¹²⁶ 逸濤山人，〈劍花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明治40年5月1日。

¹²⁷ 逸，〈俠中孝〉，《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明治43年（1910）1月19日。

¹²⁸ 逸，〈健兒殲仇記（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4年（1911）9月30日。

銀給還尹氏，以彰其孝，且將具題請旌。」¹²⁹

〈王孝子〉這篇小說值得思考的地方在於，就算是要報仇，因為復仇恐有殺身之禍，基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孝子之舅要求王孝子必須先有子嗣、能為王家傳香火後，才得以報仇，以避免報仇後因殺人而遭致死刑，導致家族絕後。而王孝子：

疾下其斧，斧入顱間，血濺孝子頭面，然猶患不死，則以足力蹴其胸。實則奇強中斧，時死已久，孝子恨深，故累蹴以洩其憤。¹³⁰

王孝子戮屍般殘忍的殺人行為，不但不被鄉里民眾譴責，甚至最後因為其出發點是為「盡孝」而一起替王孝子向官方求情，可見「孝」的觀念是如何地深植於人心。但衍生出的兩難問題卻是「道德」與「法律」間的紛爭，到底該如何解決？「盡孝復仇」與「殺人犯法」間起了衝突，為了「盡孝」而殺人，甚至是殘殺的程度，是否真的可以被法律所容許，而不用付任何責任，最後還可以被表揚？作者在為王孝子的罪行開脫後，將這個兩難問題透過官紳之論，歸結於對整個司法制度的檢討：

是時蒞孝子事者，則撫軍蔣廷錫、提學黃叔琳、觀察李發甲，皆一時名宿。踐卓翁曰：「刑政之不平，始有復仇之舉。果有司能治冤獄，則人心平，何至懷斧伺仇，至十餘年之久？」¹³¹

無論小說的來源是一字不改的由中國傳抄入臺灣，或是日治臺灣文人的獨創之作。小說對於私情與司法間的衝突描寫，在被臺灣閱讀者於報上所閱讀後，臺灣讀者對於「復仇」的理解，不再是俠客復仇般天馬行空、以武犯禁的想像。而是開始思考法律／道德如何平衡、不再對司法制度深信不疑……，這對於被殖民律法禁錮下的被殖民者而言，藉由小說的兩難思考，在以「孝」為名的復仇行為下，得以開啓對殖民法令展開反省的管道。所以這些觀點對於臺人智識上的啓蒙，必會有所助益。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兒子或女兒的復仇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為父復仇」，而沒有「為母復仇」。在消滅仇家的過程中，母親往往只是哭泣無助的角色，必須依靠兒子／女兒，才能達到復仇的目的。這個一成不變的復仇模式，宣告傳統復仇體系以父權為主的脈絡。且為了維護這個父權體系的完整，子女唯有藉著復

¹²⁹ 〈王孝子〉，《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大正4年（1915）1月20日。此篇小說傳抄於《清稗類鈔·孝友卷》（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整理，出版年不詳），頁868。原題為「王恩榮為父復仇」。

¹³⁰ 同上註。

¹³¹ 同上註。

仇的血腥行動並獲致成功時，才達到「盡孝」的目的。就算是以「復仇」聞名的日本文化，也難以脫離「為父復仇」的基本模式。日治臺灣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紀曾我兄弟事〉和〈兄弟復父讐〉¹³²，是取材於日本復仇史上與「赤穗四十七人眾」齊名的「曾我兄弟」。¹³³小說主要講述伊東祐親與工藤佑經結怨，工藤佑經因此殺害伊東祐親，並欲殺死其二子的故事。此二則取材自《曾我物語》的復仇事件，本身在日本就引起不少的討論，李隆獻認為事件在日本復仇史上的意義是：

日本學者在探討中世紀的「仇討ち」時，多半視曾我兄弟復仇事例為中世紀「仇討ち」的開端。《曾我物語》以「小說」的方式，詮釋曾我兄弟盡「孝道」為父報仇；水原一則由「史實」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曾我兄弟在十八年之中汲汲營營，企圖躋身武士上層階級，卻因政局改變而未果，因此才會假藉復仇之名而行叛亂之實。此處「仇討ち」不再是單純的復仇，與現實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水原氏之說不無道理，但即此亦可見日本復仇觀的演變軌跡及其受中國「五倫復仇觀」影響之一斑。¹³⁴

李氏分析日本復仇史上各事件的文化淵源，使得看似簡單的復仇過程，背後卻是極為複雜。作為東亞文化圈中的一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面對的不僅是中國復仇傳統的影響，還有日本復仇觀的強烈洗禮，並因此被迫接受封建特質的國民性。¹³⁵這股復仇脈絡，是由中國傳到日本，在日本增強、加料後，又在日治時期移入臺灣，不但成為小說仿效對象和取材來源¹³⁶，其觀點也會影響到臺灣人的精神意識。

為了「盡忠孝」而復仇，在道德和法律上如何相容？〈王孝子〉為直系血親的父親復仇，或真是情有可原。但如果不是「為父報仇」而是「為君報仇」，王法可以容許嗎？類似的困擾，表現在傳入日治臺灣時的日本講談。¹³⁷以日本「赤穗四十七人眾」為主題所改編的〈赤穗義士一菅谷半之丞〉和〈十八義〉，既表

¹³² 〈紀曾我兄弟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明治33年（1900）2月9日。〈兄弟復父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6月6日。

¹³³ 李隆獻分析稻垣史生在《仇討を考證する》一書的研究後認為：「曾我兄弟的復仇故實與《曾我物語》不但廣為流傳，且掀起一股復仇熱潮：以往的復仇大都陷於宮廷鬥爭，曾我兄弟則將復仇的傳統帶至武士階級，且將復仇的概念帶至民間。無論在思想上或文學上，《曾我物語》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李隆獻，〈日本復仇觀管窺—以古典文學為重心〉，《成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9年4月），頁18。原文出處引自稻垣史生，《仇討を考證する》（東京：旺文社，1987年）。

¹³⁴ 同上註，頁18。

¹³⁵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台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頁386。

¹³⁶ 同上註。

¹³⁷ 此即上文引張崑將之研究所述、日本「忠孝一體」的特性。

彰了日本傳統的忠孝觀，卻也落入私仇與公理的衝突。¹³⁸若由小說推源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四十七義士的行刺舉動，在當時震驚了以幕藩體制為政治主體的日本。四十七義士固然是為了表示「忠」而為主人報仇，且「復仇」行為亦是幕藩體制下武士社會所能容許的事。但義士們的主公淺野長矩畢竟是犯了「以下犯上」的錯誤，而在幕府款待天皇使者的宴席中傷人，更是讓幕府顏面盡失。既是如此，淺野長矩被判切腹謝罪、赤穗藩遭到徹藩的懲罰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當後世只注意到義士們為了盡忠而復仇，所表現出不畏死的態度時，久而久之，受害人吉良上野介的形象反而不停地在戲劇、小說中被醜化¹³⁹，受害者反而成為負面角色，加害人反而成為代表民族精神的英雄。所以荻生徂徠在〈徂徠赤穗四十六士論〉中痛斥四十七人的行事錯亂：

世皆謂四十七人者，捐身命于主死之後，以效無報之忠，翕然以「義士」稱之，以予視之。是亦田橫海島五百人之倫也。夫長矩欲殺義央，非義央之殺長矩，不可謂君仇也。赤穗侯因欲殺義央而國亡，非義央之滅赤穗，可謂君仇乎？長矩一朝之怒，忘其祖先而從事匹夫之勇，欲殺義央而不能，可謂不義也。¹⁴⁰

太宰春臺也附和徂徠之言，認為不當把四十七人視為「義士」：

父之讐，弗共戴天。禮經有文，至於君之讐，雖無明文，然資事之道，敬同於父，故居其讐，亦猶居父之讐也，此古今之通義，而人皆知之。乃者良雄等所稱是已。惟赤穗侯之死，非吉良子殺之。斯之謂不知所怨，予於是乎？非於良雄等所行也。遂持此論以與人爭，人多不說。故藏諸胸臆以自珍，有年數矣。及見徂徠先生，聞其餘論，則與純所持若合符節。¹⁴¹

由荻生徂徠、太宰純之論斷，可以發現，徂徠等名儒認為赤穗眾的行為並不可取，自然不能以符合「武士道」的資格稱之。但有趣的是，卻有更多的學者，忽略了前因後果，僅將焦點置於「復仇」、「盡忠」和「赴死」等行為，當他們為了美化這些行為，而以「仁義之道」、「忠義之舉」來作為此次事件的評斷時，「赤穗四十七人眾」的經典化，就在一面倒的聲浪中形成。例如林信篤在〈復讐論〉中認

¹³⁸ 有關兩篇小說的改寫問題，請參考林以衡，〈典範、通俗與皇國教化—以「赤穗四十七人眾」為例論日治臺灣對「武士道」思想的接受〉，《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年9月），頁77-102。

¹³⁹ 根據茂呂美耶的說法，吉良上野介其實是位明君，非常受到封地三河國人民的愛戴。所以直至大正年間，三河國都還拒絕「忠臣藏」在此地上演。反觀淺野長矩被形容是脾氣暴躁的粗人。茂呂美耶，《江戶日本》（臺北：遠流，2004年10月），頁236。至今到東京墨田區兩國駅一帶，吉良的住所內，後人甚至將吉良視為「松阪稻荷大明神」加以供奉。

¹⁴⁰ 荻生徂徠，〈徂徠赤穗四十六士論〉，《近世武家教育思想》（東京：秀研社，2001年），頁49。此篇文章又有一說為徂徠門生記錄先師言行而成。

¹⁴¹ 太宰春臺，〈赤穗四十六士論〉，《近世武家教育思想》（東京：秀研社，2001年），頁51。

爲四十七人的復仇行爲雖與國家之典有違，但義士能繼「亡君之志」的行爲，卻可在「仁君賢臣」與「忠臣義士」間並行不悖。¹⁴²石黑知幾說：「若赤穗之四十餘子，其忠義勇烈，固足以動天地之心，感鬼神之氣，而況於人乎？」¹⁴³大原長發則說：

赤穗四十餘輩，壹志協謀，始終不變，以報主讐，明人臣之義於天下哉！考之世史所載，古今之間，未聞有如此之偉事也。¹⁴⁴

山科元德更說：

蓋人倫之道有五，而更有三綱之名者，以是三者人倫之所以爲綱領，而國家之治亂，風俗之盛衰，皆繫於此也。是故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而人臣事君，於禍福存亡之間，最當竭心盡力，繼之以死者也。¹⁴⁵

由上述各家論點可知，肯定者的焦點，其實仍集中深受儒學影響的「君臣」、「父子」之道爲立論焦點，而非到底是誰先動手傷人，或是處罰令是由誰下達的追究。所以，反對與讚成派所著眼的立場並不同，也無絕對是非的問題。但爲何到最後肯定派佔了上風，進而讓「赤穗四十七人眾」成爲「武士道」的代表呢？¹⁴⁶

吾人必須了解的是，「復仇」一事，是日本以武士爲中堅勢力所發展出來的社會行爲，在國家法度與爲臣之道間，幕府並不是沒有訂出一套在公憤與私仇間取得平衡的規則。¹⁴⁷但當「有恩必還、有仇必報」的信念成爲武士們內心引以爲鑑的處事準則時，赤穗義士若不爲主人報仇，那他們就沒法盡到作爲人臣的責任，以及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說，報仇與否，主要目的仍是爲捍衛自己的名譽而戰，這個名譽問題，即是武士在公與私間都必須要遵守的準則。所以無論動機爲何，四十七人是真心想爲主公報仇，或是只是想在歷史上留取美名，至少他們都是照著身爲一位武士，所必須遵守的行爲準則而走，進一步捍衛自己的名譽。且當頌揚四十七人眾的言論多過批判時，對以天皇爲尊、以武士爲崇拜對象的日

¹⁴² 林信篤，〈復讐論〉，《赤穗義士讀本》（兵庫縣：義芳文庫，1937年），頁294-295。

¹⁴³ 石黑知幾，〈題赤穗義人錄後〉，《近世武家教育思想》，頁6。

¹⁴⁴ 大原長發，〈書赤穗義人錄後〉，《近世武家教育思想》，頁15。

¹⁴⁵ 山科元德，〈書赤穗義人錄後〉，《近世武家教育思想》，頁17。其他還有更多的人如大地昌言、三宅觀瀾等人，皆對赤穗眾人之行爲表示肯定。

¹⁴⁶ 「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於生死兩難之際，要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覺悟而勇往直前。」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陣基筆錄、李冬君譯，《葉隱開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11月），頁34。由此可知，「不畏死」、「當機立斷的死」，是「武士道」的一個必備要件。但問題在於「死」要如何死得有意義、有價值，才會爲人所敬重。

¹⁴⁷ 幕府規訂，唯有「武士」才能「討敵」（報仇），但必須是直系血親（父兄）遭到殺害，才可以復仇，而復仇前必須跟幕府報備，幕府應允後才可以進行。但赤穗四十七人擔心消息走漏，吉良上野介會有防備，所以並沒有事先知會幕府。有關復仇的條件可參考山本博文著、趙佳誼、黃碧君譯，《武士道圖解》（臺北：商周 城邦出版，2008年6月），頁38。

本社會大眾來說，很容易就被佔多數的言論牽引過去。於是乎，讚成與否定兩派的論爭，也漸漸由復仇行爲到底對不對，轉變成到底是要讓赤穗眾以斬首方式處死，或是讓他們仍被視爲武士而切腹自盡。¹⁴⁸最後，幕府下令讓四十七人以切腹作爲處罰時，即是默許赤穗眾的復仇行爲，在幕府最後一刻的背書下，「赤穗四十七人眾」就這樣成爲日本「武士道」的代表，直至今日，歷久不衰。若是再輔以其他以復仇爲主題的日本小說，更可體現日本國體觀移入臺灣的現象，所以黃美娥總括此時期日本移入臺灣的復仇觀說：

可知日本文學在移植、傳播來臺時，其中實際隱藏了不容忽視的「國體」敘事，促使日本相關歷史記憶、精神文化或國民性特質，成功化身爲模式化情節，成爲小說敘事的重要「結構」。其次，小說中的忠、孝、勇、義，尚武或復仇美德的宣揚，更是具有鍛鍊日本「國體」的規訓作用，這些帶有殖民主中心意識型態，或屬於殖民主民族文化特殊精神結構的文本，有助於馴化臺人國族認同的主體建構，以便順利轉換臺人從「中國子民」到「日本新國民」的身體象徵系統與國族／文化認同狀態，故這類小說，無疑是日本民族文化輸入來臺的最佳仲介與媒介。¹⁴⁹

黃美娥的論點，已爲日本復仇如何根植於臺灣民眾心理作了說明。本段落於此基礎上，進一步對中國忠孝觀、日本忠孝一體觀乃至於盡忠、盡孝的復仇觀，如何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現象加以觀察。可以發現，日治臺人對復仇觀的接受是多元且紛雜，此乃因中、日兩國在復仇信念上的同異互見所導致。

復仇，是人類基於原始天性衝動嗜血的慾望，又是盡忠盡孝的終極手段。無論東西文化，復仇皆有其存在的可能，亦是人性不可迴避的問題，若放置於道德和法律的糾葛中，則會更顯複雜。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不乏有介紹西洋復仇事件的例子¹⁵⁰，但對於日治臺灣影響最深的，仍是源自中國和日本的復仇觀。這兩股同源異途復仇觀對臺灣的洗禮，就如同中、日兩國的小說在日治臺灣漢文通俗說融合般，亦隨之匯聚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進而讓臺灣閱讀者所認識、理解以及感悟。原本僅對身旁人物的忠、孝觀念，也會在殖民政府巧妙的操控下，擴展到願意爲國家政策盡忠又盡孝的行爲模式，對於文化融合或殖民統治，皆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¹⁴⁸ 林景淵，《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臺北：自立晚報社，1990年8月），頁167-168。

¹⁴⁹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台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頁387。

¹⁵⁰ 大正8年（1919）的翻譯小說〈復仇〉，即是以第一人稱「余」的自述手法，講述普法戰爭時，遇到一童子全家爲普軍所殺，童子於是從軍，欲爲父母報仇的小說，可見臺人當時除日治初期〈健兒殲仇記〉外，對於西方報仇之事亦有所聞。〈復仇〉，《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8年（1919）2月28日。

小結

作為臺灣的殖民宗主國，日本講談文化隨著殖民政府對臺灣的統治而來到臺灣，成為在日本漢文小說外，另一個構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類。在中國說書、日本講談以及臺灣講古的脈絡中，藉由臺灣文人對日本講談的傳抄、譯寫與模仿，講談文化開始在日治臺灣紮根。於是在文學創作外，整個日治時期的講談活動更是層出不窮。日治臺灣知識分子既閱讀到書面化的講談，又認識了講談大師如松林伯知等人的講談作品，中日文化開始混合於臺灣文化中，成為組成臺灣文化的因子。

在這股東亞文化脈絡的相互影響下，中國的忠孝傳統與日本的忠孝精神，也開始隨著不同的文學形式進入臺灣，而被臺灣閱讀者所吸收。吾人可見演義中的忠孝觀念會被臺灣人所閱讀到；軍談、講談中的忠孝一體，也同樣地被當下臺灣人所接觸。而這個同異互見的精神信仰，將會被融合於它的終極表現：復仇。所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復仇情節，不但成為忠孝精神的體現。它更透露出閱讀者如何在道德與法律間如何自處的兩難抉擇。當復仇行為被國家法律所包容時，既是對既有法律不足的檢討，又可能淪為被國家政策所掌控、灌疏民眾捨己為國的絕佳教材。通俗文學寓教化於娛樂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第六章、翻譯西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西方小說的譯介與模仿

融合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展現多元且豐富的特色，同時也證明臺灣文學在東亞文學脈絡中具有集大成的關鍵地位。但臺灣作為世界的一環，它所能接受的文學精萃，並非僅限於東亞諸國，同樣也會與西方文學展開接觸。乙未割臺後，西化成功的日本政府開始統治臺灣，帶給臺灣的並不只有大和文化或是日本漢學的洗禮，西方現代性的一切，舉凡器物、觀念與習俗，對臺灣而言不再只是日治以前皮毛式的認識或接觸，這些來自西方的舶來品開始大量地透過日本殖民政府，或是對岸中國晚清民初的媒體報導後傳入臺灣。而對大多數兼任記者、並從事小說創作的臺灣文人而言，在關心世界局勢或新聞的同時，他們接觸到了西洋小說。

與西方世界接觸的結果，拓展了臺灣文人的文化視域，並豐富他們對於小說創作的技法和內容。於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化組成，不再受限於中國與日本，而是在這兩股文化匯流於臺灣時，另發掘一條吸納西方文化的渠道。但要開鑿出這條譯介渠道好讓西方文化匯入臺灣並非易事，其原因乃在於翻譯行為實是一種雙語轉換的過程，譯者必須將小說閱讀者原本不懂的語言、文字轉換成其熟悉的語言、文字，故譯者本身必須具備良好的雙語能力，又要能理解不同語境所造成的文化差異。¹在兼備上述兩個條件後，譯者才可以將原著小說的內容情節清楚傳達給閱讀者，或是將小說所具備的啓示告知閱讀者。這對於過去長期沉浸在制藝時文、四書五經的臺灣文人而言是一大挑戰。對於閱讀者來說，嘗試去接受經由翻譯後的小說，固然這些小說具有奇特處而成為他們的閱讀動機，但要去習慣、理解不同語境下所生成的文學作品，也是必須依賴譯者翻譯的品質，才能順利達成此目標，劉宓慶說：

翻譯活動也是被「預先規定」了的 (predetermined)；翻譯不是個人的活動，而是一種社會交際形式，翻譯有其社會功能，翻譯的成果必須受到社會接受力 (social acceptability) 的檢驗。²

翻譯並非透過譯者進行語言、文字上的轉換即可，它還牽涉社會是否能有接受的條件。畢竟，人不能遠離社會而生存，翻譯也要存在於社會的網絡中，才能在社會各項機能的映照下，彰顯出其文化意識。本章將先研析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對於

¹ 劉宓慶認為：「翻譯涉及的是從形式到內容、從語音到語義、從達意到傳情、從語言到文化的多層次、多方位語際轉換。翻譯首先是一門科學，有其本身的內部規律、行為模式、作用機制、工作規範和實施程序。從事翻譯的人必須運用自己的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同時，翻譯又是一種藝術，有其本身的藝術法則、美學特徵、審美意識系統和體驗過程。從事翻譯的人還必須運用自己的創造性思維，賦予自己的成果以美學價值。」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臺北：書林出版社真正的文學理論，1999年8月），頁49。

² 同上註，頁61。

「文學翻譯」的認識與翻譯目的，在闡述臺灣文人相關看法後，再逐步探討若干於日治時期以翻譯方式傳入臺灣的西方小說，並論述其原著與譯作間的譯介關係。最後，將深入探討翻譯行為下生成於臺灣的西方小說，其在日治時期臺灣通俗文學中娛樂以及增廣見聞的文學效用。

第一節、日治臺灣傳統文人接受西方小說時的困境

文學作品由語言、文字所組成，若要了解不同國家、地域的文學，首先要面對的挑戰，即是語文能力上的隔閡。日治時期的臺灣，雖自初期開始就已接收大量的外電消息，並有記者將這些世界各地的奇聞軼事融入小說中，得以讓臺人感受到世界之奇與大。但若從語文上的理解來看，當時臺灣懂漢文的人數已經不多，更遑論要具備有外文能力，以進行語言／文化的遞換？所以，臺灣閱讀者在閱讀西洋小說前，最大的考驗即是是否有人能具備「翻譯」能力，以及了解「翻譯」的困難度，才能將不屬於漢字體系的小說以當下閱讀者能接受的文字譯出。如此，西洋小說才不會僅是少數人的讀物，而是能成為刊登在報上、被更多人閱讀到的通俗作品。故探究西方小說如何融入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問題時，不能忽略臺灣傳統文人如何面對這個「翻譯」困境。

一、「翻譯」的困難處

日治初期，身兼記者、小說創作者的臺灣傳統文人謝雪漁，即以淺顯易懂的直白方式，闡釋他對「翻譯」的想法，以及他所認知的「翻譯」困境：

雖云小技，然非精其國之文者不能。精其國之文，不精自國之文者亦不能。何則？凡一國之文，各有命意措詞運筆之妙，決不能知一不知二也。³

雖稱「翻譯」為「小技」，但在文中，謝雪漁不得不承認翻譯有其困難度，而寓佩服、敬畏之意於釋義中。謝氏之言，不僅是承認己身有外語能力困擾、進而演變成在翻譯上的困擾。其實也說出當下不少臺灣傳統文人心中對西洋文學或消息如何暢通接收的焦慮。對日治初期的臺灣傳統文人而言，「翻譯」其實也是一個新概念，他們對於「翻譯」的感想是似懂非懂，覺得只是把文字轉換的工程似乎沒什麼大道理，但要翻譯就必須精通二種語言，卻又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種模稜兩可的翻譯觀，表現在政權交替的時代，文人們在時代變革的此刻認識新觀念、新事物時所透露出追求新知識的渴望，但在翻譯方面知識的匱乏，以及必須面對經由「翻譯」所帶來對傳統文化的衝擊，臺灣傳統文人在大量新知進入臺灣時，內心惶恐不安。

³ 雪，〈翻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明治40年（1907）6月30日。

〈就通譯而言〉一文，透露當下文人對於全世界語言文字複雜性極高的了解，而力陳通譯、翻譯任務的必要性：

天下之言語文字，汎汎茫茫、其類不一。文字但因國而異，言語則隨地不同也。若支那則更難言矣！吾臺與支那大陸隔絕，海外孤懸，雖文字同軌，而言語則有閩粵之判。在閩之中，猶有泉漳之別。泉則復有晉南惠安同之分。故於政治上之關係，不得謂無足輕重也。

況版圖歸於帝國，人雖同種，而淵源各有所自，前此已難，而今則難之又難。政府安能不深費苦心？以期有可以去此重難者故，此國語之普及所由視為急務也。憶自改隸迄今，僅閱十數秋，其間無形之進化，固為多大，不煩吾儕辭贅。然吾儕猶有太息欲陳之者，時至今日，內地人之於本島人也，言語能相通者，容或有之，而未能，實向更僕數。夫同居一國之地，同為一國之民而共治於一國之，為言語不通故，上意未由下達、下情不能上道，所以政治教育以及商務諸大端，莫不有所遺憾也。

雖然，言語縱不能相通，若能多解漢文，亦可稍拯此困難之毫末，無奈臺人之識漢文者，除都會外，其在村落者，本為無多，平均實千無一人，是無論筆談不便。即欲筆談，亦難有其人也，假如有之，亦碌碌不足觀矣。若是則兩者之意。將何以達之乎？苟非有兼解斯二者，居於其間，則兩者實如啞與瞽者，此通譯所由設也，而文字猶必要有翻譯之者也。⁴

臺灣改隸日本後，原本紛雜的語言情況又加入殖民宗主國日本的語言，因而更呈現溝通上的難處。但既然作為同一國，若語言紛亂，在政令推廣和施政成效上，不免造成遲滯與錯誤，作者認為此點對臺灣社會而言並非好事。本來不通日文，以漢文為書寫工具，或能成為替代方案，然而教育不普級，造成城鄉間識字率的落差，故此法也不符實際需求。所以，在國語普及無法一蹴可幾的當下，作者提出通譯／翻譯的重要性。其中，通譯是針對口語而言，翻譯則是針對如何互曉書面文字的功能性而論。作者認為，只有在此過渡階段重視這兩者的重要性，才能收到施政成效，並達到：「毋結怨構難於人民，以輔當道之不逮。誠能如此，則民無所怨，而當道且可倚之為腹心矣！」的目標。⁵當然，這篇文章的主要重點，還是在強調日文的重要性，亦可見當時之人若要學習漢文、臺灣話文外的語言，在當時已成為「國語」的日文絕對是他們必須首選的語言。

日治時期的臺灣人並非不知道翻譯在施政、啟蒙、教育，乃至於文學等方面的重要性；他們也深知實際在進行翻譯活動時所會產生的困難，以全球譯本最多的《聖經》為例，報上即例舉《聖經》在被多國翻譯時所遇到的問題：

⁴ 〈就通譯而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明治41年（1908）8月19日。

⁵ 同上註。

聖書乃耶蘇教本記，為傳道計，翻譯各國語者，現今已有四百餘種。其飛譯之難（原文別字，應為「翻」），實有不可名狀者。如某野蠻國，其獸名只有豚、犬、鼠三語耳。其外總無方言，故不能明說聖書中獅子等語。又無市街、小麥、裸麥等語，而聖書不容略之，故益覺困難也。其他如亞弗利加「佗治比」島之無正直，美良等語如「有來夜」島之無希望、法律等語，又如「由港佗」之無疫病等語，為講求其適當譯字，實費約五年星霜，又現今世界中，禁止輸入聖書，且懲罰其讀者。亞拉比亞、波斯而外，尚有四國云。⁶

文中所用之「耶蘇」與現今所用的「耶穌」音同字不同，表現出翻譯時選字的差別。又，如果一個國家關於動物的語言形容語只有「豚」、「犬」、「鼠」的話，遇到《聖經》中有其他動物如「獅」的辭彙，到底要如何翻譯，對翻譯者而言是一個困難問題。可惜僅靠這段文字，不知是何種譯本的《聖經》，給譯者帶來應該如何翻譯的困擾。相對的，沒有相對應的語彙，也同樣麻煩，因為《聖經》在宗教意義上具有神聖性的地位，無法省略或跳脫，各國譯者要面對的翻譯困境還真不少。⁷

以上所言，表面上看來僅是針對在翻譯時語言轉換的困境，但隱含於內的翻譯困境，卻是較語言、文字差異性更為難解的語境問題，以及不熟悉全球各地異文化的矛盾。吳錫德說：

若只求借助於語言符號代碼的轉換，而想理解或掌握另一種文化，便有自不量力、甚至緣木求魚之處。另外，所有的文化也盡其可能地透過一定的語言符號傳遞，兩者相互依存，因此，文化之於語言；既是表徵，又是內容。為此，若要進行語言的解碼，就得透徹理解文化。而如何解析這些文化元素一即「文化障礙」（包括不同文化淵源、不同社會形態、不同精神與物質條件、不同思惟與信仰模化式等等），或「語言文化的異質性」便至關重要。⁸

翻譯並不是只要做出形式上語言文字的互換即可，語意的傳達、語境的配合，以及如何跨越異文化的障礙，都是完美翻譯的必要條件。《聖經》翻譯到各地時所產生的問題，反映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在語言、文字的陌生外，另一個所要注意的翻譯困境。日治在臺學者小野西洲於〈翻譯の難〉一文中，將翻譯的

⁶ 〈亞鉛歐鐵／聖書及各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明治41年（1908）8月19日。

⁷ 此即劉宓慶所言：「文化對語際的有效轉換關係極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型式(或形態)具有相通的或相近的信息通道;反之，不同的文化型式必然產生文化差異或『隔膜』，阻塞信息通道的暢通。因此，文化因素在語際轉換基本作用機制中起著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頁83。

⁸ 吳錫德等編，《翻譯文學&文學翻譯》（臺北：麥田出版社），頁91。

困難處，由語言、文字上的隔閡，推及到意譯上的困難：

我認為身為一位直譯者是很困難的。因為身為直譯專家，他不得不立刻翻譯所聽到的話，而沒有時間去查詢。在所有的語言中都是如此，所以他們要與說話者具備同等級的智識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達到直譯的效果。口譯如此困難，筆譯其實也很困難，雖說如果有時間可以查閱參考書好像比較容易，但翻譯起來仍會有錯誤，尤其是要與原文讀起來有相同的感覺，所以「意譯」可說是最困難的了。⁹

日治後期的張星健雖然認為此時的翻譯，已經由過去的理論研究階段進入到實踐期，但他也指出翻譯的難處：

然而翻譯並不僅僅只是將原作譯成他國語言而已，還必須將原作的思考方式、思想表現、感情的流露以及文中奇趣等弦外之音完整呈現，雖與創作之苦悶不同，翻譯責任也很大。¹⁰

與日治初期粗淺的翻譯看法兩相比較，小野氏與張星健的見解如果能被當時從事翻譯的臺灣文人閱讀，顯然能夠幫助他們在進行翻譯活動時有更多的留意和思考。小野所強調的「翻譯」，並非僅有語言、文字上的相符合，而是譯者與原著者（無論是口譯或筆譯），最好都要有相程度的「智識」，才不會造成與原文差距感過大的遺憾。對於小野西洲來說，語言、文字上的翻譯是理當會遇到的困難，但如何透過形式上的翻譯，進一步捉住「意譯」的重要性、與原作者有較相近的思考，才能得到翻譯的真髓。

小野西洲可說是日治臺灣最為認真思考翻譯問題的日本學者，早在日治初期，為了解決因語言上的隔閡而造成日本統治臺灣的不便，他就提出「日本來臺官員不可不知臺灣話」的論點，這也成為他日後積極從事翻譯理論的提出，以及實際操作翻譯以作為示例的先趨：

今夫言者心之聲，人心之有事與情，胥發之於語言。上之情下通，下之情上達。於是乎攸賴置官吏於舊轄土宇，施政之易易姑勿論，臺灣新隸我帝國版圖。我帝國以官吏分治臺島，風俗異，語言更異。風俗異，於政治上不過稍形隔閡。語言異，於政治上將有時見乘違。然則臺語不可不知，謂

⁹ 小野西洲，〈翻譯の難〉，《語苑》第17卷第9期，頁45。原文為日文，筆者自譯，並煩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潘小姐校正。

¹⁰ 張星健，〈翻譯文學について〉，《臺灣文學》2卷1期（1942年2月1日），頁7-9。本文引文少數為筆者自譯，大部份參考吳豪人譯、王惠珍校，〈論翻譯文學〉，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229-231。

非行政之急務耶。我帝國早見及此，歷觀府令，始也頒土語兼掌津貼章程，以獎勵官吏學土語。後也設舊慣調查會，研究本島慣習風俗。¹¹

可見小野氏對於日本來臺官更多未能及時善用臺灣話進行統治而感憂心，他進一步批評日本官員對於殖民地語言驕矜輕視的心態：

然而臺灣歸我十三載於茲矣，全島官衙林立，為問文官精通土語者今有幾人乎？為問警官數千，能自訊案無需巡查補為通譯者今又有幾人乎？揆厥由來，比比者大抵謂作官如作客，官衙如傳舍，勢不能久住臺島。且其意若有輕視臺島，故也。¹²

若不重視語言在統治上的影響性，則對於政府在臺灣的施政造成不便，甚至引起許多無謂的糾紛，此即「上下意不通」、「下之情無由上達」和「上之情無由下通」的弊病：

近復聞某警官為曉諭事，以不甚諳臺語，下詢人民。礙上下意不通，警官誤解遽怒而毆打之，民遂斃，該官今繫獄中。官吏不諳土語之禍害，此又其一證也。噫嘻別無他故，僅為土語一知半解、為屬之階，災及其身，至於此極。要之為臺島官不曉臺灣語下之情無由上達、上之情無由下通。為之取譬土語不精通，藉通譯以傳說，有如隔壁談話，其諸多不便有如是也。甚至事關秘密，慮人知覺，必事事依賴通譯，幾事不密則害成之謂，其謂之何？夫苟其精通言語，則心志喻。心志喻則情意投，情意投則上下聯為一氣，憂樂與同、安危與共，不患上之情難以下通也，下之情難以上達也。矧日人臺人本屬同種，人情又不甚遠也。西洋植民地為吏者，大率先學土語、次究民情，斯敷政裕如無格之不入也。新領土官吏，土語不可不知也，獨臺灣一島，爾哉！¹³

正因了解翻譯之難，小野西洲並不認為靠「通譯」或「翻譯」就可以解決問題，因為這些做法充其量只是「隔壁談話」，無法深入了解語意和語境，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親自去學習語言，才能對統治成效有所助益。小野西洲對「翻譯」的問題頗有研究，主要是自己也從事不少翻譯。這些作品，大多集中在《語苑》雜誌上，此即符合了雜誌本身的專業性。¹⁴他講求翻譯的方法，也值得後世參考，如此便可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可能存在哪些翻譯觀念：

¹¹小野西洲，〈本島官吏不可不知臺語論〉，《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1年12月13日。

¹²同上註。

¹³同上註。

¹⁴例如在《語苑》上連載性質的專欄「詩學初階」、「時文欄」，即是透過如〈祭十二郎文〉等文學作品，進行訓讀式的翻譯，而翻譯的語言則遍及日文、漢文或臺灣閩南話。

翻譯的要訣在於，不應拘泥於原文字句，應力求意義失去愈少愈好。同時，注意字句的精煉、聲調的正確、文意的暢達。而就翻譯對象而言，散文易、韻文難，詩歌尤為最難。故初學翻譯者宜由散文始，詩歌翻譯則非容易事，也非此學業的餘事。實用翻譯是必要的，譬如今日流行的宣傳文標語等漢譯時，不可用太新的白話語翻譯、不可用古漢文翻譯，時文則稍可。¹⁵

以上對翻譯的看法，並非僅限日文譯為漢文、或譯成臺灣語而論，它印證整個日治時期，為何臺灣文人在翻譯西洋文學時，會以小說、散文等無韻作品為優先，且又以小說為多，英詩等有韻作品則未有。故小野西洲的翻譯論，雖未直接涉及臺灣文人翻譯西方文學的說明，且趨近於為便於統治臺灣而建立的翻譯論點，但仍可做為日治時期如何看待翻譯，以及可能有哪些翻譯方法的借鏡。

二、以日文為翻譯方法的中介模式

「翻譯」如此困難，但，阻擋不了臺灣傳統文人認識西方世界的決心。在受限於無法直接通曉西方語言的現實情況下，臺灣傳統文人改採退而求其次的方式，達成他們與西方世界的聯繫。這個方式即是大批的文人在殖民政府進入臺灣後，除了初期以漢詩文與日本來臺官員進行交流外，文人如李逸濤、謝雪漁和魏清德等人，也開始著手學習日語。¹⁶畢竟，臺灣已是處於被殖民、被統治的一方，不熟悉殖民者的語言，會讓已保受戰亂驚嚇的臺灣文人苦惱不已，同時喪失更多能與新統治者交往溝通的機會。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認為：「說一種語言，是在承擔一個世界、一種文化。」¹⁷所以臺灣傳統文人試圖另闢日文學習的道路，並以之作為認識西方世界的管道。

日治初期，學習日文有成的臺灣文人開始翻譯日本講談進入臺灣，所以出現了一連串〈寶藏院名鎗〉、〈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志士傳〉等由日文轉換為漢文的小說。足見對知識份子而言，殖民宗主國的語言對他們的影響是直接且迅速。因為對他們而言，初期日、臺官紳以漢文進行交流酬唱的方法畢竟只能算是權宜之計。若要取得更好的發言位置，就必須加快腳步地學習日文，而這反造成日後臺人若欲引介西方文學、消息進入臺灣時，藉由翻譯日文的中介管道變成最便利的方法。陳伯輿在翻譯田原天南的《蒙古征歐史》時，於「緒言」就提及田原天南的翻譯本對其影響甚深，並說明他是將田原天南的日文譯本翻譯成漢文，刊登在報紙上供臺灣讀者閱讀，順便在文中推崇田原天南在翻譯上的貢獻：

¹⁵ 小野西洲，〈翻譯の難〉，《語苑》第17卷第9期。

¹⁶ 這些文人皆有學習日文的經歷。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頁299-300。

¹⁷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心靈工坊，2005年），頁98。

是書為本社邦文記者田原天南先生所著，以本年春出版。先生學問淵博、尤長西文，其著作常見本報。其文筆之流暢、議論之精警，久為有目所共賞，可毋庸喋喋。即其翻譯西文諸書，亦多能補著者所未及，且譯其意而不泥其文，誠翻譯中之聖手。近又有蒙古征歐史之作，乃譯自西文者，書中敘蒙古帝國之強盛，震古鑠今、驚歐動亞，允為亞細亞放一絕大之光彩，留一絕大之紀念。雖千載下猶足誇耀于四鄰者，當此清國危亡疲弊之秋，而有是作。使其民族讀之。藉知其屬部之強盛，時曾亦如斯。而我蹴踏神州、入主中夏者，尤當何如。則于喚起民族自強之觀念，或不無小補，故特為轉譯云耳，譯者識。¹⁸

由上文可知，《蒙古征歐史》本是西文，經過田原天南翻譯後有日文版本，而後陳伯輿又以田原天南的日譯本為依據，將其翻成漢文，並刊載於報上供人閱讀。譯者詳細地解釋其譯介的來源、翻譯的特色，以及促進「民族自強」的用意，充滿對當時正處於內憂外患的滿清政府的批判，有自我警惕的意味。

當然，除了藉由日文進行再次的轉譯外，臺灣文人對於己身是否能具有直譯西方語文的能力也是充滿期待。魏清德在〈南清遊覽紀錄〉中自言：「余管見囿於英文不精，故不能識，詢諸內地人，內地人亦僅多少知之。」¹⁹又在〈支那近時教育之進步〉一文中，展現對臺灣文人能具備直譯西方外電報導能力的渴望：

近日倫敦泰晤士報上連揭關於支那一通信。題曰「重遊極東」。世人以為類名士芝羅呂氏筆墨。試將通信中論支那新教育勃興記事。翻譯其大要。介紹如左。（雲林識）²⁰

由上可知魏氏耿耿於懷其英文不佳，引以為憾。故魏清德對譯文的介紹，仍是出自經由日文轉譯成漢文的翻譯行為，故僅能「翻譯其大要」而非將全文譯出。但臺灣文人能在此時注意到英文能與西方世界溝通，以及英國《泰晤士報》的重要性，代表臺灣與西方世界接軌的能力和吸收外電知識的管道隱然形成。

三、臺灣文人開始接觸西方文學

上述日文小說證明臺灣文人隨著殖民統治的深化，開始具備翻譯日文的能

¹⁸田原天南著、陳伯輿譯，《蒙古征歐史（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明治39年（1906）10月21日。

¹⁹潤菴生，〈南清遊覽紀錄（13）〉，《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明治44年（1911）2月4日。

²⁰雲林譯，〈支那近時教育之進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明治43年（1910）1月12日。

力。了解日文後，臺灣文人藉由將日文翻譯成漢文後，才得以以閱讀到西方文學作品，此法可稱之為「二度轉譯」。這可作為臺灣文人在接觸西方小說時，如何認識它、並將其翻譯入臺灣的其中一個管道。

縱使臺灣傳統文人必須經由對日文的再度翻譯，才能接受到西洋文學的洗禮，但他們卻從未放棄與西方文學的交流。黃美娥已指出，臺灣傳統文人甫自日治初期開始認識西方世界時，「時事」和歐洲各國的歷史即是他們所關注的重點，這其中還涉及視域由亞洲轉向歐洲空間意識的變化，因而成為臺人認識世界的契機。²¹而在西洋文學方面，林佛國等人也已注意到西方文學可供臺灣文人學習、觀摩之處：

古詩三百篇，……義旨奧妙，以十五國風言之，……於是政治經濟，人才風俗，沿革得失，指陳詳審，後人讀之，勃然感奮，故詩之所以可貴也。是後王風委頓，大雅不作……此雖或運會使然，要非詩人所見不太之故歟？近世歐美詩人則反是，其文藝文醇者，一本於哲學，凡所賦詩，不寫國家之政象，則描民族之心理。如俄之託爾斯泰、印之泰古俞者，使人誦其詩、讀其說，可以察其社會千變萬幻之情狀矣，蓋學不離乎社會，而措辭命意，又務以指導人心、改造時勢，此詩之之偉大，所以能後杜少陵，而為詩聖也。²²

黃美娥認為，由林佛國之言，可以觀察出此時臺灣傳統文人已經將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相聯結：

他在人物上，為臺人引介了托爾斯泰、泰戈爾及其寫作特質；在文章措辭上，則使用了「哲學」、「心理」新名詞，可見他對世界文學／現代性知識的挪用與移植。而更有趣的是，在林氏眼中，托爾斯泰小說、泰戈爾詩歌的創作精神，可以作為臺灣詩界革新的圭臬，顯現出如此國際環境中不同文化、語言的文學實踐觀念，卻無礙地從世界他處向臺灣本地傳送。²³

語言隔閡雖是臺灣文人在面對翻譯作品時最大的挑戰，但他們仍努力打破翻譯上的困境，而致力於認識外國文學，並期盼能為榜樣，作為協助臺灣文學革新的參考作品。這些行為與看法，皆顯示臺灣文人對於認識外國文學的主動，以及非皮毛式的認識。此外，另一文人連雅堂也談到他對外國文學的認識：

少陵之詩，人世之詩也；太白之詩，靈界之詩也。故少陵為入世詩

²¹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頁 301

²²林石崖，〈臺灣詩報序〉，《臺灣詩報 創刊號》，大正 13 年（1924）2 月 6 日。

²³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頁 304。

人，而太白為出世詩人。吾友蘇曼殊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諸子，只可與少陵爭高下，此其所以為國家詩人，非所以語於靈界詩翁也。烏乎！英國有一沙士比，已足驕人，而中國有一靈均，又一太白……而今之崇拜西洋文學者，不知曾讀靈均、太白之詩而研究之歟？唯我臺灣今當文運衰頹之時，欲求一入世詩人渺不可得，遑論出世？然以臺灣之山川奇秀氣豪雄偉，必有詩豪誕生其中間，以與中原爭長也。²⁴

連雅堂此段心得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談到「沙士比」（莎士比亞）之名，代表當時的文人對於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已有聽聞，開啓日後報紙上出現莎翁譯作的被譯介。再者，黃美娥剖析連氏之言，認為連氏既對西洋文學有所認識，卻又對推崇西洋文學者不以為然，並將西洋文學視為競爭／比較對象，並藉此凝聚臺人努力自前的推進力量，顯然潛意識中亦已正視西洋文學的份量。²⁵

由上述可知，雖然臺人在從事翻譯活動時，必須經由日文的再譯方式，才能讓世界接軌，但其對翻譯內容的了解，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且更積極的層面則是轉化為改革臺灣文學的動力，西洋文學於是成為臺灣文學的成分。以上林、連二人雖然著重在詩、戲曲的討論，但若細究日治《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小說轉載情況，則知西洋小說被翻譯的情況，以及可能帶來的知識系統，其實亦不亞於對詩歌的依賴。

無論日治時期臺灣文人的語言程度、翻譯能力如何，他們基於嚐鮮、啟蒙等種種理由，仍努力地將所接收到的外電知識翻譯進入臺灣，介紹給臺灣閱讀者知曉，其精神值得肯定。就在翻譯逐漸成為日治臺灣普遍性的文學活動後，西方小說也藉此被文人譯介至臺灣，於是臺灣小說在中國、日本的影響外，又另外開闢一條全新的接受路徑。

第二節、由原著到譯本：西洋翻譯小說在臺灣

隨著殖民統治的到來，臺灣加快了邁向現代的腳步，在政治、經濟上如此，在文學上亦藉此開拓與西方文學的接觸。由上述臺灣文人在翻譯新知的過程可知，臺灣人對於「翻譯」日益重視，其原因包括殖民統治的需要，以及作為對外吸取新知的重要方法，而翻譯理論也因此建構起來。在這幾項因素影響下，臺灣文人開始自動地嘗試翻譯西洋小說進入臺灣，這些小說如同中國通俗小說、日本講談／軍談般，在臺灣與世界接軌的時代，成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吸納、整合的對象。

²⁴ 連橫，《臺灣詩薈（下）》，第 13 號。收於《連雅棠先生全集·附錄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頁 83。

²⁵ 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頁 305。

哪些西方文學作品被譯介進入臺灣？它在翻譯取捨、改寫手法上又有何特色？臺灣知識份子對於這些千里迢迢傳播入臺的文學舶來品，又抱持何種心態去面對？臺灣文人在進行翻譯時，與 20 年代的臺灣新文學作家進行譯介時，存在著某些差異，鄧慧恩認為：

20 年代的知識份子的翻譯往往脫離了原始文本的脈絡，轉而遵從自我對於取決翻譯題材的初衷，換言之，對知識份子來說，引進文本裡的現代性，帶進文本的「新」顛覆自身的「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對他們而言，「翻譯」背後的元語言，就是對於新思潮的渴求。²⁶

鄧慧恩認為 20 年代知識份子在翻譯時，對於新思潮譯介的重視遠大於對原始文本脈絡的理解，誠然是另一種在翻譯上的思考方式。但部份被臺灣文人所翻譯的西方小說，出現於日治時期臺灣通俗文學界的時間點，實早於 20 年代知識份子的譯介活動。這些臺灣文人翻譯西方小說的行動，固然包含著將西方思潮或文化特點傳達於臺灣讀者的目的。但，文人們必須先將內容儘量傳遞給臺灣閱讀者閱讀後，讓讀者理解小說內容的梗概，才能進一步思考其文化意涵對臺灣的影響有多深遠。故文本翻譯是臺灣文人在進行西方小說的譯介時，所要面對的第一個挑戰。

既然文本翻譯如此重要，那麼日治臺灣第一篇翻譯的西方小說為何？哪些西方小說曾在日治時期被翻譯入臺灣，它的情節、內容，或是改寫的面貌與原始文本有何異同、臺灣讀者能透過翻譯對小說內容了解多少？將是本節欲先釐清的問題。

日治臺灣文人對非漢文小說的翻譯，最早可追溯到本文前述的日本講談²⁷，而若就西方文學而論，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與西洋小說的翻譯接軌，又應當由何篇小說開始？謝雪漁在明治 38 年（1905）所連載的中篇小說〈陣中奇緣〉，是翻譯法國小說而來，可視為日治臺灣第一篇翻譯西洋小說的通俗小說。²⁸譯者謝雪漁將此篇小說冠以「最新」稱之，是在召告臺灣讀者他所刊登的小說，將是之前臺灣閱讀者所沒有體驗過的小說內容、未曾接觸過的歷史故事。²⁹而號稱「最新」所代表的也是一個起點，謝雪漁有自信地認為，由他所刊登的〈陣中奇緣〉之後，日治臺灣將會出現更多以介紹、翻譯西方小說的「新小說」，故曰：「最新」。

²⁶ 鄧慧恩，《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頁 36。

²⁷ 請參考本文第 5 章。

²⁸ 南瀛雪漁，〈最新小說 陣中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38 年（1905）7 月 1 日-12 月 30 日。

²⁹ 黃美娥認為謝雪漁將其小說取名為「最新」，代表了：「遂顯現為一種新一代文學家自我創作形象的積極活動面貌。」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收於氏著，《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312。

雖說此篇小說敘事手法上是「承先」，仍是使用傳統的敘事方式，且就小說名觀之，「陣中奇緣」的命名，頗有「陣前招親」的意味。無論如何，〈陣中奇緣〉的出現，都可視為謝雪漁希望能藉由對內容與翻譯兩點，不但搶下翻譯西方小說的頭香，更能以此篇小說帶給臺灣閱讀者不同的內容感受，而達到「啓後」的目的。

〈陣中奇緣〉是以 18 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所譯寫成的小說。謝雪漁以共和派和保皇派的相互攻擊為情節主要的鋪敘內容。小說描寫由老魁倫、松如龍為首的勤王師（代表專制政府），與欲恢復政權、由熊大猛所領導的自由志士（共和政府）在蘭屏山相對抗。正當松如龍為戰局一籌莫展時，鐵花公子來求見，並欲改扮女裝前去探查敵情（但其實鐵花本身即是女子）。沒想到鐵花在探查敵情時結識敵方大將熊大猛，熊大猛對鐵花動了感情。之後雙方混戰，鐵花不慎失散亂軍中，熊大猛則被勤王師所俘虜。松如龍為救鐵花，將熊大猛放回，沒想到熊大猛雖然找到了鐵花，卻和鐵花一起被關入牢中，兩人逃獄時迭遇凶險，幸而順利逃脫。逃脫後鐵花生病，幸賴熊大猛、保赤醫生等人的協助，眾人輾轉逃難時遇到綠湖的靜修老人，才得知身世之謎。熊大猛將鐵花送回去，兩人卻已有了情愫。後鐵花再度失陷於敵手，大猛亦被擒但又獲釋放。以松如龍為首的保皇師最後大敗，主將魁倫自殺，松如龍則被捉並落入水中。熊大猛和鐵花脫困後來到綠湖尋寶，巧遇未死的如龍，並得知自己的身世，惡人梅孽最後遭到報應落湖而死。最後，活下來的人物皆有歸宿，可說是完美的大結局。

為何〈陣中奇緣〉是翻譯作品呢？由作者在結尾的附記中，即可知此篇小說是翻譯西方小說而來：

附記：《陣中奇緣》譯書，原為初稿，未經校閱，篇幅之複雜、辭句之繁蕪，在所不免。原不敢遽以問世，因本紙有餘白，故陸續揭出。以供閱報諸君之快覽，非敢炫異也，尚祈諒之。³⁰

《陣中奇緣》的翻譯來源為何，至今未知。但由文中可知，譯者謝雪漁之言，實道出原著本的複雜，故在翻譯時也遭受到不少困難。雖自己號稱「最新」，但受限於翻譯能力，謝雪漁仍免不了在結尾時謙遜指出譯作的缺點。而刊登的動機之一，雖然是向臺灣讀者介紹世界之大、給讀者帶來迥異於中國傳統小說的風格，但主因之一竟是報紙版面尚空欄位，所以將此譯作用來補白。³¹

³⁰南瀛雪漁，〈最新小說 陣中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38 年（1905）12 月 30 日。

³¹ 蔡佩玲分析此時期文人兼具記者身份的寫作心態是：「由於報紙密集發刊，有時甚至日夕刊、和漢刊並行，文人／記者對於寫作不再像著書傳世般慎重其事，他們既寫新聞記事，也寫詩、文、小說、短語叢錄作品，這些文學作品表面上像是新聞正刊的『白』，但實際上，文學的描摹也為讀者提供了互為映照的面向，反應人生世態、世局變遷、與新舊思維的種種裂變可能。」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頁 36。

謝雪漁不懂法文，可想而知翻譯此小說時，依靠的仍是經由日文版本轉譯，或是抄寫中國中譯本而來的再譯本，經由二度翻譯、更動的詞彙恐與原文有更大的隔閡。幸運的是，以今日的語音反推與對照，通篇小說中仍可看出部份譯介詞彙。此點不但是對當時翻譯者的考驗，也是能讓臺灣讀者有不同感受的特異處。例如「南都」(Nantes)、羅爾河(Loire)、溫的地方(Vendee)等詞，皆是在法國地理上實際存在的地方。譯者將其譯入臺灣，帶來的並非僅是譯者／讀者在體驗新詞彙、新地名的新奇感受，而是將原來被視為異域空間的西方地點帶入臺灣，在譯介文字符號的背後，開始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引入洋風。

長久以來，沉醉於中國通俗小說的臺灣文人，隨著日本殖民的到來，不但要試著習慣日本文學的進入，也必須承認臺灣作為世界一環，還有更多異於東亞文學範疇的小說值得去認識。自〈最新小說 陣中奇緣〉後，日治臺灣文人亦持續對西洋小說感到無窮的興趣，並以翻譯西方的偵探小說為最大量。³²但，偵探小說外，如同西方人認識中國通俗小說時必先認識《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一樣³³，日治臺灣小說界對於西方幾部頗富盛名的小說亦會感到好奇，而將它們譯介入臺灣。這些西方名著包括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名著³⁴、奇幻與冒險的小說《格理弗遊記》和《魯賓遜漂流記》、

³² 關於日治臺灣偵探小說的問題，已有黃美娥、呂淳鈺和王品涵等人作過詳細研究，故於此不再贅述。黃美娥見〈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308-309。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以及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³³ 例如楊達就以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為例，說明《水滸傳》對她創作《大地》的影響。楊達，〈談水滸傳〉，《楊達全集·詩文卷(下)》，(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年12月)，頁39。

³⁴ 日治臺灣報紙對於英國文豪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名著也多有翻譯和轉載，例如他的「四大悲劇」中，最早被翻譯進入臺灣的是明治年間由日本人中洲生所節譯的〈降任錄〉。〈降任錄〉節譯的參考來源為莎翁「四大悲劇」裡的《奧賽羅》。可參考孫大雨譯，《奧賽羅》(Othello)(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此譯介關係黃美娥已經言及，請參閱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74。以及另一部巨作《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復仇記》)，在臺灣刊登時其名為〈丹麥王子〉。觀潮譯，〈丹麥太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6日。許俊雅認為此篇小說為抄寫林紓、魏易所翻譯的〈鬼詔〉而來。但無論是臺人自我翻譯或傳抄他人，都可見證當下臺人認識到莎翁作品，而與西方文學接軌。許俊雅，〈少潮、觀潮、儀、耐儂、拾遺是誰？-《臺灣日日新報》作者考證〉，《台灣文學學報》第19期(2011年12月)，頁7-8。以上雖皆為翻譯之作，但其基本性質為戲劇，而本文論述重點為小說，故不再贅述。筆者另發現，大正14年(1925)的叢錄體小說〈治悍〉，雖然是以中國人作為小說中的人物，但其情節與莎翁的《馴悍記》頗有相似之處：兩篇小說皆是姐妹二人一暴一溫。而暴者被男子娶走後，在先生更加兇暴的對待下，不得不收斂起蠻橫脾氣，成為對丈夫唯命是從的賢妻，最後也同樣是以誰的妻子最先聽從丈夫呼喚而來的賭注，做為馴妻有成的成果展現。雖然因為篇幅短小，無法有更多證據證明兩者的譯介關係，但由主要情節判斷，《馴悍記》應對〈治悍〉有影響。莎士比亞原著、朱生豪譯，《馴悍記》(The Taming of the Shrew)(臺北：世界書局，1996年)。〈治悍〉，《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4年4月14日。

俠盜小說，以及教育、童話類小說。

一、奇幻想像與冒險犯難：《格理弗遊記》和《魯賓遜漂流記》

(一) 綏夫特 (Jonathan Swift)：《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

18 世紀愛爾蘭文學家綏夫特所著的《格理弗遊記》，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³⁵綏夫特化身為小說主角「格理弗」，因各種奇遇而到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駟國冒險的故事，由於廣被世界各種語言所翻譯，稱它為世界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尤其全書的前兩章敘述「大人國」與「小人國」的歷險故事，更被廣為流傳。日治臺灣也將〈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翻譯進入臺灣，並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綜觀整個日治時期，對「大人」、「小人」等特異人物的想像不少，這些外在因素影響臺灣閱讀者對於〈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的好奇。根據與日譯本和中國晚清譯本的比對，可知日治臺灣《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大小人國記〉不是由日本、中國轉譯而來，是由西方直譯進入。³⁶

除了《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大小人國記〉的翻譯作品外，日治時期專以刊登教育類文章為主的《臺灣教育會雜誌》上，也刊載由臺灣文人蔡啓華所翻譯的〈小人島誌〉³⁷，此篇小說亦源自於《格理弗遊記》中的「小人國」。這篇刊登在《臺灣教育會雜誌》上的〈小人島誌〉，開頭即說明它的刊登目的：

嘗讀《山海經》，有交脛貫胸三身一臂諸類，罕見者見之，無不以為至奇至怪也。然品物流行，賦稟不一。我以彼為奇，安知彼不以我為奇。我以彼為怪，安知彼不以我為怪？易地而觀，同此意想。夫羽民毛民，各隨煦育，無腸無胃，各令生成，乃異嘆造物賦界之奇且巧也。然而造物不以為奇也，人以為奇耳。造物不以為巧也，人以為巧耳。³⁸

在連載期間，緊接於每篇〈小人國誌〉後的，是對於《山海經》的分段介紹，可見譯者蔡啓華翻譯〈小人國誌〉的原因，有對世界特異之事好奇的動機，

³⁵ 單德興譯注，《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 (臺北：聯經出版，2004 年)。

³⁶ 林以衡，〈《格理弗遊記》在臺灣：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寫、諷喻與西方想像〉，《成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 (2011 年 3 月)。

³⁷ 蔡啓華，明治年間曾與謝尊五等一同應聘擔任大稻埕公學校的教員，並任總督府學務課員。此點可說明為何會在《臺灣教育會雜誌》上撰文。文學活動則活躍於大正年間，詩作頗多，與日下峰蓮、初山衣洲等人皆有交情，亦與「瀛社」社員相善，並有意加入「瀛社」。大正 5 年 (1916)，蔡啓華學家牽往東京，乃因其二子至東京留學，故有詩〈挈眷住東京〉，潘濟堂、陳清輝等人亦作詩送行。沒想到過 2 年後，蔡啓華因病逝於東京，享年 55 歲。《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5 年 9 月 14 日。〈瀛社例會補誌〉，《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2 年 (1913) 11 月 13 日。〈蔡啓華逝〉，《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7 年 (1918) 4 月 18 日。

³⁸ 蔡啓華，〈小人國誌 (1-4)〉，《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91、92、93、94 號 (明治 42 年 (1909) 10 月 25 日-明治 43 年 (1910) 1 月 25 日)。

另一方面，也是配合當時對《山海經》的解釋，取之作爲補充參考資料。至於在參考何種原著本下翻譯，由內容中難以判斷。因爲〈小人國誌〉雖然大致將完整情節以簡潔筆法譯出，對漢文讀者來說是一篇流暢通順的佳作，但它刪去主角便溺、以及小人國人物獲頒彩帶的情節，故無法判斷它確切的版本來源。在主角姓名的譯法上，蔡啓華將「格理弗」譯爲「涯里覓」，目前可見的日文版本並未見到有以漢字如此標示者，故也非出自目前可見的各種日譯本。但由於蔡啓華一生與日本親善、精通日文，因此他參考的應是研究者未見的日文譯本，譯者將其再譯爲漢文後，刊載在《臺灣教育會誌》上。除〈小人國誌〉外，蔡啓華亦知道有另一部相對性的小說「大人國」，所以在文末特別提到：「涯里覓素好航海，遂以此金造一巨艦，滿載食料，再遊大洋。自今以後，又有最奇之大人島談，以傳于世云。」³⁹可惜未見蔡氏繼續將其譯出。

在蔡啓華翻譯〈小人國誌〉的動機中，臺灣四面環海的地理位置成爲他譯介〈小人國誌〉其中之一的原因，這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大小人國記」中所沒有的。蔡啓華認爲，日本、臺灣與英國一樣，都是四面環海的地理形勢，所以與海洋有關的冒險故事都值得譯入、介紹給臺灣讀者認識：

英吉利者，恰如我邦島國也。四面環海、瀕海之人，每好遊於海。故關於航海之談話，自古以來頗多，其中最趣味者，爲「魯猛爽」及「涯里覓」，遊小人島及大人國之談。⁴⁰

除《格理弗遊記》外，蔡啓華還注意到同爲英國文學的著作《魯賓遜漂流記》，故將其與《格理弗遊記》並稱爲航海小說的兩個富趣味之作。藉由西方海洋小說的聯想，以及與西方國家英國的比較，臺灣文人注意到殖民者日本、家鄉臺灣的地理特性，選取與航海有關的小說譯介給臺灣讀者閱讀，可見蔡氏翻譯「小人國誌」並非僅以與《山海經》比較而滿足，其背後實寓東方／西洋文化同異性的比較，並重視日本、臺灣身爲海島的特殊性。《魯賓遜漂流記》也因此成爲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吸收的一本西方文學名著。

（二）笛福（Daniel Defoe）《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魯賓遜漂流記》是英國記者狄福的作品，狄福一生，處在政治、宗教的紛爭中，造成他本身漂泊不定的歷程，時人對他擔任情報員刺探對手機密、甘願協助禮遇他的政客撰寫政論文章批判對手的行徑頗多輕視，但這些負面形象卻絲毫不影響《魯賓遜漂流記》在文學上的價值與在世界上的巨著地位。此書於 1719 年 4 月出版後就不停再版，廣爲人知。徐霞村認爲，笛福其他作品完全比不上《魯

³⁹ 蔡啓華，〈小人國誌（4）〉，《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94 號（明治 43 年 1 月 25 日）。

⁴⁰ 蔡啓華，〈小人國誌（1）〉，《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91 號（明治 42 年 10 月 25 日）。

賓孫漂流記》的名氣和價值：

在以後的十二年內，他所寫出的小說無論在數量方面、在門類方面，都非常驚人，雖然其中除了《寡婦自傳》(Moll Flanders)和《大疫日記》(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兩書比較成功外，沒有一部可以和《魯賓孫》相比。他的小說的毛病是結構太鬆懈、文筆太無修飾、人物缺乏心理描寫。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長處，那就是敘述樸直、有寫實性、富於想像力，以及無論在情緒上、理智上都沒有造作之處。這些長處都給了後世的英國小說家不少的影響。⁴¹

基於上述長處，以及帶給閱讀者們冒險歷程的想像，久而久之，《魯賓孫漂流記》成爲風靡全球的讀物，其被熱譯的程度，可說和《格理弗遊記》相去不遠。故有「英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美譽，甚至被稱作是僅次於《聖經》而被多次再版的讀物。⁴²在翻譯版本方面，崔文東分析《魯賓孫漂流記》在晚清被大量翻譯，以及在日本出現多達 17 種譯本的熱烈情況⁴³，可見受到日本殖民的臺灣文人，其閱讀、翻譯《魯賓孫漂流記》的來源可能來自中國，也可能來自日本。而可觀察出受到《魯賓孫漂流記》影響的小說，分別是「鐵冷」的〈短篇寓言五毒〉和魏清德的〈百年夫婦〉。⁴⁴

二、俠盜與愛國故事的譯介：《羅賓漢》和《愛的教育》

(一) 亨利·吉爾伯特 (Henry Gilbert)：《羅賓漢》(Robin Hood)

「羅賓漢」出現於西方世界的舞臺，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元 1400 年左右，主要是以詩歌、傳說爲主，而後經過十九世紀作家浪漫想像的添加後，逐漸成爲今日所見的「羅賓漢」形象。按雷路許的說法，目前的「羅賓漢」有兩個面貌，其一是十九世紀美國作家霍華·派爾(Howard Pyle)和亨利·吉爾伯特(Henry Gilbert)兩人協力整理的「俠盜」面貌。另一個則是在英國作家司各特(Scott)《劫後英雄傳》中、協助理查王十字軍東征的軼事。⁴⁵

⁴¹ 笛福(Daniel Defoe)著、徐霞村譯，《魯賓孫漂流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47年2月)，頁12-13。

⁴² 笛福著、郭建中譯，《魯賓孫漂流記》(臺北：新潮社，2007年9月)，頁1。

⁴³ 崔文東，〈家與國的抉擇：晚清Robinson Crusoe諸譯本中的倫理困境〉，《翻譯史研究》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02-222。

⁴⁴ 陳佳慧以黃美娥的研究爲參考，注意到此兩篇小說與《魯賓孫漂流記》的關聯，她分析兩篇小說與《魯賓孫漂流記》的異同處，以及兩篇小說翻譯與地方文化價值塑造的重要性。值得參考，故本文不再贅述。陳佳慧，〈魯賓孫漂流臺灣記-從鐵冷〈短篇寓言五毒〉和魏清德〈百年夫婦〉看臺灣古典小說中的翻譯與地方文化塑造〉，《第5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討論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9月)，頁413-434。

⁴⁵ 以上參考自雷路許，〈自由與勇敢之心-不斷映像化的俠盜羅賓漢〉，收錄於亨利·吉爾伯特(Henry Gilbert)著、韓慧強、韓慧敏譯，《羅賓漢》(臺北：新雨出版社，2010年5月)，頁7。

「羅賓漢」的形象多元，他「替天行道」、「鐵漢柔情」、「驍勇善戰」⁴⁶，更具備「神箭手」的技藝與特質。綜合以上諸點，他成為西方典型的「英雄」形象，但卻沒有人能肯定「羅賓漢」是否真有其人。儘管如此，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仍稱讚「羅賓漢」形象的被塑造有其必要性：

雖然事實上他並不真正存在，也要把他這號人物編造出來，因為窮苦人需要他。他代表正義、公理，沒有了正義公理，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曾說，王國、政府，亦不過大寇而已。也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推翻暴政無望、只能照求重擔減輕之際，可憐的老百姓尤其需要他的出現之故。甚至在他們半同意半否定接受那些制裁強盜行為的律法之際，他們的內心深處，卻也同時認為，俠盜也者，代表著天理公道，一種今生無力實現的更高社會形式。⁴⁷

不同時代、地點，人們心中都共存有對英雄的渴望，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認為：「社會中到處都有一種對英雄分等級的崇拜，就是對真正偉大和賢明人物的敬仰和服從。⁴⁸」所以，日治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不但充斥臺灣文人對中國俠客、日本劍客的描述與想像，也將西方的「俠盜」羅賓漢翻譯到臺灣，認為他是西洋「俠」的代表。

早在大正6年(1917)，「羅賓漢」就以「勞賓赫脫」的譯名，於小說中跟臺灣讀者見面。〈俠盜軼事〉本身就是一篇翻譯小說，它講述高加索山中的老盜齊林康，人稱之為英國大俠勞賓赫脫第二。俄國政府屢屢要捉拿他。並派偵探追捕，卻反而被他戲弄。齊林康會易容，常化粧成老人或牧師以戲耍偵探，或是假藉為偵探提行李藉機偷取偵探的子彈和槍隻。最後傳說於戰爭中死去。⁴⁹到了大正13年(1924)，截取原著《羅賓漢》的短篇小說出現在報上：

俠盜羅賓漢，英人也，性剛毅而慷慨，有強力，善劍擊格鬥，見義勇為。貧而安者時濟之，富而驕者恒誅之。盜能如斯，誠以名之以俠焉。⁵⁰

小說因是節譯，所以篇幅不長，但跟原著「羅賓漢」的某段情節相符。臺灣版〈俠盜羅賓漢〉所節選的情節是：羅賓漢本打算搶劫一衣著華飾的少年，但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鄭明萱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傳》(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69。

⁴⁸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著、周祖達譯：《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年3月)。

⁴⁹ 〈俠盜軼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6年11月8日，第6版。

⁵⁰ 佚名，〈俠盜羅賓漢〉，《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3年4月16日。

得知少年的愛人將被為富不仁者奪走後，羅賓漢挺身而出，為少年奪回未婚妻。⁵¹小說其實沒有按照原著內容逐字逐句地翻譯，而是譯者閱讀小說、並了解內容後，重新以漢語語法重新敘述。如此方便臺灣閱讀者的閱讀，避免逐字逐句翻譯時，譯本和原著可能因語言文字不同而產生隔閡。而將「羅賓漢」事蹟引入，主要動機應是為讀者製造閱讀上的新鮮感、激起閱讀者對俠盜的想像與英雄式崇拜，為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增添加入西方傳奇人物的事跡。

由此不難發現，上述所例的西洋名著小說，除了〈大小人國記〉篇幅較長外，其他幾本小說幾乎都採用節譯的方式，僅是述其大要。雖然能講述到重點，以及觀察到原著對漢文譯本的影響，但帶給臺灣讀者的，卻也限於片斷的閱讀享受，而未能一窺全貌，此點對於臺灣翻譯文學而言，實是頗為可惜。黃美娥說：

而當時在報紙中，傳統文人對於世界文學的介紹，往往缺乏系統，而多半是針對個別作家作品簡單剖述，所見常是零碎式、單一文學的譯介而已，只能以知識的斷片、碎片，縫合、拼貼出臺人對世界文學的想像衣裳，但因報紙是每日出刊，甚如《臺灣日日新報》還曾有夕刊發行，接受訊息在大量積累之下，仍可對讀者產生可觀之刺激與影響。⁵²

可見量雖不大，仍可讓臺灣讀者認識到亞洲以外的文學作品，當中所蘊含的知識，亦多少會使閱讀者體會到與以往中國通俗小說不同的感受，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融合了西方名著，成就它兼容並蓄的特色。

(二) 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愛的教育》〈少年鼓手〉

大正 4 年 (1915) 3 月，一篇名為〈義大利少年〉的小說連續 3 天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⁵³小說講述義大利與奧地利兩國交戰，某日意大利步兵欲佔領小山上的民家，沒想到卻遭遇奧國軍隊的偷襲而陷入包圍中。於是「轉瞬此隊中已六七人僵矣。」隊長乃命令所有人進入民家抵抗敵軍攻擊。隊中有一掌號者：「撒爾尼產也，年纔十四耳。相度軀幹，又短小而精悍。」⁵⁴隊長指揮部下勇敢抵抗敵人進攻，怎奈寡不敵眾，眼見就快要失守，隊長於是命令掌號者求援：

呼曰：「兄弟，今有機密要事，煩君一行，不知君有此膽力否？」少年立隊長之前，舉毛加帽簷，以施軍禮曰：「願聽隊長軍令。」隊長乃自後窗

⁵¹ 此情節經筆者對照畢維安著、李淑貞譯的《羅賓漢》一書後，此敘事實源於〈阿藍·亞·戴爾的故事〉(The Tale of Alan-a-Dale)。《羅賓漢》(The adventures of Robin Hood)(臺北：九儀，1998 年)，頁 101~105。

⁵² 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頁 300。

⁵³ 〈義大利少年〉，《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4 年 (1915) 3 月 10 日-12 日。

⁵⁴ 〈義大利少年〉，《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4 年 3 月 10 日。

中遙指曰：「而不見山岡之上，閃閃槍矛之光者，非吾本隊乎？今我令若速持書趨本隊，遇第一士官，即以書授若。以汝身輕，縋此懸崖而下，越隴畝一直線行，即達本隊，注意注意。」少年曰諾，即以隊長手書，敬謹藏諸衣囊中……。隊長復言：「兄弟，此重大之命令也。吾一隊之生死，全軍之勝負。均繫汝一人之身，責任固非輕也，千萬注意、千萬注意。」

55

少年受此命令後立刻出發，心焦如焚的隊長親眼見到少年在槍林彈雨中受傷，但仍支撐著完成隊長所交派的任務。於是義大利軍隊在援軍來救下，反敗為勝，隊長甚至帶領士兵追擊奧軍，直到自己手臂也受傷後才歸來。歸來後第一件事，隊長在醫院中見到少年，並嘉勉他救了全隊性命。躺在床上極為虛弱的少年見隊長受傷而欲為其包紮時，卻無力而暈於榻上。隊長以為少年失血過多，但少年將被子揭開，隊長才知道原來少年因為中彈又狂奔，一隻腿不幸被截肢。而醫生在旁曰：

將軍，此少年真不愧為意大利之軍人也。渠以一脛活全隊之性命矣。彈丸躍地，自下而上，貫其脛骨，非斷之不為功，此勇敢之少年，方我施術時，嚙齒忍痛，既不涕泣，亦不呼號。自云：「我意大利之男兒也。」令人生感。⁵⁶

真正的高潮在隊長聽聞醫生的讚美後：

隊長默不一語，遽脫帽致敬於少年之前。少年曰：「隊長何行此盛禮也？」此時威嚴無倫之老隊長，不覺垂其淚曰：「兄弟，我不過一全隊之隊長，君真勇士哉！君真勇士哉！」語時，緊握少年之手，接吻於其額也。⁵⁷

這一段描述義大利少年不顧己身、拯救全隊於敵人槍口下的愛國故事，是翻譯於義大利作家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的作品《愛的教育》⁵⁸，書中一篇〈少年鼓手〉的故事。《愛的教育》是亞米契斯作品中最為暢銷的一部，它的原名“Cuore”在義大利語中原是「心」的意思。而它的副標題則是「一個義大利四年級小學生的日記。」這本書主要在闡述作者對於人生的感想、學校和家庭的關係、教師和學生的關係和父子之情。當然，最重要的宗旨，即是如同此篇〈意大利少年〉般，主要是在宣揚愛國情操。⁵⁹

⁵⁵ 同上註。

⁵⁶ 〈意大利少年〉，《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4年3月12日。

⁵⁷ 同上註。

⁵⁸ 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著、康華倫譯，〈作者介紹〉《愛的教育》（臺北：希代書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5月）。

⁵⁹ 同上註。

這篇小說是如何被臺灣文人所翻譯進來？與其他篇小說不同的是，這篇小說的原著語言並非英文，更非日文。對當時臺灣文人來說若要直譯於原著恐怕更為困難。當代早期由「學海書局」的出版的版本在〈譯者序言〉中曾提及此本書的中譯情況：

在中國也已有了好幾種譯本，或稱「愛的教育」，或稱「愛的學校」，大都是從日文本的書名上化出來的，內容也多以日文本為根據，所以和英文本法文本對照起來，譯得不同的地方很多。⁶⁰

如果說連中國的中文譯本都必須參考日譯本而翻譯。那麼，有鑑於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對外語了解不多，這本書的原文又是更少人能了解的義大利文。故合理推測，這篇由《愛的教育》中節錄的單篇小說，其來源應該也是由日文二度翻譯而來。這篇小說雖然在發揚愛國心，但在大正初期戰爭煙硝未起的時刻，譯者引入小說應是沒有呼應日本國策的意圖。至於閱讀者閱讀後，是否會激起他們對「國家」（無論是中國或是日本）的愛國心，就不得而知了。比較大的影響程份，應當仍是閱讀上的娛樂效用。

三、童話名著的引入：《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與《安徒生童話》

（一）《天方夜譚》之〈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

明治 45 年的小說〈盜窟〉描寫黃浩某天於森林中伐木時，偷窺到巨盜數十人以鎗擊石三下、並呼口號，使洞門開後將寶物藏入，藏好出來後，則以投擲碎石作為關門訊號。⁶¹於是，黃浩依法為之而取得盜賊所藏寶物，成為富人；後其異母弟見錢眼開，依法取寶，卻被殺害。之後，盜賊聽聞城中有人暴富，且為橫死者辦喪事，眾盜乃假辦成大腹商人入城，準備殺害黃浩，但黃浩僕人甚為機敏，發現情況不對遂報官緝賊，群賊見無法逃脫，憤而舉火自盡。然而，黃浩夫妻恐盜群仍有餘黨，亦連夜遠走他鄉。⁶²

小說〈盜窟〉與阿拉伯傳說《天方夜譚》頗有相似處，疑為參考〈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而來。因兩者皆為主角偶然發現巨盜藏寶的地點，以及必須使用暗語口號讓洞門開關的方式。而〈盜窟〉是同父異母弟因貪心而遭殺害，〈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則是阿里巴巴之兄卡西姆因貪財而死。不同點在於，〈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很詳細地描寫阿里巴巴如何費心地掩蓋兄長後事處理，以及自己為何變富有的轉變。而〈盜窟〉則僅以群盜：「又未幾，有疑浩暴富，掘得藏鏹

⁶⁰ 意·亞米契斯著，〈譯者序言〉，《愛的教育》（臺北：學海書局，1971年3月），頁1

⁶¹ 柯特·維京等編，《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臺北：志文出版社，2001年4月），頁57-106。

⁶² 〈盜窟〉，《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明治45年（1912）5月11日。

者，附會其詞，不可究詰。事遂喧傳殆遍，盜亦有所聞。」作結⁶³，但之後兩篇小說的盜賊皆假扮成商賈欲加害主角，雖然〈盜窟〉未多加著墨，且群盜之死不同於〈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是用油燙而死，而是被改寫成以遭到官兵包圍而集體自盡。但群盜被發現的起因，皆因兩篇的主角都分別有聰明的男僕／女僕莫姬亞娜幫他們化險為夷。

（二）《安徒生童話》之〈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

可以與《天方夜譚》並列為世界名著，且膾炙人口的世界著名童話《安徒生童話》，也在日治時期傳譯介進入臺灣。目前可見的小說為〈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漢文譯名為「克老司。」兩篇小說除臺灣譯本使用文言文外，故事情節於前半部幾乎完全相同，都是談大克老司富有，因而欺負小克老司。小克老司平時將僅有的一匹馬借給大者使用，大者的四馬匹卻只在星期日休息時供給小者用。當準備去教堂做禮拜的人問起小克老司所擁有的馬匹時，他總是得意說他有五匹馬，大克老司警告數次後，終於將小克老司之馬殺死。哀傷的小克老司將風乾的馬皮帶走，本想到市集賣掉。卻因投宿時見到農婦與牧師通姦，並在農夫回來時將酒菜藏起、牧師躲入箱中。故假怪力亂神之語，將馬皮說成爲魔術師，而騙出酒菜和讓農夫見到躲藏的牧師。農夫信以爲真，而出高價買了小克老司的馬皮，並要他處理箱中的惡魔（即牧師），小克老司假稱要將箱中牧師丟下水，而獲得牧師付錢換命，小克老司因此靠了張馬皮致富。回來後，小克老司向大克老司借衡器秤金，大克老司故意塗黏料在衡器上，因而黏了一點金子回來，也因此得知小克老司向他借衡器的秘密。⁶⁴

在譯文有譯出的文字中，只有結尾的地方不同。在原著中，小克老司是爲了要報復大克老司，而故意遺落金幣在斗中⁶⁵，譯文則省略了報復、殺人的情節。但無論如何，此段文字的出現，已可證明當下閱讀者已有受到《安徒生童話》的影響。

本節透過譯作與原著的聯繫，介紹日治時期除偵探小說外，被翻譯進入臺灣的西方小說，其原著與譯本的連結。這些現象包括奇幻、歷史、俠盜和童話題材的小說出現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可見臺灣對西洋小說多元的翻譯。特別是這些小說的原著語言包括英語、義大利語或是阿拉伯文，更可見當時影響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著作，並非只有英語系的小說。雖說它們會被翻譯成漢文進入臺灣，是經由日譯本翻成漢譯本的可能性較大。但，西洋小說終會成爲在中國通俗小說、日本講談外的另一股支流，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場域因爲有它們

⁶³ 〈盜窟〉，《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明治45年5月12日。

⁶⁴ 〈克老司〉，《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1924）8月5-6日。

⁶⁵ 安徒生（H.C.Andersen）原著、葉君健評譯、蔡尙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頁3-19。

的加入，而變得更為多元豐富。

由上述可知，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已能閱讀到不少西洋翻譯小說，對於他們與西方世界的接觸將會有所幫助。但，當下臺灣文人既會想要翻譯西洋小說進入臺灣，除了好奇心趨使外，還會帶有什麼動機以及寓意呢？這將是下節欲論述的問題。

第三節、翻譯的影響：創作範本、增廣見聞與娛樂效用

西洋翻譯小說進入日治臺灣通俗文學的場域，開啓臺灣文人和讀者閱讀小說的另一扇文學之窗，對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發展，絕對有正向助益。因此，翻譯小說的進入，不只是建立了臺灣與西方世界接軌的管道，不少翻譯之作，亦會成為臺灣文人在撰寫小說時，所欲模仿的對象。而除了創作上的啓發外，翻譯小說所帶來的世界新知、地理知識，也會讓居於島內、對世界有認識期待的讀者們，滿足他們在增廣見聞上的渴望。此外，欲讓讀者們有興趣閱讀西方翻譯小說，小說之「新」與「奇」則為吸引讀者的兩大因素，唯有在此兩條件下讓讀者產生閱讀時的娛樂感，西洋翻譯小說才能真正在日治臺灣的通俗文學場域中立足。

一、創作範本：敘事視角的轉換與新題材的運用

西洋翻譯小說進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場域，並被臺灣小說創作者／閱讀者共同閱讀，其敘事手法開始漸漸被小說創作者學習，並被閱讀者所接受，西洋翻譯小說於是成為臺灣文人撰寫小說時，不同於中國演義和日本講談的範本。在敘事手法方面，受到西洋翻譯小說的影響，除了將世界各國風貌大量融入小說中作為敘事背景外⁶⁶，臺灣文人開始嘗試使用第一人稱敘事手法的「我」、「吾」作為小說的敘事視角。這些有異於中國演義中傳統的全知視角，代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敘事手法上的創新以及改變，而這個改變將帶給小說作者在創作時異於傳統思考，讓臺灣閱讀者產生全新體驗。

(一) 敘事視角的轉換：由全知視角到第一人稱限制視角

全知敘事角度在中國演義發展上佔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但這並不代表每位作家、每篇小說，都甘心依照著此種敘事角度作為小說的主要視角。同時，也非每個時期所有小說都是使用全知敘事角度，然後才進入到限制敘事角度的階段。⁶⁷因為小說視角的使用，主要仍取決於作者書寫時的創作手法和考量，在有意或

⁶⁶詳細請參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⁶⁷所謂的「限制視角」，陳平原綜合各家說法後歸納為：「敘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樣多，人物不知道的事，敘述者無權敘說。敘述者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幾個人輪流充當。限制敘事可采用

無意間，作者就會選擇使用傳統或是較為創新的敘事角度於小說中。

當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試圖建立自己融匯百川的多元特色，又無法迴避對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承衍和接受時，全知敘事角度固然成爲臺灣通俗小說中可以輕易見到、受到中國通俗小說影響的敘事角度，但臺灣文人並未因此不在創作時去嘗試不同的敘事角度；更何況，所謂的「全知敘事角度」或是「限制敘事角度」，本就不是中國通俗小說的專屬用法，而是由世界上所有小說中所歸納出的共相，只是因爲臺灣距離中國僅一海之隔、又長期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多數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創作手法、風格幾乎等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敘事模式，中國通俗小說也就因此成爲影響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主要文類。⁶⁸但隨著臺灣文人對西方世界和西洋文學的愈益認識，小說創作者也開始嘗試運用不同於全知敘事角度的限制視角，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敘事角度，慢慢地產生變化。

明治 40 年（1907）由李逸濤所著的〈義俠傳〉，隱約已有限制敘事角度的運用。〈義俠傳〉講述的是小說主角麟山濤與其僕人誤入賊巢，險被劫財害命的經過，雖因周道士的相救而脫困，卻展開一連串的逃亡過程。幸運的是，由於麟山濤在路上結識了身負武功的李天民兄妹，在危急之時，李天民兄妹適時出手，解救了麟山濤。在這整篇小說中，麟山濤並非是小說的真正主角，小說的主角，其實是被李氏視作「義俠」的李天民兄妹，爲了描述李天民兄妹的義行，李氏本人並未進入到小說中自行敘說李天民兄妹的來歷和義行，而是以麟山濤的視角出發，描述兩人的義舉：

山濤因轉詰其所以，壯士乃自言為李天民，偕妹李雪花，入浙訪親不遇，前後半年餘，衣物業已典盡，所剩愛馬二，即兄妹之所乘者，不得已而鬻其次者，不謂上者亦被盜，幾同碧海之珠，言下殊有餘痛矣。⁶⁹

透過山濤的角度，敘說李天民兄妹的困窘潦倒，將英雄末路的情況，藉由麟山濤的視角表現出來，而非作者自己跳入小說中說明李天民兄妹的境遇。之後，麟山濤遇劫，在逃亡過程中，又再次透過麟山濤的視角，將李天民兄妹「俠」的一面表現出來：

天民曰：「有某在，斷不使君不生也。惟君終夜疲困，腹必大餒，某尚有

第一人稱，也可採用第三人稱。拉伯克稱之爲“視點敘事”，托多羅夫稱之爲“敘述者=人物”，熱奈特稱之爲“內焦點敘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頁63。

⁶⁸ 所以中國通俗小說如《紅樓夢》等已有採用限制視角的情況，自也會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視角的運用有影響。但此時期大量進入臺灣的西方翻譯小說，其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影響又遠大於《紅樓夢》等小說。

⁶⁹ 逸濤山人，〈義俠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0年（1907）1月15日-2月3日。

乾餵少許，敢以食君及貴僕，賊轉瞬至，君可避于此大石後，使舍妹護君，二馬即繫于大石後之大樹下，以防不測，如三十分鐘後，與賊戰不勝，某必不免，君與舍妹策馬奔，必以我為念。」山濤方欲有言，賊已追及，天民遂提劍與賊力戰，人如餓虎、刀如游龍，遇之無不辟易者。雪花自大石後窺之，以其徒甚眾，恐兄有失，急發一手鏢射僧，中其左臂，僧負痛引眾走。⁷⁰

這一整段躲避賊人、或與賊人交戰的經過，全都是透過麟山濤的視角而呈現在閱讀者的眼前。麟山濤在小說中只是一個平凡的角色，雖然因為一時慷慨而結識了李天民兄妹，但真正在小說中敢與惡勢力正面對決、行俠仗義的人物，仍聚焦於李天民兄妹上。所以，整篇小說無論是李天民兄妹的出現、賊人的登場或是周道士通風報信的義行，作者皆不進入小說中補敘，而是直接以麟山濤的眼光出發，描述小說的種種經過。但，在小說的結尾，作者李逸濤仍是耐不住習性，而以史傳方式的口吻，現身於小說文末的論讚中。因為多了這個補敘，整篇〈義俠傳〉出現了敘述者的聲音，告知閱讀者他敘寫此篇小說的動機，讓小說成為全知敘事與限制敘事融合的小說，李氏有感知地想要脫離純粹全知敘事的動機，仍然清楚可見。

類似的視角運用，也表現在小說〈留學奇緣〉。〈留學奇緣〉講述一在東京留學的「某生」，一夜忽遇豔遇，所遇女主角「賽羅蘭」及其女婢，不但會武，亦身付復父仇的重任。透過「某生」的視角，「賽羅蘭」與其女婢的復仇經過和逃亡計畫，一一呈現在閱讀者的眼前：

曰（賽羅蘭）：「無須，祇妾與婢子足矣。婢子亦劍俠也。且精于銃術，其藝不在妾下，妾前言欲得一可成事者，非欲藉其力也，乃欲謀安身立命之地耳。」……及越五日之夜半，果見女飄忽而至，顏色張皇，餘喘未定。擲物案上，礫然有聲，蓋拳銃也。視其竅僅放兩彈，生未及問，女曰：「大事已了。」⁷¹

「某生」在小說的前半段，作者雖然設計以夜半豔遇而與「賽羅蘭」有所交集，但除了少部份情節描述兩人的情意之語外，「賽羅蘭」的每個奇特行動，幾乎是透過「某生」的眼光描述而來。作者本身不再進入情節中為閱讀者補述「賽羅蘭」的生平與意圖，而是透過「某生」的視角，告知閱讀者關於「賽羅蘭」的一切。到後半部「某生」未曾親眼見到的事，作者也有意地安排一個懸疑的情節，即實際上有發生的事件，卻因為「某生」未見，作者不直接描述、以新聞消息傳送的方式表現：

⁷⁰ 同上註。

⁷¹ 李逸濤，〈留學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5月15日。

數月後忽聞喉殺生父之巨室，于重樓層閣中，深夜為人所殺。並剖心剖腸以去，今尚不知殺者何人。生頗疑女，然女不言。生亦不敢遽問，姑置之。

72

但在小說的最後一句：「聞女性又好讀書，每閱猶太亡國史，未嘗不感慨係之云。」作者並未安排以「某生」的角度出發，且按常理而言，「某生」既已與「賽羅蘭」作婚隱於馬賊中，她的所有動作「某生」應會習以為常，而不用發感慨之語。所以在小說的末尾，作者李逸濤仍是不自覺地運用全知敘事視角，或也藉此「猶太亡國史」的安排，作為自己在異族統治下悲哀的抒發。

當然，除了李逸濤所著的小說可稍見到臺灣文人已經隱約運用到「限制視角」的手法外，也有其他小說運用到此手法。例如許多以中國各地軼聞、叢談為主的短篇小說，雖然內容短小、字數不多，在有限的篇幅中，以簡單的筆法描繪出俠客的行俠事蹟，符合陳平原所述：「以人物為描寫的中心，紀其行狀，摹其心理」的手法。像是〈李雅宜〉、〈碧秋〉、〈白衣孃〉、〈黃副將女〉，「摭談」的〈袒臂僧〉、〈甘某〉、「叢談」〈盜馬兒〉、〈唐手之神技〉，「技擊談」例如〈劍術〉、〈劍俠〉、〈少林寺僧〉、〈劍娥〉等⁷³，主要的性質看似不同，但內容方面皆以介紹單個人物的行俠事蹟為多，標題也多以主要描述的人名稱之，這些小說的來源，大部份應來自中國，但應該也摻雜有臺灣文人仿作的小說。其中像是「白太官」、「白大痴」、「甘鳳池」等部份人士，史書紀載確有其人，這些俠客在民間口耳相傳下，逐漸流傳出多元事蹟，人物的面貌也趨於多樣。像是「甘鳳池」，除了大正年間在《臺灣日日新報》連續兩天刊登甘鳳池以及甘鳳池後人的行俠事蹟外⁷⁴，三〇年代後創刊的《三六九小報》「史遺」專欄也刊登甘鳳池的生平行為⁷⁵，但這幾篇和甘鳳池有關的描寫，內容並不相同。例如大正 11 年（1922）的〈甘鳳池〉，作者僅描述他是清初的拳術大家，但某一天碰到一位自稱姓紀的奇男子，紀姓男子「偉男子行走如飛，甘盡力追之，苦不及。」最後紀姓男子和甘鳳池聯手誅除父子大盜，於是甘鳳池在男子的高強武功以及仗義人品感召下，遂「從偉男子行，愈益悉心習劍術，故甘之武技，卒臻上乘，而著名於世。」⁷⁶這篇小說紀載的雖是甘鳳池的事蹟，但卻由紀姓男子的武功與行俠之事為視角，襯托出甘鳳池年輕時的桀傲不馴，既有史傳筆法的運用，又由紀姓男子的視角出發，紀述甘鳳池的行為。還有極短篇〈七世冤家〉，以夫妻爭吵失和的家庭問題為主題，以濟良所管理員的視角出發，描述午夜過後一婦人前來濟良所借宿，本來管理員要以婦人

⁷² 同上註。

⁷³ 來源請見林以衡，《日治時期台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語言及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文末附表：〈日治時期報刊漢文俠敘事目錄〉。

⁷⁴ 〈甘鳳池〉（上）（下），《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11 年（1922）2 月 25 日、大正 11 年 2 月 27 日第 7811 號。

⁷⁵ 亞雲，〈武術餘聞（2）〉，《三六九小報》第 3 頁，昭和 9 年（1934）10 月 19 日。

⁷⁶ 同上註，亞雲：〈武術餘聞（1）〉。

不是妓女爲由拒絕，但見此一名爲戎陸氏的婦人帶有三歲孩子，在側隱之心爲動力下，仍然將其安置一夜，並在明日爲其報官，解決家庭問題：

如此，我送你到捕房，明日請官長安插。啊啲！多謝多謝。早堂，捕房送來一個難婦，是慈谿山北人。我聞得寧波同鄉會是狠有名望的，不免送這難婦到該會，請他們安頓便了。⁷⁷

作者努力地想要以管理員「我」的第一人稱限制視角出發，描述整個家庭糾紛的過程，但，在技術未純熟的情況下，作者本人似乎仍然擔心閱讀者無法習慣此一敘事角度而了解其書寫小說的用意，故在文末時，作者終究忍不住跳入小說中，以自己的聲音爲讀者解釋這篇小說著述的用意：

此一篇小說，是欲世人家家夫婦和睦，免致妻離子散，惹起平地風波，故把這件事寫與眾人聽聽，也是以人為鑑的意思。⁷⁸

在結尾時，作者按捺不住以往的書寫習慣，而再度回到全知敘事角度的補述，讓人有限制敘事未竟全功的遺憾。但無論如何，由以上例子可知，臺灣作家在創作小說時，無論是無意或有心，其實都已經在全知的敘事角度外，運用到少許限制視角的手法，這種在敘事角度上已有對傳統展開反思的情況，是值得肯定。由於這些小說的文體與語法，仍然趨近於中國通俗小說的風格，所以這些在日治初、中期出現的限制敘事角度，會被臺灣作家運用的原因，仍可視爲受到中國通俗小說的影響，而在寫作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擺脫完全的全知敘事角度。但，對臺灣而言，其文化來源並非只有中國，而是包含著世界各地所傳入的文化，因此隨著時間的演進與推移，自明治年間乃至於大正時期，使用限制敘事角度的小說作品，其數量將會愈變愈多，也會愈來愈明顯。更重要的是，上述小說都難免摻雜著全知敘事角度，故只能視爲限制敘事角度出現的一個過渡期。但隨著臺灣文人對外吸收的小說愈多、技法愈純熟，全知敘事角度的小說雖然仍在日治時期各階段中不時出現，相對地，以限制敘事角度手法寫成的小說，其特點也會變得更爲明顯。最後，日治時期的臺灣通俗小說，即會以包含各種敘事角度的文化面向，呈現於臺灣閱讀者的眼前。

（二）向西洋學習：第一人稱限制視角的運用

在前段落中，已知臺灣通俗小說並非僅囿於全知敘事角度的表現，從對情節與人物的分析中，也能觀察到臺灣文人使用限制敘事角度的意圖。敘事手法和角度的多元，對於臺灣通俗小說的發展，必然是正向的幫助，而非負面的阻礙。

⁷⁷ 〈七世冤家〉，《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3年（1914）2月5日。

⁷⁸ 同上註。

如果臺灣小說只有一種敘事角度可供我們閱讀，又如何能顯示臺灣文人們的創作能力，以及證明日治臺灣閱讀者對於不同小說形式的閱讀渴望？時代在前進，作家對於小說創作的腳步，也隨之一同並進，就在這股小說創作的文學浪潮下，明顯向西洋翻譯小說學習，並以第一人稱限制敘事角度呈現的小說，也躍上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舞臺。⁷⁹

省思陳平原所重視的中國近代小說，晚清小說在西力衝擊下開始始用「予」、「余」、「我」的第一人稱敘事，堪稱是中國小說的重大變革，從此中國小說突破全知觀點的成規，開始有新的敘事角度出現，不但是對作家寫作技巧上的考驗，更帶給閱讀者全新的體驗。⁸⁰其實不僅是中國，一水之隔的臺灣，在殖民統治挾帶現代性的刺激下，也開始有不少文人嘗試使用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書寫，但一剛開始，這些以第一人稱限制視角出現的小說，大多數仍以文言小說的形式出現，造成一股舊／新相間的特殊風格。大正年間的幾篇中、短篇小說，已開始涉及視角的轉換，或是純粹使用「我」、「余」的限制手法來對小說情節進行鋪陳。後者如小說〈寄生樹〉，是以標準「余」的第一人稱視角，由拾得作為耶誕樹上的金飾品「寄生樹」談起，由此「寄生樹」引發出一連串的命案：

余乃持友一裝飾品之作寄生樹狀而金其質者，語之曰：「此微物，而置爾之檯上者，其所盛也。」……是日，午後，風大作，余乃取此，置於掌上，就暗淡日光中以視之。六日前，余見之於自由俱樂部，樹上有長方之葉二，葉之間，綴以果，其質金，其數亦二，今只有其一，而其他則失之矣。⁸¹

這裡的「余」，其實就是偵探本人，小說中不見作者聲音的出現，所有案情的發展與推敲，都以「余」和旁人的討論才得以逐漸明朗。敘述者本身並不知道全案的經過，敘述者本身也必須經由「余」的抽絲撥繭，才能和閱讀者一起了解案情的始末：原來命案發生的原因，乃是因為投機人物亨利與吉樂爾在共謀國財上出現歧見，亨利欲殺吉樂爾滅口，所以將毒藥施於貓身上，並誘使毒貓捉傷吉樂爾，造成此一離奇命案的發生。小說結尾的感嘆，也一改過去著者自言的形式，而是以「余」內心獨白的方式，為此兇案立下警語：「蓋吾不幸之亡友，當遇吉樂爾於倫敦時，曾戒吉樂爾，嗣後苟再有行爲，奸僞如是者，必舉發其事於比政

⁷⁹ 華萊士·馬丁 (Martin, W.) 認為「第一人稱敘述」是：「敘述者-作者也是該故事中的人物，他可以講自己的故事（作為主人公之“我”。若奈特的“extrading-homodiegetic〔外在敘述的-同一者敘述的〕”或別人的故事（作為目擊者之“我”，或德語所謂“Ich-Erzählung”）〔我-敘述〕）」華萊士·馬丁 (Martin, W.) 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頁 133。

⁸⁰ 當然中國傳統小說如《遊仙窟》、《浮生六記》等也有採用第一人稱限制視角的寫法，但對此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而言，受到大量進入臺灣的西洋翻譯小說，其直接影響程度應較為深遠。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頁 62-65。

⁸¹ 〈寄生樹（1）〉，《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 3 年（1914）1 月 25 日。

府也。嗟乎逆耳之言，竟至隕其身矣。」⁸²

至於視角轉換方面，則如小說〈奇男邸〉講述俄羅斯上流階層的交際應酬與男女情愛糾葛，雖無法得知所據原本，但應是西洋翻譯小說。小說一開始描述宴會情況和男女間微妙的情愫時，是以作者的全知眼光進入小說中為閱讀者說明：

當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之頃，那白雪皚皚，壓著的俄羅斯，那日却變做了繁華富麗之鄉。只見千街火樹根花、萬點瓊樓電魄，從肩摩轂擊、人山人海之中，洶湧出一派歡呼慶賀之聲。細聽來都道國皇萬歲，道不是俄帝尼古拉王第二登位的第一天嗎？……⁸³

諸君，那少年客人的名字，既然已由伯爵夫人宣佈出來，我以後就稱他叫栗格特了。⁸⁴

很明顯地，從小說一開始到第二篇的開頭，都是作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地為閱讀者講述小說地點、情節和人物，所以這部份是屬於全知視角的部份。但到了主角「栗格特」登場後，一開始雖然不脫作者以「他」的稱呼來描述「栗格特」的全知手法，但小說視角逐漸變成以「栗格特」的視角出發，特別是在偵查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時，「栗格特」以「我」的觀點出發，為閱讀者說明整件事情關係的始末。⁸⁵足見此篇小說在視角轉換上的特殊之處。雖說無法查得這篇小說的作者和來源是否真為臺灣人所作，但在此時刊登於臺灣報紙上，仍會帶給臺灣作者和閱讀者另類的敘事構思和閱讀感受。

謝雪漁的中篇小說〈偵探案〉，也是涉及了視角上的轉換。雪漁在書寫這篇小說時，其實是採用第三人稱限制敘事進行譯寫，但由於辦案過程中屢屢有犯人或證人自白的情節，而這個部份，又只限於當事人才能述說清楚，所以第一人稱的限制視角，在小說中不停地與第三人稱限制交互運用：

林福接到電話，總會未了，託故辭歸。見陳氏死狀，知是中毒。穿衣不著褲，精液沾濕床蓆，知必與人私通。乃取一氈覆其體，親身走報警官。

林福答以據他所知，有同鄉同姓，名成財。他原在我店為外交員，常到我住家取物件。他果否與陳氏通姦，我亦無所見。惟陳氏生一男孩，其面貌體格，絕似成財盡人譏訕，以為是成財所生，不是我之親生，我乃將成財解雇。⁸⁶

⁸² 〈寄生樹（5）〉，《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3年1月29日。

⁸³ 〈奇男邸〉，《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大正3年12月20日。

⁸⁴ 〈奇男邸續〉，《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大正3年12月21日。

⁸⁵ 同上註。

⁸⁶ 雪，〈偵探案：新式科學的搜查（19）檢血驗毒（3）〉

上述第一段引文是屬於第三人稱限制敘事的範疇，第二段引文則由第三人稱限制角度換為第一人稱限制角度。小說要使用何種視角，無論是作者和譯者都可以有很大的選擇權，若〈偵探案〉不是謝雪漁翻譯的作品，而是原創之作，則小說中表現視角不停地轉換，其實代表臺灣文人在書寫小說上對於視角運用的來回嘗試。

不過，對於閱讀者而言，突破全知敘事角度而改採第一人稱限制敘事角度的書寫模式，他們會習慣嗎？小說〈失畫〉是融新聞與小說為一體的偵探故事。小說一開始，並不說明是誰在講述故事，而只描述在「一千九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時，有名畫「拉霞空那」在巴黎國家博物院遭竊。由於此畫為法國國寶，法國政府開始派出偵探於全歐到處查訪。二年多後，義大利學務大臣突然告知此畫在義國，而竊賊為義大利油漆工人，藉著在院內施工機會將畫偷走。在欲轉手賣出時被警方盯上，而宣告破案。⁸⁷

通篇案發到破案的來龍去脈，一直到記者「余」在後半段出現後，閱讀者才了解到底是誰在講述案情：

余（訪員自稱）持此新聞赴伊立斯宮，晉見法總統蒲爾楷里時，法總統亦適從廓互塞接到是項新聞也。斯底奇者是畫被竊時之美術總管也。彼告我（訪員自稱）曰：「拉霞空那之失蹤，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⁸⁸

為了怕閱讀者不太了解「余」所指是法政府美術總管，或是記者。原作者或譯者都在「余」的後面加上附記，以免閱讀者弄錯整篇小說是透過誰的角度所敘說，可見此時對於「余」、「我」等第一人稱限制視角的運用雖有，但有時作者／譯者仍然擔心閱讀者不習慣，而導致對小說情節無法具體掌握。

昭和年間所刊載的翻譯小說〈小人國記〉的「序言」，也表現出譯者顧及到當下臺灣閱讀者是否習慣第一人稱限制敘事角度的疑慮：「事之有無，在所不論是為緒言云爾，詳細且看本文，此下皆用作者自述口吻。」⁸⁹如果說，當時的小說作家和閱讀者都已經習慣第一人稱限制敘事的手法，那麼，譯者也不須要在「序言」中還要特別說明小說所使用的口吻。此點反應出第一人稱限制敘事角度的用法，雖然已經出現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通俗小說中，但能不能被大眾廣為接受，仍是一個難以判斷的問題。

但，文學如同時代一樣，也必須要有所進步。到了日治後期，由於文體從

⁸⁷ 〈失畫〉，《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大正3年（1914）12月29日。

⁸⁸ 同上註。

⁸⁹ 〈小人國記（緒言）〉，《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3月3日。

文言瞬間改變為白話文，小說書寫者和閱讀者對於第一人稱限制敘事的用法，也就愈來愈習以為常。可以說到《風月》系列的刊物出現後，在其上所刊載的作品，大量使用第一人稱限制角度，讓這個敘事視角的發展，終於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得到成熟。例如《風月報》上的翻譯小說〈俠女偵探記〉，譯者吳漫沙忠實地使用第一人稱視角來表達小說內容：

皎潔的月色，從窗之隙際射入來，很覺清媚可愛，我和我友福爾摩斯都睡不合眼，便相偕起來，站在小露臺裡，想藉此一滌室中的濁氣……。

「你聽！」這我才覺得遠，有著步履的聲音，其聲很輕，好似要掩其足跡的樣子。過了一忽，河中忽然湃潑一聲。福爾摩斯不說什麼，愴惶把我挾著，我為他所挾，幾乎要撲倒在扶梯上。⁹⁰

此文是翻譯小說，但較諸之前的例子，不但文體由文言文轉換到白話文，第一人稱的「我」在使用上也較自然和合理。雖然說在整個日治時期臺灣通俗小說的敘事角度發展上，第一人稱限制敘事都未缺席，但恐怕是要到《風月報》的時代，第一人稱限制敘事才得與其他敘事角度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其他敘事角度的運用，享有它應有的敘事地位外，也代表臺灣小說作者／讀者在創作技巧和閱讀感受上的進步與成熟，不再囿於中國傳統的敘事角度。

嚴格來說，絕大多數使用第一人稱限制敘事角度的小說，幾乎都是與西洋翻譯小說有關係，翻譯者例如〈大小人國記〉、〈俠女探險記〉等，模仿者則如謝雪漁的〈偵探記〉。而在《風月》系列上出現的白話第一人稱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發展的階段，必然也受到不少西方作品的影響。綜合上述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代表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在書寫通俗小說時，若欲使用第一人稱限制敘事角度建構小說人物的視角，仍必須以西洋翻譯小說為範本進行模仿和學習。而之所以會有這種在書寫上的轉折，自也跟日治時期的臺灣開始大量接受西方事物、文化的影響有莫大關聯。這個現象不是臺灣僅有，中國晚清小說的作家在使用限制敘事角度創作時，也受到西方翻譯小說深厚的啓發。⁹¹中國如此，臺灣如此，更別說早於臺灣與中國力行西化且獲得全面成功的日本。所以文化的影響是環環相扣，此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受中國、日本文化的影響，但三者卻又共同的彼此關聯，以及同樣地受到西力東漸的改造。單僅是由限制敘事度的文學基本形式出發，也代表此時期的東亞文學，正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將會產生更多的變異與炫麗。

⁹⁰ 曉風（吳漫沙）譯寫，〈俠女偵探記〉，《風月報》（第85期5月號），頁5。

⁹¹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65。

(三) 西方新知在小說題材上的出現

臺灣文人對西洋翻譯小說的學習能力，並非僅止於形式上的模仿。西方新科技、新知識的運用，才是文人們在閱讀西洋翻譯小說後，在創作小說時最大的收穫。日治臺灣通俗小說就不時出現傳統與現代相混雜的書寫情況，例如〈人怪〉描述盜匪用來謀財害命的器物：

加害者既被獲，搜其身得一電器，且有藥水及器械數事…蓋以電器擊人至死，針以藥水則暫活，可遲至二三時間……。⁹²

這種新型的犯罪手法和器物，夾雜了作者對於科技的想像，頗能為讀者製造出不同的新奇感。通篇小說以中國的僵屍傳說為背景，按照作者的情節安排，以馬生不信邪，依恃勇氣和武力揭發僵屍傳說的愚昧，宣揚西方科學手法和進步，希望培養民眾的研究精神以破除歹徒假借怪力亂神傳說的惡劣行為：

□中僵屍之說最盛，人亦信之而不疑。

馬素豪爽，不為邪說所惑，不禁鼓掌大笑曰：「余道君是防寇盜，不意丈夫亦畏鬼。」

此賊從西醫學得新式電氣，觸人鼻孔輒死…蓋件作于解剖學尚未興也。

後馬辭歸會稽，乃乞贈王所攜諸物以去，謂以供研究也。⁹³

〈古體聖文〉中，則充斥對世界宗教的描述：

北支那稱奉回教者為回子，而印度南洋諸島土人，亦多崇奉其教，其數或多於奉佛者，其人絕對不食豬肉，且惡人食之。

地拿及其生地麥加拜禮，若臺灣媽祖之進香者。⁹⁴

後聽耶蘇基督教說教，乃折節為善。⁹⁵

寶惜猛憶喇嘛僧有贈書，囑令臨危方啓，因出而啓之，內置喇嘛符一道。

⁹⁶

以及對「人從能裡來」、「世上有無神」的辯論：

卓爾哀曰：「實告君，余乃天使降生為支那人，將以救非洲蠻族之野蠻，而使之開發也。」約翰不信，言：「廿世紀科學發達之今日，那有人肯信

⁹² 李逸濤：〈人怪〉（上）、（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43年（1910）5月25、27日。

⁹³ 同上註。

⁹⁴ 潤，〈古體聖文〉（1），《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1924）6月2日。

⁹⁵ 潤，〈古體聖文〉（2），《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6月4日。

⁹⁶ 潤，〈古體聖文〉（21），《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7月5日。

先生為天使？」卓爾哀曰：「誠如所云，彼蠻人安肯信我？今且敬我以神，奉我為盟主矣！」約翰曰：「彼蠻人固信。而余終不信。」卓爾哀曰：「君誠中文藝復興後懷疑思潮之毒，今日科學雖萬能，亦必有神在，世人雖盛論生物進化之理，起於單純之一細胞，却又不知細胞之組織，又何物也？」約翰曰：「是無難知。依學者所云，細胞實質之構成，基於原形質之複雜。原形質之構成，基於元素之複雜。」卓爾哀曰：「若然則元素盡歟敢問元素從何而來？」約翰曰：「元素分子之複雜也，分子則出於原化合法無限之複雜也。其進而為電子，日月星辰於以繫而不墜，飛潛動植於以生而遞易，其無生者為大氣、為礦物。吾終不信世間有甚麼所謂天使。」卓爾哀見約翰年少博學而甚好辯，乃繼之以言曰：「集電子而創造進化為萬物者，天使也。」約翰曰：「誠如先生所言，則天使為誰造？」卓爾哀曰：「吾母。」約翰至是笑不可仰，問先生既係天使，自當知我死者三名之名姓。卓爾哀無言可答，乃囑令秘之，言不如是，恐遭蠻人毒手。約翰點首許諾。⁹⁷

這段兩人論辯生命由何而來的文字，包含了對生物學、倫理學、宗教學以及化學等議題的討論，充分反映出作者對於各門學科基礎性的認識，而將其化入小說情節中。有趣的是，此段文字到最後看不出什麼結論，作者直接把方向導回命案，而沒有再就此議題交代出符合科學的答案，顯示作者在西方科學認識不充足，雖然將其作為小說情節，卻只能告知讀者「世上有此說法」，而無法告知讀者「為何有此說法」的無力感。但小說畢竟學習到西方實事求是的規則，雖未達成熟，仍將其融於小說中，為小說帶來不同的風格。

比起上述所舉兩篇小說，學習西方偵探小說的作品，更能觀察出臺灣文人在翻譯大量偵探小說進入臺灣後，欲模仿偵探小說而嘗試創作新作品後的成果。由早期魏清德的偵探作品如《環珠記》、《金龍祠》、《傾國恨》、《獅子獄》開始，到後期的《咄咄之怪函》、謝雪漁的《偵探案》，乃至於《風月報》上的《俠女復仇記》，這些作品無論內容是西洋或日本，抽絲剝繭的推理精神和錯綜複雜的情愛糾葛，都一反過去中國傳統小說平鋪直敘的敘事模式，給予讀者的是情節屢經轉折、主角每逢碰壁時，都必須動腦思考作者之後會如何佈局，以及可能的發展模式。由於這些小說都是每日在報刊上連載而未出單行本，閱讀者無法在欲知曉結局的動因下事先看到真相大白的情節，如此更增添閱讀者欲罷不能的閱讀動機。例如《獅子獄》描述主角偵探「屈里克」出場時，特意描述他身為西方人的身份：

屈里克其時目眺園中花木，覺詩情泉湧。屈里克若假定為臺灣詩人，便當聯想及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之詩句起來。惟是屈里克即係巴黎人，自有泰西人一流之詩的及哲學思想。⁹⁸

⁹⁷潤，〈古體聖文（9）〉，《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6月17日。

⁹⁸潤，〈獅子獄（1）〉，《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大正13年（1924）9月27日。

作者魏清德本身即是著名詩人，在這篇小說中，他特意捨去中國傳統小說主角出場時的「出場詩」描寫手法，改以西方詩及哲學思想作為偵探的特點，作者模仿的企圖並非只是披著東方人外衣的偵探，而是期望建構一位真正來自於西方的偵探形象。為了強調此點，才會在小說中特意描述此人若是臺灣詩人，則應當會有何種動作的假設情節，以作為西方人身份的反證。⁹⁹之後，經過偵探縝密的訊問、實驗與設計，整起「以獅殺人」的兇殺案得以水落石出，但作者畢竟是模仿西方偵探小說，而無法立刻擺脫原來的敘事模式，這些一時無法改去的書寫習慣，充斥於寓科學實證內容的小說中，使小說具有新／舊交替的模仿痕跡：

讀者諸君。那獸醫固不問而能知為屈偵探。獨先攀幕入。而施總監則喻觀眾以宜暫時靜候。不可退場。今夜之劇。比諸弄獅。百倍興趣。巴黎市民。素有節制。果絲毫不敢紛擾。屈偵探等遂入內。¹⁰⁰

偵探於社會上至為必要，故一名曰藝術家，所貴乎存心良善，不敢顛倒是非。而手腕之精，又貴不使人得以是非顛倒，則信乎衙門中好修行者。故書此以為一般之偵探勸，若夫亞納夫大尉及智囊綽兩人，計非不奇、謀非不毒，陷人者適足以自陷。故天特假名偵探之手而暴露之，一則死刑、一則無期徒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以也夫。¹⁰¹

作者條理清楚地為讀者解釋案件的發生、經過與結果。讀者們則按照作家筆下偵探的思路，逐步了解整件事的因果，潛移默化中習得西方偵探小說的理性精神。但並非每篇小說都如此成功地在保有獨創性下，又能兼具原著小說的意義。例如「鐵冷」的小說〈短篇寓言五毒〉，黃美娥分析此篇小說後認為，作者雖有意模仿《魯賓遜漂流記》獨創一篇小說，但卻只有學到皮毛，而未了解原著的真正精神：

鐵冷此篇文言小說，是從魯濱遜冒險精神的感召展開的，但最後終寫成一則始終和家人在一起，安份守己，認清世態汙濁而避居自清，認命而無所欲求的人生寓言作品，他大大背離了《魯濱遜漂流記》原著所強調的個人主義精神；雖然文中對於汙穢的國家群體有所批判，也選擇不予接觸，但如此並不同於尊重個體人格價值和人格獨立的現代文化。¹⁰²

⁹⁹ 黃美娥認為此段頗有討論的意義，她說：「魏清德此處其實已悄悄要進入個人心理的揣摩書寫。這種想要設想人的心理的描寫，一旦再多濡染世界偵探小說對事物前因後果的細膩剖析，查案時蛛絲馬跡的掌握，相乘相加之下，其實有益深化創作者的觀察力與體悟能力，行之於文，自能催化現代文學中個人心理的描繪。」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頁 327。

¹⁰⁰ 潤，〈獅子獄（9）〉，《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大正 13 年 10 月 19 日。

¹⁰¹ 潤，〈獅子獄（10）〉，《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大正 13 年（1924）10 月 20 日。

¹⁰² 黃美娥，〈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頁 331。

而同樣受到《魯賓孫漂流記》影響的魏清德〈百年夫婦〉，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

可見魏氏此文綜合了魯濱遜漂流孤島，以及發財致富的情節，不過小說中少了經濟分工與勞動神聖觀念的凸顯，其對小說人物何以能造就財富的原因，只以奇異機緣解釋，以及文末王某在官積德所致，小說焦點遂形成傳統果報觀的宣揚，減損了援引魯濱遜冒險敘事的意義。¹⁰³

由以上兩篇模仿《魯賓孫漂流記》的習作可知，「鐵冷」和魏清德雖有閱讀《魯賓孫漂流記》的經驗，並有意將其化爲己身的創作，但卻未能將小說精神徹底發揮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僅習得部份皮毛。此舉固然讓西洋小說傳入臺灣所能引起的文化刺激大打折扣，但，文學創作本就應以「貴獨創」爲重。兩位作家皮毛式的學習，雖然有缺憾，換個角度思考，他們畢竟是在學習，而非抄襲。作家至少藉由習作，讓讀者大概了解《魯賓孫漂流記》的內容梗概和部份創作精神，對於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發展，仍有功勞。

總之，無論臺灣文人藉由西方翻譯小說所學習到的觀念是深或淺，都可以說日治臺灣通俗文學可作爲時代進步的一個見證。若學得淺，是習得創作手法和西方器物融入小說中。若學得深，則是將「理性觀念」深植於人心中，馬克思·韋伯（Marx Weber）在論及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由理知化和合理化而來時認爲：

只要我們想了解，我們就能夠了解；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在原則上，並沒有任何神祕、不可預知的力量在發揮作用；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在原則上，透過計算（Berechnen），我們可以支配（beherrschen）萬物。但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¹⁰⁴

這種以「除魅過程」提高理性和科學的方法，成爲文人們配合運用科學觀念和各種西方新器物於小說創作時的展現，透過吸收、接受與模仿，西方翻譯小說與臺灣通俗小說交互運用下，爲臺灣現代性引入打開一扇大門。

二、增廣見聞：以翻譯小說見世界之大

翻譯的功用爲何？日治臺灣文人是否能了解，透過翻譯，他們能得到什麼？對於日治臺灣各方面的發展，又有何效用？作爲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後，得以打敗中國並取得統治權的殖民地，臺灣文人對於日本維新時大量師法西方的策略十分清楚，故「翻譯」在明治維新時實是具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¹⁰³ 同上註，頁 332。

¹⁰⁴ 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著、錢永祥等編譯：〈學術作爲一種志業〉，《學術與政治》（臺北：遠流，1991年），頁 145。

維新之初，志士群起。有自備學金，涉重洋研洋學。有捐財產，興學校、廣翻譯，以灌注歐西思想者。上唱下響，舉國靡然。其時幕府未倒，非有政府大官之獎勵卒至民想趨潮，黃河東下，不可遏止，是豈偏執者之島人可能效顰也。¹⁰⁵

「廣翻譯，以灌注歐西思想者」成爲明治維新能成功的重要推手，因爲引進了西方思想，才能促進日本的倒幕運動、走出鎖國並自力自強，開始一連串的改革。這一切的進步運動，就有如濤濤江水般無法抑制，終於讓日本達到亞洲第一強的地位，翻譯所帶來的功效，並在日後幫助國家達到革新的目的，是臺灣人開始重視翻譯的起因。又云：

此種統計。非爲公表外國而集記者。乃自支那文書中特爲翻譯之數字。此外又有數多宗教學校。然於表中。不爲記載。支那欲急行採用此泰西教育。必須多數有爲教員。然其不易得。自可想見。然而支那各地父母於子弟。熱心誠意。力求教育。不吝惜巨金。故新學堂之增設。實有似此旭日昇天。林立而起之勢也。學堂以外。爲支那鼓吹新空氣者。莫如翻譯外洋書籍。能使不通外國語之支那人。得藉以洞察天下大勢。其感化偉力之不淺。頗可歎賞矣。¹⁰⁶

在新知引進方面，翻譯的重要性已爲日治臺灣文人所肯定。面對世界局勢的詭譎多變、西學的日新月異，唯有透過洋書的翻譯，才能讓中國或是臺灣在耳濡目染下，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翻譯文類既具有知識傳遞的功用，翻譯小說也兼具有讓讀者增廣見聞的責任。日治臺人若欲了解世界之大，除了外電新聞的報導外，透過小說的閱讀，幫助臺灣讀者滿足對世界奇風異俗的想像，並從中學習臺灣所沒有的西方制度。例如《格理弗遊記》的主角格理弗，是在奇遇下進入到各個非屬常人世界的奇幻國家，而後展開歷險的故事。由於作者梭夫特對於英國政治現況的不滿，造就《格理弗遊記》寓於情節中的濃厚諷諭性，透過以「國家」作爲小說單元的組成，更能將作者對時政的不滿，藉由書寫國家制度表現出來。既是如此，在譯者深知《格理弗遊記》的諷諭特性下，譯者也在譯寫「大小人國記」的過程中，藉由格理弗的描述，體認到現實生活中英國的各項制度，或是感受到大小人國虛幻、異於常人世界的治國方式。現實生活中的國家形象，爲日治臺灣「大小人國記」的閱讀者開啓一扇知識窗口，而幻想中的國家制度，則對照現實世界的國家形象，襯托出更爲強烈的國家意義。無論實或虛，都讓臺灣閱讀者感受到一個異於總督府統

¹⁰⁵雲，〈時趨之瑣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明治43年（1910）8月23日。

¹⁰⁶雲林譯，〈支那近時教育之進步〉。

治下的政治制度，於是譯者就藉由對「大小人國記」的譯寫，成功地傳達原著作者綏夫特對國家、人性的不同思考，幫助自己和臺灣閱讀者深刻地去認識、比較一個與殖民地臺灣不同的政治局面，藉由小說的譯介擴展自己的政治想像，並對己身作出反思：

當今交通大啓環地面國者，皆近若比鄰，南北極、非洲、西藏，乃至深、絕海。行將闡發無遺。¹⁰⁷

譯者雖與閱讀者一同分享他的世界觀，卻未提及原著作者、小說主角所身處的歐洲，也未提及美洲等地。反而是談到人跡罕至的南北極，或是同在亞洲的西藏。身為翻譯小說的負責人，譯者或是當下的臺灣人，必定知道歐洲的存在，但刻意於此省略不提，表現出譯者不願在閱讀者閱讀小說之前，就先把相對於臺灣處於西方的歐洲說出，以期能讓讀者有更多的思考空間，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一步步去建構讀者心目中的西方世界。

相對於西方歐洲的真實存在，小說主角格理弗所漂流到的小人國與大人國畢竟不是歐洲，而是作者自我想像中的空間。且兩國的國王和人民，也都被安排不知道歐洲的存在，所以描述歐洲的文字，表面上是對二國的國王而言的內容，卻透過格理弗之口，將英國實在的政治制度與地理空間傳達給讀者知曉，讓臺灣閱讀者藉由譯寫的描述，勾勒出一個比日治初期更為具體的「英國」：

我開始用我的談話，先告知皇上，我的領土，包括兩個島，兩個組成三個大王國，一個君主之下，除開在美洲的我殖民不算我說了好久。我的土地肥沃，我國氣候溫和。¹⁰⁸

又對大人國國王言：

英國議院的組織，一部是顯貴的團體組的，叫作貴族院。都是最貴族的人。有最古最大的遺產的人。議院的別一部份，包括一個叫作眾議院的議會，其中都是主要的紳士歸人民自己自由挑選出來的，為著他大本領與愛國心。代表全國的智慧。這兩個團體組，成歐洲的最尊嚴的議會，全部的立法事情，都付託給他的會議同君主辦理。¹⁰⁹

透過對英國議會制度實在的描寫、闡述與翻譯，可與臺灣的政治制度作一對比。大正 10 年（1921），日本殖民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以及治臺方針的改變下，

¹⁰⁷ 〈小人國記〉「緒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昭和 5 年（1930）3 月 3 日。

¹⁰⁸ 〈大人國記（46）〉，《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昭和 5 年（1930）10 月 4 日。

¹⁰⁹ 同上註。

頒佈「臺灣評議會」作為殖民地臺灣的議會機構，但這個「臺灣評議會」不但是要「受臺灣總督之監督，應其諮詢，開陳意見。」¹¹⁰且其組成成員，幾乎是與日本政府較為親近的士紳如辜顯榮、李延禧、簡阿牛、顏雲年等臺灣士紳富豪所組成，這個僅有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的議會機構，並非臺灣人在經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的願望實現，反而變成臺灣總督府安撫人心和更加合理其殖民地統治的結果。對照小說中格理弗自豪的英國議會制度，譯者藉由翻譯的動作，與兩方議會組成成員性質相似的特點，實是作出對臺灣政治制度的反諷，因為英國的議會政治，至少可由「人民自己自由挑選出來」，且「全部的立法事情，都付託給他的會議同君主辦理。」反觀臺灣的議會制度，卻只是臺灣總督府的一個橡皮圖章，其權力還是握在臺灣總督個人手上。透過格理弗之言道出的政治國家，其人為所制定的規章與制度，對照臺灣現實政治的情況，讓閱讀者在閱讀中不自主地進行比較和質疑。臺灣閱讀者於是透過這些政治、歷史與文化上的議題，除建構一個對西方國家實質性的認識外，也透過對所處現實政治的對照，開始檢討己身所處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與合宜性。還有，當〈大人國記〉的大人國國王再度詢問格理弗「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兩黨政治問題¹¹¹，讓讀者與小人國的專制政體並置思考，對於日治時期處於專制統治下的臺灣人來說，通過小說認識英國的兩黨政治，將會讓臺灣閱讀者知曉，在這世界上的政治體制，並非只有日本天皇或是日本總督府的存在。於是譯者藉由國家典章制度的制定、或是法律觀念的培養¹¹²，啟蒙出一個讓臺灣翻譯者和閱讀者和以往不同、更為真實且足以拿來為自身所處環境相比較的政治想像。

在寓含諷諭的寫作意圖下，藉由對歐洲政治制度的介紹，展現出譯者與讀者共同的政治想像，並擴及到對全體人性的省思。使得同樣身為「人」的臺灣讀者，在閱讀〈小人國記〉、〈大人國記〉時，無法迴避對自我的檢討，卻也因此將臺灣與西方世界的距離更加拉近。臺灣讀者對西方世界不再僅限於器物、技術方面的想像，更能因為類似〈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般的諷諭類文學被譯寫進入臺灣，而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有更深層的認識，並進行與臺灣現實政治情況的比較。臺灣民眾不會如同小人國國君或大人國國君般，不知世界之大，也不會因此成為對世界潮流一概不知的井底之蛙。¹¹³

三、娛樂效用：神怪、詼諧到奇幻的跨越橋樑

西方偵探小說內所寓含的新知識、新觀念、新器物等，為日治臺灣帶來一

¹¹⁰ 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2），頁99。

¹¹¹ 〈大人國記（23）〉，《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8月19日。

¹¹² 〈大人國記（47）〉，《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930）10月5日。

¹¹³ 林以衡，〈〈格理弗遊記〉在臺灣：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寫、諷諭與政治想像〉，《成大中文學報》，頁191-196。

股「新」的面貌。相對於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成規與情節內容，「新」與「舊」的勢力一同在臺灣通俗小說中紮根，卻又彼此互相交互融合，往往使得日治臺灣通俗小說呈現新／舊並陳的面貌。

由「舊」過渡到「新」的臺灣通俗小說，一時很難將舊有的陳規擺脫，也無法短時間內迅速地將作者觀念、小說面貌完全翻新。在這個文學隨社會變動的時代中，是否能有某個觀念、文學風格能夠在新／舊之間尋得一個平衡點？意即要能滿足閱讀者懷舊的閱讀傳統，卻又能在此傳統上建立與世界相聯的管道？呂淳鈺在探論西方偵探小說敘事成規內化於日治時期臺灣通俗小說的敘事規律時，指出這個「以舊變新」的過程，促成「俠義章回化」的興起：

對於已經操作內化的、熟練的敘事模式，產生了形式轉變的可能與需求，創作者想要、也能夠以新的元素增加、改變此文類的表現形式。改變這個「新」文類的方式，日治時期在台灣的作家，卻選擇了「舊」的因素，而使這樣的轉變饒富傳統與現代之間交流的意義。¹¹⁴

呂氏認為，諸如〈龍山寺の曹老人〉之類的小說，其人物形象設計與西方古典偵探小說中的偵探，或是在此篇小說之前臺灣偵探小說中的偵探形象都大異其趣。偵探角色是與逐漸俠義小說中的俠客逐漸合流，成為與官方合作的對象。¹¹⁵此乃偵探小說被翻譯入臺灣後，與本土化結合的一個特徵，造成日治下的臺灣偵探小說，更具有殖民文化的色彩。然則，偵探小說如此，其他類型的小說，是否同樣依循著相同轉換模式？由西方奇幻小說被譯介進入臺灣的動機觀察，日治奇幻文學的發展，卻是奠基於對「舊」的陳述，展開對「新」的好奇，除了為讀者增廣見聞外，又能藉由奇幻式的想像，帶給臺灣讀者閱讀上的樂趣，此點恰巧與偵探小說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

以日治時期對奇幻、歷險文學〈大人國記〉、〈小人國記〉的翻譯為例，即可發現譯者在替讀者介紹此部新奇之作時，必先以中國自古以來擁有的詼諧敘事與神怪傳統出發，目的為了喚起臺灣讀者對中國通俗小說的閱讀記憶外，也出自「西方有，我們東方也有」的自尊心態。昭和年間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大人國記〉、〈小人國記〉，譯者於「緒言」中就先為讀者複習中國自古以來的詼諧敘事與神怪傳統：

古人有云：「吾人生於此天地間，有玩世者、有厭世者。其在玩世之中，有以麥菊槩自放，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有不衫不履、視舉世若不當於意

¹¹⁴ 呂氏並引用考維爾蒂 (Cawelti) 等人的觀念予以解釋。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頁 97。

¹¹⁵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頁 98-101。

者。」殊如小說著名批評家之金聖嘆，其怪行猶多。而馬遷有滑稽傳。滑稽如東方曼倩之遊戲金馬門尚矣。又有自標榜（姑與群小論一人之短長）是真玩世之極，願實際生活，若孜孜於群小爭論短長，勢必多受危險，寧託於筆墨婉曲道之，此《鏡花緣》小說所以多假藉也。¹¹⁶

譯者先述世上之人生於天地間，個性互異，故所撰之文章多也有不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則是類似金聖嘆、司馬遷般的諷寓類文章，不顧流俗而玩世不恭。但，若是諷寓之意太過明顯，則會遭致危險，所以要是像《鏡花緣》般假借神怪之事而寓諷寓於其內的「筆墨婉曲道之」，可在不招致小人忌諱的情況下，抒洩己身的不滿言論。譯者認為，中國有像《鏡花緣》般的小說具備這個功用，西方則推〈大小人國記〉為範例，故言此小說：「惟其設想，離奇怪誕，又能不背於理有足多者。」¹¹⁷重點在於它雖「奇」、「怪」，但它卻又不脫於現實生活的道理，所以不能全然以寫實小說視之，又不能就此認定它荒誕不經。在虛實、真假間，達到寓怒罵批判於諧諷怪誕的情節。所以這類小說的「奇」是「快人心意」的藝術：

讀小人國之遊記者，能不生出一種懷疑之念。雖氏東坡說鬼，未必喜鬼、非必有鬼。人性好奇，虛誕怪異，固一種快人心意之藝術，而且無害。生活窘迫、競爭激烈，神經易流於衰弱讀此篇者，當能得不少精神快意。¹¹⁸

怪誕、奇幻的敘事特點，在此轉變成閱讀者抒發壓力、渲洩情緒的良方。譯者了解外在現實生活中的壓迫，故並未將這類奇幻敘事視為無價值之物，而是它的價值即是在娛樂之外，藉由敘事中呈現之歡笑、荒誕、怪異等特點，成為人們調適情緒的出口，對人心／人性的健康有所助益。譯者一方面知道〈小人國記〉以「離奇怪誕」為表面特點，又肯定它「不背理」的寫作手法，認為它是一部有深度的文學作品。在日治時期，尤其是戰火正熾的昭和年間，譯者譯此小說並作為治療當下人們情緒上之良藥，讓奇幻小說更具時代意義。

其實在昭和年間的〈大小人國記〉前，蔡啓華所譯的〈小人島誌〉就已經將中國傳統的「怪誕」、「奇異」特點用來與〈小人島誌〉作比較，他在〈自序〉中，開頭即言世上之事無奇不有，足以為人所認識：「世界之大，萬物之眾，紛紛異類，極極殊形。無奇不有，無巧不具。¹¹⁹」又述已閱讀經驗，引所熟悉的古籍《山海經》為例，試圖由東方神怪傳統入手，逐步為讀者介紹西方奇幻敘事：

嘗讀《山海經》，有交脛貫胸三身臂諸類，罕見者見之，無不以為至奇至怪也。然品物流形，賦稟不一，我以彼為奇，安知彼不以我為奇？我以彼

¹¹⁶ 〈小人國記〉「緒言」。

¹¹⁷ 同上註。

¹¹⁸ 同上註。

¹¹⁹ 蔡啓華，〈小人國誌（1）〉，《臺灣教育會雜誌》第91號（明治42年（1909）10月25日）。

為怪，安知彼不以我為怪？易地而觀，同此意想，夫羽民毛民，各隨煦育，無腸無胃，各任生成。乃益嘆造物賦界之奇且巧也。然而造物不以為奇也，人以為奇耳。造物不以為巧也，人以為巧耳。試於公退無聊之候，偶檢逸史，為述一絕奇絕巧之事，譯而出之，以當奕碁觀劇之趣云爾。¹²⁰

蔡啓華深知小人島探險之事，不過是文人杜撰的情節¹²¹，所以他特別在文中將〈小人島誌〉歸類為「逸史」類。由內容可知，譯者深知天地萬物各有異處、皆有所長的特點。他指出，從己身眼光視之他物為怪、為奇，但由他物眼光觀之，身為人類的我們，不也是他物眼中怪奇的對象？所以無論是何「怪」、何「奇」，其實都是造物主造物的神妙。凡事萬物皆有主客觀的認定，奇巧事物，難以定論。表面上看起來，譯者似乎超脫「怪」、「奇」界線，以客觀態度對奇異事物作出評析，但，以上是譯者針對過去閱讀《山海經》所得出的感想。當蔡啓華由《山海經》的閱讀，轉變為對〈小人島誌〉的閱讀後，他所訝異的，並非是「小人」、「大人」的存在，因為比他們更奇特的人物形象中國本有之。他所驚訝的是沒料到除了《山海經》外，在西方竟然也有這類「絕奇絕巧」的描述及想像，而將其譯出。這個翻譯動機除出自譯者本身對西方人如何描述「小人」、與中國傳統的描述有何不同的好奇心外，也帶有與《山海經》比較的意味。〈小人島誌〉就在作者自謙「奕碁觀劇之趣」的翻譯動機下，聯繫東方神怪傳統與西方奇幻文學，不但打破過去囿於中國傳統典籍下的想像侷限，東西互相比擬的效果下，將會為讀者帶來更廣泛的娛樂效果。

藉由對臺灣文人翻譯西方奇幻小說動機的探究，可發現在翻譯之前，譯者們對於中國的神怪傳統以及怪誕敘事有深厚認識，然後才以此為基礎，拓及到對西方奇幻文學的譯介。此點與西方偵探小說進入臺灣後，再與原來俠義公案小說傳統的融合有所不同。但無論是何種翻譯的動機以及譯介後所產生出文體的交混，都可證明中國傳統文體與西方文體在日治臺灣通俗小說中的交匯，而非僅是單方面文化的接受與繼承。西方小說被翻譯進入臺灣，無論是偵探、冒險、奇幻、歷史或是俠盜故事，就這樣成為組成日治臺灣小說的重要因子。

小結

臺灣作為世界的一部份，並非僅有東亞文學脈絡下的重要角色，而更具備與世界接軌的能力，所以，透過「翻譯」的幫助，臺灣閱讀者開始認識西方小說，

¹²⁰ 同上。

¹²¹ 然在當時世上確實有所謂小人存在，大正 15 年（1926）的《臺灣日日新報》，就刊載了這樣一則消息：「據英國漢外聖書會秘書威理幕竊母氏言，彼近由亞非利加游歷而歸。曾於該洲中部，見有身高七尺之大人種，其人口約有二百餘萬，性喜運動，若能利用其體力與身長，使之運動競技，必可在世界運動界中，開一新紀元。最奇者，該洲西北地方，又有身高四尺之小人種。大小二種，適相對照，可謂奇也云云。」〈摭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大正 15 年（1926）6 月 29 日。

成爲有別於東亞文學外、另一個全新的閱讀體驗。

但，翻譯並非容易之事。此點困擾著多數臺灣文人，而使他們不得不去正視自我語言能力的不足，以及在語言能力有待加強的情況下，思考著如何透過其他方式與西方文學接觸。所以，殖民者的語言日文，成爲臺灣文人翻譯西洋的中介管道。由於有日文的協助，林佛國、連雅堂等人開始認識泰戈爾、莎士比亞等文學大家，並隨著時代的精進，愈來愈多西方小說得以被譯介入臺灣，豐富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內容。這些小說除了數量眾多的偵探小說外，還包括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部份名著、以奇幻和冒險爲取向的小說和富有俠盜仗義精神、愛國意識和童話趣味的多本世界名著，由此可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兼容並蓄的精神，是多麼令人嘆爲觀止。

西方翻譯小說進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後，將爲臺灣閱讀者開啓一個不同的視野。例如在敘事視角方面的學習，突破過往文人慣以全知視角對小說敘寫的習慣，而逐漸採用第一人稱的限制視角出發，爲作者和閱讀者營造出一個異於傳統的寫作模式和閱讀習慣。而小說對新觀念的啓蒙和對世界的想像，成就臺灣閱讀者擴展其知識層面，以及了解世界之大，而不再畫地自限、墨守成規。最後，西方奇幻文學與中國神怪傳統的匯流，除帶給閱讀者中西文化的比較作用外，兩者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匯流，開啓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璀璨的一頁。





第七章、結論

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中葉的前夕，跨界研究的風氣並未停歇，反而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有愈益興盛的趨勢。作為世界一環的東亞自不能從中退却；作為東亞文化一份子的臺灣，也必須坦然面對來自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衝擊，才能更為彰顯臺灣文化的包容力。而作為人文學科的臺灣文學更是不能故步自封，應將其整體放置在世界局勢與東亞文化脈絡下思考，其特點才能更被重視。

有鑑於此，本論文跳脫傳統作家作品論的思考範疇，以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為研究對象，透過文本閱讀、外圍史料的蒐集與運用，並由「接受」的視角出發，證明日治臺灣漢文小說的生成，乃是受到中國、日本及西方小說的影響，此乃本文主要研究目的。總括而論，日治臺灣在面對東亞／西洋的文化衝擊下，嘗試融合雙方文化，從而建構出具有多元且混雜色彩的通俗小說，可見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並非僅受到中國小說的影響，而是在東亞文學脈絡中具有集大成的地位，甚至得以與世界接軌。臺灣文學的包容性與多元化，由是成立。

但，本論文畢竟只是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研究的一個初步開端，故以下將分項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並檢討本論文尚未處理之處，以及未來得以再深究的研究方向。

一、敘事手法的多方嘗試與小說文體多樣性

本論文在敘事手法的探究方面，是以分章論述的方式，梳理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敘事背景的採用、敘事結構的承衍和敘事角度的改變。此乃有感於過去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過重於文化取向的探討方法，故改以回歸文本的基本態度，重新架構小說敘事模式的發展情況。在敘事背景的運用方面，漢文通俗小說的場景運用，已不限於鄰近的中國和日本。在記者兼小說創作者的雙重身份下，文人視野得以展開，整個世界因而被縮小至小說內容中，日治臺灣閱讀者藉此滿足立足臺灣、展望世界的渴望。而在敘事結構的承衍方面，中國演義的脈絡在臺灣被漢文通俗小說所繼承，部份小說因此具有演義的各項敘事特點，表現出小說創作者受到過往閱讀經驗的影響，而使用類似的敘事模式，此點得以滿足當時臺灣閱讀者所保有、對中國通俗小說的閱讀習性。而在敘事角度方面，西方翻譯小說進入臺灣，於創作手法上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造成最大的影響，是小說由全知敘事角度轉變為第一人稱限制視角的過程，於是在敘事手法上，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具有多元特點。

在文體多樣性方面，首先以狹義文體的概念，歷時性考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變化階段。並指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變化，是以文言一

文白夾雜—純熟白話文出現的過程而演變。但這不是代表文言小說的消失，只是白話小說出現，並隨著文人刻意學習而變成熟，成為文人書寫通俗小說時愛用的文體。最後，本文以廣義文體的角度，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進行分類，大致有沿襲中國的章回體／傳奇體／叢錄體、日本漢文小說體和新聞體小說等三類。這三類文體各有所特色，交織組成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主要的文體類型，除供文人仿作學習並再造出己身創作的小說外，亦見證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多元化的學習來源。

二、東亞視域下的圖書傳播與流動

圖書交流與印刷生產的問題，是近幾年伴隨跨領域文化研究而興起的課題。同時，亦隨著對文學社會學理論的關注，書籍議題的重要性，已不亞於文本或創作的研究課題。是故，本文在文本分析為研究基礎外，亦不偏廢外圍史料的蒐尋與運用。所以由日治臺灣「蘭記圖書部」所代銷的小說書籍為例，溯源於同時期中國上海的各書店，聯結兩者進以證明日治臺灣與清末民初上海兩方在書籍銷售上的合作模式。經由本文的探究，發現書肆繁盛的上海，不但是臺灣文人前往中國時喜愛購書、訪書的地點。「蘭記圖書部」更與上海廣益書局和會文堂書局有小說書籍銷售上的商業往來。此點對於日後若欲更深入考察日治臺灣與同時期中國書肆的來往交流，有所助益。

除中國上海外，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對日本書籍的輸入，亦是本論文關注重點。透過對日治時期各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所作的查詢，以及版本的比對，本文發現當時有不少的日本「軍談」和通俗讀物典藏於圖書館中供人閱讀。此點證明這些書籍由日本輸入到日治臺灣，成為臺灣通俗市場中的一部份。這些軍談早在日本江戶時期就被刊刻、譯寫，但時代的間隔，並未影響閱讀者對它們的喜好。所以在明治時期，又被早稻田大學重印，因而流傳到日治臺灣。這些「軍談」如同中國的演義書籍般，蘊含教忠教孝的道德觀念於其中，對於殖民政府教化民眾、啓迪民智有一定的作用。

而透過本論文對臺灣、中國和日本三地在圖書交流上的考察，日後可進一步深究東亞圖書傳播與分佈的往來脈絡，此外，東亞文化圈的建構，亦可納入書籍流動的問題，而使得吾人在東亞研究跨領域、跨文化上的思考會更加深入。

三、對東亞／西洋的小說的接受與模仿

作為文學接受者的臺灣，其小說生成與中國、日本和西方翻譯作品的關係密不可分。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除與中國演義有形式上的承衍外，在內容上亦與中國通俗小說有互文的情況發生。日本方面，日本漢文小說在日治初期進入臺灣、成為臺灣文人創作小說時所模擬的對象。而日本講談文化的進入，亦是臺灣文人編寫小說時一個重要的參考範例。當然，除了東亞小說的脈絡對臺灣漢文通

俗小說影響甚鉅外，西方翻譯小說在由原著翻譯成爲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一部份後，即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接受西方小說洗禮的最好證明，故本文分析不少西方小說原著與臺灣漢文譯本間的關係，即是證明西洋小說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建構，亦有重要地位。綜合上述諸多文體對於臺灣漢文小說的影響，亦可見臺灣文人如何在這些文體爲範本下，對它們的再造，以形成漢文通俗小說的多元樣貌。而寓於其中如桃花源理想的建立、忠孝精神的傳遞與復仇觀的形成，或是奇幻詼諧、冒險犯難與見識世界等文化寓意，又皆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上述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過程中所習得的精神體會。

四、臺灣通俗小說在臺灣文學史的評價／定位：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於臺灣文學史的重要性何在？本文對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形式與內容上對東亞／西洋作品兼容並蓄的接受特點進行析論後，雖初步彰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但仍有未能處理之處。例如對於日文通俗小說的研究，受限本文篇幅與個人目前仍感不足的語文能力，因此無法以之作為論述對象，甚至進一步與漢文通俗小說並置思考，這是本文力有未逮之處。但，仍期盼日後能在前人研究爲基礎、綜合各方論述後，將其補足，如此，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研究才會更爲完備。

在過去，通俗文學被視爲不登大雅之堂的研究議題，卻在近幾年一片「重寫文學史」的學術反思中，通俗議題如同性別議題、馬華文學等，成爲研究者不可輕忽的研究方向。那麼，通俗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應如何被定位，它又肩負著何種文學使命，讓它得以在通俗娛樂的表相下，發揮其知識啓蒙、維護文化的特性？以小說範疇而論，以往在臺灣文學史中被重視的，當屬賴和、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人的小說。自葉石濤、陳芳明、邱貴芬、彭瑞金以降的文學史書寫者，也對於這些小說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定位有各自論點，但臺灣通俗小說卻一直在臺灣文學史上空白。其次，古典文學方面，學界在古典漢詩文的研究上實益豐碩，讓吾人見到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表現，並不比白話文學遜色，但也未注意到文言小說的存在。而真正將文言小說或通俗小說納入於文學史／小說史中來討論，並試圖爲其在臺灣古典文學史或小說史的建構中找尋一個定位，這個工作是由黃美娥開始，她指出：

由於日治時代的臺灣，正處於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故這些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小說，在寫作上卻不乏受到世界文學的刺激與影響，從而出現了「從東亞到西方」各式文本、文類、文化的跨界移植現象，最終甚至有了形形色色的生產與再製。¹

¹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64。

1895 年至 1920 年代後傳統文人在新題詩、通俗小說的耕耘，其中的現代性書寫，實際可能扮演過提供新文學萌芽滋長的生機養分。也因此，以往文學史中慣將傳統與現代間的不相容性、新與舊的緊張對立關係，當成是一種研究前提的說法，也就有了重新省思的空間，新、舊文學的發展將有銜承轉化的可能。²

不僅是從文學史／小說史的角色思考出發，黃氏論述引發本文日後思考：當臺灣通俗小說在與東亞和西洋小說接軌的同時，我們應該如何透過對此文學現象的深入闡述與解析，並由此更加進一步證明臺灣通俗小說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綜觀以上諸點，本文並不是認為單靠一本論文的書寫，就足以完成日治時期臺灣通俗文學史的建構，而是在未來有可能出現各本通俗文學史前，期待能預先對通俗文學的接受與再造、藝術形式、文化意義等各項特點有一個解答。因為唯有重新審視通俗小說的重要性與價值，甚至追繹發展源頭，才得以讓它不再被湮沒在過往的舊史料之中，以致於未能進入文學史的討論範疇。此即本論文目前未能處理周全、但欲留於日後深入探討的文學史問題。

五、由「忠孝」出發：日治臺灣儒學與東亞的接軌

本論文由各個交混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文體類別出發，指出中國演義、日本講談和軍談，其情節內容皆具有忠孝精神的宣揚，期能透過小說的書寫和閱讀，使閱讀者受到忠孝精神的洗禮。本文已分析中國傳統的忠孝精神與日本忠孝一體的觀點同異相間，但最後都在盡忠盡孝為宗旨下，形構為小說中的復仇觀。這對於身處於殖民地的臺灣人接受殖民政府培養尚武、忠君、愛國等信仰有所刺激。

但，本論文限於篇幅以及能力，僅能先就小說所寓含的思想進行探討，其實此問題若與日本來臺儒官與臺灣文人間思想交流、詩文應酬，以及殖民政策主導下的孔教祭祀等問題相互論證，是否可藉此由臺灣視角出發、推源東亞精神史如何在中、日、臺的三方網絡中建立？所以本論文目前不足之處，也就是希望能留待日後再加以討論的問題是：這股由中國和日本移入臺灣的忠孝精神，其共同源頭既為中國儒家思想演化而來，那麼如果能將此忠孝問題擴大思考，探究日治時期臺灣儒學的發展，其後再與日本、中國儒學思想並置討論，以建構一個由臺灣觀點出發的東亞儒學的體系？將是筆者未來所要努力的地方。

關於東亞儒學的問題，目前學界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並且對於東亞儒學的知識生產有所思考，黃俊傑說：

²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頁60。

從字面、形式的觀點來看，所謂「東亞儒學」這個名詞受到「東亞」與「儒學」這兩個概念的規範或限制。首先，「東亞儒學」研究的對象以中國大陸、臺灣、韓國、日本、越南這些被稱為「東亞」的地理區域為其範圍。其次，「東亞」這個地理範圍又是被「儒學」所界定的，也就是說：「東亞儒學」這個學術領域中的所謂「東亞」，指受到儒學傳統所浸潤的東亞地域為其範圍。³

可見臺灣與東亞諸國的文化脈絡，是可以藉由儒學的發展與探究加以聯繫。那麼，若要以日治臺灣儒學作為本論文未來持續關注的研究方向，是否能由本論文於小說研析中所關注的忠孝精神加以擴大與深化，將臺灣儒學精神與東亞相連結？如此，本論文的研究將能對東亞文化的整體發展作出更多的貢獻。



³ 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年10月），頁30。



參考書目

(一) 中日文相關舊籍

(漢) 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

(漢) 班固，《漢書》，《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

《三六九小報》 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風月》、《風月報》、《南方》 臺北：南天書局影印本，2001年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南新報》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の教育》，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文學》，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文藝叢誌》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日日新報》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現勢要覽》，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語苑》，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年。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郎瑛，《七修類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

連雅堂著，《臺灣通史》，臺北：臺灣時代書局出版，1976年9月再版。

連橫，《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3月31日。

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第3卷，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楊家駱編，《清光緒朝文獻彙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九，臺北：鼎文書局。

鈴木清一郎：《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臺北：杉田書店，1937年5月22日，
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總督府發行，《臺灣法令輯覽·第八輯衛生、警察》，帝國地方行政會發行，
1921年1月，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總督府編，《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年6月。

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出版年不詳。

(二) 文學專書／文化理論書目

1. 文學論著：

(日)「講談落語研究會」編，《趣味の講談落語》，東京：富文館，大正15年

- (1926) 5月10日。
- (日)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東京:鶴書房,昭和18年(1943)。
- (日) 和漢比較文學會編,《軍記と漢文學》,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4月。
- (日) 和漢比較學會編,《江戸小説と漢文學》,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5月。
- (日) 幸田露伴著、陳德文譯,《書齋閑話》,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譯稿完成。
- (日) 菊池真一,《講談資料集成(二)》,大阪:和泉書院,2002年3月2日。
- (日) 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 清末民初小説目錄》,山東:齊魯書社,2003年3月2刷。
- (日) 關根默庵,《講談落語今昔話》,東京:雄山閣,大正13年(1924)。
- (日) 鹽谷溫著、孫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民國59年。
- (法) 蒂費納·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vault)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 (美) 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
- (英) 佛斯特(E.M.Forster)著、蘇希亞譯,《小説面面觀:現代小説寫作的藝術》(臺北:商周出版,2009年1月)。
- (瑞) 安徒生(H.C.Andersen)原著、葉君健評譯、蔡尙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
- 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7年11月。
- 王三慶、陳慶浩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説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初版。
- 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臺北:亞太,2002年8月。
- 王平,《中國古代小説文化研究》,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二刷。
- 王平,《中國古代小説敘事研究》,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二刷。
- 王向遠,《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
- 王昕,《話本小説的歷史與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
- 王清原、牟仁隆等編,《小説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4月。
- 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5月)。
- 王德威著,《小説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説》,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年6月。
-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説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8月。
- 王慧芬等著,《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年。
- 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3月。
-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臺北:草根文化,1998年4月。
- 平川祐弘、平岡敏夫、竹盛天雄編,《鷗外の人と周邊》,東京:新曜社,1997年5月。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海峽學術，2002年2月。
- 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全三卷）》，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
- 任翔著，《文學的另一道風景：偵探小說史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
- 朱一玄、劉葉秋等人主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 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著、康華倫譯，〈作者介紹〉《愛的教育》，臺北：希代書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5月。
- 亨利·吉爾伯特（Henry Gilbert）著、韓慧強、韓慧敏譯，《羅賓漢》，臺北：新雨出版社，2010年5月。
- 吳盈靜，《清代臺灣紅學初探》，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11月。
- 吳福助主編，《日治臺灣小說彙編》，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年。
- 呂興昌主編，《許丙丁作品集》，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
- 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全三卷），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2004年10月。
-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7月。
- 王平主編，《明清小說傳播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
- 李仁淵著，《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臺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10月。
-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8月。
-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李楠著，《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9月。
- 李福清著、李明濱譯，《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
- 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4月。
- 孟樊著，《文學史如何可能~臺灣新文學史論》，臺北：揚智出版社，2006年1月。
- 岸本美緒等著，《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之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2004年。
- 林以衡，《日治時期台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年5月。
- 林景淵著，《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臺北：自立報系，1990年8月。
- 林翠鳳，《鄭坤五及其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
- 河原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科技，2004年。
-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 施懿琳、楊翠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

施懿琳等著，《臺灣文學百年顯影》，臺北：玉山社，2003年初版。

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年初版。

柯特·維京等編，《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臺北：志文出版社，2001年4月。

柯榮三，《時事題材之臺灣歌仔冊研究》，臺北：鼎文書局，2008年2月。

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的交錯》，臺北：播種者，2004年4月。

范伯群、孔慶東著，《通俗文學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年6月。

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江蘇：江蘇教育，2000年4月。

迪特爾·格勒弗特(Hans-Dieter Gelfert)著、許惠容譯，《莎士比亞與他的時代》，臺北：晨星出版社，2007年。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臯于厚，《明清小說的文化審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12月。

秦秀白，《文體學概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年1月。

馬幼垣著，《中國小說史集稿》，臺北：時報出版社，1980年。

馬祖毅、任榮珍著，《漢籍外譯史》，武漢：湖北教育，1997年。

高日暉等著，《水滸接受史》，山東：齊魯書社，2006年7月。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2005年9月。

康韻梅，《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2005年3月。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稻香，2006年9月)。

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5月。

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梁啓超，《梁啓超全集(第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梅家玲主編，《跨領域的視野：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笛福(Daniel Defoe)著、徐霞村譯，《魯賓孫飄流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47年2月。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孫大雨譯，《哈姆雷特》(Hamlet)，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

莎士比亞原著、朱生豪譯，《馴悍記》(The Taming of the Shrew)，臺北：世界書局，1996年。

莎士比亞原著、孫大雨譯，《奧賽羅》(Othello)，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

許麗芳，《章回小說的歷史書寫與想像—以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敘事為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1月。

連橫，《臺灣詩薈(下)》，第13號。收於《連雅棠先生全集·附錄三》，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

陳大康，《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12月。

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7月2版。

陳益源，《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8月。

陳國球、王宏志、陳清僑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單德興譯注，《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

湯哲聲，《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年。

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山東：齊魯書社，1998年4月。

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0月。

菊池真一編，《講談資料集成》(全3卷)，大阪：和泉書院，2001年3月。

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年10月。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

黃美娥、黃英哲主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集一、二》，東京：綠蔭書房，2007年。

黃美娥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

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上)(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年。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

黃毅、許建平，《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視角與方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4月。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臺北：臺灣學生，2007年。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2004年2月。

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00年10月。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編，《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年9月。

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1999年8月。

劉秀美著，《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臺北：文津，2001年11月。

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說と中国小説》，東京：青裳堂書店，1992年。

樓含松，《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歷史敘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7月。

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
鄧慧恩，《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年12月。
鄭明嫻著，《通俗文學》，臺北：揚智1993年。
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
羅鋼著，《敘事學導論》，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
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8月。

2.文化、歷史理論論著：

(日)《赤穗義士讀本》，兵庫縣：義芳文庫，1937年。
(日)《近世武家教育思想》，東京：秀研社，2001年。
(日)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陣基筆錄、李冬君譯，《葉隱閒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11月。
(日)山本博文著、趙佳誼、黃碧君譯，《武士道圖解》，臺北：商周 城邦出版，2008年6月。
(日)依田熹家，《日本通史》，臺北：揚智出版社，1996年1月。
(日)茂呂美耶，《江戶日本》，臺北：遠流，2004年10月。
(日)黑田俊雄，《日本の歴史・蒙古襲來》，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年。
(日)稻垣史生，《仇討を考證する》，東京：旺文社，1987年。
(法)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心靈工坊，2005年4月。
(法)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社會學》，臺北：遠流，2004年10月16日初版。
(法)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顏美婷譯，《文藝社會學》，臺北：南方，1988年2月。
(俄)渥夫剛·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著、邱慈貞譯，《暴力十二章》，臺北：玉山社，2006年9月。
(美)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著、閻嘉譯，《通俗文化理論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4月2刷。
(美)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
(美)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著、李根芳等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臺北：巨流，2004年4月。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陳永國等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6月。
(美)華萊士·馬丁(Martin,W.)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

(英)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Hobsbawm) 著、鄭明萱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英) 泰瑞·伊果頓 (Terry Eagleton) 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2002年4月。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等譯,《關鍵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10月。

(紐) 史提夫·羅傑·費雪 (Steve Roger Fisher) 著、李中文譯,《閱讀的歷史》,臺北：博雅書屋,2009年7月。

(瑞) 古斯塔夫·榮格 (Carl Gustav Jung) 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圖書公司,1994。

(義) 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論文學》,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德) H.R 姚斯、(美) R.C.霍拉勃等著、周寧、金元蒲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遼寧文學出版社,1987年9月。

(德) 哈拉爾德·韋爾策 (Harald Welzer) 編,《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2刷。

(德) 哈拉爾德·韋爾策編,《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

(德) 恩斯特·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著、黃龍保、周振選譯,《神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

(德) 烏爾夫·D·馮·盧修斯 (Wulf D.von Lucius) 著、陳瑛譯,《藏書的樂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5月。

(德)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臺北：臉譜出版社,2002年。

(德) 馬克斯·韋伯 (Marx Weber) 著、錢永祥等編譯,《學術與政治》,臺北：遠流,1991年。

上海檔案館編,《檔案裡的上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王逢振編,《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2刷。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

王曉路等著,《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

包亞明、王宏圖、朱生堅等著,《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像》,高雄：宏文館,2002年。

甘懷真等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12月。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2版。

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

朱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臺北：揚智出版社,2002年7月。

吳三連、蔡培火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部,1993年12月。

- 吳錫德等編，《翻譯文學&文學翻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9年3月16日。
-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編，2005年5月。
- 周婉窈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年。
- 周憲、羅務恆等人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 湯重南等著，《日本文化與現代化》，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12月。
- 童元方，《選擇與創造：文學翻譯論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廖炳惠，《關鍵字200》，臺北：麥田，2003年12月初版3刷。
- 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年8月。
-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2005年。
- BAKHTIN, Mikhail M,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Harry Gailey 著、蔡百銓譯，《非洲史(中)》，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

3. 辭書

- (日)日本國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國語大辭典(5)》，東京：小學館，2001年5月。

4. 會議論文集

-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第二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年。
-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灣文學館出版，2006年。
-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編，《第四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7年8月。
- 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2007年。
-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第五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8年9月。

(三) 會議論文

- 《日治時期的語言·文學·「同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南：成大台文系 2004年。
- 山下一夫，〈濟公傳在日本〉，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神魔入世：明清小說面面觀」學術座談會，2012年3月19日。
- 中島利郎，〈日據時代臺灣文學：關於臺灣的「大眾文學」〉 「文學傳播與文化

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
林以衡，〈革誰的命？—日治初期台灣文人李逸濤對革命思潮的接受與想像〉，
「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中文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主辦，2009年3月14、
15日。

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櫟社成立
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臺中：臺中縣立文化局，2001年12月8日。

柳書琴，〈《風月報》到底是誰的所有？書房、漢文讀者階層與女性識字者〉，
（國立清華大學主辦：第五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2006年
10月26-28日。

趙雪君，〈菊部陽秋與日據時期戲曲劇評專欄 李逸濤——專欄〈菊部陽秋〉的主
筆〉，2004年全國碩博士生戲劇學術研討會暨聯合讀劇會議論文。

蕭義玲，〈誰做了決定？從主體敘事論大眾文化中受眾的位置〉，「文學傳播與接
受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2006年3月
24-25日。

（四）學位論文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臺南：成功大學中文所
碩士論文，2003年）。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臺灣
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6月。

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11年7月）。

吳舜均：《徐坤泉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

吳瑩真：《吳漫沙生平及其日治時期大眾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2年。

呂淳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及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產生》，
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武麗芳，《日據時期竹塹地區詩社研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3年）。

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
年。

徐意裁，《現代文明的交混性格—徐坤泉及其小說研究》，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郭怡君：《風月報與南方通俗性之研究》，臺中：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0
年。

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臺北：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陳俊宏，《《西遊記》主題接受史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陳莉雯，《「島都」與「戀愛」：《風月報》相關書寫的再現與想像》，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陳琬琪，《張純甫儒學思想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3年)。

曾婉君，《《三六九小報》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文學敘事與文化視域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潘俊宏，《臺灣日治時代漢文「武俠小說」研究：以報刊雜誌為考察對象》，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蔡佩均，《想像大眾讀者：《風報》、《南方》中的白話小說與大眾文化建構》，臺中：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蔡翔任，《張純甫「是左」、「非墨」思想研究-以古史辨運動為背景》(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鄭梅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蕭玉貞，《鄭坤五小說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五) 學術期刊論文

1. 中文期刊

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6期，2004年12月，頁159-222。

伊瑟著、單德興譯，〈讀者反應批評的回顧〉，《中外文學》第19卷第12期(1991年5月)，頁86。

李隆獻，〈日本復仇觀管窺—以古典文學為重心〉，《成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9年4月)。

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以《春秋》三傳為重心〉，《臺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05年6月)。

林以衡，〈《格理佛遊記》在臺灣：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寫、諷喻與政治想像〉，《成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1年3月)。

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2期(2009年9月)。

林以衡，〈日治初期臺灣文人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接受—以菊池三溪的作品為例〉，《中國文學研究》第26期(2008年6月)。

林以衡，〈英雄、歷險、桃花源—由日治小說《奇人健飛啓疆記》的試煉之路論

其敘事建構的原型模式》，《東華人文學報》第 18 期，2011 年 1 月。

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上）、（下）〉，《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 年 8 月，頁 131-136、3 卷 3 期，1954 年 12 月，頁 115-130。

柯喬文，〈漢文知識的建置：台南州內的書局發展〉，《國立臺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第 42 卷 1 期（2008 年 4 月）。

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第 319 期 2004 年 12 月。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

徐志平，〈遺民詩人杜濬功能論小說觀探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 期（2006 年 7 月），頁 129-130。

崔文東，〈家與國的抉擇：晚清 Robinson Crusoe 諸譯本中的倫理困境〉，《翻譯史研究》第 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康韻梅，〈康人小說中「智慧老人」之探析〉，《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9 月）。

張圍東，〈日據時代臺灣的雜誌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 7 卷 2 期，2001 年 6 月，頁 66~75。

張圍東，〈日據時代臺灣報紙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第 5 卷 3 期：1999 年 3 月，頁 49~58。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3 期（1986 年）。

莊永明，〈第一臺新式印刷機—『聚珍堂』印刷機〉，《書卷》，第 4 期，1993 年 12 月，頁 26。

許俊雅，〈少潮、觀潮、儀、耐儂、拾遺是誰？—《臺灣日日新報》作者考證〉，《台灣文學學報》第 19 期（2011 年 12 月）。

陳培豐，〈大眾的爭奪：〈送報伙〉·『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10 月）。

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2001 年 3 月，第 12 期 1 期 頁 115~155。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2009 年 2 月）。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與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2 期（2006 年 11 月）。

楊永彬，〈從「風月」到「南方」—析論一份戰爭時期的中文文藝雜誌〉，《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臺北：南天出版社，2001 年 6 月）。

楊瑞松，〈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 3 期，2000 年 9 月。

- 葉國慶，〈平閩十八洞研究〉，《廈門大學學報》第3卷第1期（1935年）。
- 廖珮芸，〈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主題研究〉《東海中文學報》第19期（2007年7月），頁61-88。
- 齊益壽，〈桃花源記並詩管窺〉，《臺大中文學報》第1期（1985年）。
-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第91卷2期，2002年12月，頁65~92。
- 蔡盛琦，〈新高堂書店：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9卷第4期（2003年）。
- 蔡錦堂，〈日本治台時期所謂「同化主義」的再檢討——以「內地延長主義」為中心〉，《臺灣史蹟》，2000年6月，第36期，頁242~250。

2. 外文資料

Beardsley, Monroe C, "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C1958.*

- 〈中国講史小説と通俗軍談(上)―讀本前史―《文學》第52卷第11期(1984.11)。
- 〈通俗軍談研究(一)―『通俗台灣軍談』・『通俗元明軍談』〉《明治大学教養論集》第165卷(1983.03)
- 熊慧蘇，〈『通俗五代軍談』の典拠と構成法―「通鑑に載伝へたる所を拔萃和釈す」考〉《近世文芸》第18卷(2003.07.11)，頁1-14。
- 荒尾禎秀，〈『通俗列国志吳越軍談』の漢字語について〉《東京学芸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第51卷(2000.02.29)，頁197-204。
- 黒石陽子，〈草双紙と通俗軍談物の諸相―『通俗漢楚軍談』と『通俗三国志』を中心に〉《黒本・青本の研究と用語索引》(1992.2)。
- 神谷勝広，〈近松と通俗軍談―『通俗列国志後編』『通俗漢楚軍談』を軸に〉《名古屋大学国語国文学》第82卷(1998.07.11)，頁31-42。
- 石田賢司，〈『吳越軍談』の構想と趣向―紀海音独創期の浄瑠璃〉《人文論究(関西学院大学)》第54卷第3期(2004.12)，頁21-36。
- 長尾直茂，〈「前期通俗物」小考―『通俗三国志』『通俗漢楚軍談』をめぐって〉《上智大学国文学論集》第24卷(1991.01)。
- 徳田武，〈二つの『絵本漢楚軍談』と『西漢演義』〉《和漢文學比較叢書7》(1988年6月)。

附錄一：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同業掛號¹

書店名稱	位置	經營者	書店名稱	位置	經營者
理文軒書莊	於光緒拾捌年開役，設在上海英租界路字字第一號	店主戎賓儒文彬，甫年三十五歲，浙江慈谿縣人。經理人劉春江。	鼎新書局	光緒參拾壹年開設在上海英租界山東路第八十五號，	門牌店主戎賓儒字文彬，年三十五歲，浙江慈谿縣人，經理人梁海山。
可壽齋書坊	現設四馬路跑馬廳三百四十三號石庫門內	東家自理，管斯駿號秋初，江蘇吳縣人。	育文書局	鐵馬路天后宮後恒慶里七浦路朝字三十四五號。	店東夏毓芝，江蘇江都籍。經理人陳小湖，江蘇江都籍。
江左書林	現設肆英租界河南路四百五十七號。	店東謝鉉號企之，江蘇吳縣人。執事徐興鎰，號鴻雲，江蘇丹徒人。	源記書莊	西門外樹奧里門牌四十號。	店主程倍明。經理平杏生江蘇吳縣。
有益寫別莊	高壽里第二弄	無紀載	華興石印書局	合股，設靶子路春暄里。	經理張紫珍，浙甯鎮海縣人
鍊石齋石印書局	股設靶子路春暄里。	經理人李東生，浙省寧波鄞縣人。	環地福書局	北河南路百字四百二十三號內。	店東趙全春，江西安福人。執事徐渭字惠甫，江蘇丹徒人。
新學界圖書社	河南路元字第五百二十九號。	合股而成，執事徐渭字惠甫，江蘇丹徒人。	文明書局	佳美界武昌路。	局東杜鳴綏。經手自理美華賓記石印局。

¹整理自〈書業公所同業掛號〉，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編號：S313-1-76。

環地福書局	北河南路丁字四百二十三號。	店東趙全壽，觀察江西安福人。執事徐渭字惠甫，江蘇丹徒人。	宏文閣	開設三馬路。	原件不清楚
科學會編譯部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	代表人陳文號桂生，福建連江人。	緯文閣書局	上海四馬路即福州路六十三號門牌。	店主邵善貞，經理俞譽漢。
文宜書局	福州路	店主程光裕。	詞源閣書莊	無紀載	康祝三，江蘇江寧人，經理人許元亮，江蘇江寧人。
錦章石印書局	寧波路仁美里	許鑑清字錦明江蘇上海縣人。	申易書局	三馬路即漢口路十八號。	經理人賈渭川。
崇新書局	無紀錄	李逸卿	著易堂	英租界河南路第五百念三號即棋盤街。	徐子巢，江寧府上元縣人。代表徐幼梅，蘇州府吳縣人。
順成石印書局	鐵馬路錢業會館背設海寧路。	東家招信延，廣東南海縣人。經理人徐瑞芝，廣東香山縣人。	新說林	福州路辰字第一百十四號	經理人傅豐和。
千頃堂	英租界九江路第廿八、廿九號。	鮑興華字德奉，浙江鎮海縣人。	文瑞樓書號	開設九馬路列字第四十六號。	店東捕錫齡字鑑，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經理華哇壽字心

					齋，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
章福書局	佳牯崩德華里街。	章□蔭，副理丁雲寧。	□記書局	貴州路登字七十九號門牌。	姚永福，執事陳善康。
□記書莊	□□里肇慶里茅山街揚字第□號。	無紀錄	科學會社	河南路四百九十五號	毛伯如，蘇省長洲縣。
玉磷書業	英租界伯頓雞鳴里。’	龔鏡	遜記書莊	住平橋路進仁里	經理李遜齋。
紫來閣節記書莊	中泥城橋文遠里。	經理李節泊。	中新譯印書局	泯寬路	吳金龍，浙江餘姚縣。
通時書局	派鬼路	店東浦鑑庭，江蘇常州府人。	同文新譯書局	大東門外	無紀錄
廣益書局	英界河南路	店東浙江人魏天生等，經手魏炳榮開設。	林記書莊	大東門	江蘇丹陽人住伯頓路臣字廿二號。
鴻文堂書莊	上海新北門內天主堂街口	朱永林自理	新世界小說社	棋盤街元字四百九十八號	經理凌佩青
文運書局	申北泥城橋鴻奧里。	店東櫪經毓，蘇州吳縣人。	韻記書莊	老北門內吳家街	店東金韻笙自理，江蘇吳縣人。
文成堂書莊	申新聞同昌里。	殷庠生，蘇州吳縣人。	文新書局	派克路福海里五百十號	經理人吳鏞州特字掛號。
公興代印鉛板書局	浙江路	總經理趙榮熙。	經香閣書莊	住梅百克路	店東邵甘甫安徽休寧。
□光閣書莊	鐵馬路錢莊會館西首。	經理人王安師，寧波鄞縣人。	文池書坊	大東門外大街店	朱奉泉上海縣人。
灌文編譯書社	原件不清	合資創辦，經理凌	啓□書局	小東門內四牌樓閣家街	經理人洪□生寧波

		仲萃。		內。	慈鷄縣人。
□任書社	上海站浙江路。	經理人吳禱字丹初，安徽州府休甯縣人。	中西書局	蘇州河鐵大橋下	經手人魏天生。
錦文堂	英界福建路洪字第□號	店主李錦文，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	古香閣	福州路辰字九十號	店東袁春洲自理店務。
啓新書局	無紀錄	黃補勤。	日新書社	四馬路	主人蔡葆馥。
東尚□文閣	原件不清	原件不清	時新書局	小東門內平安里	洪以生
秀記書莊	脩德里六百七十六門牌	店東何秀夫字瑞瀛。	鴻寶齋分局	河南路元字九十一號牌	東家何瑞堂定海廳人，經手烏仁甫鎮海縣人。
變記書莊	中國地界新址，坡橋北留里，西首合泰商貨店隔壁。	經理本人係淮府鹽城縣人。	文會書社	英界福州路辰子。	浙江省鄞縣人。
藻文石印書局	東棋盤街第七十九號	經理人倪獻庭、副經理陳冠三，浙江紹興府餘姚人。			

附錄二：上海書業公所書底掛號²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海書業公所書底掛號 光緒三十二年（1906） 歲次丙午 書店名稱／所售書籍</p>
<p>一、緯文閣</p> <p>《馮抗議》、《經濟文□編》、《十三經注疏》、《二度梅》、《仙狐窃寶錄》、《栗風記》、《仙下奇緣》、《王氏脈經》、《湯氏危言》、《坐花志□》、《朱子近思錄》、《美國輿地遁考》、《沙山春畫譜》、《中國戰輯》、《先天易數》、《美國輿圖》、《上海畫》、《尺牘句解初二集》（未裱）、《馬光通鑑論》、《文獻紀要》、《仕商應酬便覽》、《護富奇□》、《皇朝分省圖》、《新疆識畧》、《萬寶全書》、《青樓圖記》、《殿版□記辦方》（已裱）、《礦務□種》、《幾何三種》、《時務文編》、《楹聯彙編》、《古文關鍵》、《文筆□範》、《時務八種》、《三國志演義》、《國語合刊》、《湯文正尺牘》、《駢雅訓纂》、《□稼書尺牘》、《廣東考古輯要》、《灘黃》（未印過）、《詩經集句》、《策學大會》</p> <p>（以上鉛板書底）</p> <p>《四書全註》、《□小四書論集》（未裱）、《四書補韻》、《精萃□□□》、《時務新策》、《西學課藝》、《文料資新》、《四書會典》、《四書類聯》、《□料選》、《文料大成》、《典制二十二種》、《光緒會計表》、《約章分類輯要》、《訓蒙捷徑》、《繪畫字課新說》、《文史蒙求》、《美國通史攬要》、《日本全史》。</p> <p>（以上石印書底）</p> <p>《尺牘三種》、《脉學四種》、《笑話新書》、《蘭□□外史》、《尺牘摘聯》、《王士雄醫學五種》、《萬年曆》、《後三國志》、《楹聯新集》、《適軒尺》、《宦鄉要則》、《尺牘碎錦》、《策論舉隅》。</p>

²根據上海檔案館館藏整理而成，檔案編號：S313-1-76。由於原件以毛筆書寫，加上年代久遠，多處字跡不清楚或毀損，故無法辨視者以□省略。筆者整理時雖力求辨認和校對，仍恐有錯誤或誤判之處，故仍應以原件為準。

二、慰記書莊

《增評言行錄》、《三江校志錄》、《康熙字典》、《秋燈傳》、《鑑畧要註》、《加批四書新論》、《中西三字經》、《格致課藝》、《四書經史摘正》、《管子》。

(以上科學用書底)

《中外輿畫說集成》、《鉛□草綱目》(圖局版)、《陳修園卅種》(圖局版)、《(石)盛世危言》、《五十朝東華錄》、《西學十六種》、《(石)困學記聞》、《(石)□書王大全》、《(石)經世文匯編》、《歷代經濟論》、《歷代史論》、《(石)卅二子全書》、《袁了凡綱鑑》、《苗史人物類考》、《皇朝輿地通考》、《橫行廿四史全集》、《五經全註》、《四書五經精義》。³

三、廣明書局

《華裝 最新美國政鑑》、《洋裝 動物進化論》、《洋裝 近世歐洲大事記》、《華裝 吉田松陰遺墨》、《洋裝 斯賓塞干涉論》、《洋裝 文政黨更議院政治□□》、《洋裝 胡雪巖》。

(特印各書)

《高等□學中國地理學》、《女公子》、《活財神》、《最新中外度量衡合數表》、《最近中國文勢》、《動物學教科》(中等)、《四書子史集正》、《五千字文》、《提綱釋義》、《岳傳》、《列國志》、《碧血錄》、《牙牌金鉢數》、《算法大全》、《白鶴秤骨數》、《玄秘塔》、《九成宮》、《地球韻言》、《讀史論大成》、《皇朝掌故》、《袁五合判》、《繪畫增補史鑑節要》、《言行錄》、《開闢演義》、《通鑑輯覽》、《正續唐著必讀史》、《五經傳註》、《一筆寫算史》、《經義大全》、《王李脉訣》、《各國藝學策》、《正續讀金石粹編》、《四□經新義》、《注袁尺》、《應試八種》、《正史論大成》、《正蒙必讀》、《西洋歷史教科(中等)》、《理化教科》。

四、醉六堂

《施公案十全》、《□□字彙》、《大字東西漢》、《阮氏鐘□》、《幼幼集成》、《繪圖四千字文》、《外科金鑑》、《史鑑節要》、《繪畫□務三字經》、《三千字文》、《廿四史通俗演義》、《西朝通鑑輯覽》、《鉛應酬彙選》、《(石)評鑑彙選》、《吳祭酒尺牘》、《繪圖粉粧樓》、《全圖包公案》、《繪圖三才畧》、《評批周禮政要》、《繪圖隋唐演義》、《繪圖西廂記》、《全圖萬國公法》、《繪圖聖武記》、《全圖中國魂》、《時務政藝通纂》、《洋務經濟策論》、《泰西事物通考》、《時務變法奏議》、《四書五經義》、《正續四書義》、《策問大成》、《四書論議》、《薛氏庸合全集》、《鉛版古文辭類纂》、《鉛版大清律》、《鉛版九朝記事》、《鉛版曾全集》、《鉛版簡□目錄書目問答》、《三百六十行尺》、《西學大成》。

五、嘉惠書林

³ 原件中有部份書籍書名前加一「石」字或「鉛字」，表示此書版本為石印本或鉛印本，故本表整理時於書名前以(石)、(鉛)標示。

<p>《白芙堂算學算書》、《九教通考》</p>
<p>六、科學編譯部總發行所</p> <p>《查理斯密大代書學 上卷》、《中學適用 算術教科書》、《幾何學初等教科書》、《寫信不求人》、《尺牘句解》、《三百六十行尺牘》、《唐著寫信必讀》、《一筆寫算》、《續尚友錄》、《繪圖征朱傳》、《繪圖征西傳》、《東俄戰征記》、《歷代史論》、《史論正鵠》、《亞細亞東圖》、《電報新編》、《五大洲全圖》、《暗碼》、《平圓地球圖》、《巾幗英雄傳》、《三通序》、《三才畧》、《筆算便覽》、《野叟曝言》、《新撰美國歷史》、《鮑公案》、《中東字課圖說》、《左公平西》、《皇朝直省地圖》、《舊三國志》、《神仙傳》、《平長毛書》、《蓮子瓶》、《夢裡一片情》。</p>
<p>七、理文軒</p> <p>《代數述補式》（有版權）、《拳匪史末記》、《東語入門》（有版權）、《英美海軍戰史》（有版權）、《紅樓夢》、《中英字課圖說》、《七俠五義》、《東語文法提綱》、《續兒女英雄傳》、《德國軍制》、《日本歷史》、《西學課程》、《時務全書提要》（有版權）、《中西度量權衡表》、《普法戰記》、《中西學門經□種》。</p> <p>（以上鉛版）</p> <p>《洋務叢鈔》、《孤忠錄》、《洋務訣要》、《冶遊便覽》、《笑得好》。</p> <p>（以上木版）</p> <p>《紅梅圖》、《大清一統史》、《笑林廣記》、《世界通史》、《奇器畫說》、《大聖末瓶真經》。</p> <p>（以上石印）</p> <p>《萬花樓》、《大明奇俠傳》、《希奇古怪》、《無師自通東語錄》、《四書五經義》、《胡曾二公要略》、《尺牘不求人》、《蜃樓傳》、《普通世界地理》、《時務新編》、《大聖末劫真經》、《校正史略》、《石蒙古紀事本末》、《石官商便覽》。</p>
<p>八、文會書社</p> <p>《繪圖啓蒙課本□編》、《甲辰乙巳新氏彙編》。</p>
<p>九、蔣春記</p> <p>《（石）驗方》、《（石）□通鑑編》、《（石）太上感應篇》、《（石）各國政治藝學策論》、《（石）大字三國演義》、《（石）四書五經義》、《課蒙文引》、《直省鄉會》、《三字經畫說》、《（石）會墨》、《（石）五千字文畫說》、《（石）御批輯覽》、《（石）皇朝經世文編》。</p>
<p>十、經香閣</p> <p>《醫宗全鑑》、《袁了凡鑑》、《陳三十六種》、《王鳳洲鑑》、《本草綱目》、</p>

《續尚友錄》、《(鉛)分類尺牘》、《九教通考》、《御批綱目》、《綱鑑刑律》、《廿四史緯》、《皇朝輿地考》、《九朝紀事》、《經世文新編》、《繪圖三下南唐》、《名花尺》、《國朝御治學經》、《繪圖弟子戔(附童子禮)》、《柔遠新書》、《兵政新書》、《工政新書》、《農政新書》、《測候叢談》、《行素九種》、《地學淺釋》、《學算筆法》、《金石識別》、《四元玉鑑》、《測候叢談》、《離引蒙》、《代數難題》、《金石識別》、《微積溯源》、《測海山房叢書》、《代數學》、《續三疇人傳》、《數學理》、《代數通藝錄》、《增刪算法》、《強自力齋十種》、《算式要集》。

十一、著易堂

《正續西藝知新》、《光學大成》、《西學軍改全書》、《聲學大成》、《化學大成》、《中外化學通表》、《電學大成四種》、《?》、《礦學大成五種》、《航海簡法》、《天學大成兩種》、《測地繪圖》、《地學大成兩種》、《談天》、《汽學大成》、《繪地法原》、《十七史洋節》、《廿四史人物考》、《佐治芻言》、《四書古注十種》、《庸書內外篇》、《千百年眼》、《富國農民策》、《加禮要》、《校邠靈抗議》、《分類政治史論匯海》、《明夷待訪錄》、《增訂盛世危言新編》、《適齋記言紀行》、《致用精合選藝》、《海外文編》、《列國計要》、《分類時務策海大成》、《袁了凡鑑》、《王鳳洲鑑》。

(以上石印)

《算學啓蒙》、《西學學十六種》、《筆算便覽》、《識史輯譯》、《衍元要義》、《宋利堅志》、《閩方表》、《張溥歷代史論》、《九數外錄》、《年陸家公集》、《勾股六術》、《馬幸批點東萊博議》、《三角數理》、《時務新策彙編》、《董方立遺書》、《分類時新論》、《同文館課藝》、《萬國史記》、《曾文正公年譜》、《註表尺牘》、《曾大事記》、《嚶求集》、《續玉錄尺牘》、《尺牘》、《往還尺牘》、《尺牘合璧》、《官鄉要則》、《分類尺牘備覽》、《尺牘入門》、《增補尚友錄》、《字類標韻》、《新增韻合璧》、《增補四書備旨》、《四書合講》、《治平彙要》、《空策渡津筏》、《空策過新又新》、《性理論》、《秋兩盒》、《杜詩鏡銓》、《說岳全傳》、《唐宋八家古文》、《醒世新編》、《子不語》、《滬游雜記》、《隨園隨筆》、《曾侯日記》、《隨園食單》、《活世生記》、《注三字經》、《家庭講話》、《注百家姓》、《不可錄》、《注千字文》、《隨園三十六種》、《增廣日記故事》、《胡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家書》、《東塾讀書記》、《四書新論》、《國朝尚友錄》、《萬國公法》、《續兒女英雄傳》、《綱鑑總論》、《格致學啓蒙》、《格致學啓蒙》、《韓國沿革史》、《中外衛生要方》、《韓湘子全集》、《呂東萊集評》、《名醫類案》、《時病論》、《孝經論》、《聖諭廣訓》、《溫病條辨》、《八家四六文注》、《東三省輿地圖說》、《東北邊防揖要》、《歲迎邊務錄》、《東日記》、《念二子摘

錄》、《三才記要》、《勸學篇》、《文獻通考洋節》、《續集尙友錄》、《訓蒙捷徑》、《綱鑑易知錄》、《地球韻言》、《廿四史劄記》、《大清會典》、《地球圖要通考》、《史論菁華》、《普通問答四種》、《掌故時務教科書》、《萬國地理教科考》、《蒙學課本初編》、《蒙學課本二編》、《蒙學課本三編》、《大版蒙學課本》、《心算教授法》、《物算筆算教科書》、《小學紅印書畫範本》、《小學墨印書畫範本》、《初等留學範本》、《最新繪畫蒙學課本》、《最新 繪畫蒙學課本》、《最新 繪畫蒙學課本》。

十二、文海閣

《繪圖射雕記》、《內經知要》。

十三、蘭陵社

《繪圖中等格致課本》、《五版改良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繪圖中等格致課本》、《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批點大學術義》、《四書古注》、《五經味根》、《□□生編》、《□□才子》、《石牙牌數》。

十四、何秀記

《張氏醫通》、《方輿郡國合》、《二十三子》、《十子全書》、《注孫子》、《注管子》、《淮南子》、《韓非子》、《莊子》、《老子》。

(以上鉛印本)

《新論》、《算法指掌》、《字學》。

(以上石印本)

《尺句解》、《三百六十行尺》、《木蘭傳》、《十才子》、《八才子》、《坐花志果》、《名目傳》、《宣講□聞錄》、《省身鑑》、《五種遺規》、《學堂日記》、《巾幗英雄》、《引□千家□》、《征西全傳》、《征東》、《逆匪紀畧》、《八仙緣》、《吉祥花》、《花鏡》、《聖諭廣訓》、《馮抗議》。

十五、古香閣

《綱鑑正史約》、《四書匯參》、《刪除新律例》、《時務叢編》、《古文翼》、《五經囊括》、《兩漢論叢》、《史要增注》、《水道提綱》、《萬國公法》、《對聯便覽》、《三才畧》、《四五經論義》、《應試繩墨》、《空策渡經筏》、《十五貫》、《黎星便叢稿》、《湯危言》、《汲古閣文選》、《八賢手札》、《數度衍》、《算法統宗》、《東萊博議》、《代數術》、《盛世危言》、《爾雅畫》、《幼學求源》、《防海新論》、《陸宣公集》。

(以上描本底)

《唐宋十家古文》、《汪中述》、《天雨花》、《徐十三種》、《兩壘軒尺》、《醫宗必讀》、《吊腳痧方》、《桂宮梯》、《□物百獸醫院》、《外科金鑑》、《暗室燈》、《錢畫冊》、《晚笑堂畫》、《孔子事蹟畫》、《捐例新章》、《大生要旨》、《劉人譜》。

(以上石印底)

《康宋十家古文》、《江中學述》、《孫氏說文》、《歷代史表》。

十六、洽記書莊

《拳匪紀畧》、《大破孟州》、《四書五經出鵠》、《□法歸宗》、《俞曲園史論合璧》、《女科指南》、《廣新聞》、《聊齋》、《情史》、《九才子》、《洋務升官圖》、《盛世危言》、《經餘必讀》、《地球韻言》。

(以後鉛板書底)

《兩般秋雨》、《地理精微集》、《太四色》、《腳氣類方》、《沿革畫》、《武功紀盛》。

十七、廣益書局

《濟公傳》、《蕩寇志》、《女男有兒新法》、《說岳》、《說唐》、《鏡花緣》、《二度梅》、《平西南》、《英字指南》、《東語進階》、《英語註解》、《普通新歷史》、《東萊博義》、《史鑑節要》、《三才略》、《直乃學算筆譚》。

十八、文通書莊

《西□仁書》、《通鑒輯覽》、《王船山十二種》、《輿地通考》、《史性韻編》、《廿四史橫行》、《夷通分類總纂》、《明儒學案》、《同治東華錄》、《時算法九種》、《飛影叢語畫》、《美國公法》、《東語正則》、《性理教科》、《回鑾拾末記》、《五種遺規》、《國際私法畫解》、《驗方新編》、《運規約指》、《幾何畫教科書》、《新地理學綱要》、《十三經集學》、《代數通藝》、《應酬彙選》、《分類尺》、《尺牘句解》、《仕商尺》、《丹溪心法》、《金醫心點》、《石藥性賦》、《大地畫》、《袁慰帥陸兵書》、《普通小學歷史》、《農化學問答》、《花月夢》、《數學啓蒙》、《萬國輿圖》、《直行代數術》、《大字列國》、《夢筆生花》、《學海要言》、《三字經注解》、《四書疑題解》、《諧譚》、《字類標韻》、《明聖經》、《求知齋》、《唐宋宮詞》、《聖諭廣訓》、《牙牌數》、《韻史》、《三國志》、《西遊記》、《封印》、《雪□經解》、《七俠五義》、《小五義》、《續五義》、《廣治平略》。

十九、廣百宋齋

《經世文□編》、《通商約章》、《閱微草堂筆記》、《洪經略奏對筆記》、《綱鑑易知錄》、《九朝東華錄》、《石頭記》、《名臣言行錄》、《皇朝開國方略》、《論語旁證》、《大版の書》、《四方匯參》、《訪韻合璧》、《先□事略》、《通俗演義》、《庭訓格言》、《臨文便覽》、《日知錄》、《聊齋志異》、《柔遠記》、《胡曾要略》、《八賢手鏡》、《蔭桂軒》、《列女傳》、《圓明園》、《任の橦》、《易知錄》、《曾家書》、《五經分纂》、《事類統編》、《賞奇軒》、《分類賦鵠》、《百美圖》、《西廂圖》、《石頭記圖》、《水滸贊》、《欣賞齋尺牘》、《通閭便集》、《汲古文選》、《太上感應篇》、《陞官圖》、《鏡花緣》、《曾家公》、《五才子》、《福幼編》、《尚友錄》、《驗方新編》。

(以上鉛版)

《□氏說文》、《論語旁證》、《雲溪畫稿》、《鴻雪因緣》、《三國演義》、《四庫全書》。

二十、千頃堂

《中西醫書匯通五種》、《新增幼學瓊林》、《芥子園三金》、《正續國朝先正事畧》、《溫病條辨》、《中興名目事略》、《醫宗必讀》、《筆算便覽》、《群經蒙求歌略》、《史記菁華錄》、《左傳□議》、《唐著寫信必讀》、《毛□世本古義》、《尺牘合璧》、《小學集注》、《史鑑節要便讀》、《西游畫像》、《封神畫像》。

(以上石印)

《道生堂》、《鐵網珊瑚》、《正續名稿彙選》、《得月樓賦》、《小題正鵠》、《袁秦合稿》、《制藝靈樞》、《目耕齋》、《五經文料大成》、《管世銘稿》、《試律大觀》、《分品別傳》、《浙江校士錄》、《四六新策》、《象吉通書》、《芥子園四集》、《儲選八大家文》、《名花尺牘》、《文心雕龍》、《遵生十二線》、《西湖佳話》、《三通序》、《歷代名目奏議選》、《武備兵書十種》、《論語》、《續歷代名后言乃錄》、《名畫集錦》、《增廣驗方新編》、《國朝策論舉隅》、《松陽講義》、《文獻通考詳節》、《二十四史簡編》、《無邪黨答問》、《瀛談志略》、《廿四史論粹萃》、《地球韻言》、《五經全注》、《金蒙石宗》、《廿二史劄記》、《四書襯》、《繪畫禮記節□》、《四字經》、《圖局陳修園卅種》、《圖局本草綱目》、《圖局袁王合鑑》、《圖局傳家寶》、《四書古注十一種》、《御纂文經》、《直行九通書》、《五經傳注》、《十一朝東華錄》、《二十五子》、《東萊博議》、《歷代史論》、《臨文寶笈》、《困學記聞》、《五經文府》、《大題文府》、《四書全注》、《江湖尺牘》、《東西學書錄總序》、《中西村務紀要》、《萬國公法》、《三朝名醫方論》、《時務》、《富國養民策》、《前後珍珠塔》、《唐宋八大家文》、《代數通藝錄》、《應耐火成》、《代數備旨細本》、《鉛版幼學瓊林》、《鉛版說文旁訓》、《三千字文》、《商賈尺牘》、《白鶴□數》、《識字教科書》、《尺牘教科書》。

二十一、藻文書局

《精選五經義大觀》、《中興言行》、《歷代名目言錄》、《中外經濟政治彙考》、《新學三字經》、《唐代業書》、《幼科三種》、《普天忠憤》、《醫學心悟》、《中俄國志》、《新增女科切要》、《御批通鑑輯覽》、《御批五經備旨》、《尚友錄》、《繪畫巧合情緣》、《壬寅新民叢報》、《五經宏括》、《□帖玉芙蓉》、《訪句題解彙編》、《分類賦鵠》、《空策分類彙編》、《文腋類編》、《郡國方輿□》、《銅版增廣韻合璧》、《分類鎖圖□》、《直行廿五子》、《皇朝輿地通放》、《直行九通》、《十一朝東華錄》、《橫行廿四史》。

二十二、鏡海樓

《史記精華錄》、《王氏潛齋醫書五種》、《雷氏時病論》、《張隱庵注傷寒

論》、《十一朝東華約錄》、《雷公藥性賦》、《三才畧》、《□□試草》、《後列國志》、《平宜粵匪紀畧》、《蕩平髮逆圖記》、《左傳句解》、《改良幼學瓊林》、《東華易知錄》、《清史覽要》、《中西痘科全書》、《增像十美圖》、《四書古注》、《鑑撮》、《文選集腋》、《中西策論大觀》、《西學改藝通考》、《小蓮傳奇》、《通鑑綱目輯要》、《湘學報類編》、《詩句題解彙編》、《續名臣言行錄》、《治事文編》、《錢輯政學五種》、《十七朝史事新論》、《繪圖三千字文》、《繪圖六千字文》、《文獻通考詳節》、《通商始末記》、《排律初津》、《鉛版萬花樓》、《鉛版前後珍珠塔》、《歷代尙友錄統編》、《前後漢精華錄》、《溫熱經緯》、《空策分類彙編》、《鉛版文腋類編》、《郡國輿合》、《銅版增廣□韻合璧》、《分類韻□□》、《直行荀子》、《皇朝輿地通□》、《直行九通》、《十一朝東華錄》、《橫行廿四史》、《鉛版尙友錄》、《石印李氏五種》、《鉛版橫行寫信必讀》、《石印四才子》、《鉛橫行尺牘句解》、《石印名臣奏議選》、《鉛版三國志》、《石網鑑正史鈞》、《鉛版京調》、《石印四大家棋譜》、《石印本字彙》、《石印各國名人事略》、《石印毛□□圖》、《石印續尙友錄》、《石印史記精華》、《石印史事論編》、《石印最新今古奇觀》、《石印御纂義經》、《石印東西漢》、《鉛古文辭類纂》。

二十三、掃葉山房北號

《鉛印經世文編》、《石印左傳句解》、《鉛印橫行分類尺》、《石印幼學瓊林》、《鉛印說岳全傳》、《石印幼學須知》、《鉛印五種遺規》、《石印星軺日記》、《鉛人範》、《石印六書通》、《鉛四分集注》、《石印農改全書》、《鉛□注》、《石印說文古籀》、《鉛印王氏脈經》、《石印燈月醉世傳》、《石印七俠五義》、《石印王大全》、《石唐印□□》、《石印沈八家》、《石印五洲志畧》、《石印通鑑輯覽》、《石印皇清奏議》、《石印中興將帥》、《石印博物志》、《石印國名初階》。

二十四、掃葉山房南號

《鉛印玉鑑》、《鉛印醫□合》、《鉛印合聖》、《鉛印文武聖訓》、《鉛印古詩源》、《鉛標韻》、《鉛暗室燈》、《鉛印牙牌數》、《鉛三才畧》、《鉛印三備要》、《石印國朝文錄》、《石印正續經□篇》、《石印列國》、《石印金七墨》、《石印萬國史記》、《石印文獻纂要》、《石印諏吉便覽》、《鉛印曹全集》、《石印鏡相法》、《鉛印九朝紀事》、《石印官商便覽》、《石印史論彙選》、《石印近思錄》、《石印湖海精華》、《石印西俗襍志》、《石印商子》、《石印美國總統》、《石印全彭公案》、《石印史畧》、《石印四書院課藝》、《石印二度梅》、《石印校宏議》、《石印古文武義》、《石印紫陽課藝》、《石印相理衡真》、《石印美國輿圖》、《石印古文觀止》、《石印玉字彙》、《石印大八義》、《石印漁洋詩話》、《石印杭議》、《石印時務策論選編》、《石印白虎通》、《石印緬甸志畧》、《石孝性合》、《石等洋芻議》、《石印王公表傳》、《石印真墨》、《石印續史論》、《石印七俠

五義》、《石印王大全》、《石印唐寫信》、《石印沈八家》、《石印五洲志畧》、《石印通鑑輯覽》、《石印皇清奏議》、《石印中興將帥》、《石印博物志》、《石印國名初階》、《石畚塘論》、《石印丁曾合》、《石印勸學篇》、《石印湯危言》、《石印續富國策》、《石印牛馬經》、《石印今古奇觀》、《鉛印濟公全》、《石印地理原真》、《石印雪心賦》、《石印神峰通考》、《石印羅注解遺》、《石印大六壬》、《石陽宅大全》、《石入地眼》、《石東醫》、《石印萬年曆》、《石印子平》、《石印卜筮正宗》、《石印玉匣記》、《石印官鄉要則》、《石印□男女科》、《石印商業地理教科》、《石印尺牘句解》、《石印女學教科書》、《石印說唐》、《石印改良隋唐》、《石印陽宅三要》、《石印地理五訣》、《石印巧金奇冤》、《石印萬病四春》、《石印陽愛眾》、《石印第□奇女》、《石印尺句解》、《石印星報日記》、《石印東萊》、《石印五十名家手札》、《石印前後三省莊》、《壽世保元》、《三公案》、《□正字彙》、《施公案歌詞》。

二十五、韻記書莊

《三國志歌詞》、《明聖經》、《針灸大成》、《碧玉圖》、《尺牘字彙全璧》、《三百六十行尺牘》、《萬年清八全》、《八本尺牘句解》、《說唐全傳》、《地球韻言》、《前後兵書拾程》、《五方元音》、《史鑑節要》、《鉛版宣講拾遺》、《三百名家策論》、《達生編》、《鑑畧妥注》、《玉連環》、《經濟策論》、《日本新史》、《雙玉決》、《才子醒夢緣》、《三蘇策論》、《繪圖古文觀止》、《通鑑覽》、《袁鑑》、《袁王合鑑》、《經世文新編》、《寫信必讀》、《外科正宗》、《經世文三篇》。

二十六、鍊石印局

《三國志》、《玉夔龍》、《封□》、《說唐前後》、《列國志》、《尺句解》、《西遊記》、《□今古》、《酬世尺》、《反唐傳》、《名花尺》、《征西傳》、《□寶全》、《粉庄樓》、《非峰通考》、《五美緣》、《武備蒙學傳操》、《美國輿圖》、《休皇朝直省大地圖》、《四齋年表》、《瀛環新志》、《太平經國書》、《陽湖沈氏算學初集、二集》、《普通新數學》、《萬國公法》、《大學衍義補》、《周禮政要》、《綱鑑總論》、《管商全傳》、《歷史一千題鼓吹》、《兩湖課藝》、《勸學篇》、《校邠蘆杭議》、《聖武記》。

二十七、六藝書莊

《六藝通考》、《正續代數通藝錄》、《名醫書方類編》、《管子》、《增補支那通史》、《增補東漢史要》、《普天忠懷集》、《代數補式》、《續瀛環志畧》、《醫方幸草合編》、《經史貫通》、《輿地三字經》、《繪圖小學音語》、《小學女子讀本》、《和文譯學》、《初等普通傳操》。

二十八、興記鴻文書局

《直行皇清經解》、《橫行康熙字典》、《□□十三經注疏》、《花月痕》、《皇朝五經彙解》、《白芙堂》、《小學三種》、《三通纂要》、《群經平議》、《百子金丹》、《諸子平議》、《化學求數》、《直行念四史》、《胡刊文選》、

《四史》、《讀史大略》、《四書合講》、《槍炮算法□□》、《歐羅巴通史》、《天文地理歌畧》、《秦西新史攬要》、《中西武備兵書五種》、《俄前皇併吞世界遺策》、《大清一統新志》、《政藝提要》、《孽龍傳》、《碧玉溪》、《大字網總論》、《東洋史要補》、《遼志廬醫學群書》、《大學衍義》、《普通新歷史》、《各省課藝課海二集》、《行素軒》、《瓊林霏齋》、《新學大全》、《湯危言》、《西學時務大成》、《易知錄》、《萬國改藝全書》、《尺牘合璧》、《史論觀海》、《唐宋八家文》、《四書五經義彙選》、《湘軍記》、《袁了凡》、《古文雅正》、《通鑑輯覽》、《唐注尺牘》、《通鑑纂新》、《子不言》、《四書彙解》、《隨園三十六種》、《太上寶筏圖說》、《豪傑譚》、《醫本合利》、《鑄史駢言》、《施公案》、《文獻詳節》、《永慶昇平》、《代數難題》、《全圖三國》、《代數術》、《聊齋志》、《代微積拾級》、《七劍十三俠》、《談天》、《小倉山房尺牘》、《字彙》、《董方立》、《四書味根錄》、《算廸》、《宣講拾遺》、《化學鑑原》、《司馬溫公通鑑論》、《地學成說》、《讀史提要錄》、《龔定庵全集》、《六大家策論》、《尺牘初概》、《格致泳藝約編》、《五才子》、《格致古微》、《廣廣策府統案》、《古微書》、《古今名人畫譜》、《泰西言行錄》、《東萊博議》、《地球韻言》、《庸書》、《通鑑便讀節本》、《王引之四種》、《文苑摺華》、《廿五子》、《刑案匯覽》、《續廿五子》、《讀通鑑論》、《直行康熙字典》、《經史八種》、《曹家書》、《東周列國》、《曾書禮》、《元明清史畧》、《經史百家雜鈔》、《日車教育三種》、《人譜》、《念世新論十種》、《小學纂注》、《史論五種》、《則古普齋算學》、《經濟策論》、《幾何三種》、《讀富國策》。

二十九、有益齋

《正續編驗方新編》、《地理五決》、《蝴蝶盃》、《紅燈記》、《巧連珠》、《賣油郎》、《花魁傳》、《秦雪枚》、《五龍傳》、《金陵府》、《歸西寧》、《包公案》、《郭秀下兩廣》、《南北京》、《蜜蜂記》、《天門陣》、《廿二史劄記》、《唐宋仿文醇》、《任鈞台史要增注》、《美國史記》、《紀效新書練兵變記》、《節本宋元學案》、《史略》、《王陽明集》、《古文辭類纂》。

三十、智新書局

《繪圖改良五千字文》、《繪圖改良活五千字文》、《最新女子淺說教科書》、《繪圖學堂日記》、《繪圖改良幼學歲字教科書》、《繪圖改良三字經》、《繪圖改良英烈傳》、《繪圖玉尺記》、《醫宗金鑑內外金》、《太西言行》、《唐馬信必讀》、《尺牘句解》、《大清商律》、《四書義》、《心田抄選》、《壬寅癸卯新民叢報彙編》！《雙瑣山》、《綉鞋記》、《血手印》、《鸚哥記》、《汗衫記》、《正續精忠傳》、《大字腳品》、《昕夕閒談》、《繪圖蒙學唱戲實在易》、《繪圖大學新體讀本》、《繪圖孝經新傳讀本》、《繪圖中庸新傳讀本》、《繪圖論語新傳讀本》、《繪圖孟子新傳讀本》、《繪圖四書白話

解》、《初級普通話□字讀本》、《繪圖便蒙識字讀本》、《繪圖通經字法即編》、《繪圖中國白話史》、《繪圖外國白話史》、《繪圖中國白話地理》、《繪圖外國白話地理》、《繪圖識字入門》、《初等小學論說入門》、《毛筆畫入門》、《繪圖初級尺牘教科書》、《精圖彩印新式百家姓》、《精圖影印白話注解四千字文》。

三十一、彪蒙書室

《繪圖蒙學識字實在易》、《繪圖蒙學求通》、《繪圖蒙學造句實在易》、《繪圖蒙學圖說實在易》、《繪圖蒙學修身實在易》、《繪圖蒙學中國歷史實在易》、《繪圖蒙學外國歷史實在易》、《繪圖蒙學天文實在易》、《繪圖蒙學中國地理實在易》、《繪圖蒙學外國地理實在易》、《繪圖蒙學昭算實在易》、《繪圖蒙學習畫實在易》、《繪圖蒙學格致實在易》、《繪圖蒙學衛生實在易》、《繪圖蒙學體操實在易》、《白話化學》、《繪圖蒙學習字實在易》、《繪圖速通□字法續編》、《精圖彩印白話注解三千文》、《最新小學□字教科書》、《繪圖普通科學問答》、《繪圖格致啓蒙問答》、《繪圖中外豪傑史讀本》、《繪圖中外□□史讀本》、《繪圖外國龍文鞭影》、《小學專用中外歷史名人分類問答》、《華英合璧繪圖孩童識字課本》、《繪圖白話注解小學韻語》、《繪圖兒童過渡》、《筆算速成法》、《蒙學彩印暗射地圖附說》、《圖畫五彩方字》、《白話物理學》、《白話生理學》、《白話動物學》、《白話植物學》。

三十二、遜記書莊

《石印封神傳》、《石印陳卅二種》、《石印三國志》、《石印本草綱目》。

三十三、玉葉山房

《小金錢》、《大清相法》、《司馬溫公論》、《分類尺》、《六法大觀》、《綴白裘》、《醫宗全鑑》。

三十四、飛鴻閣

《正續兒女英雄傳》、《黃氏八種 鉛版》、《格物入門》、《古文雅正 鉛版》、《大八義》、《四書講義》、《小八義》、《三國志 鉛版》、《本草溢新》、《包公案》、《麻衣相》、《醫林改錯》、《柳庄相》、《鐵關刀》、《牙牌數》、《鉛本廿三子全書》、《鉛方輿郡國合》、《鉛本綱綱鑑易知錄》、《鉛本十子全書》、《石印本梅氏叢書》、《董方立遺書》、《十三經某句》、《勾股六術》、《空策□文新》、《九數外錄》、《□理集句》、《前後珍珠鏡》、《卜筮正宗》、《算學啓蒙》、《列國陸軍制》、《四元玉鑑》、《西域の種》、《行素軒五種》、《增刪算法統宗》、《針灸大成并圖》。

三十五、文瑞樓

《鉛本三國志》、《鉛本文辭類纂》、《鉛本彭公案》、《鉛本曹惠敏公》、《鉛本長生殿》、《鉛本五代殘唐》、《文選集腋》、《鉛本治本十議》、《銅版の書題鏡》、《文選課靈》、《鉛注八家四六》、《鉛藥性賦》、《鉛本醫學心悟》、《鉛賦學正鵠》、《鉛本山海經》、《鉛本黃帝內經》、《英字入

門》、《韻海大全》、《五經鴻寶》、《詞林墨鈔》、《經解萃稿》、《蘭□詩鈔》、《漢學師承記》、《夢花賦海》、《攢花小堂》、《雪□經解》、《四方串珠》、《參省課藝》、《白英堂叢書》、《字類標韻》、《文選類腋》、《兩漢蒙拾》、《強學彙編》、《大法會□》、《九朝紀事本末》、《通鏡切覽》、《小題題鏡》、《續閱微草堂》、《古今名人畫》、《王注□解》、《兵書十種》、《大題速文府》、《渡津筏》、《□史》、《三才畧》、《史通通釋》、《小題文藪》、《阮氏鐘日記》、《尚友錄》、《牡丹亭》、《文林五種》、《輿地彙鈔》、《英字指南》、《蒙古游散記》、《分韻□□》、《數理精蘊》

三十六、萃文齋

《御批通鑑輯覽》、《王風洲綱鑑》、《袁了凡綱鑑》、《皇朝政典挈要》、《歷代名臣言錄》、《五大洲格致國□》、《泰西政治新論》、《湯摯先治事文編》、《時務策論大觀》、《算學課藝鴻裁》、《繪圖三國志》、《繪圖粉粧樓》、《前後濟公傳》、《繪圖六才子》、《俠義奇女》、《繪圖綠牡丹》、《星命□年》、《廿四史劄記》、《潛齋醫書五種》、《左傳正緯》、《考試必讀》、《定菴全集》、《元史譯文證補》、《西藏圖考》、《本草溢新》、《場頭歌訣》、《近思錄》、《大清律例》、《皇朝藩叢書》、《七俠五義》、《戲法圖記》。

三十七、久敬齋

《直行九通全書》、《五經合纂大成》、《皇朝經世文編》、《道咸同光奏議》、《皇朝經世文續編》、《御批通鑑綱目全書》、《皇朝經世文三編》、《直行殿板四史》、《皇朝經世文新編》、《直行殿板康熙字典》、《增批歷代名臣言行錄》、《康熙字典改證》、《加批四書味根錄》、《壬寅癸卯直省闡藝大全》、《四書補注備旨》、《三國志》、《增國□全玉匣記》、《尺牌句解二集》、《大字寫信必讀》、《剔弊魚力元音》、《考古名人畫全集》、《潘名家蘭名畫》、《唐寅竹譜》、《玉歷玉寶鈔》、《大字京調集》、《□□字彙》、《放白字彙》、《□□字彙》、《喉科祕書》。

三十八、同文新譯書局

《石印本草溢新》、《石印方輿紀要詳節》、《石印幼學瓊林》、《石印列國志》、《石綱鑑總論》、《石印宋傳本草綱目》、《石印陳修國卅二種》、《三續錢輯政治考》、《史論正鵠初集》、《列國志》、《史論正鵠二集》、《史論正鵠三集》、《續文海》、《史論正鵠四集》、《經餘必讀》、《遼金元三史》、《小題□遺》、《小字輯覽》。

三十九、詠記書莊

《經史摘證》、《南北宋》、《鉛危言》、《二本算法》、《九數通考》、《商務尺》、《三蘇策》、《三千字文》、《地球韻言》、《句解尺》、《唐注尺》、《美年八集》、《圖局胡令集》、《石印今古》、《石印經世文編》、《石印岳傳》、《幼學瓊林》、《洋務經濟新論》、《螢窗異叢》、《寫信必讀》、

《四千字文》。
四十、仁餘書莊 《四書古注十一種》、《史記菁華錄》、《簡明五備》、《史鑑節要》、《五經備旨》、《地球句言》、《張太史四書義》、《拳匪記畧》、《又續集》、《征東傳》、《□經義》、《美國史記》、《經史摘記》、《盛世危言》、《聖諭廣訓》、《周禮政要鉛版》。
四十一、同文晉記書局 《鉛本三國》、《尺牘句解》、《寫信必讀》、《袁鑑》、《小倉尺牘》、《鉛本言行錄》、《三百六十行尺》、《鉛本古注十種》、《不求人尺》、《鉛本經史摘證》、《尺牘合璧》、《鉛本正續四書義》、《古文筆法》、《鉛本會墨》、《東萊博議》。
四十二、王林記書莊 《十一朝聖武記》、《歷代政治問答》、《經世文正編》、《經世文三編》、《御批輯覽》、《續文正事略》、《鑑撮》、《夢遊傳》、《生意尺》、《珠玉緣》、《楊家將》、《大電報》、《四全彭公》、《法五才》、《□樓夢》、《飛龍傳》、《銘秀袍》、《前後三門街》、《叶文科》。
四十三、文宜書局 《東西漢》、《花月春聯》、《隨唐傳》、《尺牘合璧》、《前後雙星》、《驗方編》、《萬年曆》、《外正宗》、《夜雨錄》、《醫宗必讀》、《金台傳》、《說唐傳》、《客窗話》、《五代殘唐》、《大江袍》、《石通鑑輯覽》、《古今名人畫》、《石醫宗全鑑》、《三才略》、《石印袁了凡》、《大電報》、《改良今古奇觀》、《正續通天》、《醫本合》、《白牡丹》、《鏡花緣》、《萬花樓》、《忠烈傳》、《三下南唐》、《大梁史》、《三全七俠》、《征西傳》、《指南尺》、《通國尺》、《尺大觀》、《大金錢》、《馬外科》、《正續四大金剛》、《竹林女科》、《英語問答》、《尺牘全新》、《二才子》、《新學編》、《龍仙傳》、《石印說岳》、《劍仙傳》、《英烈傳》、《三俠傳》、《四大奇案》、《百千尺》、《夢遊傳》、《生意尺》、《珠玉緣》、《楊家將》、《大電報》、《四全彭公》、《□五才》、《□樓夢》、《飛龍傳》、《錦秀袍》、《前後三內街》、《葉文科》、《椰庄相》、《遇仙奇緣》、《平長毛》、《笑林廣記》、《灘簧集》、《前後十八義》、《湯頭歌》、《外國笑話》、《生生數》、《眼前報》、《一幸美利》、《飲食秘書》、《攝生妙方》、《中西戲法》、《明史奇觀》、《雙金錠》、《聽月樓》、《哈哈笑》、《三續今古》、《換空箱》、《中東大戰》、《三國志》、《拍案記》、《平捻記》、《天兩花》、《發一才》、《皆大歡喜》、《包公案》、《雙連筆》、《文武秀球》、《伏魔奇書》、《還金鐲》、《綠牡丹》、《興中緣》、《草木秋》、《胡九美》、《四俠兒女》、《引人笑》、《西□律例》、《雙珠球》、《京調二十五種》、《水怪緣》、《征東傳》、《後聊□》、《反唐傳》、《雙珠鳳緣》、《□今古》、《雙蝴蝶》、《雙鳳奇緣》、《鐵公雞》、《二度梅》、

《怕老婆》、《續□國策》、《鐵關刀》、《銀并枚》、《江湖尺牘》、《巧合三緣》、《寫信必讀》、《加興八美》、《拾施公案》、《前後珍珠語》、《百花台》、《七才子》、《案中緣》、《鬼話書》、《九才子》、《日用字》、《十才子》、《白鶴圖》、《算名求》、《燕山史》、《算大全》、《玉歷傳》、《新□新》、《百局譜》、《麻衣相》、《醒世姻緣》、《康梁傳》、《白鶴數》、《感應篇》、《牙牌數》、《開國義》、《□□大觀》、《非峰改》、《見心集》、《覺世十二樓》、《掃北傳》、《筆花醫》、《蘊香丸》、《仕商尺》、《新小調》、《天寶圖》、《忠毅錄》、《麟兒報》、《孝經注》、《藥性賦》、《美年□□》、《四字經》、《八夢緣》、《八才子》、《後魚才子》、《觀由科》、《三才子》、《澆愁集》、《勸戒烟書》、《四才子》、《金錢數》、《四今古》、《五今古》、《庸書》、《金如意》、《詳夢書》、《藻綉圖》、《飛跏子》、《紅廟□鳴》、《十美圖》、《十二金釵》、《看花記》、《奇中奇》、《花天酒地》。

四十四、源記書莊

《關帝籤》、《非相彙編》、《灶君籤》、《十粒金丹》、《暗室燈》、《達生編》、《食物本草》、《三聖經》、《傳家玉寶》、《傳家必讀》、《八仙奇緣》、《天花格言》、《韓非子》、《痧痕良方》、《俞對解》、《滬遊雜記》、《變法新議》、《政治策》、《號寶書》、《戒淫存我錄》、《命不求》、《木蘭傳》、《呂六才子》、《看洋書》、《四千字文》、《俞燈謎大觀》、《封神傳》、《對火金》、《聊藝志》、《西湖圖》、《明日樓》、《洋外官圖》、《濟公案》、《玉匣記》、《李公案》、《文升發》、《最新笑話》、《圖注三字經》、《龍鳳記》、《畫採新》、《政富金書》、《尺句解》、《飛龍傳》、《尺讀全新》、《楊家將》、《格言聯璧》、《搖錄樹》、《圖畫西遊記》、《先天數》、《說岳傳》、《命不求人》、《征西傳》、《譯行尺牘》、《雷峰塔》、《黃金印》、《正續日俄記》、《九□堆》、《開天闢地》、《平貴傳》、《汪氏素問》、《玉火意》、《諷□便覽》、《商賈人》、《三字經歷史》、《普天憤續集》、《胎產彙編》、《改試新章》、《時務新論》、《快心編》、《勸學篇》、《安樂銘》、《三內街》、《神仙傳》、《藝學策》、《古今祕苑》、《曾家書》、《活人良方》、《正續日俄戰記》、《校邠廬杭議》、《醒世金丹》、《大學堂章程》、《稅則》、《宣講拾遺》、《飛歸算》、《四書王大全》、《方輿那國利病》、《百科全書》、《鉛本列國志》、《鉛本爵世錦囊》、《鉛本皆大歡喜》、《鉛本廿四史通俗演義》、《排版法史攬要》、《鉛本西遊記》、《鉛本五洲地理志》、《鉛本本草綱目》、《鉛本外臺祕要》、《歷代政治史論集成》、《四書五義正宗》、《四書五經聯絡金丹》、《注釋目耕□》、《增潤五經樓》、《官商通考》、《中俄分類集成》。

四十五、華興書房

《加批四書味根錄》、《孫批胡文選》、《東西漢演義》、《三生姻緣》、《念史通俗演義》、《春暉堂印譜》、《龍光狀元四書》、《帝王年表》、《京調

易種》、《通鑑輯覽》、《經世三編》、《經世新編》、《大清會典》。

四十六、文寶琳記

《鉛本書□》、《鉛本西遊》、《鉛本扁字聯□》、《鉛本扁字東西漢》、《鉛本扁字易知鑑》、《續尺句解》、《三百六十尺》、《夜兩秋燈錄》、《拍案驚異記》、《尺牘全新》、《客窗驚異記》、《尺讀□裏□》、《續施公案》、《全集施公案》、《各國政治觀》。

四十七、公興印局

《鉛本七使三種》、《鉛本正續□環》、《鉛本全驗方偏》、《鉛本讀通鑑論》、《鉛本前永慶》、《鉛本後永慶》、《鉛本前後說唐》、《石印策論通考》、《石印群書備考》、《俄文變通新階》、《史俄活專》、《兩朝批通鑑輯覽》、《隨國遊戲奇文》、《儒釋道三傳》、《繪圖四千字文》、《電報新編》、《密碼電報》、《繪圖三字經》、《繪圖同人尺牘》、《諸名人尺牘》、《茶花女遺事》、《包探案》、《唐注必讀》、《新章八種》、《三續□□考》、《中外交涉表》、《續各國政治考》、《鉛本宣學堂章程》、《錢氏政學五種》、《國朝名臣言錄》、《御評通鑑圖要》、《十五朝史事新編》、《通商□覈表》、《半俄文界談》、《財政四綱》、《花月痕》、《鏡花緣》、《三聖注》、《廿四史演義》、《隨園鏡花水月》、《尺牘維新》、《上海雜記》、《中國五十年女界史》、《日本史鑑節要》、《華英字典》、《三國演義》、《前後說唐》。

(以上鉛版)

《三國志》、《列國志》、《讀通鑑論》、《百子金丹》、《通商始末記》、《東萊博議》、《前後永慶》、《前後施公案》、《三四五施公》、《唐語別裁》、《日本新政考》、《燕山外史》、《小倉尺牘》、《五朝言行錄》、《自強新論》、《五才子》。

四十八、申昌書室

《徐氏十三種》、《醒世姻緣》、《繪芳錄》、《明季稗史》、《紅樓夢補》、《紀氏五種》、《四國日記志畧》、《德國年表》、《西學十六種》、《瘍醫大全》、《牧令輯要》、《刑案彙編》、《六科準繩》、《刑案彙覽》、《袁王合》、《東西漢》、《儒林外史》、《遜江南》、《蝴蝶緣》、《英注解》、《華英尺》、《英入門》。

(以上石印)

《美國公法》、《浙江形勝訪》、《改正字彙》、《唐宋八大家》、《校邠廬杭議》、《續盛世危言》、《中外時務策》、《前後勸學篇》、《華英字典》、《英語錄》、《英洋撮要》、《海國春秋》、《直省地圖》、《男女科》、《筆生花》、《群芳花鏡》、《耳食錄》、《草木春秋》、《頤人奇潭》、《蘭苕館外史》、《初等小學筆寫速成法》、《初等小學國語教科書》、《初等小學倅探遊戰法》、《初等小學毛筆習□帖》、《初等小學鉛筆習過帖》、《最新婦孺唱歌書》、《最新時務三字經》、《最新修身愛國三字經》、《最新節本春秋左傳》、《劉忠分人譜》、《弟子戰集解》、《格蘭小傳》、《物理學上

中下篇》、《教育學問答》、《飲水□文集》、《男女情文新編》、《新輯史翼》、《□史約編》、《啓悟要津》。

四十九、支那新書局

《最新改良筆算數學》、《最新禮記節本》、《幾何通注教科書》、《新傳小學韻語讀本》、《普通傳操教科書》、《筆算數學全科》、《手工學教科書》、《代數農分全科》、《女子修身□科書》、《形學備旨全》、《初等小學廳史□科考》、《高等小學五種□科考》、《初□小學國文□科》、《改良新語普通新歷史》、《桃花女鬥法》、《五六汾述異類》、《支那兒女英雄傳》、《綺樓重夢》、《圖第一才女》、《圖聯夢》、《圖螢窗棄草》、《天雨花》、《廻龍傳》、《腥睡錄》、《收妖夢》、《蘭□牙牌數》、《第四才子》、《三百六十行尺》、《尺牘句解》、《新花樣星意尺》、《仕商應酬四爲種》、《庚注駢體文鈔》、《施公案》。

五十、文富樓

《地球韻言》、《東萊博議》、《史鑑□要便讀》、《時務分類□□國策》、《時務分類續四國策》、《歷代史事政治》、《史論彙選》、《洋務經濟新論》、《各國時事類編》、《遼天鶴淚記》、《東周列國志》、《鏡花緣》、《綠牡丹》、《蕩平奇妖傳》、《鐵花心史》、《巧合姻緣》、《筆算便覽》、《古今相法》、《比例匯通》、《學算筆淡》、《說唐前後英雄傳》、《今古奇觀》、《算美寶金書》、《代數新法》、《華英字典》、《驗方新編》、《酬世錦囊》、《子史火文瀾》、《中西算學提要》、《方輿紀要》、《格致啓蒙》、《格致菁華錄》、《華英通商要語》、《化學指□》、《古文筆法》、《後三國》。

五十一、美華寶記

《御批通鑑輯覽》、《御批通鑑輯覽》、《御批通鑑綱目》、《王鑑》、《易經合纂大成》、《格致課藝》、《瀛寰字畧》、《東周列國》、《三國志演義》、《三國字演義》、《東華詳節》、《史論觀止》、《美國史記》、《宋本考證字彙》、《代數術》、《萬國公法》、《皇朝經世文編》、《茜窗小畫》、《最新經世文編》、《地球韻言》、《皇朝正通淺要類編》、《聖武記》、《中西武備兵書廿一種》、《鉛本朱萁傳議》、《五大湖藝全書》、《四才子》、《尚友錄全編》、《天雨花》、《藝策府統宋》、《醉乃尺》。

五十二、南洋官書局（附寶善齋）

《同文通鑑綱目》、《子史精華》、《同文通鑑輯覽》、《篆文六種》、《欽宣全唐詩》、《四書備旨》、《駢學類編》、《王大全》、《淵鑑類函》、《日知錄》、《佩文韻府》、《爾雅圖》、《佩文□書畫揚》、《五才子》、《大康熙字典》、《孔子家語》、《皇朝尚友錄》、《最新分類尺》、《三字經注解備要》、《繪圖增注朱子格言》、《馮氏錦囊祕錄》、《東萊博議》、《廿の史約編》、《廿四史緯》、《應酬彙選》、《西國新改輯覽》、《篆文六種》、《中外時務策論新編》、《時務宏括》、《袁了凡》、《綱鑑易知錄》。

（以上寶善齋書底）

《春風館國文教科書》、《商業實踐法》、《春風館□授法》、《小學韻語》、《繪圖本便蒙課本》、《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增注啓蒙課本》、《史等生理學教科書》、《大清一統志》、《集古名公通式》、《胡文選》、《任渭長の種》、《仇十汾列女傳》、《勸學篇》、《皇朝經世文統編》、《茜窗小圖》、《最新經世文編》、《地球韻語》、《皇朝正通淺要類編》、《聖武記》、《中西武備兵□廿一種》、《鉛本朱菓□□》、《五大湖□藝全書》、《回才子》、《尙友錄全編》、《天雨花》、《改藝策府統宗》、《鉛本乃尺》、《蒙學聯字等科》、《初等生理□科》、《初等中國歷史□科》、《初等體操□科》、《初等外國歷史□科》、《小學習字帖》、《最新西洋歷史□科》、《小學堂歌》、《最新外國歷史□科》。

(以上南洋官書局書底)

《高等形學□科》、《中等歐洲地理□科》、《中等亞洲地理□科》、《高等西洋歷史□科》、《高等商業□科》、《中等美國歷史□科》、《女子修身□科》、《初等中國地理□科》、《儀禮韻言》、《初等地文學□科》、《繪圖左傳約韻》、《初等算術□科》、《繪圖孝經便蒙課本》、《中等代數學□科》、《小學文藝□科》、《中等格物□科》、《鳳雙飛》、《六科準繩》、《王船山經世八種》、《大清會典》、《四書五經義彙鈔》、《御纂義注》、《時務通纂》、《經世文新編》、《經世文三編》、《五經合纂》、《分類通鑑輯覽》、《分類會□》、《歷代政治史事論》、《正續興國策》、《初等小學算學教科書》、《初等小學格致教科書》、《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小學筆算教科書》、《初等小學心算教科書》、《小學選白教科書》。

五十三、育文書局

《康熙字典》、《花月痕》、《東西漢》、《袁王合》、《鉛本景岳》、《鉛四書義》、《大字御批輯覽》、《鉛本五經義》、《陳修園廿八種》、《烟叢小說》、《大字廿五子》、《批言及錄》、《兩斛鄉會大全》、《繡像六才子》、《壬寅癸卯新氏叢報》、《飲水□》。

五十四、富強齋

《兵式體操法教科書》、《普通體操法教科書》、《兵式柔軟游戲傳操合》、《鉛版英文典問答》、《鉛版海上游戲奇觀》、《鉛本普通新律史》、《繪圖小學韻譜》、《蘭閨牙牌非數》、《金錢數》、《增補三才紀要》、《繪圖四言歷史》、《物理算學》、《改良徐三種益注》、《繪□四千字文》、《啓蒙問答》、《經史蒙求》、《初等小學手工藝科考》、《初等小學中國歷史藝科考》、《初等小學毛筆留畫帖》、《初等小學心算教授法》、《初等小學體操教科書》、《初等中學藝科書》、《中學植物藝科書》、《中學動物藝科書》、《中學生理藝科書》、《中學礦物藝科書》、《中學憲法新書》、《初等小學修身藝科考》、《高等小學經學藝科考 高等小學中學中國歷史藝科考》、《筆算數學全□》、《衛生教育初階》、《中西普通天文講義》、《中西商業通史》、《行政學講義》、《各國政治彙編》、《策學纂要》、《中興變法群議》、《□

靈叢書》、《西國近事彙編九年》、《格致實學叢書》、《西學富強叢書》、《續叢書》、《美國通鑑綱目》、《化學分原》、《幾何原本》、《重學》、《算式集要》、《化學鑑原全編》、《化學大全十種》、《科學叢書》、《電學》、《西醫十種》、《談天》、《中西農改叢考》、《官鄉要則》、《兒女英雄傳》、《地球韻書》、《續坐花誌果》、《增廣尚友錄統編》、《皇朝政典挈要》、《胡林翼一統輿圖》、《代數通藝錄》、《歷家考成後編》、《文史通義》、《白春山詞譜》、《英語問答》、《九通序》、《交合新論》、《佐治芻言》、《史論五種》、《唐史論斷》、《中西圖兄錄》、《分類格致課藝》、《甲午格致課藝》、《測候叢談》、《西洋軍政叢書》、《地學淺釋》、《礦務五種》、《內科理法》、《西藝知新全》、《測繪學五種》、《各國交涉公法論》、《俄史轉譚》、《列國歲計政要》、《東方交涉記》、《泰西新史□本》、《清海新論》、《臨陣管見》、《普法戰紀輯要》、《工程致富》、《□工記要》、《國政貿易相關書》、《保富興國策》、《動植物學各說》、《汽機發軔》、《汽機必□》、《汽機新□》、《金石識判》、《繪圖至武記》、《治國要略》、《古文印駒六種》、《寫信必讀》、《杜林左傳》、《西學啓蒙十六種》、《新時務通改》、《乾隆府殿列□志》、《御批通鑑輯覽》、《□□義匯考》、《御批通鑑輯覽》、《通鑑題解》、《續西國近乃彙編》、《十五史詳解》、《皇朝經世文續新編》、《御批通鑑綱目》、《應試新政必讀六種》、《測候叢談》、《西洋軍政叢書》、《地學淺釋》、《職務五種》、《內科理法》、《西藝知新全》、《測繪學五種》、《各國交涉公法論》、《俄史輯譯》、《列國歲計政要》、《東方交涉記》、《泰西新大節本》、《清海新論》、《臨陣管見》、《普法戰紀輯要》、《工程致富》、《致工記要》、《國政貿易相關本》、《□富興國策》、《動植物學□說》、《經藝宏括》、《五經文鵠》、《分類賦□》、《五經文府》、《白芙堂算學》、《十朝東華錄》、《俄遊彙編》、《生生數》、《正續歷代史論》、《盛世危言彙編》、《御纂七經》、《大清會典》。

五十五、奎照樓

《改良新增繪圖幼學瓊林》、《增批繪圖古文觀止》、《古文析義》、《繪圖千字文》、《繪圖□本五千字文》、《最新商務尺牘節科書》、《最新增廣尺牘合□》、《改良筆號算》、《繪圖仙女外史》、《增廣尺韻句解》、《明夷待訪錄》、《越諺》、《鉛本□書課本》、《大學衍義》、《鉛版日本沿革史》、《加批袁王合》、《應試必讀二集》、《同治東華錄》、《五經合纂大成》、《四書五經類典集成》。

(以下鉛版股底目)

《曾文正公全集》、《七朝記事》、《策府統宗》、《經世文匯編》、《胡文忠公全集》。

(以下鉛底目 自藏)

《分韻餘錄》、《文科大成》、《聯齋志異》、《試帖□雲集》、《文武陞□

圖》、《文陞□圖》。

五十六、江左書林

(石印股底目)

《大題文府》、《大文府二集》、《經藝宏括》、《五經文鵠》、《白芙堂算學》、《十朝東華錄》、《俄遊彙編》、《生生數》、《正續歷代史編》、《盛世危言彙編》、《御纂七經》、《大清會典》。

(石印書目 自置)

《四書五經典林》、《小試利器》、《四本的書串珠》、《二幸時務新策》、《策論問答》、《六大家棋譜》、《金鞭記》、《試帖玉芙蓉二三集》、《典搭新樣》、《寫書典牀》、《策□□大成》、《易例の種》、《典林□覽》、《內府本地國二幸韻》、《一字文準》、《二情の全註》、《洋務陞官圖》、《後施公案》、《雷公藥性賦》、《加批足本東萊博議》、《曾文正公奏議》、《空策》、《利藝精華文□》、《詳注牙版數》、《達生數》、《補注青雲集》、《醫書集解本草綱要合刊》、《清烈傳》…;

(銅版書目 自置)

《秋景□》、《爾爾圖》、《小塔珠華》、《行文寶籍》、《文章潤色》、《江左書林改正字彙》、《牛馬經》、《音義尺句解》、《星命萬年曆》、《長搭小典文彙》、《四五備體文□》、《陞官圖》、《廿四史政治新論大成》、《史論統編》、《□家必讀二三編》、《三通改洋節》、《中國電報匯編》、《分類尺》、《加批古文辭類纂》、《四書五經義精騎集》、《正續尙友錄》、《閒□光陰》、《中俄話本》、《中俄分類音韻集成》、《俄文變通就階》、《賦海統編》、《百鳥畫傳》、《申江勝景圖》、《孔公案》、《劉將軍地營圖》、《天文算學精蘊》、《詳註□求集》、《笑林廣記》、《鋤經堂文》、《沈選唐宋八家古文》、《經濟新論》、《□學答問》、《邊洋備考》、《校邠廬抗議》、《湯氏危言》、《新學準繩初二集》、《東塾讀書記》、《彭公案正續再續全四集》、《五大洲政治通考》、《欽定協記辦方》。

附錄三：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張純甫〈守墨樓書目〉所藏書籍及來源一覽表⁴
 (所在地在上海者以※註記)

小蘇齋	復古編。
川東官舍	集韻、類篇、禮部韻略。
三槐堂	清文彙書。
大中書局	文學常識、資治通鑑正／續篇、文學常識。
大達書局	智囊補、隨園隨筆、浪跡續談、戴南山集、今古奇觀、官場現形記、西洋通俗演義、分類宋人小說、六朝文絜、西洋通俗演義、續今古奇觀、宋人小說、燕子箋、官場現形記、本草問答。
※大達供應社	智囊補、正/續浪跡叢談、隨園隨筆。
大文書局	詳註白話詩經*2。
大明書局	義俠女子。
※大成書局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
※大通書局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大一統	儒林外史*2。
大泉書局	東塾讀書記。
※千頃堂	小爾雅疏、西南紀事、續左傳博議、急就篇補注、張氏二酉堂叢書廿六種、楹聯彙編。
※上海書局	皇清經解、綱鑑總論。
中外書局	實驗避妊法。
中山大學	客方言*2、湖南唱本提要*2、台山歌謠集*2、開封歌謠集*2、福建三神考*2、泉州民間故事傳說、孟姜女故事*2、紹興歌謠、泉州民間故事傳說。
中央大學	左侯家書、秋燈瑣憶。
中央書局	□燈瑣憶、南唐二主詩詞。
※中華書局	談天、談地、辭海、新式學生辭林、閩中金石記略、續古文辭類纂精華、列子精華、淮南精華、淮南集證、檀弓精華、楹聯名蹟、孫雪居行楷真蹟、同楷書前後赤壁賦、明拓史晨後碑、明拓乙瑛碑、明拓張猛龍碑、明拓嵩高靈廟碑、精拓夔龍顏碑、初拓夔寶子碑、精拓雲峰山詩刻、曹全碑、居古塔塔銘、周易古易、周易述、毛詩傳箋通釋、禮記集說、增輯左傳杜注、孝經鄭注疏、四書白話句解、孟子精華、廿四史、遼史、金史、清史列傳、國語精華、聖武記、東萊博議、老子古義、莊子精華、管子精華、列子精華、檀弓精華、淮南子精華、淮南集證、國音新字典、中華諺海、列子精華、淮南子精華、居士塢塔銘、

⁴ 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提供，筆者分類整理。

	聖教分類、孫雪居行楷、何子貞赤壁駢、史晨後碑、乙瑛碑、張猛龍碑、嵩高歸廟碑、鸞龍顏碑、鸞寶子碑、雲峰山詩刻、曹全碑、閩中金石略、中國畫學全史、中華大字典、詩歌易讀、詩歌發蒙、唐詩易讀、弘明集、推眠術、肺病療養法、康德傳、國語成語大全、國文自脩書輯要、婦女脩養談、烹飪一班、美國教育徹覽、戰後世界教育新趨勢、孟祿的中國教育討論、英國教育要覽、政治學大綱、世界文學家列傳、赫克爾一元哲學、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西洋古代中世哲史綱、漢官六種、談天、談地、新式學生辭林。
中華教育會	新青年的筆記。
中原書局	駢雅訓纂、歷代白話詩選。
※世界書局	後東塾讀書記、天工開物、文文山全集、蘇東坡全集、歸震川全集、朱舜水全集、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明鑑、廿二史劄記、古書字義用法叢刊。
王岩書局	豈好辯。
※文德堂	南史演義、自動車用品辭書、前五代演義。
文藝	古今文學美術人名辭書、今古文學美術名人辭書。
※文明書局	隨園詩音注、宋四□詩、古榻爭坐位、金冬心書畫小記、枝山古詩、宋帖集錦、文章天馬、陶心堂北□寺、徐熙百花圖長卷、國語詳註、戰國策詳註、宋四霸詩、陶心雲龍藏寺、徐熙百花圖、金冬心小記、祝枝山古詩、石庵詩稿、脩庵書譜、武穆行書、徵明對月、板橋夕照、元章天馬、元章檜贊、山谷蘭、山谷千峰、爭坐位帖、應酬聯文、義俠女子、山谷尺牘。
文瀾書局	史學叢書、明儒學案。
文來書局	史緯。
※文化學社	新學偽經考。
※文瑞樓	漢書補註、經傳釋詞、經義述聞、經籍纂詁、漢書補註、史通通譯、文字蒙求、孔子家語、宋元本書目行格表、才子尺牘、傷寒活人書、丹溪大法、亭林隨筆、顏氏家訓、明夷待訪錄、澄懷園語。
文奎堂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少記	明清山水□榻、明清山水畫幅。
元昌	聊齋志異。
天成書局	三希堂續法帖。
※天寶書局	戲畫、芥子園畫傳、四十八孝奸圖。
玉岩堂	豈好辯。
玉石社	周宣王石鼓文、碑法帖大觀。
玉簡齋	殷商貞卜文字考。

白蓮社	一切經音義。
台灣語研究會	台俚諺詳解。
台灣通信社	最近の歐米。
民智書局	育兒初範、美國勞工狀況。
平凡社	世界美術全集、書道全集。
北平民社	韻典。
北平故宮	清故宮古物書畫日□。
未學齋	古今類傳。
半畝園	小學類編。
出版協會	台灣の貿易基隆港。
※江左書林	初學記、算法統宗。
江蘇書局	倉頡字林合編、五子近思錄。
※江東書局	易經來註。
多伽	史微內篇。
全民書局	文史通義。
※有正書局	八大石濤畫合冊、清儀閣金石文字拓片。
有用書齋	環瀛志略。
旬刊社	人生指津。
寺田	人與猿。
守山閣	九國志、越史略。
光明莊	周禮節訓。
※光明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光華	元代奴隸考。
※同文書局	通鑑綱目正編*2、通鑑綱目續編*2、四書古註群義彙解。
竹簡齋	前漢書。
弘文館	和漢三才圖會。
仿古	蘇老泉全集、曾南豐全集。
宏文社	台灣通史。
宏大	坐花志果。
扶輪社	張氏適園叢書七種、花近樓叢書序跋記、東坡尺牘、林下清錄、塵餘。
※育文書局	清御纂五經、欽定五經。
※求古齋	嚴達□岳廟記、小佩文韻府、說文大字典、嚴達閔岳廟記、泰山金剛經帖、養生保命錄。
汲古閣	新五代史、南唐書、宋本說文解字。
侍經堂	山歌，
味經堂	詩緝。

兩儀堂	河洛理數。
尙友齋	釋史。
金筆軒	古今文字通釋。
金陵書局	元和姓纂。
延壽館	春秋氏族圖。
邵武書局	東南紀事、海東逸史。
※佛學書局	六祖壇經、楞嚴經、大乘起信論。
前川	蒙求校本。
南洋公學	原富。
南方大學	四聲等子。
郁文舍	會玉篇大全。
思賢書局	皮氏四種。
南海書局	南漢書。
研究會	朝鮮寶鑑、朝鮮文獻備考。
研究社	中國實用藥物學。
洛陽社	鐵海印譜。
洛東書社	墨場必携。
科學社	中國文學史。
紅玉堂	書畫鑑賞藝苑人名辭典、藝苑人名辭典。
郁文堂	小倉山尺牘。
郁文舍	日本外史（和文）。
述學社	古史研究二輯。
咫進齋	說文引經。
香港書局	清史攬要。
※亞東	神會和尚語集。
益元書局	公餘五種。
退補齋	增脩東萊書說。
振文	桐陰吟社甲乙編詩集。
振新書局	左傳事緯、字說、古今僞書考、易筋經八段錦、古泉叢話、
浙江書局	禹貢指南、四書反身錄、論語古訓、鄭康成佚書、稽古錄、明紀、姓氏急就篇、新方言。
師古書局	續漢書。
泰東書局	現代民主政治、治法、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
留餘草堂	金思節公語錄。
※掃葉山房	金壺七墨、宋元明詩三百首、正續詞選、人海記、我佛山人札記、易經本義、夏小正、全註讀書論略、鐘鼎字源、老子、莊

	子集釋、荀子、荀子集解、商君書、楊子法言、論衡、獨斷、四體大字典、宋元明詩三百首、正續詞選、書目答問、女誠淺釋、儒門法語、牡丹亭、酬紅記、人海記、溫熱暑疫全書、板橋雜記、男女百孝圖、金壺七墨、分甘餘話、冷齋夜話、庸閒齋筆記、我佛山人札記。
※商務印書館	國語文法、陶說、陸放翁全集、中國哲學史、裴將軍詩卷、東周列國、中國寓言、伊索寓言、錢南園墨蹟、何子貞書廖夫人墓志、吳昌碩花卉、□山賦詩、晉唐楷帖、錢南園書施芳谷壽序、初拓高湛墓志、易經、韓詩外傳、詩經之女性的研究、禮記集解、左傳通論、十三經白文、經今古文學、群經概論、國語韋解補正、戰國策補註、世界史、世界大綱、中古歐州史、說文解字、說文通檢、契文舉例、破音字舉例、汙簡、音韻學、莊子集解、墨子閒詁、墨子閒詁箋、墨學微、公孫龍子釋、新文化辭書、錢南園墨蹟、何子貞廖氏墓誌、吳昌碩花卉、祝枝山賦詩、小楷正則、魯公裴將軍詩、晉唐楷帖、錢南園芳谷序、高湛墓志、新俄羅斯、實用主義、笑之研究、動的心理學、群眾心理、社會心理學、分配論、物質與記憶、新俄遊記、宋元學案、中國哲學史、陶說、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東周列國、梨園佳話、心經六家注、正續淨土津要、中外病名對照表、讀書輯略、名學淺說、穆勒名學、儒教與現代思潮、社會進化論、西洋演劇史、國語文法、中國古代法理學、國學研究會講演錄、狄雷博士講演錄、三百篇演論、生與死、富之研究、天演論、天文學、倫理學原理、西洋倫理學小史、政治汎論、政治學大綱、政治中之人性、公共意見與平民政治、新德國社會民主政象記、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近代文學思潮、教育哲學、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心理學大綱、心理學概論、馬氏文通、畏廬論文、大清會典、元代白話碑、履園叢話、東坡志林、塵史、畏廬瑣記、庸庵筆記、老學庵筆記、中國寓言、伊索寓言、正續巧對錄、世說新語。
淮南書局	音韻闡微。
掄元堂	禮記會元。
通志堂	春秋集註、春秋詳說、春秋皇綱論。
通元書局	通鑑輯覽。
敏德堂	外科全生集。
望仙館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淞隱閣	國朝名人著述叢編。
※國學館	西域爾雅。

※國民局	閱微草堂筆記、
崇文書局（湖北）	尚書大傳、太玄經、易林、風俗通、傅子續孟子、古今注牟子、枹朴子。
崇文書局	經典釋文、九經三傳沿革例、十六國春秋、水經注、葬經宅經。
教育學會	帝範。
※涵芬樓	隨隱漫錄、朱文公校昌黎集、周易、尚孔傳、大戴禮記、孟子、經學歷史、汲塚周書、穆天子傳、吳越春秋、廣韻、大廣益會玉篇、釋名、方言、同文韻統、老子、慎子、尹文子、鄧析子、新語、申鑒、中論、伊川擊壤集、太古集、涑水記聞、隨隱漫錄、仇池筆記、潛夫論。
※開明書局	中國歷代年號索引、戴東原二百年生日、清人絕句選、十三經索引、中國歷代年號索引、清人絕句選、看雲集。
博文館	日本大玉篇*2。
博信堂	老子翼。
富田	日本外史（漢文）。
復古齋	五十名家手札。
貫吾齋	九通。
景山	諸子辯、詩疑、諸子辨、戴氏三禮。
華美書局	通鑑綱目正／續篇。
普益書局	酬世錦囊。
進步書局	石庵習字。
聖書公會	新舊公會。
鼓山	墨場必攜菜根譚、菜根譚。
新月書局	古史研究。
新華書局	宋宮十八朝演義、宋宮十八朝演義外集。
新聞紙	金魁星。
新高堂	日語便覽。
新樸學社	兩漢尚書*2。
新文化社	老殘遊記、宣和遺事、格言聯壁、太平天國文鈔、求闕齋讀書錄、世說新語。
新民報社	陶村詩稿。
新文學社	台灣民間文學集。
群山堂	左氏會箋（日本漢文大系）。
※群學社	顏習齋集、朱舜水集、書經簡明白話解。
※會文堂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醫部全錄、女四書白話解、正／續楹聯叢話。
慎初堂	經典集林。

慎記	廿四史論贊。
經世社	臺灣誌。
萬卷樓	春秋大事表。
彙賢齋	十國春秋。
傳奇社	桃花扇。
傳經堂	山歌。
鄂官書	孔叢子、鬻子、白虎通。
廣百宋齋	四書朱子本義滙參、洪經略奏對筆記。
※廣益書局	七修類稿、竹垞詩話、祝枝山詩文集、紀曉嵐詩文選、呂氏春秋集解、韓非子、淮南子、鏡花緣、燕山外史、樊山賞心閒樂集、當代名人事略、淮南子集解、韓非子集解、呂氏春秋、俗語典、樊山賞心集、龍文鞭影、鏡花緣、留青新集、醫門律法、中西滙參、冤童洒、藝丹雙掛。
廣雅書局	西魏書、續唐書、歷代史表、元史氏族表、墨緣彙觀。
臺日社	臺陽詩話。
嘉業堂	春秋穀梁疏。
暨南大學	中華民族之國外發展。
幕園	闡義。
漁古書房	隸辨。
輔仁堂	莊子因。
※蜚英館	皇清經解續編、古經解彙函、說文解字段注、群書拾捕。
粵雅書局	周官新義。
圖書局	九通目錄、六通訂誤、霍亂論。
圖書會社	地理の學習指導。
緯文閣	三才略、溫熱經緯。
嘯園	金壺子考。
樸社	粵風、子略、戴氏三種、詩辨妄、子略、四部正偽、三訂國學用書撰要、粵風。
積山書局	毛詩品物圖考、說文釋例。
※錦章書局	禮記節本、蘇批孟子、史記菁華錄。
學海書局	國醫小史。
※點石齋	日知錄集釋、前漢書、後漢書、淵鑑類函、佩文韻府。
營造學社	園治。
※鴻寶齋	詩經世本古義、四書備旨、欽定七經、經解入門、清三通、本草綱目。
※鴻文書局	二十五子、續二十五子彙函。
鍊石書局	溫病條辨。

雜誌公司	宋六十名家詞、李氏□書、鍾伯敬全集、唐詩記事、唐詩紀事、元人雜劇全集。
襟霞閣	紫桃軒雜綴、梅譜、鼎錄、紫桃軒雜綴、群芳清玩。
簡玉山房	說文經典異字釋。
醫學書局	六道輪迴錄、感應篇續義、如來成道記、無常經、觀音經箋注、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法華三經、佛學起信論。
瀛社	詩海慈航。
寶文館	中等東洋史、難經脈訣、近代七言絕句初集。
蘇州書局	儀禮章句。
鑄成書局	周禮正義。
※鑄記	五方元音。

